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5 / 01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第31卷 第1期 (总第152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程建军

副主任 刘守旗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家军 尹坚勤 方露娜

冯保善 刘守旗 李洪天

张广才 张勤 沈仁国

周韵 周成平 黄正平

黄光耀 程建军 蔡飞

主编 程建军

执行主编 吴春浩

#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 【政治学研究】

- 邓小平政治改革思想的起源与演变 ..... 汪春劼 魏忠(1)
- 论“双百”方针的历史建构与转变之原因 ..... 孟令蓉(5)
- 社会转型视域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研究 ..... 司甜(11)
- 

## 【哲学与宗教研究】

- 科学问题的逻辑系统构造 ..... 沈振东(15)
- 从新教三大教派看宗教改革对西欧社会转型的意义 ..... 桑田(22)
- 韩非和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之比较 ..... 刘赢(26)
- 

## 【历史与文化研究】

-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持海外侨校的举措试析  
——以侨务委员会为核心 ..... 关冰 陈国威(29)
- 浅析汉代服饰中的紫色应用  
——以考古学为视角 ..... 郭美雅(35)
- 

## 【社会管理研究】

- 经济欠发达地区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研究  
——以驻马店市为例 ..... 叶亚杰(39)
- 人的安全研究:渊源、概念与特征 ..... 邢瑞利(44)
- 服务提升视角下的电子政务完善研究 ..... 杨军(50)
-

---

---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冯保善

- 《镜花缘》的文昌、魁星信仰与科举人格 ..... 王学钧(56)
- 论明清小说中的民间制度文化语汇 ..... 韩希明(62)
- 《西游记》情爱世界与游戏世界的同构 ..... 丰 竞(67)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郁达夫旧体诗研究百年史述 ..... 蒋成德(71)

---

**【外国文学研究】**

- 访谈:跨学科研究与专业建设 ..... [美]托马斯·德皮耶罗 周 韵(83)
- 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福克纳短篇小说 ..... 薛瑞东(86)
- 哈金小说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许 铨(91)
- “道”载万物  
——论库切的动物观 ..... 洪 芸 姜礼福(98)
- 向死而爱  
——论《灿烂的星》中死亡与永生的对立统一 ..... 方娇艳(104)

---

**【美术研究】**

- 早期现实主义油画本土化进程及当代性演变 ..... 朱 平(108)
- “以中为本”“以今为魂”  
——论关山月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的发展观 ..... 张曼华(113)
- 霍利·霍比的迷人世界  
——图画书《嘟嘟和巴豆》艺术性简析 ..... 贾如丽(117)

- 2014 年社会科学总目录 ..... (120)

## Main Contents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eform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 WANG Chun-jie WEI Zhong( 1 )
-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Adhering to the Party's Mass 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 SI Tian( 11 )
- Significance of the Religious Reform to the Transition of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 SANG Tian( 22 )
- Comparison of Utilitarianism Between Han Fei and Jeremy Bentham ..... LIU Ying( 26 )
- Research on the Measure of Suppor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With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at the Core ... GUAN Bing CHEN Guo-wei( 29 )
-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Infringemen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Disabled  
in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Zhumadian ..... YE Ya-jie( 39 )
- Study of Human Security: Origin,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 XING Rui-li( 44 )
- Perfection of E-government from the Angle of Service Promotion ..... YANG Jun( 50 )
- Wen Chang, Kui Xing Beliefs and the Intellectual's Personality under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Flowers in the Mirror ..... WANG Xue-jun( 56 )
-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Academic Project Development ..... Thomas De Piero ZHOU Yun( 83 )
- The Domestic Research Overview of Ha Jin's Novels from 2000 to 2014 ..... XU Tan( 91 )
- Love to Death  
——An Analysis of The Paradox of Death and Immortality in Keats's Bright Star ... Fang Jiao-yan(104)
- Loc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he Early Realist Oil Painting ..... ZHU Ping(108)
- 
-

## 邓小平政治改革思想的起源与演变

汪春劼 魏 忠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 20世纪60年代末邓小平流放江西,这让他开始对盛行多载的极左思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有了大彻大悟的反思,产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想法;70年代末,邓小平出访日本、新加坡、美国,强烈感受到中外经济的差距,由是他对政治改革的迫切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可政治改革异常复杂,年迈的邓小平对此极其谨慎。当今,在经济改革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进行以制约权力、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公开性、透明化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既具有了更好的基础,也显得更为紧迫。

**[关键词]** 邓小平; 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 起源; 演变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01-04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宏伟蓝图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正因如此,他的文集中提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多达七十多处,而直接论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原因、目标、基本思路等内容也有三十多次。”<sup>[1]</sup>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府机构等等。但是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显得比较滞后。本文通过分析邓小平政治改革思想的背景、原因、动力以及对其政治改革实践的“复盘”,来思考中国政治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 一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而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经历、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是紧密相连的。邓小平是20世纪的见证人,他16岁出国,在法国留学期间,因生活的艰难,他没有机会去高等学府深造,20岁投身革命后,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他更没有时间集中学习,所以他非常坦率地说道:“我读的书并不多”<sup>[2](P.382)</sup>。从他留给我

们的巨大精神财富《邓小平文选》三卷本中,可以看到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刻意要建构一种什么体系的滔滔巨论,也没有那些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鸿篇说教,有的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而说出的实实在在的大白话,通俗易懂,文如其人。”<sup>[3](P.10)</sup> 邓小平是一个不善言谈但非常务实的政治家,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过人的才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他的果断、魄力,使他能脱颖而出,成为毛泽东以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领导一个东方大国取得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中国的辉煌成就都是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而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形成和能为全党、全国民众所接受,都是与那场刻骨铭心的大动乱分不开的。应当说,20世纪60年代前后,权力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模式以及对阶级斗争的过分追捧、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等因素的叠加,使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上风,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对此也是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剥夺了工作机会,丧失人身自由。尤其是1969年10月,年过六旬的他被下放到了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收稿日期]** 2014-11-12

**[作者简介]** 汪春劼,男,安徽怀宁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魏 忠,男,江苏镇江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其后三年间,家庭不能团圆,子女流落各处,“在其一生最痛苦的时候”<sup>[2](P.54)</sup>,他对中国的基层民众生存的艰辛与极左路线的危害都有了更深的感受与认识。一次邓小平想为受迫害而双腿瘫痪的儿子邓朴方找点事儿做,就问自己的工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这让他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了,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sup>[4]</sup>1986年,82岁的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非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sup>[2](P.265)</sup>

浩劫过后,民族从愚昧麻木中觉醒了,转而是—场痛苦的反思——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缺乏生产的积极性?为什么人民共和国还会出现“文革”这具怪胎?为什么我们的党不能抵制“文革”这场灾难?“文革”的源头在哪里?怎样才能彻底铲除“文革”发生的土壤?

这些不容回避的问题苦苦纠缠着洪水退去后的中国思想界,也苦苦纠缠着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各层人士。不错,“文革”这场灾难的发生同毛泽东失误紧紧相扣,但如果把这一切完全归咎于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身上,又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它在监督制衡、集体决策、民主公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对极左思潮、个人迷信的泛滥成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健全的政治体制可以及时修正错误的决策,防止失误的蔓延;而不健全的政治体制却没有一种纠错机制,它易使失误长期化。有着强烈平民意识与愤世情怀的毛泽东,在他的晚年,正是因为“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sup>[5](P.293)</sup>邓小平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sup>[6](P.60)</sup>所以制度比人更重要,法治比人治更根本。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以后,作为一个对自己民族极为忠诚的政治家,他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国家和共产党内部都必须建立一种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到个别领导人手中,而又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使

国家和民族卷入一场灾难。因此,他意味深长地告诫全党:“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sup>[5](P.227)</sup>由这场亲身经历,几经沉浮的邓小平酝酿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的‘意识结构’变化了,文革的灾难恐怕已经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非变不可’的意识上的逼切感。这是物极必反。这种意识结构造成改革的最有力的条件。”<sup>[7]</sup>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邓小平顺应了时代潮流,准备着力改变苏联模式下所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缺少制衡的政治体制。可以说,邓小平政治改革的思想是他“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在对中国现实的基本问题的反思中逐步酝酿产生的。”<sup>[8]</sup>

## 二

如果说极左所造成的历史教训、自身受打压的遭际使邓小平开始思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产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想法,那么中外发展的差距、现实的疾瘤则使他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邓小平年轻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短期学习,他对外国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1975年5月,年过古稀的邓小平重访法国,他目睹了法国的巨大变化;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考察了八天,日本经济的发达、基础设施的先进,让他感触极深,11月他又接连考察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此年底他在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sup>[9]</sup>1979年2月,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作为一个有着宽阔世界眼光,并以世界为背景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政治家,邓小平强烈感受到了中外经济的巨大差距,他对使中国人民的工作积极性被压抑被束缚、使中国的发展受限制的极左路线及其危害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国门外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希望”<sup>[10]</sup>,为使中国早日摆脱贫穷,缩小同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邓小平越加觉得必须改革开放,“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改革开放步子的迈出不仅是对于过去错误的反省,而且也在于对变化着的时代和世界形势的认识。”<sup>[11]</sup>

发展生产力,让人民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与动力;有着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可到文革结束后,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中国与日

本、新加坡、欧美等国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加大，这一切都让邓小平感受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非改不可了。1978年12月2日，他告诉那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sup>[12]</sup> 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支持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必须改弦辙。

经济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经济改革的推进与成功，需要大量的干部解放思想，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个好的政策制订、执行、反馈，一个社会的治理、疏导都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他们必须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乐于奉献、纪律严明，他们是群众的表率，正是靠了一支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共产党人才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然而成为执政党以后，一些干部蜕化变质，尤其是10年文革，更使干部队伍受到污染，一些干部考虑更多的是个人的享受、小集团的利益，他们工作不力，缺乏干劲。对此，邓小平深有感触：“现在国际国内普遍都感觉到我们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到处靠开会画圈过日子……”，“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sup>[5](PP.287-288)</sup>。“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叠，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sup>[6](P.230)</sup> 官僚主义不仅阻碍了改革的进行，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

官僚主义是人民的大敌，是国家的大敌。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对官僚主义的冲击、讨伐，但官僚主义并没有寿终正寝，而是在“抑制——膨胀——再抑制——再膨胀”的圈子里循环不已。实践证明，那种仅从体制外采取行政手段、思想教育、道德批判、群众运动或阶级斗争的方法，只能在短期内遏制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从全面、根本上看，解决不了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从过去反官僚主义的经验教训中，邓小平改换了思路，那就是从官僚主义的源头、根子入手。他说，不健全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sup>[5](P.288)</sup>，“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5](P.293)</sup>。因此，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规章制度，从而堵塞官僚

主义滋长的空间，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与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弊端。

### 三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邓小平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专门做了题目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基本目标和方法步骤。“但由于这次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成果，从总体上讲，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sup>[3](P.225)</sup>。

另外，与当时经济体制的增量改革所带来的共赢局面不同的是，政治体制所做的存量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sup>[2](P.176)</sup>，在中央内部意见不一，反对声音还很强大之时，有着极高政治智慧的邓小平，在政治实践上极其谨慎。

邓小平一生中谈政治改革最多的时候是1986年，这年9月至11月，他四次谈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sup>[2](PP.176-180)</sup>。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建议，1986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研究和论证，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正式确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1986年邓小平之所以对政治改革强调比较多，原因主要在于，党的十三大即将召开，中央人事安排正在紧张筹备中，党中央内部“杂音”较多，

对此,已是耄耋之年的邓小平为了使改革开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使改革的倡导者有更大的施政空间,用政治改革的旗帜来占领改革的制高点。直到1992年,面对中国改革的停滞徘徊,88岁高龄的邓小平离京南下,发表了震撼人心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再出发大声呐喊,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sup>[13]</sup>邓小平本人亲自将其定为《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本身就有着极深的政治寓意。

#### 四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持久战,是一个全面系统工程。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sup>[2](P.237)</sup>“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sup>[2](PP.176-177)</sup>但是政治改革必然要触及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与既得利益,导致其操作异常困难,面对这个不是加法而是减法的棘手难题,邓小平坦言,他对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完全理出头绪”<sup>[2](P.179)</sup>。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用生产力去衡量一切、评价一切,不要拘泥于空洞的僵化的教条争辩。但对于政治改革,邓小平却没有提及。作为一个年迈的老人来说,“这种选择,可能不是完全自觉的,也许是无奈的。”<sup>[14](P.8)</sup>邓小平百年华诞之际,作为改革排头兵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感言道:“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不亏为“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但“人无完人”,任老认为邓小平“过”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而“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sup>[14](P.8)</sup>

今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都源于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源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接受与确立。在经济改革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进行以制约权力、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民主

性、公开性、透明化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既具有了更好的基础,也显得更为紧迫。从邓小平政治改革的实践中,我们既感到政治改革的曲折艰难,也感到政治民主化在中国的任重道远。我们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但我们更不能放弃或延缓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自我完善,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sup>[5](P.288)</sup>。

#### [参考文献]

- [1]张叶婷.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6).
-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卫炜,刘客.邓小平理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4]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 [7]金耀基.中国人的三个政治[A].金羽,等.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C].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 [8]高屹.邓小平理论发展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 [9]林重庚.序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A].吴敬琏.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回顾与反思[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1]胡振平.时代的跨越[A].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 [12]杨天石.邓小平写真[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 [13]郑必坚.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第三卷的一点回忆[A].郑必坚,等.著名学者回首百年邓小平[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 [14]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J].同舟共进,2004(8).

(责任编辑 光 翟)



# 论“双百”方针的历史建构与转变之原因<sup>\*</sup>

孟令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 广东广州 510665)

**[摘要]** “双百”方针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际、在国内外双重因素影响下建构的。它是党在科学、文艺领域的领导方针和建设民主政治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国式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的一次有益探索。但该方针在反右派扩大化中迅速发生逆转,进而名存实亡。当前考察“双百”方针历史建构及其转变原因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双百”方针; 毛泽东; 历史建构; 逆转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05-06

“双百”方针是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际、在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建构的。它是党在科学及文艺领域的领导方针和建设民主政治的治国方略,更是对中国式的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的一次有益探索。但该方针在反右派扩大化中迅速发生逆转,进而名存实亡并由此产生深远影响。及至当前,考察“双百”方针历史建构及其逆转原因仍具有重要意义。

## 一、“双百”方针的建构背景和过程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吸引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以期在科学和文艺发展领域营造起宽松的、开放的民主氛围。

### 1. “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首先,“双百”方针是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在经济上迫使中共反思和突破苏联模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外,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同样也造成了一种以苏为鉴、打

破专制、发展民主的政策改革要求。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文首所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sup>[1](P.23)</sup>随后,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会谈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过去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目前对斯大林的批评,“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sup>[1](P.127)</sup>。即使在“双百”方针宣讲过程中,毛泽东也一再提醒要谨记苏联的教训,认为在列宁死后的一段时期内,苏联的内部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中有各党各派,社会生活中可以说各种话,甚至可以批评政府。之后,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搞愈加专制,不仅不能“百花齐放”,而且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风吹草动都是反革命。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混淆所致。鉴于此,他希望把中国建构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群众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敢于发表意见。并坚信一旦采取这一方针,中国的文化、科学、经济、政

<sup>\*</sup>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前苏联经典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4CDJ005)。

[收稿日期] 2014-11-12

[作者简介] 孟令蓉,女,江苏常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法学博士。

治,乃至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多地、快地繁荣起来。<sup>[2]</sup>可以说,“双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突破苏联式的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主义,建立生动活泼的文化和政治局面的需要。

其次,“双百”方针是在纠正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过程中形成的。三大改造完成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过渡性的文化政策,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此之中,尤以改造旧文化为主要任务。1951年,党开始对旧有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实为从思想和灵魂的深处,帮助他们祛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旧思想的影响。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颁布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而文化领域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改造运动,其矛头指向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党先后发动了两次思想斗争,皆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先是1954年10月对俞平伯、胡适思想观点的批判,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sup>[3]</sup>(P.312) 后是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认为它“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sup>[4]</sup>(P.33)。但对上述文艺思想的批评,迅速转变成政治运动,进而形成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可是,在上述文化改造运动中,“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不断滋生,导致在文化界出现比较沉闷的局面。与之相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并进入经济建设的高潮期,全国人民的热情极其高涨。经济领域的热火朝天和文化领域的沉闷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迫使中国共产党反思和调整过去较“左”的文化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双百”方针正是这一政策调整的产物。

再次,“双百”方针是在毛泽东对国内局势乐观估计的条件下提出的。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得到完成。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改造,这是毛泽东不曾料想的。更令他欣慰的是,如此短暂剧烈的社会运动,不仅没有造成苏联式的社会动荡,反倒是资本家们“敲锣打鼓、服服帖帖”地接受改造,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们积极响应号召“跑步进入了社会主

义”。这就使得毛泽东对国内政局评估过于乐观。在他看来,“(经过改造,)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以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sup>[5]</sup>(PP.514-515)。简言之,当前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并不代表阶级斗争就没有了,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只是现在将这一斗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毛泽东认为,比起苏联当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过“左”的做法并引起了不良的后果,他把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慢慢化掉”的做法要更为高明。对此,毛泽东非常自信,在中国一定可以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各种意见在媒体上刊发,或开座谈会评论,且不会把天下搞乱。因为,“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sup>[6]</sup>(P.158)。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并在党内极力推行之。

## 2. “双百”方针的建构过程

“双百”方针的提出经历了酝酿准备的过程,率先提出的是“百花齐放”方针。1950年,戏曲界围绕京剧发展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一种观点主张要将包含糟粕在内的京剧遗产全部继承,另一种观点基于京剧是封建主义的而倡导全部取消。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借此解决了这场争论,并要求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戏曲遗产,繁荣各种戏曲形式和艺术风格。不难发现,此时的“百花齐放”方针,只是用来解决戏曲界的戏曲形式并存发展的问題,还没涉及到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但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已经初见端倪。

1953年,毛泽东又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就提出的缘起而言,先是起始于时任历史研究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办刊方针,毛泽东答以“百家争鸣”四字而起。后涉及到苏联在华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认识分歧,主要是对毛泽东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观点表示了异议。当时的中山大学党委认为,此种观点有损于党的负责同志的威信,询问中央是否有必要向尤金反馈。此时正值酝酿“双百”方针之时,毛泽东明确批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

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sup>[7](P.40)</sup>及至1956年2月,国内思想界又发生一次争论,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提出了迥异的想法,“有些同志要中央宣传部决定谁对谁错”。陆定一随即报告中央,并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建议“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决定”。<sup>[8]</sup>对此,毛泽东风趣地答复说,即使让马克思来当中宣部部长,让恩格斯和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如此众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应该是百家争鸣的。这就确定了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和国家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在2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sup>[1](PP.54-55)</sup>同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双百”方针是我们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根本方针。他强调,现在春天到来,就应该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或几枝独放;百家争鸣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对于各种或正确或错误的学术思想,都要不加干涉并准许他们言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是一样的。由此,中共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文化方针在党内确立下来。

## 二、“双百”方针的建构成果和科学蕴意

### 1. “双百”方针是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正确方针

“双百”方针首先符合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文化本身具有相对特殊性和独立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风格,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另一种风格,是不利于科学和艺术的健康发展的。而且许多新生事物,在发展的早期往往是被批评的。对此,毛泽东进行了丰富的例证。他认为,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哥白尼的天文学,从意大利的伽利略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初都是得不到世人的承认。因为,凡是新生力量要得到社会的承认,都是要经过艰苦奋斗的。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社

会,目前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容易碰上官僚主义者和顽固派。基于此,毛泽东强调大凡科学上的、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并切忌轻率结论。

如果就“双百”方针的本质内涵的概括而言,是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率先作出完整阐述的。他认为,所谓“双百”方针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允许各种学术思想、流派“自由争鸣”,各种文艺题材、形式、手法或风格“自由竞赛”,“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sup>[9](PP.501-502)</sup>。上述一连串的“自由”,表明了“双百”方针是尊重科学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民主领导方式。

“双百”方针提出后,虽然得到科学和文艺界的广泛支持,但遭到党内有些人的不解甚至是抵制,部分知识分子对其顾虑重重。1957年1月7日,陈其通等四人在《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批评了他们认为的一些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而青年作家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也遭受到批评和围攻。这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双百”方针的贯彻任重道远,尚处于乍暖还寒的早春料峭之中。对此,毛泽东多次提出批评,并进一步阐释“双百”方针,认为陈其通四人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不仅“粗暴不讲理”,更是对“双百”方针实行的阻挠。尤其是他们“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的看法,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双百”方针。对此,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的对立统一的角度强调,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事善人是同恶事恶人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同丑恶、同谬误、同唯心主义、同形而上学见面,是很危险的政策,这将引起人们思想衰退。思想硬化,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sup>[6](P.346)</sup>这些论述事实上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强调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外,毛泽东还着重从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在思想界和文艺界占主要的和统治地位的思想。他认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

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sup>[6](P.350)</sup> 这事实上已经将文化分为两个派别,对“双百”方针的外延做了一定的修改。

## 2.“双百”方针是民主治国的基本方针

“双百”虽是党对文化科学领域提出的方针,但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性的治国方略,它既区别于专制、僵化的苏联模式,又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是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政策建构。

那么,“双百”方针是怎样突破界限,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方针的呢?首先,“双百”方针是在苏共二十大暴露苏联模式弊端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以苏为戒、避免出现苏联那种不敢讲话,不能批评的专制主义的产物。因而,从“双百”方针的提出背景来看,毛泽东早就赋予其远比文化方针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其次,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但判断“香花毒草”的标准是有阶级性的。<sup>[1](PP.233-234)</sup> 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宪法原则下的“六条标准”,即要有利于团结人民、社会主义事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民主集中制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不难发现,经过毛泽东诠释的标准,使得字面上的文化方针成为了有阶级性的政治方针。再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后,毛泽东又建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传达贯彻上述讲话精神,研究国内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sup>[10](P.1595)</sup> 在此次会议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目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sup>[11](PP.122-123)</sup> 这就明

确将“双百”方针纳入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框架之下,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述“双百”方针的崭新的政治功能。随后,毛泽东又开始了为期四天的南下宣讲,每到一处,必谈“双百”方针。在南京讲话和上海讲话中,他一再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要求不管是纯粹科学艺术问题,还是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都可以自由讲话,采取民主的方法。从这四天的宣讲中,毛泽东进一步肯定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双百”方针的政治性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可见,“双百”方针最初是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民主方针,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决定了其具有更深层次的蕴意,“双百”方针演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政治方针,并逐步凸显和强化其政治性功能。这一方面是我国政治民主的一次有益探索,但同时也为后来的逆转埋下伏笔。

## 三、“双百”方针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在毛泽东大力推进“放”的方针之下,全国各地逐渐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并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然而,“双百”方针在整风运动的初期成为帮助党整风的方法,但整风转为反右运动后,“双百”方针却产生了转变,与原先的民主方针彻底背道而驰。

### 1.“双百”方针的转变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整风的指示,确定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作为帮助党整风的一个口号,简化为‘鸣放’”<sup>[12]</sup>。4月30日,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面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代表,毛泽东要求他们积极参加“鸣放”。毛泽东认为能否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几天以后,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动员党外人士积极参与“鸣放”。可以说,此时的“鸣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代名词,即鼓励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工作错误缺点提出批评。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掀起一轮“鸣放”的高潮,中共中央还将“鸣放”出来的言论集中登载在各大报

纸上。对此毛泽东则坚信：上述做法一旦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可以说，在整党前期，“鸣放”既成为全党整风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学会该方法，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标准。

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改变了毛泽东原先的乐观估计。付诸报端的一些发言、报道和评论，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印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全局性的危机。甚至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煽动学生罢课上街、工人罢工。对于该局面，完全是毛泽东未曾料想到的，由此形成的极大反差，导致其对国内形势作出与原来截然不同的严重估计。5月14日和16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和《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鸣放”的目的转变为“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sup>[11](P.273)</sup>。为此，“鸣放”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由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转变为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在反击右派的过程中，“鸣放”转变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为“四大”）的形式。“四大”与“双百”方针所蕴含的“平等对话、自由讨论”等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渐行渐远，是对“双百”方针的逆转。所以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sup>[8]</sup>

## 2. “双百”方针转变的原因分析

“双百”方针为什么会在整风运动中发生转变，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毛泽东的影响、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以及“双百”方针本身的理论缺陷有关，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波匈事件与国内知识分子的骚动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严重估计。波匈事件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觉，进一步加深了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认识，并意识到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开始阶段，毛泽东认识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反官僚主义方面。因为，中国若发生匈牙利式的事件，其主要危险是党内官僚主义使党群关系恶化，从而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而克服之道就是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加之，毛泽东非常自信，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

国业绩，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发生，更不会出现如其严重的情况。因此，毛泽东提出要用“小民主”的“鸣放”方式，发动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过火的批判和言论，如少数人提出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平分秋色”等。这不得不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趋于严重的估计，强调反击势在必行，否则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发生了。5至6月间，毛泽东开始积极部署和领导反击“右派”问题。6月8日，毛泽东指示用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大鸣大放”，“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然后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反击，打“一场大战”<sup>[11](PP.285-286)</sup>。在这种情况下，“双百”方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武器。

另一方面，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又开始发挥作用。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谈及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时就说过：“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sup>[13](P.114)</sup>从此，阶级斗争的观点就浸透于毛泽东的政治韬略，伴随着他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双百”方针虽是针对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民主方针，但其理论基础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成果。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政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的，两类矛盾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基于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双百”思想的系统性：对立统一（矛盾法则）——阶级斗争——两类矛盾——“双百”方针。在此之中，阶级斗争是处于中心的位置，也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的主要表现，而两类矛盾和“双百”方针则是阶级斗争观点的“解释和发展”，它们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sup>[14](P.52)</sup>为此就不难理解，原本是一种不同以往阶级斗争的工作新方式的“双百”方针，很快就成为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好方法。

而“百家”变成了“两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sup>[11](P.116)</sup>“百花”变成了“香花”和“毒草”。“双百”方针实质上变为“鲜花”和“毒草”的斗争，变成了两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较量。在反右派运动中，“双百”方针彻底演化为“大鸣大放”的阶级斗争形式。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明确：“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sup>[11](P.598)</sup>所以，“双百”方针本身就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维的产物，最终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其必然结果。

同时，“双百”方针自身的理论缺陷也是造成其被逆转的原因。陆定一曾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方针，不是政治斗争的方针。”<sup>[8]</sup>有人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双百”方针的逆转是因为没有一以贯之的坚持它是一条文化方针，与政治扯上了关系。问题的关键真的是这样吗？周恩来就曾指出：“艺术形式也只能根据它原有的形式逐步提高，不能生吞活剥地改造。”<sup>[15](P.55)</sup>高尔基在谈科学与政治之关系时 also 说道：“当科学闯入或被强力拉入政治的血腥泥潭时，受害的不只是科学本身的纯洁和自由，受害的还有人类所有的最好的理想和希望，全世界的理智都会受到损害”<sup>[16](P.224)</sup>。这就是说，“双百”方针如果能与政治撇清关系，它就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但是，即便从纯粹的文化方针来看，“双百”方针本身也存在着理论缺陷。在其确立之初的政策内涵中，对于何谓学术标准，何谓艺术标准，没有做出科学的界定；同时，对于一些操作性的问题也没有加以厘清，如“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否意味着对“价值多元”的合理性的承认；确立能参与齐放的“花”和能合法参与争鸣的“家”的标准又是什么，标准又是由谁来设立和解释等。<sup>[17](P.63)</sup>可以说，这就决定了即便“双百”方针的内涵没有扩大，也很难在实际操作中获得成功。问题是，“双百”方针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方针，它的政治功能蕴含其中并逐步突显和强化。因为作为“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主体——知识分子，是有立场、有世界观的主体，对其的定性问题在我国从来都是政治问题，这就使问题变得极其复杂。作为一个政治方针，毛泽东对其作了一个补充，即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以后还成为给右派分子定性的依据。这六条标准，概括的极其全面，但又抽象而笼统。这就给以后的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留下了巨大的政策空间。因此，“双百”方针自身的理论缺陷就决定了在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下被逆转的历史命运。

#### [ 参 考 文 献 ]

-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57-3-20(1).
- [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4]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5]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7]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8]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N].光明日报,1986-5-7(3).
- [9]陆定一.陆定一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0]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12]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J].新文学史料,1995(1).
- [13]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 [14]王也扬.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J].中共党史研究,2000(3).
- [15]周恩来.周恩来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16]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17]罗建平.“双百”方针的政策问题建构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责任编辑 光 翟)

# 社会转型视域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研究

司 甜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 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 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基础与保障,为民主决策提供有效的参与模式。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尤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党密切联系群众面临时代的挑战,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群众基础复杂化,干群矛盾冲突加剧,社会纵向流动通道阻滞,权力行使不公与腐败现象严重,导致传统政治权威大量流失。我们应从建立畅通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流动机制,转变党群沟通方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遏制公权力异化等方面入手,对党群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反馈和科学预测,并不断探究建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使践行群众路线具有长期性和常态性。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群众路线; 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11-04

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利益多元化,利益矛盾突出,能否很好地贯彻群众路线,不仅考量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直接体现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政治发展的水平。我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一场运动,因为“运动式思维模式”已不适当今时代的发展,我们更需要通过此次教育实践活动,从根本上促使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的构建,使党和政府工作方式和效能得到根本性转变,以制度的形式坚持发展党的群众路线。

## 一、党的群众路线蕴含的时代价值

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群众路线是我党信守的政治价值理念,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时代挑战,党如何作出令人信服的时代提升与应对,是当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1. 群众路线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基础与保障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取过程,经历了由取得社会权威、形成社会权力、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并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权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群众工作贯穿始终。民意认同是一个政党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靠艰苦的群众工作获得合法性,这不仅保障了中国革命在物质经济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而且在中国共产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执政合法性已经具有法律保障之后,群众的拥护是党的真正优势,这使得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法律基础和民意认同基础。

马克斯·韦伯认为:“民众对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虽与内在的纯精神的信仰、信念有关,但不可回避与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有关。”<sup>[1](P.64)</sup>因此,政治统治能否满足社会占绝大多数人民的功利性要求是其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大动因。政党合法性基础的维系已经转向建立在代表人民的利益意志、借助人民授予的政治权力实现法理型统治的意义上。在利益变动加速的社

**[收稿日期]** 2014-10-10

**[作者简介]** 司甜,女,江苏徐州人,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

会转型期,作为长期执政的大党,要密切关注着转型期各阶层利益变动和调整的变化,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实现执政理念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提升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 2. 群众路线为民主决策提供有效的参与模式

民主的精神实质是平等,民主理念应用在群众工作中就意味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法权意义上是平等的,他们平等地享有权利,也平等地履行义务,而不是党员干部享有“管制”群众的特权。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已不满足于仅仅听命于各级组织和领导人的安排,民主决策显得尤为重要。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群众的利益诉求,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群众工作。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阶层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求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性问题,都必须反复调查,充分论证,统筹兼顾。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以民为师,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如果群众能够参与政治并发挥影响,那么各级领导者就会对授予、监督他们权力的人产生敬畏之感,就会意识到“权为民所赋”,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从而充分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

## 二、坚持党密切联系群众面临的时代挑战

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脱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执政风险,尤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种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产生严重的冲击,使党群关系更加复杂,以致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突出。

### 1. 社会阶层分化,群众基础复杂化

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等地位的人占有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诸多方面的不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元化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单一,利益结构简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出现新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我党原有的阶级基础即普通劳动者阶层并非是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当人们还在努力解决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时,很

难想象他有多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其外在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无论受益多少都普遍存在着对党的不满情绪,改革发展中的负面效应不断消解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威胁党的执政基础。

新阶层形成后,有着自己的利益主张和政治要求,并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需要,新阶层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要求如果不能被纳入到现有体制中或对体制进行改革,他们可能会成为现有体制的反叛者。而市场经济的功利性缺陷,又使社会主义倡导的诸如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也频繁地发生着变化,随之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呈现出不确定性,产生了政治挫折感和“离心”情绪,从而降低了对党的信任度,加剧党群之间的矛盾分歧。

### 2. 干群矛盾冲突加剧,社会纵向流动通道阻滞

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更加趋于开放,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群体、阶层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大量增加,在社会加速转型时期,分化与整合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干群矛盾日益突出,分配不公矛盾凸显,公共资源分布不均等。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作为社会的非稳定性因素,其影响都是非常突出深刻的。阶层固化使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尖锐化、固定化、代际传承化,这容易使人们对群众路线所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合法性价值产生怀疑。

在分化还不充分且尚未定型的情况下,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益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窘迫境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阶层矛盾。当前,人们对社会阶层结构固化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心理感受越来越强烈和敏感,势必加剧社会上的仇富、仇官心理,甚至出现一些底层人以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致使阶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社会群体纵向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的交流,导致了党和人民群众的疏离感,加大了党联系群众的难度。

### 3. 权力行使不公与腐败现象严重,传统政治权威大量流失

腐败官员用权力来保证利益的获得,导致党



的传统政治权威大量流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研究表明:权力、职业、行业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三大主要因素,其中61.5%认为,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最主要的不公平。这主要表现在党和政府在政策与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还未能充分做到公正,向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利益集团倾斜;公共权力为利益集团代言,包庇强势群体;政策执行不公,执法不公正等,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问题是制约我们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瓶颈。<sup>[2](P.2)</sup>

腐败是严重危及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腐蚀剂,影响人民对党的认同感和信任度,直接导致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危机。腐败影响着合理的财富分配和收入,拥有权力的人对物质财富起支配作用,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社会财富,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特权,形成了社会特殊利益阶层。腐败分子通过滥用权力的方式为权力与资本的非法交换提供条件。公职人员通过权力经营着经济实体,以权力入股谋取利益,打压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打击人们通过正常劳动获取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我党的传统政治权威。

###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构建的当代路径

转型期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定位,政党运行机制的深刻转变,群众社会心理的重大调适,使党群关系问题更加突出,通过科学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使党同群众的联系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的保障。

#### 1. 建立畅通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流动机制

畅通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对人民群众来说,利益问题是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通常以此为标准来决定对政党的选择。尽快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沟通渠道。首先,通过评议、听证、公示公告、大众传媒等方式,及时解决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底线;其次,支持和引导不同社会阶层通过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民间社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等途径进行合法利益表达,增强执政党与群众沟通的能力;重视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支持和帮助其建立起正常规范

的利益表达机制,把社会上分化的分散的各种利益加以整合和同化,才能维系政治体系的稳定;再次,应加大对公平正义的关注力度,缩小阶层间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使各阶层人民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阶层和谐,巩固执政基础。

当前我国必须建立自治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阶层结构获得性体系,摒弃先赋性因素如权力、职业、财富等因素的不公正影响,降低优势地位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实现阶层利益的动态均衡;加快城镇化建设,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更高层次的就业机会;推动中国职业结构的升级,拓宽社会流动渠道,从而使人们有更多机会实现向上流动,实现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升级;通过推进户籍、社会保障、就业等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全民真正公平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各种资源和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建设和完善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体系,修改和改革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从根本上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避免社会与政府的直接利益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 2. 转变党群沟通方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要实现党群沟通方式的转变,从侧重感情联络转变为侧重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要从长远和现实的高度创建造福于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机制,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从接待上访转变到领导干部下访。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党员干部联系点和派驻基层制度,派驻干部到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和农户居民家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定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构建灵活高效的党群联系沟通体系和机制,强化领导组织机构,健全网络载体,通过查询、分析、反馈等环节对群众的愿望需求、矛盾焦点做系统分析,为领导部门提供前瞻性预警信息。

构建并完善集检查、监督、预防和处罚于一体的群众工作制度。通过法规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实现群众工作经常化、制度化。明确群众在监督中的法律地位和监督权限,从制度和法律上充分保障群众对干部及其行为的监督。同时,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中,真正把群众参与选举、评议干部的有效性及其所占比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防止人民民主流于形式;要扩大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开性与透明度,通过制定并广泛推行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制度,把各基层、各单位部门的财政开支情况、事务执行情况定期向群众公布;逐步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以便接受群众的监督。

### 3. 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遏制公权力异化

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上,要充分体现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形成适应不同职业、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选人用人机制。第一,扩大选拔干部的工作信息,健全信息公开渠道,将干部任期内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多数群众是否认同作为衡量其思想水平、贡献大小和领导能力的根本标准;第二,通过经常性的公开竞争,不断培养提拔实绩卓越的干部人才,调整淘汰不称职的干部,依法处理违法违纪的干部,特别是对监督管理中发现的失真失实、违规用人问题,要严肃追究责任并予以通报,要使选拔出来的干部让群众公认;第三,建立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落实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对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不推诿、不扯皮,对于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予以加重督察和处罚。

通过法治从制度上钳制腐败行为。建立健全防范性法律法规,切实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加大惩处力度,积极探索通过立法来缩小既得利益集团活动空间的理论与实践;对涉及政府及其部门利益的决策,政府及其

部门应该回避,应将其交给独立的第三方进行方案设计和科学论证,积极吸收人大和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的意见,主动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再次,建立健全干部考评机制,将践行群众路线实绩考核评价纳入干部综合素质考核和年度综合目标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创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式和实效的内容,且通过制度固定下来,切实把考评结果作为党组织和党员评优、年终考评定级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总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转型期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要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对党群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反馈和科学预测,不断探究建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使践行群众路线具有长期性和常态性,我们党才能够牢牢把握正确引导党群关系发展的主动权,引领时代潮流,永葆先进性。

#### [参考文献]

- [1][德]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2]谢金林. 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光 翟)

# 科学问题的逻辑系统构造\*

沈振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科学哲学研究的主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科学理论的进化和有意义的科学问题的产生。长期以来关于科学理论的进化的研究一直占据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而忽略以科学问题为主线的研究。本文旨在为问题学(即以科学问题为研究主线)的建构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此,笔者在这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一是为不同的科学问题之间的比较提供了比较标准,这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深刻性和广延性,定义了科学问题的秩和矩的概念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概念;二是以模态逻辑系统为工具对科学问题的逻辑系统作尝试性的构造,并指出该逻辑系统与怀疑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

**[关键词]** 科学问题; 秩和矩; 序结构; 逻辑系统; 必然化规则

**[中图分类号]** B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15-07

科学探究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行为。在探究活动中,人们总是以各种疑问的方式来试探性地表达对探究对象的某种理性预期。当面对某个期望了解的未知领域时,人们总是尽可能地为渴望得到的求解预设一个应答域,并对应答域中的每个可能的解进行筛查。换句话说,科学家在探究活动中,总是不断地构造问句:“A 是  $b_i$  吗?”(其中  $b_i$  是科学家根据自己背景知识所能构造的应答域  $B$  中的元素),或者“命题 +?”的形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尽管科学探究可以以各种疑问句形式呈现(例如, *why -*, *how -*, *what -*, *where -*, *whether -* 等等特殊问句形式),但实际上,在具体地探究过程中,科学家最终总是将之转化为可实验操作的一个个一般问句形式。例如,对于 *why -* 型问句,我们可以将之转化为“……的原因是什么?”,即“*why -* 型”可以转化为“*what -* 型”;接下来,科学家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尽可能地构造原因的可能的解集  $\Omega = \{b_1, b_2, \dots, b_n\}$ ,进一步地“*what -*

型”问题可以转化为下列  $n$  个问句的析取:“……的原因是  $b_1$  吗?”  $\vee$  “……的原因是  $b_2$  吗?”  $\vee$  ……  $\vee$  “……的原因是  $b_n$  吗?”;最后,科学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上面每个一般问句作出否定或肯定解答。其他类型的特殊问句可以做出类似的转化。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一般问句的形式构造科学问题的逻辑系统,旨在为科学问题的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一些逻辑支撑。

## 一、科学问题逻辑系统的概念系统

定义 1:(信息域的秩)<sup>[1]</sup> 设存在两个相关变量组:  $P_1, P_2, \dots, P_m$ ;  $Q_1, Q_2, \dots, Q_n$ 。按照集合分类标准,如果  $P_1, P_2, \dots, P_m$  组成一个类(记为  $\prod_1$ ),可逻辑演绎得出  $Q_1, Q_2, \dots, Q_n$  也组成一个类(记为  $\prod_2$ )的话,那么  $\prod_1$  类的信息量较类  $\prod_2$  的信息量更深入,即称  $\prod_1$  的秩大于  $\prod_2$  的秩,记为  $\|\prod_1\| > \|\prod_2\|$ 。例如,  $\prod_1 = \{\text{质数, 合数}\}$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问题中的逻辑”(项目编号:2013SJB720001)。

[收稿日期] 2014-09-02

[作者简介] 沈振东,男,江苏宿迁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后。

所揭示的信息量较  $\Pi_2 = \{\text{整数, 分数}\}$  的信息量更深入, 因为  $\Pi_1$  中的元素是借助  $\Pi_2$  中的所有元素的含义是已知为基础而进一步定义的。

定义 2:(信息域的矩)<sup>[1]</sup> 按照集合分类标准, 如果两个相关变量组  $\Pi_1$  和  $\Pi_2$  具有共同的外延, 且  $\Pi_1$  是  $\Pi_2$  的真子集, 那么称  $\Pi_2$  的矩大于  $\Pi_1$  的矩, 记为  $|\Pi_1| > |\Pi_2|$ 。例如, 考虑抛硬币的实验, 一般可以构造结果集  $\Pi_1 = \{\text{正面向上, 反面向上}\}$ ; 但随着对硬币本身质地的深入了解(比如, 得知硬币材料有瑕疵, 易碎的特点)可以进一步地将结果集修正为  $\Pi_2 = \{\text{正面向上, 反面向上, 落地时粉碎}\}$ 。一般而言在科学活动中, 科学家总是随着其知识的不断扩充适时地修正某个问题的应答集。

定义 3:(科学问题的难度系数): 对于科学问题  $[P(a)]_X S$ (此结构是科学问题的简化形式)<sup>[2]</sup>, 设  $S_1, S_2$  为其不同的问题域, 且  $|S_1| > |S_2|$ , 相应地其应答域分别为  $S'_1, S'_2$ 。令  $Y$  是  $[P(a)]_X S$  的解,  $\delta(\cdot)$  表示问题的难度系数。则有:(1) 若  $(Y \in S'_2) \wedge (Y \notin S'_1)$ , 则  $\delta([P(a)]_X S_1) > \delta([P(a)]_X S_2)$ ; (2) 若  $Y \in (S'_1 \wedge S'_2)$ , 则  $\delta([P(a)]_X S_1) = \delta([P(a)]_X S_2)$ 。

该定义的直观含义为, 当问题的信息量还不充分就提出某个问题时, 该问题的求解难度将大于信息量充分时的求解难度。即对于同一个科学问题而言, 信息域的信息量越大, 科学问题的求解的难度越小; 反之, 越大。

根据上面的关于科学问题的逻辑构型, 以及定义 1、2、3 可知: 如果两个不同的提问对象来自于等秩的信息域中的不同的个体, 那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求解方式、求解过程以及求解的难易将是相同的, 可将这里的含义定义为:

定义 4:(等价科学问题) 设  $a, b$  是两个不同的提问对象。  $\Pi$  是由属于同秩的所有不同元素组成

的类。如果  $(a \in \Pi) \wedge (b \in \Pi)$ , 则  $[P(a)]_X S = [P(b)]_X S$ 。

例 1: 问题 1: 一根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与一个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靠近时, 相互吸引吗?

问题 2: 一根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与一个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靠近时, 相互排斥吗?

上述两个问题就是同一个科学问题。因为它们的应答域是  $\{\text{相互吸引, 相互排斥}\}$ , 对问题 1 的解决其实就是对问题 2 的解决, 反之亦然。

例 2: 问题 1:  $\pi$  是一个质数吗?

问题 2:  $\pi$  是一个合数吗?

问题 3:  $\pi$  是一个数吗?

问题 1、2 是同一个问题, 因为质数和合数属于同秩的应答域的两个对象; 而问题 1、3; 以及问题 2、3 就不是同一个问题, 因为质数和数; 以及合数与数在类概念上属于种属关系, 因而不属于同秩的范畴。对问题 3 的解决并不能对问题 1 或 2 的解决。

与定义 4 相等价的定义

定义 4: 对于问题  $[P(a)]_X S$  和  $[P(b)]_X S$ , 若  $[P(a)]_X S$  已解答<sup>①</sup>,  $[P(b)]_X S$  也随之被解答, 反之, 亦然。则称这两个问题是等价问题。如例 1。

定义 5:(上向科学问题和下向科学问题) 设  $[P(a)]_X S$  和  $[P(b)]_X S$  为两个科学问题, 若  $[P(b)]_X S$  的提出是以  $[P(a)]_X S$  的解答为条件, 但反之不然。则称  $[P(b)]_X S$  为  $[P(a)]_X S$  的下向科学问题, 同时称  $[P(a)]_X S$  为  $[P(b)]_X S$  的上向科学问题。

这里“ $[P(b)]_X S$  的提出是以  $[P(a)]_X S$  的解答为条件”意为: 当  $[P(a)]_X S$  被解答时,  $[P(b)]_X S$  的提出是有意义的;  $[P(a)]_X S$  暂未解答时,  $[P(b)]_X S$  的提出则是无意义的。

例 3: 问题 1: 上帝存在吗?

问题 2: 上帝是万能的吗?

问题 3: 为什么说上帝不存在?

① 这里的解答一词既可以是肯定的解答, 也可以是否定的解答, 本文中出现的解答意思相同。

问题2的提出以及是否有意义完全依赖于问题1的解答,只有当问题2的主项是否存在得到说明时,才可能讨论问题2。当问题1得到否定回答(即不存在上帝)时,问题2的提出是无意义的,此时问题3是有意义的;当问题得到肯定回答时,问题2才有意义。这里问题1是问题2的上向问题,问题2是问题1的下向问题。问题1是问题3的上向问题,问题3是问题1的下向问题。

利用定义5,可以定义科学问题序结构概念:

定义6:(科学问题的线性序结构)在某有序的科学问题 $[P(a_i)]_X S (i = 1, 2, \dots)$ 序列中,对任意的连续两个科学问题 $[P(a_{i+1})]_X S$ 和 $[P(a_i)]_X S$ :若 $[P(a_{i+1})]_X S$ 是 $[P(a_i)]_X S$ 的下向问题,且 $[P(a_i)]_X S$ 是 $[P(a_{i+1})]_X S$ 的上向问题,则由这样的一系列科学问题组成的序结构称为科学问题的线性序结构。

可形式表示为:

$$\dots \Leftarrow [P(a_i)]_X S \Leftarrow [P(a_{i+1})]_X S \Leftarrow \dots$$

这里符号“ $\Leftarrow$ ”表明:在左的问题的提出以及是否有意义是依赖于在右的问题的解答,因而下向问题的得出的潜在的前提一定有上向问题的存在并得到了解答。反之上向问题的存在并解答并不一定逻辑蕴含下向问题的存在。

科学问题的线性序结构预示着科学理论向纵深层次的发展,随着科学问题越来越下向发展,科学理论将越来越深刻。因而,科学问题的线性序结构体现出科学问题的深刻性指标。

定义7:(科学问题的统摄性序结构)设 $[P(a)]_X S$ 和 $[P(b)]_X S$ 为两个科学问题,满足:(1)若 $[P(a)]_X S$ 被解答, $[P(b)]_X S$ 也随之解答;且(2)若 $[P(b)]_X S$ 的解答, $[P(a)]_X S$ 只是部分地解答,则称 $[P(a)]_X S$ 统摄 $[P(b)]_X S$ ;同时称 $[P(a)]_X S$ 为 $[P(b)]_X S$ 的母问题, $[P(b)]_X S$ 为 $[P(a)]_X S$ 的子问题。

科学问题的统摄性序结构主要表现为科学问题和科学理论的广泛性和一致性。随着某个问题在某个特定的论域中得到了解答,科学家们就会将该特定的理论作适当地外推,即提出更加广泛

地科学问题。进一步地,统摄性序结构可分为两类:逻辑统摄性和集合统摄性:

定义7.1(逻辑统摄性):设 $a, b$ 是两个命题,且 $a \rightarrow b$ ,则(1)当 $[P(a)]_X S$ 已正解答时, $[P(b)]_X S$ 也随之正解答;且(2)当 $[P(a)]_X S$ 负解答时, $[P(b)]_X S$ 是否解答暂时被悬置。此时,称 $[P(a)]_X S$ 逻辑统摄 $[P(b)]_X S$ 。

定义7.2(集合统摄性):设 $a, b$ 是由提问对象组成的两个集合,且 $b \subset a$ ,则(1)当 $[P(a)]_X S$ 已正解答时, $[P(b)]_X S$ 也随之正解答;且(2)当 $[P(a)]_X S$ 负解答时, $[P(b)]_X S$ 也负解答;且(3) $[P(a)]_X S$ 的解答被悬置时, $[P(b)]_X S$ 的解答也暂时被悬置。此时,称 $[P(a)]_X S$ 集合统摄 $[P(b)]_X S$ 。

注:从逻辑的角度而言,上述这两个子定义中,前者是以“命题”为提问单元而构造的科学问题,对于命题之间的关系一般适合于用“ $\rightarrow, \nrightarrow$ ”等逻辑符号刻画;而后者是以“词项”为提问单元而构造的科学问题,对于词项之间的关系一般适合于用“ $\supset, \not\supset$ ”等集合论符号刻画。

统摄性问题的逻辑结构可以形式表示为:

$$[P(b_i)]_X S \Leftarrow [P(a)]_X S \left\{ \begin{array}{l} \Leftarrow [P(b_1)]_X S \\ \Leftarrow [P(b_2)]_X S \\ \dots \end{array} \right. \text{。这里的从}$$

右向左的符号“ $\Leftarrow$ ”表示科学探究者进行科学探究时所遵循的一般的思维顺序,即由特殊到普遍,然后从普遍再到特殊的思维过程:人类在认识事物事物时,往往先从具体的特殊的事物开始,当这些具体的事物被认识和了解时,由思维本性的使然,人们将向更高层更抽象的层次发展,尝试性地提出更普遍,因而也更抽象的问题并极力对其解答,最后试图将这普遍的结论应用到一切具体的领域。

例4:问题1:所有金属都导电吗?

问题2:所有铁都导电吗?

问题3:所有铜都导电吗?

问题4:所有铝都导电吗?

这里的问题1统摄问题2和问题3,当问题2和

问题3都被正解答时,问题1自然会呈现在探究者的思维过程中。当问题1被正解答时,问题4的科学价值将随着消失。

定义8:(科学问题的平行序结构) 根据定义7, 如果  $[P(b)]_XS$  和  $[P(c)]_XS$  都被同一问题  $[P(a)]_XS$  统摄, 且  $[P(b)]_XS$  和  $[P(c)]_XS$  互相不统摄, 则称  $[P(b)]_XS$  和  $[P(c)]_XS$  为平行性问题。

进一步地, 平行性序结构可以分为两类: 相容性平行问题和互斥性平行问题:

定义8.1.(相容性平行问题) 在定义8的条件下,  $b$  和  $c$  是两个不相关的提问对象, 则此时称  $[P(b)]_XS$  和  $[P(c)]_XS$  为相容性平行问题。

例5: 问题1: 凯撒的体貌特征是?

问题2: 凯撒的身高是?

问题3: 凯撒的体重是?

问题1显然统摄问题2,3, 但问题2和3是相容的平行问题, 因为无论问题2的解决与否以及答案如何, 都不影响为题3的解答, 反之亦然。

定义8.2(互斥性平行问题) 在定义8的条件下,  $b$  和  $c$  属于同秩信息域中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或者不能共存的提问对象, 则称  $[P(b)]_XS$  和  $[P(c)]_XS$  为互斥性平行问题。

例6: 问题1: 抛出的硬币落地时正面朝上的概率是  $1/2$  吗?

问题2: 抛出的硬币落地时正面朝上的概率不是  $1/2$  吗?

定义9.(链状型序结构) 由统摄性序结构和平行性序结构以特定的逻辑顺序而组成的问题序, 称为链状型问题序结构。按照问题生成的逻辑顺序, 可以将之分成归纳型链状序结构和演绎型链状序结构。

(1) 归纳型链状序结构可以表示为:

$$\cdots \Rightarrow [P(a_{i-1})]_XS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_XS \\ \Rightarrow [P(a_{i,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P(a_i)]_XS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1})]_XS \\ \Rightarrow [P(a_{i+1,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P(a_{i+1})]_XS \Rightarrow \cdots \quad \text{其中} \quad \cdots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_XS \\ \Rightarrow [P(a_{i,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P(a_i)]_XS$  其中表示科学问题的归纳生成过程, 即由对一系列特殊的科学问题归纳出更一般的科学

$$\text{问题}; [P(a_i)]_XS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1})]_XS \\ \Rightarrow [P(a_{i+1,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text{意为在第} i \text{级}$$

普遍问题的基础上, 对第  $i+1$  级的具体事物作尝试性地提问, 这里并非是问题的演绎生成过程, 因

$$\text{为} [P(a_i)]_XS \text{并非统摄}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1})]_XS \\ \Rightarrow [P(a_{i+1,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2) 演绎型链状序结构可以表示为:

$$\cdots \Rightarrow [P(a_i)]_XS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_XS \\ \Rightarrow [P(a_i,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P(a_{i+1})]_XS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1})]_XS \\ \Rightarrow [P(a_{i+1,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P(a_{i+2})]_XS \cdots$$

$$\text{这里的} [P(a_i)]_XS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_XS \\ \Rightarrow [P(a_i,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text{中的前}$$

者统摄后者, 是科学问题序中的第  $i$  级演绎生成结

$$\text{构; 而}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P(a_i,1)]_XS \\ \Rightarrow [P(a_i,2)]_XS \\ \dots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P(a_{i+2})]_XS \text{并不表示}$$

科学问题的归纳生成过程, 而是意为由第  $i$  级别的具体科学科学问题向更高第  $i+1$  级别的一般科学问题的飞跃, 两者之间是处于不同的科学结构层次上。

## 二、疑问模态算子的引入与科学问题的逻辑公设

### 1. 疑问模态算子的引入

自经典模态逻辑建立以来, 逻辑学家对“必然

(□)”模态算子给予不同的语义解释,而创建了不同的模态逻辑系统,如认知逻辑,时态逻辑,怀疑逻辑,道义逻辑等。所有这些不同的模态逻辑都是在命题  $P$  的前面增加一个前缀模态词(如,相信,知道,怀疑,应当等)而构成的,并且所构成的各种模态命题都具有逻辑真值(真或假)。那么对于科学问题能否构造类似的逻辑系统呢?答案是可能的。

根据上面科学问题的归约形式论述以及科学问题的逻辑构型可知,科学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一般疑问句的形式,即“命题  $P + ?$ ”的形式。令“ $Q$ ”表示一般疑问算子“?”,则“ $QP$ ”表示“命题  $P + ?$ ”。按照问题中所包含的所有谓词是否在背景知识中都有定义或者是否可用背景知识中的某些谓词表达,“ $Qp$ ”的逻辑真值满足三值逻辑  $T$ :有意义问题(真值记为 1),无意义问题(真值记为 0),意义不定问题(真值记为  $1/2$ )。<sup>①</sup>

## 2. 科学问题逻辑系统的公设

基本公设:

$Q1$  合取律( $\wedge$ ): $Q(p_1 \wedge p_2) = Qp_1 \wedge Qp_2$ ;

$Q2$  析取律( $\vee$ ): $Q(p_1 \vee p_2) = Qp_1 \vee Qp_2$ ;

$Q3$  蕴含律( $\Rightarrow$ )<sup>②</sup>: $Q(p_1 \Rightarrow p_2) = (p_1 \Rightarrow Qp_2)$ ;

$Q4$  等价律( $\Leftrightarrow$ ): $Qp_1 \Leftrightarrow Qp_2$ ,其中  $p_1, p_2$  来自于同秩应答域;

$Q5$  否定等价律( $\neg, =$ ): $Q(\neg p) = Q(p)$ ,其中  $\neg P$  表示  $P$  所属的应答域的余集;

$Q6$  双重否定律( $\neg, \neg$ ): $Q(p) = Q(\neg \neg p)$ ;

$Q7$  分离规则( $\rightarrow, -$ ): $Q(p \Rightarrow q) \wedge p \rightarrow Qq$ 。

这些公设的蕴意:

$Q1$ 、 $Q2$ 、 $Q3$  的含义比较直观。 $Q4$  表示:在科学家根据背景知识所能构造的应答域中,各个待筛查的候选解答都是同秩的,尽管应答域并非是完全集,但是在每个既定的时空条件下,其所包含的元素皆确定的。由于应答域中的元素具有同秩性,

所以对于应答域中的每个命题的所构造的科学问题进行疑问具有相同的等效的作用。 $Q5$  和  $Q6$  可以根据  $Q4$  以及定义 4 得出,其中  $\neg p$  表示  $p$  在应答域中的余集。 $Q7$  表示当对一个假言命题疑问合法且当假言命题的前件为真时,则对该蕴含命题的后件疑问就是合法的,此法则就是科学问题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所以可以将公理  $Q7$  改写为三段论推理形式:

$Q8$  三段论推理:

$$Q(p \Rightarrow q)$$

$$p$$

$$\hline Qq$$

真值蕴含公理:

$Q9 \neg Q(p) \rightarrow (\exists a(a \in p) \wedge ((a = 0) \vee (a = 1/2)))$ ;

$Q9$  表示,当对某个命题提问是非法时,则该命题所揭示的信息域中一定存在某个原子谓词或分子谓词在已知世界中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非法的。

$Q10(T(Q(p_1 \Rightarrow p_2)) = 1) \rightarrow ((\forall a(a \in p_1)) \wedge (a = 1))$ ;

$Q11(T(Q(p_1 \Rightarrow p_2)) = 1/2) \rightarrow ((\exists a(a \in p_1)) \wedge (a = 1/2))$ ;

$Q12(T(Q(p_1 \Rightarrow p_2)) = 0) \rightarrow ((\exists a(a \in p_1)) \wedge (a = 0))$ 。

问题的前件  $p_1$  可以表示多个命题的合取。 $Q10$  表明当某个问题是意义真时,那么这个问题的前件中的所有命题在背景知识中都是真命题; $Q11$  表示当某个问题的意义真值不确定时,那么这个问题前件中至少存在一个命题,其真假值不可以在背景知识中加以确定,或者在前件中至少存在某

<sup>①</sup> 对于问题“ $P?$ ”而言,当  $P$  或 ( $\neg P$ ) 预设  $Q$  时,若  $Q$  真,则“ $P?$ ”为真问题;若  $Q$  假,则“ $P?$ ”为假问题;若  $Q$  真假不定,则“ $P?$ ”问题真假值不定。

<sup>②</sup> 本文约定“ $\rightarrow, \Leftrightarrow$ ”分别表示“逻辑演绎蕴含和逻辑演绎等值”;“ $\Rightarrow, \Leftrightarrow$ ”分别表示“逻辑归纳蕴含和逻辑归纳等值”。由于科学问题和科学推理大都是归纳结论,所以本文中出现的关于科学问题的前件和后件蕴含和等值的逻辑符号都采用后者“ $\Rightarrow, \Leftrightarrow$ ”。

个谓词,其含义不可归约为背景知识中的已知的谓词; $Q12$ 表示当某个问题没有意义时,那么这个问题的前件中至少存在一个命题,其在背景知识中被判断为假命题,或者在前件中至少存在某个谓词,在背景知识中是无意义的。公理  $Q10, Q11, Q12$  对应于模态逻辑系统中的  $T$  公理:  $\Box A \supset A$ 。

公理  $Q10, Q11, Q12$  可以避免出现逻辑演绎系统中的实质蕴含怪论:  $P \wedge \neg p \rightarrow q$  (或  $p \rightarrow (\neg p \rightarrow q)$  或  $\emptyset \rightarrow q$ ), 即在逻辑演绎系统中永假命题可以推出任何命题,究其原因逻辑演绎逻辑追求的是形式逻辑,只要满足一定的逻辑格其逻辑值就可能是真的。但在  $Qp$  系统中,这种蕴含怪论将不会出现,因为科学推理的前件不仅要求逻辑上是合语法的,而且在物理上是应该可能真的(至少是可能归纳真的),这就宣布以空词项作为前件的非法性。

### 3. 科学问题逻辑的必然化规则

在模态逻辑中,对于命题  $A$ ,有必然化规则:  $\vdash A \Rightarrow \Box A$ 。但在科学问题逻辑中,必然化规则并非对所有命题成立。根据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界定<sup>[3]</sup>,必须对命题  $A$  作适当地限制。具体地,当命题  $A$  中的所有原子谓词(包括理论原子谓词和观察原子谓词)在已知世界中都是可定义的,所有分子谓词(包括理论分子谓词和观察分子谓词)都可以分析到已知世界中某个相应的谓词;并且  $A$  又是对已知世界的适当外推,其在已知世界的逻辑真值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意为—— $A$  的所有预设的前提在已知世界中都真的,因而其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现有的已知世界中,该  $A$  又是不可判断的。这里的不可判断是指,  $A$  的解答域是已知的,但究竟是哪个具体的答案在已知世界中是无法给予逻辑确定的。那么只有满足上述特征的命题  $A$  才具有必然化规则:

$$\vdash A \Rightarrow QA$$

即在科学家的已知的认知世界中,一个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不可判断时,

此时的命题才是科学家极力关注的问题。除此以外的其他问题(如常规问题,形而上学问题等)一般来讲,科学家是漠不关心的。

### 4. 关于双重或多重疑问算子的讨论

我们知道,在模态逻辑系统中,不等价的单独模态算子有 2 个:  $\Box$ (必然) 和  $\Diamond$ (可能),并且叠加模态算子  $\Box\Box, \Box\Diamond, \Diamond\Box$  和  $\Diamond\Diamond$  是可以归约的。如:  $\Box\Box A \Box A, \Diamond\Diamond A \Diamond A, \Diamond\Box A \Diamond A$  和  $\Box\Diamond A \Diamond A$ 。那么在科学问题逻辑系统中,是否有类似的多重模态算子的叠加律呢?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将“ $Q$ ”定义为科学问题逻辑系统中的疑问算子,  $Qp$  表示“命题  $p$  吗?”,这里的命题  $p$  实际上是类命题,即它的真假在已知的背景知识下是无法精确判断的,但  $p$  所包含的所有原子谓词或分子谓词在背景知识下都有意义或都可分析。 $Qp$  的含义可表述为:对类命题疑问是有意义的。 $QQp$  的蕴含是:如果  $Qp$  是科学问题,那么对于  $Qp$  的疑问也是有意义的。例如,若  $p$  表示“暗物质有能量”,则  $Qp$  表示“暗物质有能量吗?”  $QQp$  表示“‘暗物质有能量吗?’这种疑问有意义吗?”。这里  $p$  所隐含的所有谓词(暗物质,能量)在已知背景知识中都是可以定义的,但  $p$  本身在现有的物理知识中是无法判断的,所以  $p$  为类命题<sup>①</sup>,因而对于  $p$  疑问是有意义的,并且这种疑问是合法的。反之,对科学探究者而言,若对某个一般问句的疑问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科学问题。根据这里的分析可得定理:

$$Q13 \quad Qp \leftrightarrow QQp$$

当某个命题  $p$  的某个原子谓词或分子谓词在背景知识架构下无定义或某些成分判断为假时,那么对这样的命题疑问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对这样的问题是不合法的。例如,设  $p$ : 单身汉有妻子。 $Qp$ : 单身汉有妻子吗?  $QQp$ : “‘单身汉有妻子吗?’这样的疑问有意义吗?”。从我们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已经能够判断命题  $p$  已假,所以对在背景知识

① 所谓类命题,即命题中的原子成分在背景知识中都是有意义的,所有分子成分都可以规约为有意义的原子成分,但命题本身的真假在背景知识中却不可判断。



中被判断为假的或无意义的命题疑问本身是无意义的。可得下列定理:

$$Q14: \neg Qp \leftrightarrow \neg Q\neg Qp$$

上节的公设或定理  $Q1$ —— $Q14$  有些是不独立的,我们选择  $Q3, Q10$ — $Q12, Q13$  作为特征公理构成一个科学问题的逻辑系统,记为  $QP$

$$QP: Q3 + Q9 + (Q10 + Q11 + Q12) + Q13$$

其中  $Q3$  相当于模态逻辑系统中  $K$  公理 ( $\Box(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Box A \rightarrow \Box B)$ );  $Q9$  相当于模态系统中的  $D$  公理 ( $\Box A \rightarrow \Diamond A$ );  $Q10 + Q11 + Q12$  相当于模态逻辑系统中  $T$  公理 ( $\Box A \rightarrow A$ );  $Q13$  和  $Q14$  相当于模态逻辑系统中的  $4$  公理 ( $\Box A \rightarrow \Box \Box A$ ) +  $E$  公理 ( $\Diamond A \rightarrow \Box \Diamond A$ ); 在科学问题逻辑系统中没有与模态逻辑系统中  $B$  公理对应的特征公理。

科学问题逻辑所揭示的科学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表明:当某个命题  $P$  是类命题时(即命题中的原子成分在背景知识中都是有意义的,所有分子成分都可以规约为有意义的原子成分,但命题本身的真假在背景知识中却不可判断。),它的真假在背景知识中是不可判断的,但却是在背景知识中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借助背景中的谓词加以表达的,而且随着对知识背景知识集的扩充,原本不可判的类命题相对于扩充后的知识集其真假值却是确定的。实际上,科学探究者就是在不断地根据背景知识构造出类命题,同时又不断地扩充或修证背景知识集使得类命题变成可判断的命题。这就是科学探究者的实际的科学探究之路。

### 5. 关于科学问题逻辑与怀疑逻辑之间的同构性

怀疑逻辑是潘天群根据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支点“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sup>[4]</sup>怀疑逻辑中的公理  $D8: Dp \rightarrow \neg DDp$ ,意即:如果怀疑  $p$ ,那么对怀疑  $p$  是不可怀疑的(也称为笛卡尔公

理)。该定理对应于模态逻辑中的  $S5$  特征公理  $E$  公理:  $\Diamond A \rightarrow \Box \Diamond A$ . 而在科学问题逻辑系统中存在着类似的公理  $Q13: Qp \leftrightarrow QQp$ ,若对某个一般问句的疑问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科学问题,即若一个类命题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科学问题”这点就是确定无疑的;以及公理  $Q14: \neg Qp \leftrightarrow \neg Q\neg Qp$ ,若已经能够判断命题  $p$  已假,所以对在背景知识中被判断为假的或无意义的命题疑问本身是无意义的,即若一个命题是无意义的,那么“对‘它的提问’是‘无意义的’”这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 结语

本文借助模态逻辑工具,构造了科学问题的逻辑系统。在该逻辑系统中,定义了元算子、元公设,以及根据这些算子和公设得出了科学问题的一些重要的定理和定律;在该逻辑系统中存在着类似于科学理论系统中的三段论推理的科学问题三段论推理形式;同时也给出了含有双重疑问算子的科学问题的演绎法则。

### [参考文献]

- [1] 沈振东. 论科学问题的意义标准[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10).
- [2] 沈振东. 论科学问题的进步标准[J]. 宁夏社会科学, 2012(4).
- [3] 沈振东. 科学问题进步性之探微[J]. 科学学研究, 2013(2).
- [4] 潘天群. 建立在“笛卡尔公理”上的一个怀疑逻辑系统[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9).

(责任编辑 光 翟)

# 从新教三大教派看宗教改革对西欧社会转型的意义

桑 田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广东中山 528402)

**[摘要]** 本文主要从新教三大教派包括路德宗、安立甘宗以及加尔文宗的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中世纪宗教改革对西欧社会转型的意义。从宗教的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克服了罗马天主教的二元论,以及这种二元论所导致的信仰虚假和道德堕落,将二者和谐统一起来;从世俗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对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新教; 宗教改革; 西欧社会转型; 三大教派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22-04

基督教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开始,以其深刻的教义为中世纪蛮荒的西欧社会提供了文明和智慧的火种。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和教会组织结构在很多方面也极具不完善的地方,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任何事物都要“与时俱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很有可能被遗忘在历史的洪流中。基督教发展到了13世纪初期,就已经从内部组织和外部结构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不合理的、迂腐的气息。“上帝的国”与“凯撒的国”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教会与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促使了15世纪的“宗教改革”。

## 一、宗教改革的历史缘由

“原罪”与“救赎”作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对基督徒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时刻提醒着在世的每一位基督徒要不断反省,同时也鞭策他们不断的悔过和事功,以此来达到对灵魂的救赎和进入天国的理想。自然而然,早期的基督教会的功能主要有两点:即它是一个相互救济的团体,同时它又是一个教众进行自我反省的忏悔的场所<sup>[1](P.596)</sup>。早期基督教的这种救赎观和忏悔论主要是从精神层面上来关注的,另外所谓的“事功”也是从教众的实际个人生活品行来关注的。

## 1. 赎罪券的分发

中世纪基督教的赎罪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灵魂的救赎和忏悔从精神上逐渐走向了物质和形式化,随之而产生的就是赎罪券的分发。“赎罪卷”的形式有多种,但都表达了同一个道理,那就是有罪之人可以通过用金钱购买教会分发的赎罪券这种方式来洗清自己的罪孽。这样一来,神圣的事业就遭到了玷污,基督的原始教义就遭到了歪曲,同时罗马教廷的腐败也随之而蔓延滋长开来。赎罪卷的分发不仅使作为基督教精神的化身罗马教廷及其教会组织严重腐化和堕落,同时也玷污了基督教的圣洁声誉,更是引起教众的不满和怀疑。<sup>[2]</sup>赎罪卷的产生表明了神恩如同商品一样可以买卖,那么基督教虔敬的信仰和崇高的道德观似乎变成了虚妄。

## 2. 宗教裁判所以对“异端者”的迫害

中世纪基督教的绝对权威包括拥有对《圣经》的绝对解释权和对“异端”的决断权。宗教裁判所的运作在中世纪已经偏离了正轨,甚至变成了基督教的不宽容的暴虐态度的“杰作”。<sup>[3](P.221)</sup>教会的原本功能是劝道,而现在变成了暴行。裁判所的主要迫害对象是“宗教异端者”,然而这种对“异端”的定义和惩罚都不具有客观公正性,其行径完

**[收稿日期]** 2014-10-28

**[作者简介]** 桑田,男,广东中山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讲师,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

全是武断的。据史料记载,有 30 万左右的“异端者”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这种情况到了中世纪后期发展到了极致,同修道士们道貌岸然、骄奢淫逸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基督教教会的腐败堕落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 3. 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

与此同时,新旧意识形态的剧烈冲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6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与基督教的教义有冲突。社会要变革,而教会则处于顽固守旧状态,甚至变本加厉地对社会和民族进行约束和压制。

正是面临着以上三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中世纪宗教改革也面临了历史的机遇。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宗教改革是紧随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强调感性的、自然的人性,以此来取代唯灵主义的崇高神性,试图将基督教信仰重新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sup>[3](P.227)</sup>

## 二、宗教改革的三个流派及其主要内容

最初的宗教改革思想来源于一些所谓的“异端者”,例如威克里夫和他的思想继承者胡斯以及德国的一些神秘主义者。后来尽管这些“异端者”遭受迫害,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发展成为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巨大洪流。中世纪宗教改革主要分为三大新教派,即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路德宗(信义宗)、以亨利八世为开端的英国国教安立甘宗(圣公会)以及以加尔文为代表的加尔文宗(归正宗)。

### 1. 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主要内容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起源于他对教会颁布的“赎罪券”的不满与反叛。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提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这种荒唐的赎罪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sup>[3](P.285)</sup>3 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三部有关宗教改革的论著。在其中一部论著中,路德阐释了他的“因信称义”思想,使该思想成为新教神学理论的核心和基础。路德的新教教义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罗马天主教教义,例如三位一体、原罪、救赎主的观念等。他在三个方面对罗马教会进行否定和革新:(1)将天主教的“七礼”简化为洗礼、告解和圣餐礼;(2)反对罗马教会对《圣经》中“因信称义”的解释,确立新教“唯信称义”观;(3)否定教皇的权威和教会阶级制度,提出了“基督教徒皆教士”的观点。<sup>[2]</sup>

路德创立新教的目的在于同腐败划清界限,

以便使基督教继续生存下来。而他对罗马教皇和教会的无情鞭笞,则是为了剥掉他们伪善的面具,说明目前存在的错误并不是出在基督教本身,而是在于个别的腐败教会的教士以及他们定制的错误的教条。路德提出的宗教改革因势利导,及时调整新教教义、教规以及教会同世俗政权的关系,使基督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路德与罗马教廷的教士进行对抗,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际上为新教的教义和教规奠定了基础。

在“善功”上面,路德认为有两个特点需要突出,即“一律平等”和“不许人教”。他认为教徒自己可以“知道万事,行作万事”。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分析,路德教主张减少节日,取消了安息日以外的其它节日,这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为节日减少,劳动者就有更多时间从事生产劳动,资本家也就可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了。这反映了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资产阶级的普遍要求。<sup>[2]</sup>此外,路德的经济思想也带有重商主义特征。最后,在政治上,路德致力于调整教会与世俗权利的关系,以此来消除长期以来的教俗政权的冲突。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变革还表现在教育方面。路德教育思想对德国的最大影响是普鲁士国民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德国之外,马丁·路德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密苏里、威斯康里、俄亥俄和爱荷华等州。<sup>[4]</sup>路德宗教改革在文化上加强了德国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他亲自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到德文。德文在德国大众中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认同感,从而为后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语言上的基础。

### 2. 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其主要内容

与路德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相反,英国的宗教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英国的宗教改革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而产生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导火线是一场关于王位继承问题的离婚案。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导致了教皇与世俗皇帝之间的矛盾。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于亨利八世与教皇克莱门七世的斗争中,随后英国国会于 1534 年 11 月通过了“至尊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了国王以及他的后嗣和继承者以及这个王国的诸国王应该成为被称为“安立甘教会”(Anglicana Ecclesia)的英格兰教会在世俗尘世唯一的首脑。

“至尊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教会与罗马教

会的正式决裂,同时也揭开了英国教会改革的序幕。亨利八世的教会改革初衷并非想彻底改革,然而激进的信徒们则身体力行进行了彻底改革。这些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允许教士娶妻生子,废除密室忏悔制度、在宗教仪式中用英语取代拉丁文等等。亨利八世在这个过程中就夹在教会与教众之间,力图进行调和,然而随着他的去世,情况变得难以控制,他的后继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改革。

英国女王“血腥玛丽”的称号就是来源于她对新教势力的残酷镇压。她的后继者伊丽莎白女王则对新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了一种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为天主教和新教在英格兰的和平共处创造了条件。而自伊丽莎白开始,英格兰的宗教冲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英国国教与清教徒之间的矛盾。久而久之,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安立甘宗(圣公会)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议会、宗教会议等于1553年到1563年之间所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中所确立的,其中《第一祈祷书》、《第二祈祷书》和《四十二条信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分别对英国的宗教礼仪和教义作了一些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规定和阐释。<sup>[5]</sup>这些礼仪和教义有几个特点:(1)新教化。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改革家所提出的很多观点都被英国宗教所吸收和采纳;(2)圣经化。圣经中的准则受到了高度重视,传统的教义和礼仪中不具备圣经依据的内容被删除了;(3)简洁化。新的礼仪除掉了许多无关或者由后世杜撰出来的内容,变得简明易懂;(4)英语化。英国宗教礼拜自此完全使用英语,大大加强和提高了英格兰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

### 3.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主要内容

新教三大流派中,加尔文宗教改革和路德宗教改革一样,同属于自下而上的改革。但是与路德宗和安立甘宗这两大宗教流派的宗教改革历程相比,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的发展历程可谓艰难坎坷,命运多舛。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是在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天主教势力和德意志,英国的新教势力的双重打压之下成长起来的。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意志得到了诸侯的支持,安立甘教在英国得到了王室的支持,而加尔文教则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这三大流派中,只有加尔文教成为了一种共和国的宗教,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sup>[3]</sup>

加尔文在宗教思想上与路德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除了坚持“因信称义”以外,同时还强调“善功”对于得救的重大意义。他认为信仰是灵魂获救的内在确证,而善功则是外在确证。加尔文宗教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1)加尔文在政教关系上坚持政教合一,但是教权高于政权;(2)加尔文坚持信仰的纯正性和排他性;(3)加尔文始终努力促进海外宣教和建立普世性的新教教会;(4)他非常重视教育,以便给新教教义的发展和新教的传播做学术上的准备;(5)加尔文的预定论以他关于天职、善功、拣选的观念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杠杆。一方面,可怕的预定论迫使人们积极进取,重视善功,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宗教思想的核心是荣耀上帝,享乐是有罪的,这必然导致节俭和财富的积累。<sup>[6]</sup>

## 三、新教三大教派对西欧社会转型的意义

中世纪新教改革的三大主要教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西欧社会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1. 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

路德的宗教改革拯救了传统的基督教的对于上帝的神圣信仰。他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教众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发自于内心的,善功作为一种外部方式并没有内心的信仰重要。路德把神学规定为十字架神学和把神学主题确立为因信称义和救赎论的两大理论之下,实现了一场神学的思维转向和范式转换,福音范式成为路德理解神学、教会和社会的标准尺度。从而,福音教会作为打破中世纪罗马教会大一统思想政治局面以及取代、抗衡和制约罗马教会的教阶体制和教皇至上的实践成果,在新教地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自由思潮的产生。路德神学表征西方现代性的源头意义之处正在于全面性的结构变革:即神学与哲学学科分离的文化结构变革、宗教与政治职能分离的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教会生活民主化的教会结构变革。<sup>[7]</sup>

### 2. 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

英国宗教改革具有比较明显的实用主义。在整个英国宗教改革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宗教观点的变化,一切宗教的观点的取舍都以对英格兰国家的发展有利为唯一原则。这是一种浓郁的“埃拉斯都主义”的表现。在英国的宗教改革中所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清教徒与国教之间的矛盾也导

致了后来的一大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前往“新大陆”避难。其结果则是美利坚民族和国家的最初雏形的形成。美国民族特性以及宗教的历史渊源就在于早期的清教徒的宗教信仰。

英国宗教改革从形式和内容上撼动了罗马天主教的压倒性地位,为安立甘教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国教一方面从国家获得大量特权,另一方面它的财产受着国家的监督。国教在法律上的优越地位,使其具有一种隐蔽的歧视权。许多法律条文偏袒国教而漠视其他少数派宗教团体。在对读神行为的处置上国教的特权十分明显。<sup>[8]</sup>此外,教会提倡在教会仪式中使用英语这一举措也增进了英国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最后,由于英国的君主专制以及新教徒的反抗精神,逐渐形成了君主专制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1640年英国的“清教徒革命”(资产阶级革命)。

### 3. 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

加尔文的新教伦理,既有直接促进社会世俗化的现代因素,又有弘扬中世纪价值的成分。它蕴含着摆脱愚昧、迷信和盲从,走向明智、理性和自主的重大启蒙意义。加尔文的改革成功地构建了新的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尤其是其改革神学所蕴涵的宗教伦理为近代西方的合理主义行为准则奠定了基础。它广泛触及了日内瓦的社会整合问题,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在重新构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的同时,亦凸显了社会功能。它直接促进了日内瓦社会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社会风尚的优化,进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形成了对宗教层面的超越。就其影响而言,其社会功能的凸显,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日内瓦新兴政权的存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sup>[6]</sup>加尔文的“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宗教组织形式,和讲求实际、鼓励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的教会观符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及其在政治上企盼更多权利和自由的愿望。<sup>[9]</sup>

15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形成了以路德宗,安立甘教以及加尔文宗的新教三大教派,对西欧的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使欧洲基督教意识形态成功地实现了从中古向近代的过渡,二是实现了政治、经济权力的大转变,促进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三是为近代欧洲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sup>[10]</sup>这种具有广泛影响的宗教改革构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前提之一。宗教改革不仅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分水岭,也成为了南北欧洲综合力量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关键原因。新教教义并没有超出基督信仰的范围,然而,新教精神对哲学的影响却超出了基督教哲学的范围,它为近代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和文化氛围。<sup>[11]</sup>

总而言之,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可以从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来看。从宗教的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克服了罗马天主教的灵肉、天国与人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论,以及这种二元论所导致的信仰虚假和道德堕落,将二者和谐统一起来。从世俗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对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宗教改革也有不足。宗教改革具有一种贵族主义色彩,带有浓厚的中世纪气息,它只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开端,只是在客观上为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创造了客观条件,不具有现代性特征。宗教改革只是在欧洲天主教专制的铁幕上炸开了一个缺口,真正的社会变革是在后来的时代才发生的。<sup>[3]</sup>

### [参考文献]

- [1]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2]胡玉娟.拯救与信仰——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
- [3]赵林.西方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4]李立国.宗教改革与西方教育现代化的起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6).
- [5]柴慧廷.基督教安立甘宗的形成及其特点论析[J].史林,1994(1).
- [6]吴舒屏.对宗教的超越——论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J].兰州学刊,2005(3).
- [7]高文新,程波.路德的宗教改革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起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 [8]雷雨田.当代英国的国教[J].西欧研究,1990(3).
- [9]张晓毓.从加尔文宗教改革看西方现代性起源[J].理论界,2010(7).
- [10]李勤.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作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责任编辑 光 翟)

# 韩非和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之比较

刘 赢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7)

**[摘要]**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典型的哲学伦理学说,在东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子和边沁分别是东西方有名的哲学家,两人对功利主义和法治思想皆有深入研究,两人的法治思想都渗透了各自的功利主义思想。比较两人的观点,可以发现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拥有的思想背景不同,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人性论、社会观和基于二者之上的法治思想这三个方面都既有共通之处,又有独特之处。功利主义这一哲学思想,在韩非和边沁的哲学体系中呈现出各自特别的面貌,不仅对当时的哲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代的法治建设也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韩非; 边沁; 功利主义; 法治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26-04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伦理学说,自古至今有其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中国,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大发展的时期,儒、墨、道、法等各家争鸣,他们围绕人性、社会、国家等主题提出各自的见解,相互辩难,义利之辨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法家基本肯定人对利的欲望,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人的本性就是“好利恶害”,认为“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功利主义思想深深渗透在韩非的人性论、社会观和法治思想中。在西方,功利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到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及18世纪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时,功利主义理论初步形成。它的集大成者是英国思想家边沁,边沁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功利主义理论的人。

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由来已久。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典型的哲学伦理学说,在东西方哲学史上,甚至在东西方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较韩非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可以

启发我们对功利主义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同时对我们当代的立法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 一、功利主义人性论之比较

功利主义人性论的核心观点是:人都是主观自利的。韩非和边沁虽然身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环境,但在人性方面,他们都看到了人趋利避害的本能。

先秦时期,人性论包括“有善有恶论、无善无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善论是其中的主流观点。儒家学派的孔子和孟子对人性的善恶问题持相反的态度,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荀子认为人性恶的主要依据是人都有好利的本性,如果顺着人性自然发展必然会产生争夺导致社会动乱。韩非子师从荀子,他的人性论被很多人简单地当作荀子“性恶论”的延续。但是从韩非子本身的学说来看,他虽然主张人的行为具有“好利恶害”的倾向,但他并未对人性给出道德上的善恶评判,韩非对人性的看法是“生之谓性”,提出了“人性好利说”。首先,韩非从人的生理需求上论证自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无毛羽,不

**[收稿日期]** 2014-10-02

**[作者简介]** 刘 赢,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韩非子·解老》）其次，韩非还从人的行为和目的的关系分析，进一步论证“人性自利”，《韩非子·备内》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之所加也。故與人成與，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與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此外，韩非认为在人际关系中人的行为仍然遵循“人性自利”原则，《外储说左上》曰“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消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讙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这表明即使像子女和父母的亲密关系，两者间也存在“好利恶害”之处。韩非的人性论符合功利主义人性论的核心观点，他从经验的角度对人的本性进行把握，尤其强调社会状态下人的经验本性，是趋利避害。

边沁则认为，功利主义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行为之中，以痛苦和快乐为核心的功利主义理念来自于人的本性，而每个人的本性又受限于客观现实的束缚，因此人的本性都呈现出相同的一种倾向——“避苦求乐”。边沁曾经讲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强有力的评价的控制之下：痛苦和快乐，只有他们才能向我们指出应该做什么，并决定了会做什么。”<sup>[1](P.24)</sup> 人类的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痛苦和快乐之间的权衡，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寻求快乐避开痛苦。此外，在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的基础上，边沁重新界定了善与恶的评价标准。概括起来说，所谓的善是指好的想法、好的行为、好的结果，所谓的恶是指坏的想法、坏的想法、坏的结果。善与恶的划分基于人的本性，善就是快乐，人的一切行为在寻求快乐的同时就是在进行善举，寻求快乐的初衷就是善的初衷，快乐的获得就是善的最终实现；恶就是痛苦，人的行为出发点如果与其本性相违背，那么就是痛苦，其开始于主观意志上的恶的认知，表现为恶的进行。在这种以人性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理念中，人们会通过来自内心深处的、最朴实的理念来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给出价值判断，这回答了为何人们对于相同行为的会有不同善恶评判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人性论上，韩非和边沁极为注重人的自然本性，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好利恶害”的倾向，不同的是韩非的功利主义人性论更加强

调“利”是人类行为的动机，强调了人类这种本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边沁则将“快乐与痛苦”和“善与恶”结合起来，使“趋利避害”覆盖了人类行为的产生、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

## 二、功利主义社会观之比较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其对人性的哲学分析和对社会的深切体察基础上的，人性“好利恶害”，而当时的社会则处在诸侯国雄起、富国强兵以求争霸的时代，韩非的思想主要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因此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有其特殊的时代特征。

韩非的功利主义思想首先是为君主服务的，他的社会公利主要指的是君主的利益，“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八说》），可见韩非认为只有人主之利为公利，而普通百姓和人臣之利则是“私便”，而人主最大的公利便是“国之富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公私必须分明，当个人的私利和公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坚持去私行公。在这里，社会的利益就被等同于“国之富强”，等同于“人主之利”。但是“去私行公”并不代表忽视个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上，韩非主张顺应人“好利恶害”的实情，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韩非认为，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和对危害的躲避是人主可以用来驾驭臣民的基础，“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韩非子·八说》）通过赏罚来充分激发人臣和普通百姓的积极性，巩固自己的统治。

相对于韩非而言，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上，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更加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首先，边沁认为社会是由所有的个体组成的一个集合体，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社会的存在则是以个人为基础。社会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保护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此外，“理性的人之所以善待他人乃是因为他认识到受惠者的回报对他有利。社会生活中的人类要彼此相互实现自己的需要，且开通的人觉悟到只有合

作精神才能保全自身利益。”<sup>[2](P.583)</sup>因此,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逐步意识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功利同源性,维护社会利益也是维护个人利益的一种方式,社会发展也呈现出“趋利避害”的整体趋势。边沁主张:“一个私人无不当以自己的行为来争取他本人及同类的幸福。”<sup>[3](P.369)</sup>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抉择中,边沁的原则是追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在评价一个社会的质量时,也应该把“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衡量标准。

总之,在社会功利问题上,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韩非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都有其局限性。韩非的思想受制于人治社会的现实条件,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更多的呈现出冲突的状态。相对而言,边沁的思想则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认为社会功利应当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原则。两者对人性的看法和对社会功利的不同认知使他们在法治思想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 三、功利主义法治思想之比较

正如上文所言,由于韩非和边沁对人性功利的认识和对社会功利的认识不同,两人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法治观念上的体现也不同。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君主“人治”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所谓法治,只是君主治国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在韩非看来,从人“好利恶害”本性出发,结合“富国强兵”的社会功利目的,君主应该实行以赏罚为手段的法治。“明主之所管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行、德也。何谓行、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臣民在君主的赏罚控制之下,奖赏是臣民利益所在,而惩罚是臣民危害所在,君主执掌着赏罚之权,可以充分利用人的自然本性巩固其统治。此外,法律本身的制定,除了以君主的功利目的为出发点,还要符合人性的客观规律,“法者,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非子·定法》)这里的“民心”就是人的“好利恶害”之心,由此可见,韩非认为法虽然出乎人主的功利目的,但人臣和普通民众的利益也不可以被忽视,只有利用好利恶害的人性规律,以赏罚为手段,坚持“循法而行”的法治理念才能达到维护君主统治秩序、称霸天下的目的。

在韩非的法治思想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重刑倾向。韩非坚持“人性好利”,而且认为这种本性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包括父子、夫妻、君臣等,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到利益和欲望的驱动。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利的关系中,韩非认为人臣的“私便”会妨碍人主的“公利”,他们之间通常是冲突的。因此,韩非特别强调“重刑轻赏”,只有“重刑”才能使人臣不因为一己私利妨碍君主之利,“轻赏”则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奖赏过多会助长人性的贪婪。可以说,“以法制利”成为了韩非的功利主义法治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法律成为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时的一种制衡工具。

边沁通过对功利主义人性和社会的分析,认为是人类的功利需要导致了人们立法,产生了法治观念。他认为“个人,即构成共同体的个人之幸福——他们的快乐与安全,就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唯一目的。”<sup>[4](P.169)</sup>人们立法的需求产生于人们的功利主义目的,因此立法也应该符合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功利主义原则。在立法实践中,在立法之初和完善法律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对立法的过程、法律本身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考量,“当我们将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者不赞成的时候,我们应该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sup>[5](P.211)</sup>虽然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原则的关照之下,边沁的功利主义法治思想显示出人性化和进步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原则之下对小部分群体利益的牺牲。边沁提倡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重的是多数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幸福,但这样却忽略了利益的正当分配。在“最大多数人”里面,较为重视的是利益获得的多少,却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人占优势,有的人处于劣势,只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利益的分配问题,必然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此外,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目的,体现在出了对人类行为效果的重视和对人类行为动机一定程度的忽视,这也是边沁功利主义法治思想备受争议之处。

韩非的功利主义法治观念,是在君主人治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它与“术、势”相同,只是人君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具有先天的不足。这也是它“以法制利”特点产生的根本原因。边沁的功利主义法治思想,因为所处的 (下转第 55 页)



#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持海外侨校的举措试析

——以侨务委员会为核心

关 冰 陈国威

(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广东湛江 524048)

**[摘要]** 抗战期间,为了争取更大的海外侨社资源,国民政府在侨务政策方面,对侨民教育有所重视,对海外侨校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海外侨民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战后海外侨校的恢复与发展。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海外侨校;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29-06

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期间的侨民教育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度,但对政府与侨教的关系,似乎有待于加大。其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华侨教育被视为国家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在处理华侨教育问题上,在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很大的实质性区别。抗战正式爆发后,为了争取更大的海外侨社资源,国民政府在侨务政策方面,对侨民教育有所偏重,对海外侨校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海外侨民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战后海外侨校的恢复与发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视侨教的理念也为后来台湾侨务工作委员会所承继。现笔者据相关档案等史料,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为重点,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扶持侨校的行为进行一番考察,以有助于学界对民国期间华侨教育的研究。

## 一、海内外增设侨校

1929年召开华侨教育会议认为:“教育之目的,不外培养民族之各种能力,使能发扬光大其固有之民族精神,而造成伟大崇高普遍之文化。”“本党鉴于民族之生存,须先发扬其优越之民族性,而优越之民族性之培养充实,又非藉教育之力不为

功。故于提倡教育之中,特别注意于海外侨民之教育。”<sup>[1](P.1)</sup>此无疑道出华侨教育在国民政府的意义,认为通过华侨教育以之培养中华民族精神。

曾任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也认为:“华侨子弟远离祖国的怀抱,应从速补习祖国的教育,俾做一个现代的中华民国国民,而有爱护祖国的热忱,激发这种热忱,必须对祖国的一切有深刻的了解,了解祖国的方法,先要研习祖国的历史、地理、祖国的文化,以及祖国的文字,语言。……这些,乃是产生爱护祖国热忱的根源。”<sup>[2]</sup>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后就制定相关的华侨教育政策、宗旨,颁布了各项法令、法规,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华侨教育,大力发展华侨教育事业。其中抗战时期于海内外增设侨校即是国民政府扶持华侨教育的举措之一。

抗战前,国民政府对待华侨教育虽然呈现出比较热情的关注,如1929年教育部设置了办理华侨教育的设计咨询机关——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1929年召开全国性的华侨教育会议,相关机构、人员进行了调查海外侨社侨教的情况、计划侨教的改进、计划侨教的经费、筹划师资的培训、课

**[收稿日期]** 2015-01-20

**[作者简介]** 关冰,女,辽宁沈阳人,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

陈国威,男,广东湛江人,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程的设计及教材问题的提出等等工作,但总的说来,上述内容主要还是停留在计划之中,只为一纸空文,并没有具体实施,战前国民政府在侨教政策方面的工作主要放在海外侨校立案方面。但上述工作无疑是为抗战时期侨教政策的具体实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基于实际情况,对侨教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与实施。

早在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五七次常会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即规定华侨教育的目标为:“一、根据中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谋华侨教育之统一和发展。二、根据华侨之特殊环境,为提高华侨在国际上的地位,促成中外民族间之平等起见,应从教育方面力谋华侨民族意识之增进,华侨自治能力之训练,与华侨生活之改进及生产能力之养成。三、根据华侨教育之实际状况,力谋华侨普通教育、职业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及补习教育之改进和发展。”<sup>[3](P.1045)</sup>此举一方面基于此目标,另一方面,更主要是为了谋求更大的抗战资源。抗战时期,为争取海外侨民的支持,培植民族意识,国民政府开始在海外大力扶持各种侨校。“查有若干侨民居留地侨民众多,尚无侨民学校之设(或因经费筹措困难,或因无人倡导,或因环境特殊)遂致所有学龄侨童均丧失受祖国教育之机会。其家庭较为富裕者,则入当地政府所设立之学校受异国教育,致为其所同化。其家境较为清贫者,固不能受异国之教育,然因不识、不知,毫无祖国观念,无异当地土著。”<sup>[4]</sup>侨委会为了补救此项缺陷、培植中华民族精神起见,“乃于去年(即1940年)拨款在澳洲之雪梨,及美利滨,两地设立侨民小学。今年(即1941年)除续拨款一万元加以充实外,更择定下列各地分别创设□□充实。(一)印度噶伦,有汉藏侨民□□,而无侨校之设立,蒙藏委员会函请拨款八千元在该地设校,经函复照办,现在进行中。(二)据云南佛海县政府呈,以该地颇多由泰国退出之侨民子女,请拨款在该县设校收容等情,已准拨一万元设立小学。(三)缅甸□栋,接近泰国,泰国环境特殊,经拨款一万元,在该地设立侨校以收容泰国来学之侨童。(四)槟榔屿接近泰国,亦拟拨款八千元,设校收容由泰国来学之侨童。(五)危瓜马拉(中美)总领事馆呈请拨款在该地设校收容侨童。已准拨一万元开办。(六)纽西兰之威灵顿,及奥克兰,原有侨民颇多,广州沦陷后,侨民子弟往该地就学者更多,该地虽各有侨校一所,惟设备简

陋,办理不善,已各拨九千元,加以整顿充实。”<sup>[5]</sup>按照侨委会组织法,自1932年改隶行政系统、走上正轨以后,侨委会设三处:秘书处、侨务管理处和侨民教育处。其中侨民教育处执掌如下职务:关于侨民教育之指导监督及调查事项;关于侨民回国求学之指导事项;关于侨民教育经费之补助事项;关于文化之宣传事项。<sup>[6]</sup>相关管理海外侨教被归属侨委会管理。

对于“为使年长失学之侨民获得简易之知能”的民众学校,1936年3月侨委会就联同教育部致函中央要求拨款资助华侨设立民众学校,并随函附送何如群等人提案。<sup>[7](P.157)</sup>抗战爆发后,侨委会即于1939年订定“侨民民众学校规程”,分别令飭海外领事馆侨团侨校负责办理外,并于1940年“拨款指定驻新嘉坡等地领事馆侨团侨校设立民众学校一百班,以为示范。每班由本会补助一百元,并编印‘怎样办理华侨民众学校’一书分发参照实施。三十年度当经继续拨款办理一百班,每班予以二百元补助。”主管海外工作的党务机构——中央海外部也在积极谋划此项政策,“爰颁发海外总支部直属支部附设侨民夜校规程,通令海外总支部直属支部酌量当地情形及经济状况,设立侨民夜校一所或二所,招收不识字之本党党员与青年侨胞,教以国语习字及各种职业常识,并须注重精神讲话,灌输本党主义,校长及教职员,由党部工作人员及所属党员分任之,为义务职,经费以当地党部自筹为原则,本部得斟酌情形,按月予以补助……据报已开学者,则有换鹿、星加坡、澳门、帝文、模里斯、麻厘柏板等直属支部及菲律宾所属苏洛支部。”<sup>[8](167)</sup>而对于职业学校,侨委会则积极推进,1939年订定“侨民职业补习班规程”,普遍倡导设立侨民职业补习班。1940年侨29丁字第3368号训令要求,各驻外使领馆“飭遵前颁表格尅日将管辖区域内之职业教育状况及侨生肄业当地职业学校情形,切实调查详细填报勿延”。随即各使领馆也随即将其管辖地区的情况向侨委会汇报。如驻山打根领事馆山字第968号呈称:“……查报驻地职业教育状况及侨生肄业当地职业学校情形等因;查本馆辖内,迄无职业学校之设立。理合专文呈复。”驻瓜地马拉总领事馆也言:“……查本馆辖区内无职业教育而当地侨生,亦无肄业当地职业学校者。”但在同年度侨委会仍然“于二十九年度拨款指定驻新加坡等地领事馆会同当地侨团侨校设立职业补习班二十五班,以为

示范,每班由本会补助四百元。三十年度当继续拨款办理四十班分配于海外侨民较多之地点,每班补助五百元。”惜对于“奖助华侨学生肄业侨居地职业学校及技艺专科学校”事项,则由于“经分飭各领事馆调查当地职业教育及技艺教育状况暨华侨学生肄业当地职业学校及技艺学校情形,然后根据调查所得决定补助其中成绩优良之华侨学生,以资鼓励。惟据报廖廖难于核办。”<sup>[9]</sup>

## 二、培植侨校师资

教师作为学校运作的主体,是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侨校师资问题一直都是困扰着海外侨教的发展要素。如外交部与侨委会提出的“华侨教育实施方案”就认为“海外侨校师资缺乏,程度不齐,影响华侨教育至为重大。”而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书记黄伯耀在报告美洲华侨教育情况与改进意见里提到:“除三藩市、纽约、波士坡、斐士那市、作顿美利允沙加緬度挖慎委、加拿大之温哥华、都郎杜、多利域等埠设有华侨公立学校外,其他百数十大中小埠均无学校设备,师资亦欠缺,华侨子弟多有不能说中国话者,在家庭内有许多为父母者亦用三七四六成英语与其儿女谈话,再过数年,若不设法使之读中国文字,则尽奕为美化及加拿大化。”<sup>[10]</sup>海外侨校师资缺乏是战前不争的事实。据20世纪30年代钱鹤的南洋侨校的调查,海外侨校的师资力量是欠缺的。如“沙口越咪哩坡公立中华学校(Chung Hwa School)教职员4人,学生108人,学生原籍广东9/10,福建1/10。”“苏岛日里老武汉中华学校(Chung Hwa School)校长郑源深,女教员郭闰文,共二人,复式一二年一班,三四五六年一班。学生90余人(女生三十余人)。”“日里勿湾中华学校校长郑泽民,女教员林某共二人,复式一二三年一班,四五年一班,共两班,学生共90余人(内女生20余人)。”“苏门答腊马达山华强学校(Hwa Chung School)校长叶子元,教员蔡忠宴,小学五级,分两班教授,学生76人,内有女生14名。”“苏门答腊甲文惹中华学校校长蔡毓才(兼教员),学生28名,内女生四名。粤籍60%,闽籍40%。”<sup>[11]</sup>因而如何加强战时海外侨校的师资力量是侨委会比较积极推进的工作之一。综观该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教政策,其主要通过如下途径增进海外侨校的师资力量:

第一种途径为举办侨教函授学校,培养侨校师资。侨委会“为对于现任侨民学校教职员充实

其一般知识,增进其专业技能并予以精神上之训练,高度提起其服务兴趣,使成为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之优秀人员起见,特设立侨民教育函授学校。”<sup>[4]</sup>函授学校于1939年11月开始筹设,于1940年7月正式成立,附设于侨委会驻渝办事处内办理校务。据了解,函授学校设校长一人,由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兼任,副校长二人,由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启刚及侨民教育处处长余俊贤兼任,并聘请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为名誉校长。在校长下面设教务事务两组,各设正副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会计一人,书记二人。“担任编撰各科讲义者,计有吴敬恒,梁寒操、湛小岑、余俊贤、李长傅、吴研因、姜琦、胡寄南、章益、张峰阳、李炳樑、曾特、何士芳、钱安毅、林乾祐等十余人,均为当代知名之士,而对于所任各该学科有精深之研究者。”<sup>[12]</sup>所函授的课程“计分四大类,凡十七科”。包括“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最近国内外情势”、“教育概论”、“教育心理”、“侨校行政”、“侨校训育”、“战时教育”、“华侨移殖史”、“中外条约”等等。由侨委会“每周印发讲义约计200—300份,交由重庆川东邮政管理局作大宗航空邮件,经香港转邮各地”<sup>[13]</sup>。第一期招生1250人,84%以上为现任侨校教师,主要来源于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四大洲,规定修业期间为一年半。

第二种途径为办理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1939年侨委会经呈奉行政院批准,获拨款54600元设立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训练优秀师资派赴海外侨民学校服务。该训练班“招收中上学校毕业生,专门研究教育,或具有教学经验者,予以六个月之训练”,毕业后,即派往海外侨校任教。训练班教授的科目包括四大类:基本科目,如“总理遗教”、“领袖言行”等;教育科目,如“教材教法研究”、“侨校行政”、“侨校训育”等;侨务科目,如“各国拓殖史”、“华侨移殖史”、“中外条约”、“华侨居留地法规”等;补习科目,如“应用文”、“新闻学”等。<sup>[14]</sup>

第三种途径为设立国立华侨师范学校。“除由以上两项办法训练新旧师资外,当嫌不足为经常造就在海外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之优良师资起见,三十年度当会同教育部设立国立华侨师范学校一所,多招粤闽两省学生就学(海外侨民多属粤闽籍人,如能造就粤闽籍师资前往海外侨民学校服务自较便利),第一年办师范两班,实验小学四班(单式二班复式二班)幼稚园一班,以后逐年增

加,至少达到设置师范六班,必要时并设特别师范科若干班,另设实验小学四班(高级单式初级复式)幼稚园二班”。

第四种途径为在海外立案侨民中学内添设师范班。“目前海外侨民学校为数三千余,每年所需补充师资非少,自不能完全由国内训练派出服务,且有若干居留地政府对于知识份子之入境异常注意,往往加以阻止,故在海外侨民居留地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小学师资担任当地侨民小学教职员,实为必要之图。”

第五种途径是举办侨民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会。“本会为便利现任侨民学校教职员暑期进修并研讨校务教务训育及各科教学问题,籍资增进个人知能,进而改进侨民学校起见,决定利用暑期间召集各侨民学校教职员举行讲习会。三十年度会同教育部先在香港新嘉坡二地分别举行。”<sup>[4]</sup>

此外,政府也在经济方面,扶植侨校老师。如在1942年,侨委会发给850名侨校教师救济费即为2899136元。<sup>[15](P.415)</sup>

### 三、侨校教材的改善

“国内侨教是指侨生回国升学和就业……国外侨教那就是海外黄帝子孙的培植。”“华侨的灵魂出自侨教的反映。”<sup>[16]</sup>而海外侨教往往受到其载体——教材的影响,因而侨校教材比较早地受到关注。抗战前,已有学者对海外侨校教材问题提出意见。“改编教科书的声浪,近来很有人提议过,原因是祖国的教科书像公民自然等科,多和南洋情形不合。”<sup>[17]</sup>“现在华校所用之教科书,概取诸商务中华两书局所出版者,其内容材料多不合于南洋社会状况与需要,尤其常识一科更为差谬。”<sup>[18]</sup>抗战爆发后,侨委会开始着手编辑侨校教材。在一份国立编译馆教科用书组至侨委会秘书处的信件里讲到:“……本馆奉命接收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所有教科用书之编审工作,概由本馆赓续进行。查前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因编辑侨民初中课本,为征集各种有关资料及关于侨民初中课本中诸实际问题之请求解答起见,曾于去年(194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编字第719号公函,检送‘关于侨民初中公民课本中请指示诸问题’十五份及‘侨民初中公民课本目录’一份,……刻本馆正着手校订此种课本初稿,函需参考实际资料,恳将能以解答各问题,先行抄缮赐下,其余则可陆续予以解答。”<sup>[19]</sup>在收集一定的资料后,侨

委会即编印部分侨校教材。关于侨民小学教科书及教学法共计86册,已完成43册。科目包括:高小国语、高小自然、高小社会、高小算术、高小商业、初小国语、初小常识、初小算术等;而“教授书完成17册。”<sup>[14]</sup>这些已完成编辑的教材随即一部分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除了教材之外,侨委会还进行其他方面的教材编辑工作,“兹查南洋英美属地之华侨学校为应付当地政府之要求,及事实之需要,对于英语一科均列课程表内,为适应此种要求起见,当于三十年下半年继续编辑侨民小学英语课本,并于年底以前编辑完竣。再次,海外侨民学校之中初级中学亦属不少,为使侨民初级中学学生获有完善之课本起见,当于三十年度下半年着手进行编辑侨民初级中学各科课本,定于三十一年底以前全部予以编辑完竣。此外海外侨民民众学校亦逐渐设立。为使各民众学校学生获有适应需要课本之起见,亦当于三十年度下半年着手编辑侨民民众学校课本,并于年底以前编辑完竣付印。至于海外侨民学校员生参考之图书,亦亟待编印,以供应用。”<sup>[4]</sup>

### 四、经费扶持

1934年3月20日经侨务委员会与教育部会同修正公布的《侨民学校立案规程》第五条规定:“凡已立案之侨民学校,如有应行褒奖补助,及介绍学生回国升学事项,均得予以优异之待遇。”1936年10月1日公布的《侨务委员会补助侨民学校办法》对于补助方面的内容规定得更为具体:“凡侨民学校经呈准本会及教育部立案后,办理一学期以上,具有优良成绩,而经费确属困难者,得呈请本会补助。”“侨民学校之补助费,依各该校之办理成绩设备经济状况,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每年壹千五百元;乙种每年壹千二百元。初级中学:甲种每年壹千元。乙种每年八百元;小学及幼稚园甲种每年六百元。乙种每年四百元(均以国币计算)”。但也许由于要求登记立案的手续过于繁琐,如既要有校区的平面图、体育卫生设备一览表,图书统计,仪器统计,教具校具统计,又要有各项规则、校董会章程、教职员履历表、学生一览表、历年毕业生一览表,以及详细申述学校之设施经济实际情形资料等等文字手续,再加上补助经费不是很多,故登记立案的海外侨校不是很多。1929年立案侨校为2所,1930年为20所,1931年则为64所,但1932年为27所,1933年10所,1934

年为40所,1935年是64所,1936年79所,抗战正式爆发的1937年则为75所,战争无疑是影响立案侨校的成绩,1938年为27所。<sup>[20](P.289)</sup>而据1939年2月的侨委会侨民教育工作报告,其时立案的中小学侨校为449所,其中包括中学校数为57所,小学校数为392所,当其时的侨民中小学校数为2450所,其中中学为120所,小学为2330所。据侨务委员会统计,截至1940年12月底,在教育部核准立案的侨校为493所,约占当时海外华侨学校总数3231所的六分之一弱。这些备案的侨校包括:中学78所,小学402所,师范学校1所,职业学校4所,补习学校6所,民众学校2所。<sup>[21](P.76)</sup>

但不管如何,海外侨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当然也包括经费方面的支持。抗战时期,虽然国家财政已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查国家深念华侨教育之重要,对于侨校补助费现仍继续拨付。该福建民生小学,前经本会核准每年补助国币六百元,惟二十五年三三四两期补助费三百元,该校尚未照领,曾经批伤填具收据呈会核发有案。”<sup>[22]</sup>国民政府在进行上述扶持海外侨校工作之外,还对已立案的侨校进行经费支助。1938年侨委会在致教育部一份公函中即言:“查侨民教育补助费,係用以补助已立案而办理成绩优良经济确属困难之侨校,及清贫侨生回国升学等。其变通办理拨款创办学校者,只有古巴墨西哥檀香山伦敦四处。香港方面则未曾有。”<sup>[22]</sup>而在1942年侨委会就“补助海外侨校三十三校,内迁侨校十五校”,共花费十四万元。<sup>[23]</sup>

当然,除了中央政府固定的经费给予侨校费用的支援外,地方政府也给予一定的支助。如1942年7月福建省紧急救侨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给予侨办中学每班每月经费300元,职业学校为600元。<sup>[24]</sup>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海外侨校的扶持经费也许数额不大,但在特定的时期却对这些侨校的继续维持起到重要作用的,尤其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一种支持的态度。这种支持态度在那种民族危机时期尤显可贵。

## 五、余论

抗战时期,华侨教育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国民政府改变过去对华侨不闻不问的态度,对侨教采取鼓励、扶持态度,并日渐重视海外侨校,采取各项政策、办法扶持海外侨校。除了本

文涉及到相关措施外,还有相关的制度也被应用于海外侨校的发展,如侨教视导制度。从总体上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海外侨校的成绩还是显著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将党化教育、党务教育强化在海外教育之上。“本会(按,指侨委会)即于组织法之外,次第增设下列各种机构。(一)侨民师资教育训练所 侨民教育师资训练所原为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于民国二十三年训练第一期学员一班,二十九年训练第二期学员一班,三十年由本会与教育部会同办理扩大组织,改称为所。以训练在海外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之优良师资,遣送或介绍前赴侨民学校服务为宗旨。……(二)侨民教育函授学校 侨民教育函授学校于二十八年底开始筹备,二十九年七月一日正式开学,以对于现在从事或准备从事侨民教育人员,充实其一般知识,增进其专业技能,并于以精神上之训练,高度提起其服务兴趣,使成为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之优秀人员为宗旨。”<sup>[25]</sup>对此,抗战时期,长时间地生活在南洋地区的胡愈之颇有感触,也甚为不满。他说:“显然的,国内党化教育的疫症,已经传染到马华教育界。棋樟山的检疫所只能检验普通的病疫,对于党化教育的霉菌,当然是没有注意的。但是这种霉菌的毒害,决不亚于天花和霍乱,因为它会毒害儿童和青年的精神。”“国内党化教育的政策,除了利用党团特务在学校活动,在从事上还极力排斥异己。这可用两句话加以包括,就是:‘顺我者有饭吃,逆我者无书教。’如何表示其‘顺我’?当然要入党。因此,强迫教师入党,真是雷厉风行……在这种政策下,大批优秀教授教师,纷纷被解聘,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特务,却高踞讲坛,把持校政,弄得神圣的教育园地,变成一团糟。好像近年学生程度的低落,连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党化教育的恶果之一。有人说这种教育,是中国的‘一代奇灾’,丝毫也不过火。这种霉菌传到马华教育界来,实在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情。”<sup>[26](P.172)</sup>显然,作为一位资深的学者和国际问题专家的胡愈之对国民政府把国内党化教育移栽到海外华侨教育界甚为不满。

注重华文教育一直是海外华人群体执著的文化目标。抗战时期,基于抗战资源的考虑,国民政府也将华文教育与国家命运的思考结合在一起,比较大力气地扶持海外教育。总概民国时期海外华文教育的兴盛与衰微、成就与不足,我们不难发

现,海外华侨教育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与国家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自抗日战争爆发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海外华侨教育都持鼓励态度,不仅开始设立专门的侨教管理机构,还继续制订和修订华侨教育法规,对海外侨校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海外侨民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战后海外侨校的恢复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华侨教育会议宣言[Z]. 华侨教育会议报告书,1930.
- [2] 朱家骅. 致美洲华侨学校教职员学生公开信[J]. 华侨评论,1946(10).
-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4] 侨委会三十年工作报告[R].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全宗号二,案卷号 6660,微缩 16J-1331.
- [5] 增设华侨小学近讯[J]. 现代华侨,1941(9).
- [6] 侨务法规及有关文书[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振济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一六,案卷号 92.
-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影印本)(二十一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8] 陈鹏仁.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M]. 台北:近代中国发行,1998.
- [9] 答复关于侨校状况之询问[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 72. 侨委会三十年工作报告[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全宗号二,案卷号 6660,微缩 16J-1331.
- [10] 外交部侨委会关于华侨教育案[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 645.
- [11] 钱鹤. 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M]. 广州:暨

- 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30.
- [12] 伍瑞楷. 侨民教育函授学校办理经过及今后计划[J]. 现代华侨,1941(2).
- [13] 韩世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J]. 武汉文史资料,2001(4).
- [14] 余俊贤. 最近一年来侨民教育设施[J]. 现代华侨,1940(创刊号).
- [15] 广东省档案馆,等. 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广东)(2)[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 [16] 周尚. 战后华侨教育[J]. 教育杂志,1958(32).
- [17] 沈秋岚. 华侨小学教育的商榷[J]. 棉兰华侨教育总会. 苏岛华侨教育丛刊,1931.
- [18] 陈丰年. 改进棉兰华侨教育之我见及建议[J]. 棉兰华侨教育总会. 苏岛华侨教育丛刊,1931.
- [19] 侨民教育教材编辑室关于侨民初中公民课本疑难问题与侨民教育处等单位的来往文书[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 312.
-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21] 别必亮. 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2] 关于华侨教育问题的建议与询问[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 315.
- [23] 侨委会工作成绩考查表[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 87.
- [24] 福建省档案馆. 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Z].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 [25] 侨政十年[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 7.
- [26] 胡愈之. 胡愈之文集(第5卷)[C]. 北京:三联书店,1996.

(责任编辑 光 翟)

# 浅析汉代服饰中的紫色应用

——以考古学为视角

郭羨雅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紫色一直是中国古代备受瞩目且极具重要的色彩。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整理观察,我们可以看出在汉代,紫色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中上层贵族阶级相较于下层阶级更偏爱着紫;紫色更能体现出尊者的高贵;紫色与道家的关系较为密切。

**[关键词]** 汉代服饰; 帛画; 壁画; 陶俑; 紫色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35-04

对于紫色的考古学研究,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有所提及。孙机先生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研究了金印紫绶(孙机:《说‘金紫’》,《中国古典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曾磊从历史学角度对秦汉紫色的观念进行了梳理(曾磊:《秦汉紫色观念的演进》,《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周铁、张志军是从化学分析的角度对秦代紫颜料成分进行了阐述(周铁、张志军:《一件彩绘俑头的保护及秦俑彩绘紫色黄色颜料的分析》,《文博》1995年第1期);徐蕊、马丹华则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汉代服饰的色彩,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徐蕊、马丹华:《汉代服饰色彩的考古学观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但是从考古学角度,对于单个紫色在整个汉代服饰地位上的研究寥寥,本篇旨在通过对紫色在汉代服饰上的研究,了解紫色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 一、紫色在上层贵族服饰中的运用

### 1. 长沙马王堆汉墓

长沙马王堆汉墓属于西汉早期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地区。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的帛画,这些帛画在一定程度上生动

形象的反映出汉代的服饰特色。马王堆1号墓中,在内棺的盖板上,覆盖了一幅彩绘的帛画。帛画呈“T”形,内容丰富,色彩艳丽,保存相当完整。这幅帛画的核心人物是位于古壁以上,两个龙首之间的一位形象相对高大的老妪。<sup>[1](P.42)</sup>这位老妪拄杖而立,身着彩色花纹的紫色曳地袍服,颇有威仪。帛画的左侧刻画了两位跪迎老妪的侍从,他们分别着红、青长袍;老妪身后的三个侍女,婷婷而立,她们分别着黄、红、白色曳地曲裾长袍,谦卑恭顺。从这段画面可以看出,侍从们身着的青、白、黄为“五正色”,而老妪身为雍容高贵的长沙丞相軼侯利苍之妻<sup>[2](P.238)</sup>,却着“五间色”之一——紫。这可能说明:首先,在汉代初期,服饰色彩的运用与身份等级之间没有严格划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场合中,尊者与侍从们的服色却没有撞色雷同,这应该也是对于身份等级的一种区分。其次,紫色作为“间色”之一,其地位在上升,它慢慢成为身份彰显的标志。在马王堆1号墓中,墓主人的尸身包裹的各式衣衾、衣服共有二十层,在其色彩上,以黄色为主。而在这幅“T”形帛画上,老妪的服装绘以紫色,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紫色已具有同黄色一样,彰显其尊贵身份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14-11-12

**[作者简介]** 郭羨雅,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无独有偶,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有两幅帛画,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是《非衣》帛画<sup>[2](P.103)</sup>,平铺在内棺盖板上的这一幅帛画,其核心人物是位于古璧以上,四个龙首之间的一位形象相对高大的男子,他头戴刘氏冠,身着朱领紫色袍服,腰间佩剑,庄重威严。据推测他应是墓主人—利得<sup>[2](P.106)</sup>。在墓主人的左右两侧各有侍从,其身后还绘有四位侍女。这些仆人们都各身穿朱、青、黑色长袍。

第二幅为《车马仪仗图》,<sup>[2](P.109)</sup>整幅图分为四个部分,图中表现墓主人形象的部分,位于画面的左上方。利得身着朱领白袖黑紫色长袍,头戴刘氏冠,人物形象相对高大。

这两幅帛画反映出,墓主人生前可能钟情于紫色袍服,要不然也不会在两幅仅有刻画墓主人形象的帛画上,着重用紫;紫色可能要比其它的“间色”地位高。

## 2. 偃师辛村新莽墓

该座汉墓于1991年7月在陕西省洛阳市偃师高龙乡辛村西南部发现。此墓壁画共有八幅<sup>[3](P.121)</sup>,大多是刻画日常生活内容,运用的色彩丰富。首先,八幅中有七幅使用了紫色颜料,其余一幅为东耳室门吏,画面已漫漶不清。其中有四幅运用紫色较多,多是用于人物的服饰,袍服、上衣、领袖的部分。而其余三幅,紫色只是以帷幔的填充色使用。其次,该墓壁画中,刻画有紫色服饰的人物,都是身份相对较高的人物。中室西壁中,南幅为《庖厨图》,图中着紫红色宽袖上衣的庖丁,居中位置,头戴冠,冠的服色已模糊不清。在他旁边的是一位着红色宽袖连衣长裙的女侍,另在两侧还刻有手持托板的男侍。显然,这位庖丁在这幅《庖厨图》中,属身份最高者。在北幅的《六博宴饮图》中,左者身穿宽衣紫袖,另有一位两手挽老者的侍者,着紫色袍服。中室东壁北幅的《宴饮图》<sup>[3](P.122)</sup>中,画面下方有三位女子,其中正中一位身份较为高大者应为尊,着紫色宽袖翻领上衣,两侧侍女着青、白二色曳地长裙。白色为“五正色”之一,此时却尊者穿紫,卑者着白。说明此时的紫色地位居上,已开始慢慢摆脱“间色”卑下的状况,也可以看出,身份较为低下的庖丁同样着紫服,表明紫色此时还不是尊者的专利。

## 3.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

该座汉墓于1995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营

盘地区被发现,大约为东汉中期墓,据分析,墓主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sup>[4]</sup>这座墓葬出土的大量丝织品都保存较好,极大地丰富了考古材料。

这些丝织品中,含有紫色的织品并不多,主要是香囊的绢带和囊边表面,冥衣的领口、袖口、上衣前襟部分用绛紫色绢贴边以及死者的袖口、下摆等处有紫色夹层镶边。由此看出,紫色在这里只起到了补充配色的作用。

## 4. 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

该座汉墓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塘沽路南侧,大约为东汉晚期墓。<sup>[5]</sup>通过现存壁画的保存状态,可以看出该墓的墓顶、墓室等处原应有大量丰富多彩的壁画,可惜因年代久远以及自然条件等原因,导致如今的壁画只有零星几处。在这几处中,使用紫色的部分主要是北壁东墙和南壁东段上绘有紫红色横栏。在人物服饰上,用紫的是东壁上绘有床上端坐的夫妇,其中的女子的额头裹有上半朱红下半紫红的绸带;另一处是南壁东端上描绘的马车主人身着紫红色袍服。

从这几处用紫的地方,可以看出:紫色均用在人物衣着醒目的位置。墓主人身着紫色服装,亦可认为是尊者着紫。

## 二、紫色在中下层贵族服饰中的运用

### 1.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

该汉墓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境内,属于西汉早期墓。此墓在石构建筑中采用了岩洞结构与石室结构结合的建筑形式。<sup>[6](P.43)</sup>北洞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俑,这些彩绘陶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所有的着帽俑,帽子均为紫色或绛紫色,主要有戴帽拱手俑、戴帽执兵俑和曲裾深衣背箭箛俑。他们都属于仪卫俑,部分陶俑的红色绶带下发现了半通印,印有“郎中”或“中郎”的篆字。左、右中郎将之下为中郎、侍郎,《后汉书》有记载:“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sup>[7](PP.3674-3675)</sup>同时“中郎,比六百石。”<sup>[7](P.3575)</sup>可见,这些郎官属于中层阶级。

通常情况下,着帽俑的地位应低于着冠俑。但是,在东一龕中的唯一一件戴帽拱手俑可能是此龕中乃至八个龕中身份最高的官员。<sup>[6](P.98)</sup>他头戴绛紫色帽,佩黑色组带,身材是整个佣群中最为高大的<sup>[6](P.81)</sup>。紫色用于帽的服色,戴于头部,紫



色可能为当时郡国部队中,保卫王宫的郎官所统一的帽色。

值得一提的是出紫色帽外,该墓陶俑中,身上绘有紫色的部分极少,只有少部分陶俑的领口边缘涂有紫色。可以看出,紫色也只是简单的配色作用,无决定性作用。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的彩绘陶俑上的紫色部分均含有人造硅酸铜钡颜料的成分,即中国紫(又称汉紫)。[8]说明西汉早期的楚国地区对于中国紫的合成制作工艺已经较为成熟。

## 2. 烧沟 61 号西汉墓

该汉墓位于 1957 年发现于陕西省洛阳市老城西北 1 公里附近。这是一座约汉元帝 - 成帝之间的砖室墓。在这座墓的墓门、后室后山墙壁、前堂后室的隔梁以及墓室的顶脊都发现了大量的整幅壁画,其内容丰富,色彩多样,且保存相对较好。

这些壁画的内容主要有“二桃杀三士图”、“孔子师项橐”[3](P.88)、“雉戏殄事图”①或是“鸿门宴”等。其中,后室后山墙壁画颇具争议,目前有两种推测,一是郭沫若先生推测为“鸿门宴”[9],二是孙作云先生认为是“雉戏殄事图”[10](P.56),两位先生的观点分歧较大。如若是郭沫若先生的观点,那图中人物大多皆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如刘邦、项羽、范增、张良、项庄等,他们大多身穿紫色袍服,说明紫色虽为间色,却仍然是当时上层社会所喜爱推崇的颜色,但炙肉者也着紫衣,就与图中坐饮者(按郭沫若先生推测,该男子为项羽)的服色相撞。这显然不合当时的尊卑等级。因而,笔者偏向于张作云先生的考证。雉戏是汉代宫廷重要的巫术打鬼仪式,《后汉书》:“先腊一日,大雉,谓之逐疫。其仪:选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侺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7](P.3127)壁画表面刻打鬼仪式,实际是为希望墓主人可以升仙。壁画上打鬼的侺子大多着紫衣,并非偶然,大概是想借紫色在道家中吉祥的寓意,并且紫色本身就具有神秘的含意,这也与雉戏活动所营造的氛围相当,在如此重要的宫廷活动中大量用紫,体现出当时人们对紫色的重视程度。

在烧沟 61 号汉墓中的壁画有个显著特点,紫色均用于上衣,而不见下裳。在人物的服饰的描

绘上,紫色都是绘于袍服、短襦,甚至用于领口袖边,却惟独不见用于下衣或是足履。先秦时,就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说法,紫色作为五间色之一,却大量用于上衣的配色,可见其地位,可能高于其他间色。

## 3. 河南济源市桐花沟十号汉墓

该墓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桐花沟村南部,为东汉时期墓葬。[11]紫色主要见于陶俑及多枝灯上。该墓共出土 8 件陶俑,其中有三件陶俑的服饰中用紫,分别是舞俑的下裳为浅紫色,歌唱俑则是通体为紫,童仆俑的外衣为浅紫色。随葬品中还出土了一件外形华美、色彩丰富的多枝灯,多枝灯上刻画了许多人物和动物形象。该灯中刻画的黑山羊着紫色短裤,斗兽人形象是下着紫色紧身短裤,以及骑在龙身上的羽人也是下着紫色紧身短裤。

## 三、紫色在神话人物服饰中的运用

### 西汉卜千秋墓

该墓于 1976 年 6 月于陕西省洛阳市邙山南麓地区,应是汉昭、宣帝时期的一位郡级官吏的墓葬。这座墓的壁画充满着宗教迷信色彩,卜千秋墓壁画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壁画中的仙人形象都穿着紫色的服饰。如墓门内上额仙人王子乔[3](P.76)、顶脊壁画卜千秋夫妇升仙图中女娲像、持节方士都穿着紫色的外袍,伏羲的肩部也绘有紫色,十分醒目。其二,壁画中的一些神兽的身体重要部分以紫色填充。壁画中的双泉羊的翅膀、双龙的躯体、朱雀的双翅都是绘以紫色。其三,壁画中的祥云多以紫色涂之。墓中壁画的紫色部分是中国紫颜料。[12]

壁画中的内容大多以打鬼升仙为主,表现了墓主人视死如归,向往神仙世界,早登极乐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恰好是道家思想的反映,紫色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与道家密不可分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紫气东来”由此而生,老子过函谷关,携紫气而至,这时就已表明紫色与道家的渊源。

通过以上的汉代服饰考古材料的梳理,我们

① 据孙作云先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幅考释》所论证,通过此画幅的第二层与旅大市旅顺营城子东汉砖室墓中主室内壁画的对比,可以得出这段画是表示死者从人间到天上的升仙过程。详见《孙作云文集(第 4 卷):美术考古与民俗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可以得到以下的几点认识:

第一,紫色虽为“五间色”之一,但是其地位要高于绿、红、碧、骝黄。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偃师辛村新莽墓内的帛画、壁画可以看出,尊者往往着紫服,卑者却着朱、青、黑服,这就说明,紫色在逐渐摆脱“间色”卑下的地位。

第二,相比于下层百姓,紫色更受到中上层贵族的偏爱。上述的考古材料中,墓室中大量用紫的墓葬,往往是中上层贵族,这应该和紫颜料的提取合成与制作有关。中国紫,为人工合成的硅酸铜钡颜料。先秦制“紫”不易,制作成本大,只有中上层贵族才能够享用。当然还有,紫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美感和吸引力。因而,紫色多见于身份较高的墓葬中。

第三,紫色在汉代服装上能够体现一定的高贵身份。首先紫色的来源不易,这种稀缺性就决定了它不会大面积被使用。其次,《汉书·成帝纪》:“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颜师古注:“然则禁红、紫之属。”也就是说,此时的紫色并不是百姓的常服。

第四,紫色与道家的关系密切。通过上述几篇考古材料可以看书,如遇打鬼、升仙等具有神话题材的内容,几乎都用紫,多则大幅人物服装,少则祥云、帷幔装饰。

综上所述,紫色在汉代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治、宗教文化内涵。汉代服饰用紫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由于用紫的物品,如丝织品、帛画、壁画等大多不易保存,加上年代久远,难

免会发生物理化学变化,因而,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汉代紫服寥寥,甚是遗憾!但是对于紫色的各方面探究,我呼吁学术界应当继续深入下去。

#### [参考文献]

- [1]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 [2]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3]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1).
- [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J].中原文物,1982(3).
- [6]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7][晋]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百官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张治国,马清林,HeinzBerke[J].文物,2010(9).
- [9]孙作云.孙作云文集(第4卷:美术考古与民俗研究)[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 [10]郭沫若.洛阳汉墓壁画试探[J].考古学报,1963(2).
-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济源市桐花沟十号汉墓[J].考古,2000(2).
- [12]夏寅.显微镜探知中国古代颜料史[J].文博,2009(6).

(责任编辑 光 翟)

# 经济欠发达地区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研究<sup>\*</sup>

——以驻马店市为例

叶亚杰

(1.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2. 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 河南驻马店 463000)

**[摘要]** 残疾人属于一类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残疾人生活更加困难,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然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利用残疾人个人信息,骗取钱财、侵害人身的现象屡见不鲜。本文提出在驻马店这一经济欠发达地区,针对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的实际情况,以“组织、队伍和经费”为保障,采用“声讯网络”、“标语口号”等普法教育形式,积极宣传教育,引导残疾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免个人信息被侵犯。

**[关键词]** 残疾人; 经济欠发达地区; 个人信息; 侵权预防; 普法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39-05

残疾是人类固有的社会现象,残疾人的生活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重视。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权益。”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条第4项再次强调,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在当今信息快速发展的危险社会里,残疾人除了要应对生态环境、食品、疾病等各种风险考验之外,还要倍受个人信息的滥用、误用而带来的心理困扰。据《北京青年报》的调查,北京、上海、广

州三地分别有60.4%、55.1%、39.1%的公民(包括残疾人)个人信息被泄露和非法使用。<sup>[1](P.32)</sup>个人信息侵权现象日益猖獗,有许多侵权行为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达到了犯罪的程度。据报道,截止2013年8月15日,全国20余地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13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327起,查获被盗取各类公民个人信息7亿余条。<sup>[2]</sup>个人信息侵权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而对于残疾人来说,更是不堪重负。对于这些日常侵扰,人们深受其烦,但不知如何应对,因此,对于普及预防个人信息侵权发生的教育,对于正常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而对残疾朋友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渴望之极难于言表。

驻马店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口众多,人口达到887万,残疾人数量也较大,全市共有残疾人60.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涉及五分之一

<sup>\*</sup> [基金项目] 中国残联2014-2015年度残疾人事业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心理健康视角下残疾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以驻马店市为例”(项目编号:2014&ZZ0004);2014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流转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4181);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课题“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4-qn-009)。本文也得到2014年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和黄淮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的资助。

[收稿日期] 2014-12-10

[作者简介] 叶亚杰,男,河南正阳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副教授。

的家庭,其中农村残疾人 49.85 万,占残疾人总数的 82.3%,城镇残疾人 10.27 万,占总人数的 17.7%,农村贫困残疾人 16 万,占农村贫困人口的 32.4%。<sup>[3]</sup>驻马店残疾人口所占人口比例较大,在驻马店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个人信息侵权普法教育,很具有代表性。通过这一地区的预防普法教育宣传,可以为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推广和普及提供有益的尝试。

## 一、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概述

所谓个人信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户籍、遗传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病历、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可以识别该个人的信息。<sup>[4]</sup>个人信息具有相应的权益。首先,个人信息权也具有财产性。个人信息承载着个人自由、尊严等基本的人的伦理价值,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个人物质财富的载体,个人的财产价值就是通过个人信息体现出来的,所以,个人信息具有财产性。其次,个人信息和姓名、名誉、隐私、肖像等人格要素一样,承载着平等、自由、尊严等人的伦理价值,是自然人之所以为社会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个人信息具有强烈的人格属性,是人格权的客体。<sup>[5]</sup>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信息具有财产性和人格属性,侵犯个人信息权的现象日趋猖獗。所谓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指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或者违反保障残疾人个人信息的相关民事义务,致使残疾人的个人信息使残疾人本人的信息泄露,从而导致其个人信息的财产权益和人格权益遭受侵犯,并对此违背结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行为。广义的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指除狭义的侵权行为以外的所有的危害行为,包括民事侵权、民事违约、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等一切不法行为。

在驻马店,针对个人信息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2013 年 3 月份,某酒类品牌的商家,利用在驻马店收集到的广大群众的个人信息,向这些群体大量寄发广告,其中驻马店市辖区的新蔡、平舆、遂平的县的居民最多。某酒类品牌的商家驻马店大区的业务经理乔某说:“我们 2013 年作了一个针对贫困学生的调查,收集了这些信息,然后寄的邮件,当时有 1000 多封信。”<sup>[6]</sup>在这 1000 多封快件中,有许多寄给残疾人的,结果,这些收

件人认为是快件,肯定具有重要信息,所以,他们纷纷放弃农活,直奔几十里外的县城取快件,结果发现里面却是某酒类品牌广告纸。广大农民纷纷指责这种不道德的行径。这个事件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4 年上半年在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帮助下,我们针对驻马店辖区内的正阳、汝南、遂平、泌阳、确山、西平、驿城区等部分县区的残疾人进行了走访、问卷调查,以期研究个人信息侵权情况。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60 份,收回 818 份,残疾人群涵盖了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等各个方面的残疾人。调查表明约有 58% 的残疾人受到过个人信息侵权的骚扰,其中行政侵权约占 73%,刑事侵权约占 18%,其他侵权约占 9%。

众所周知,残疾人本身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而针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非法侵害,不但不能对残疾人提供有益的帮助,而且还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有时直至导致残疾人生活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因此,针对这种侵权现象大量存在的情况,很有必要对广大残疾朋友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预防侵权的意识,加强自身对其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本文所指的普法教育,是广义的概念,指以普及法律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普法教育宣传活动,即包括狭义的学校未成年人教育,也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其他领域的普法宣传教育。所以,所谓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就是针对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为主要内容的,面向全社会的残疾人,包括学校的未成年残疾人和学校以外的其他所有的残疾人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全民普法教育活动。

## 二、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的重要性

### 1. 响应党的号召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5 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第 4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和规范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六五”普法规划)中也要求,学习宣传维护残疾人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好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学习宣传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利用法律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在国家层面上,从宪法到近期党的重大决定来看,都特别重视残疾群体的教育问题。在当前个人信息侵权泛滥的形势下,要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残疾人教育方面的政策,依法依规进行残疾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普法教育宣传活动,依法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 2. 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信息具有财产性,侵犯个人信息权的现象日趋猖獗。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针对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现象还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农村残疾人侵权现象更严重,许多是刑事侵权,主要是财产诈骗、人身伤害等违法行为,而市区主要是抢劫、性侵犯、诈骗等危害行为。所以,广大残疾朋友由于自身身体缺陷,一般生活都很艰辛,再加上不堪其烦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更加重了他们生活的负担,增加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切实加强针对个人信息侵权方面的普法教育,防止个人信息侵权的发生,可以有效地化解社会危机,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保障

### 1. 组织保障

一项公益活动的顺利开展,单靠个人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组织保障。“六五”普法规划规定:“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完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开展督查等制度。”所以,从宏观上来讲,以普及法律知识为基础的全民普法教育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委,监

督机关是相应的人大,具体实施部门是相应的人民政府。从微观上说,普法教育的组织保障,就是政府相应部门之间的领导、实施、配合的关系。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是微观层面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驻马店市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普法教育为例,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作为普法教育的领导部门,对全市的普法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协调,对于实施部门以及其他配合部门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当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特殊疑难问题,应当向上级汇报,寻求解决办法。办公室在开展普法教育工作中,对外代表政府,要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

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作为普法教育的具体执行部门,承担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指导、监督全市普法宣传工作。当然,宣传科为了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要对各个具体单位的普法教育宣传进行组织,对他们的工作全过程指导和监督。如组建“六五”普法宣讲团、对全市 12.4 法制宣传日普法宣传教育的指导等。宣传科对外代表市司法局进行普法教育工作,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应当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汇报,并接受法制办公室的工作指导和监督。

关于残疾人方面的普法教育宣传活动,具体承办单位是驻马店残疾人联合会。针对残疾人个人信息预防方面的普法宣传教育,驻马店残疾人联合会具体负责实施,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对其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市残联应当首先制定普法教育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施教者和受教者、宣讲活动方式、具体时间和地点等。市残联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时,应积极争取其他部门、单位和团体的支持和配合,如新闻媒体、法学会、社科联、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等部门。这些部门有义务配合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全社会应当支持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的公民权利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尊重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发展残疾人事业,给残疾人以帮助,使他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实现事实上的平等,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残疾人遍布各地方,残疾人事业渗透各领域,残疾人工作涉及各部门。贯彻执行残疾人保障法不只是部分人群、局部地域、单一行业、个别组织的事情,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宣传部门、新闻单位,要利用各种传播媒介,

宣传残疾人事业和扶助残疾人的事迹,弘扬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残疾人与其他公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倡导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sup>①</sup>其中,对于新闻媒体,“六五”普法规划更是特别强调“各类媒体要积极承担公益性法制宣传教育责任。”

## 2. 队伍保障

“六五”普法规划规定:“加强各级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鼓励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支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政府有关部门和残疾人组织应当建立和完善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捐助和服务的渠道,鼓励和支持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开展志愿者助残等公益活动。”按照这些要求,普法教育相关部门,如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应当组建由热爱残疾人事业,或者具有相应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的普法讲师团队伍、普法志愿者队伍及其他热衷于残疾人事业的民间团体。

另外,在城市要充分利用各级工会的力量,使工会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普法教育活动中起到联系广大残疾朋友的桥梁作用。在农村,也可以建立农民工会,这种工会属于社会组织的一种。“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sup>[7]</sup>,农民工会这种社会组织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自发组建起来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会可采用会员制,在当地加入农民工会,享受当地的会员待遇,通过有组织的联合体,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通过农民工会,可以吸收更多的残疾人会员充实到志愿者队伍的团体中。借助部分残疾人的志愿宣传活动,可以感染更多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残疾群体纳入到普法教育的范围中。如果这些接受普法教育的残疾群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便会由被动变主动,不致于盲目地陷入被侵权的行列,我们的预防教育的基本目的也就达到了。

## 3. 经费保障

普法教育活动地需要相应的财政经费作为保障的,并且相应的法律也作出了强制性的法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领导,综合协调,并将残疾人事业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政府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加强领导,综合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使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了落实经费保障政策,“六五”普法规划特别强调:“各级政府要把法制宣传教育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相关经费,保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 四、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教育措施

在驻马店市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之下,驻马店市残联在全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培训,对于残疾人的就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驻马店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实名制统计数据,自2010年至今的4年多时间里,全市共培训各类残疾人35731人,通过培训实现就业创业27232人;其中,今年1-8月份已培训残疾人5321人,实现就业创业2759人。<sup>[8]</sup>开展这些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普法教育宣传活动,引导他们在掌握技能的同时,要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并且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针对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多发、高发的态势下,该市进行了形式多样的个人信息侵权预防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些教育和培训过程中,他们采用的教育形式主要有“声讯网络”、“标语口号”、“其他形式”。针对这些教育形式,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有51%的残疾人选择了“声讯网络”的形式,占的比例最大,最受残疾朋友欢迎;“标语口号”占31%,占的比例也较大,也较受欢迎;“其他形式”占18%。

### 1. “声讯网络”

“声讯网络”,主要指通过借助固定电话、普法网站等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全天候服务广大残疾朋友的一种普法方式。在现代信息社会,搭建一个联系受教者的平台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通信平台可以建立在残联,作为服务残疾人的一个窗口。通过这种服务平台,一方面,可以及时发布侵权信息,做出事先预警;另一方面,可以随时接收求救信息。对于接收的信息,服

<sup>①</sup> 1991年5月6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通知》相关条款均有明确规定和要求。

务平台应当综合评判,及时回复,在必要的时候及时派出志愿服务人员,上门提供面对面的帮助。

这种宣传形式,除了先期的设备投入经费以外,其他如维护、运营等方面所需费用较低,可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广使用。另外,采用这种形式,配备日常的工作人员是关键。工作人员应当热情,有耐心,并且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对于残疾人的诉求,应当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答复,雷厉风行,持之以恒,使“声讯网络”这种信息服务平台真正成为联系残疾人的桥梁。当然,这种纽带一旦建立起来,就应当保证不能断裂,否则极易伤害残疾人的感情,损害残联的形象。

## 2. “标语口号”

“标语口号”,就是通过张贴标语、口号的形式,提醒残疾人谨防个人信息被滥用、误用等非法利用,从而保护个人合法权益。“标语口号”宣传形式一般多在个人信息侵权突发易发的时间内进行,当然,在特殊宣传活动时期,可附带进行,如“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全国助残日”、“利用法律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期间以及“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题活动期。这种形式多在个人信息侵权多发易发地带采用,如商场、医院、通讯、银行、物流等易发生泄漏个人信息的行业工作区域,以及社区、乡村等广大残疾人居住的地方。时刻警醒那些易于泄漏个人信息的部门,“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的公民个人电子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也可起到提醒、教育作用。通过在个人信息易泄露的源头区、个人信息权侵害的受害区等区域,广泛张贴标语、口号进行宣传,时刻提醒,处处警示,营造一个良好的防范氛围,以此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 3. “其他形式”

除了以上宣传教育形式以外,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开展灵活多样的其他宣传教育形式。如组建“突击小分队”的形式在侵权集中爆发时期,有针对性地宣传。也即是通过公民意识的教育,激发残疾人主人翁的自豪感,“鼓励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让他们自发地组成反侵权宣传小分队,广泛动员、积极宣传,在残疾人群众中形成

反侵权的共鸣,从而形成燎原之势,自发地消除侵权滋生的土壤;再如,借助于当地宣传部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每年联合举办的“百场电影进社区”、“百场电影进乡村”等群众文体活动,<sup>[9]</sup>在每次播放电影、开始文体活动之前,简短地播放一下残联制作的预防个人信息侵权的公益短片,也可以有效地起到宣传教育的效果。通过“突击小分队”、“百场电影进社区”等各种形式,充分调动残疾人个体预防侵权的积极性,自身穿戴好“防护罩”,侵权行为就无处下手,个人的肌体就会健全,我们的普法教育目的也就基本达到。

总之,面对当前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的严重事实,与其事后救济,不如事前防范。而根据一定的原则,组建相应的保障体系,通过“声讯网络”、“标语口号”等形式,可有效地宣传和普及预防知识,防范残疾人个人信息侵权的发生,保障残疾人的健康生活,从而“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促进社会共同发展。

## 【参考文献】

- [1]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 [2]刘俊武.用法律撑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伞[N].人民公安报,2013-08-15(03).
- [3]驻马店市残联助残办实事 细节显大爱[EB/OL].  
<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4/07/10/010484659.shtml>, 2014-7-10.
- [4]齐爱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J].河北法学,2005(6).
- [5]马俊驹.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J].河北法学,2006(10).
- [6]高琳琳.个人信息遭泄露 到底是谁泄露了村民的信[EB/OL].  
<http://henan.sina.com.cn/zhumadian/jujiao/2014-04-03/09257030.html>. 2014-4-3.
- [7]杨宜勇.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的目标模式[J].中国经贸导刊,2012(28).
- [8]陈健.驻马店市开展助残扶贫工作纪实[EB/OL].  
<http://dayu001.com/zhumadian/20141101/52090.html>, 2014-11-01.
- [9]百场电影进社区放映活动正式启动[EB/OL].  
[http://zmd.dahe.cn/category/200008/2014/07/25/2014-07-25\\_280016\\_200008.shtml](http://zmd.dahe.cn/category/200008/2014/07/25/2014-07-25_280016_200008.shtml), 2014-07-25.

(责任编辑 光 翟)

# 人的安全研究:渊源、概念与特征

邢瑞利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人的安全”理念是安全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在前现代时期,人的安全理念是脱离国家安全范式的,民族国家诞生后,人的安全逐渐与国家安全紧密结合,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长期占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研究内容呈现出深化和拓展的发展趋势,安全焦点重新转向人的安全。“9·11”事件后,国家安全状态似乎回归,人的安全发展受阻,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的安全理念正逐渐地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接受,甚至可能成为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的重要认同基石。

**[关键词]** 人的安全; 安全研究;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44-06

传统的安全概念研究把国家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国家才是被保护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及20世纪把安全与国家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反映了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秩序中的主导地位。<sup>[1](P.42)</sup>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安全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批判的呼声越来越大。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安全是一种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sup>[2](PP.7-26)</sup>他指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安全的指涉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激烈争论,据此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派别,如后结构主义认为安全的指涉对象是社会,女性主义认为是性别,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是国家,而批判安全研究认为安全指涉的终极对象是个人。这些不同的理论派别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等领域拓展和深化了安全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安全、人的安全、粮食安全等安全议程也被加入进来。从横向维度看,安全的内涵超越了军事范畴,其他诸如经济、环境、健康、性别和文化等因素也被纳入考虑范围;从纵向维度看,由于排他性的、只关注国家安全的原则涵盖地区和全球,由国家向下延伸则包含社会及其所属

的不同群体、最终涉及每个个体。<sup>[3]</sup>笔者试讨论安全话语扩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人的安全”理念。首先,通过追溯人的安全理念的历史起源与内涵,分析在不同的国际关系语境下,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从学理角度探究人的安全理念。其次,探究外部因素的变化是如何促使安全研究维度由国家安全转向人的安全。最后,探究“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人的安全理念发展受阻,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状态的回归,并给出笔者自己的一些思考与评价。

## 一、“人的安全”的渊源

在深入探究“人的安全”理念的起源与内涵之前,思考一下文章讨论的关键术语——安全的定义是有必要的。“安全”概念在社会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它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谁是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威胁的来源是什么,实现安全的主体是谁,实现安全的手段是什么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激烈争论,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安全”本质上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但还是作出了尝试性的解答,即发展一种概念性框架,以供

**[收稿日期]** 2014-12-08

**[作者简介]** 邢瑞利,女,河南洛阳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分析具体的案例。<sup>[2]</sup>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的提法“看似为更广阔的共识提供指导和基础……也许是让人们给任何他们中意的政策贴上一个诱人却或是虚伪的标签”<sup>[4](P.147)</sup>。国内学者王逸舟认为:“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国家或其他集团)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的状态。”<sup>[3]</sup>安全概念的含混性阻碍了对其的精确定义,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状况下它仍然有一个大体上可接受的中心内涵,即安全意味着远离对核心价值的威胁。核心价值通常包括人身生存、福利和身份认同。当我们说到“人的安全”的时候,说的是远离对人的核心价值的威胁。

社会的理念是社会生活问题的产物。生活中鲜有新的问题,也鲜有新的理念诞生,它们因新情境而被恢复和重建。安全的概念也不例外。追溯国家安全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末期,这种安全理念会被广泛争议,以及为什么国家在安全讨论中的首要地位会受到其他对象的挑战,而个体的人就是这些对象之一。<sup>[6](P.3)</sup>通过进行深入的历史根源探究,我们可以弄清楚;“人的安全”的根源是建立在国家及其主权的正当性基础之上的,19世纪末及20世纪期间运作方式的改变又使得人们对这种正当性产生疑问。

“人的安全”理念是安全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在对安全进行考古学的探究中可以发现,安全最早是与人的主观感受紧密相连的。在前现代时期,即所谓的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人的安全是脱离国家安全范式的,在分析“国家”时很少使用“安全”的提法。正如艾玛·罗斯切尔德(Emma Rothschild)所指出的,现代的“安全”一词是从拉丁文的 *securitas* 演变而来的,它指的是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踏实感。<sup>[3]</sup>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安全最初是一个属于个体的问题,在团体和国家层面并不适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及民族国家诞生后,安全才开始针对国家,以及在保卫国家安全和使个体免于暴力侵害时使用该词。<sup>[7](P.25)</sup>到了民族主义时代,国家与民族、民族与个人的结合,使得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更加紧密,国家安全占据支配地位,但并没有完全掩盖住对个体及其安全的关切。

## 1. 前现代时期:脱离国家安全范式的人的安全

在古典时期,城邦的巩固是文明的先决条件。所有的男性都需要携带武器以保卫自己免受普遍的暴力侵害,而后来的雅典人不再携带武器了,因为城邦的力量已经足以保护他们。当他们个人安全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就可以从事更有价值和趣味的工作。由此产生的是,当城邦的终极目标受到威胁时,公民有义务让自己的终极目标服从于城邦,因为只有城邦才能使人们追求到自己的最终目标。<sup>[8]</sup>在修昔底德或者其他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中,并没有提到当国家安全与个体安全需求相冲突时,后者是可以胜过前者的。然而,在古希腊思想中也开始认识到,在战争中对平民的“有组织的暴力”应该有所限制,这种观点根植于与个体权利相关的基础之上。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希腊人对希腊人的奴役行为,正如战场上剥掉尸体的衣服,战争中蹂躏土地、焚烧田地一样,也应该被废止。<sup>[9](PP.89-90)</sup>在罗马法中,人们普遍认同,统治者不能为了私人目的行使政治权力,必须受自己承诺的约束,尊重个人权利。这些思想和原则折射出一系列自然法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城邦之外,并且高于城邦,存在着高于一切的自然普适规律。<sup>[8]</sup>

在中世纪时期,罗马帝国在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下崩溃,导致欧洲权力体系的去中心化。国家在这段黑暗时期还未出现,基督教神权统治一切,几乎不关注世俗生活。后来,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混乱逐渐得到整合,形成了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世俗政权并存的松散的中世纪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宗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圭那认为,人的原罪决定了人的无可救药,无法进行理性思考,而政治团体的功能就在于“保护人的基本财产,它们本身都没有特定的政治属性,例如,与国家有关。国家的权威规范人们行为的权限,只延伸到那些侵害了人们的自我实现,所必须的公共财产的行为。除了正义与和平,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安全原因对私人关系和事务的干涉是不合理的”<sup>[10](P.247)</sup>。与基督教相对应,伊斯兰教的作者们赋予政治领袖们裁决的权力。个体对统治者没有抗争能力:“聆听和遵从是穆斯林的本分,无论是他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只要他被命令做的是服从真主的事情,那么他就应该听从。”<sup>[11](P.14)</sup>

这并不意味着哈里发的权力不受限制。哈里发的角色虽然是保护伊斯兰国家,但是他不能要求别人违背真主。这种约束就明确了在国家主权侵犯了个体自由意志时,反抗国家的合法性和国家主权的限制。几种中世纪的政治思想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权威的行为受到他们对子民所承担的义务的制约,这一点对我们现在对“人的安全”以及相应的国家主权条件的考量至关重要。

## 2.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结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和经济框架逐渐巩固,首先是意大利半岛,而后是阿尔卑斯山北部,政权开始转化为类似于现代国家的实体,并且相应地抛弃了基督教共同体,而更倾向于转变为彻底的无统一政府的、平行的、地区性的国家体系。<sup>[12](P.2)</sup>这个时期,国家内部和外部存在的暴力也产生了强调国家集权的观念,王朝合法性是统治基础的学说以及主权专制的理论。<sup>[8]</sup>在此时期,我们首次见到人们理直气壮地声称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是安全讨论的基本方向。正如让·布丹所认为的,“这明显偏离了中世纪自然法的方向,即君主代表国家享有制定法律以及指挥其他群体和个体等无限权力。”<sup>[13](P.3)</sup>

国家安全概念通常被认为是在国际体系从中世纪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变时产生的。托马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使得个人安全与国家通过契约关系结合起来。霍布斯的《利维坦》是第一部指出在现代“安全”术语下人类困境的重要著作。他说:“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的制约和束缚之中,他们最终的动机、目的或意图,是预想通过与国家签订契约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换句话说,要让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境地……是人类本能选择的必然结果。”<sup>[14](P.111)</sup>霍布斯认为,国家合法性来源于个人对安全保护的需求,人们通过与国家建立契约关系,以换取国家对他们有秩序和安全的生活方式的许可。而这种契约关系是一次性的,一旦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在君主未能履行他的承诺时就不能再重新要回了。

总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整个过程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是由保护其领地上的个体而合法化的。在适当的时期,国家对个体的保护被延伸为是个人的权利,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国家

安全与个人安全的关系,国家合法性地位也更加巩固。

## 3. 民族主义时代:国家安全合法性地位的强化

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压迫,使得公众主权学说和民族主义思想在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期广为流行。“人民”的主权主要表现在参与民主机制时能够做出抉择,通过民主参与机制,公民对与国家签订的政治契约的认可得以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获得公众支持、取得合法性地位、动员公众为国家意愿行动的一种方法,在法国大革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这一时期,个人与国家利益的结合,既有观念转变的作用也有国家给公民提供实际利益的作用。资产阶级宣扬民主、自由、人权,将人民从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同时,伴随工业革命的进行,国家为公民也提供了许多实际的利益——无论是在公共教育、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还是退休金发放和社会保障方面。个人与国家利益的捆绑促成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正统地位。<sup>[15](PP.165-167)</sup>近代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有:国家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唯一主角;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体系下,国家关心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家安全与生存;发展军事能力是使国家免受外来侵害、保卫其安全的最好保障。个体在现实主义的主张中显然没有位置。把国家概念作为公共主权的体现,或者是民族有机的联合体,在整体意愿上证明并促成了马丁·怀特所说的国家拟人化。拟人化是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撑,后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 二、安全维度的转向:从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

17世纪到19世纪变化的国际环境对国家安全理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的历史环境也开始引导人们摆脱仅对国家安全关注的理念。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逐渐增长的支配话语权,并没有完全掩盖对个体及其安全的关切。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战争与技术的变革,核武器的发明,全球化的冲击,对安全安全的批判呼声越来越大,安全维度逐渐由国家安全转向人的安全。

(一)战争与大屠杀:两次世界大战让将近1亿平民和战士过早的死亡。庞大的伤亡人数致使

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批判呼声越来越大。此外,令国家安全主导权的可信度降低的还有国家对自己公民和臣民的大屠杀。如卡尔·霍斯第(Kal Holsti)所说:“大多数20世纪的大规模屠杀都是针对本国公民的。”<sup>[16](P.302)</sup>回顾历史,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60万犹太人的迫害;90年代卢旺达胡图族杀害了80-100万的图西族人等。这些残暴行径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国家安全的神圣外衣被逐渐揭开。

(二)冷战结束与国家能力:冷战的结束虽然极大地降低了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机率,但国家间冲突却大幅度增加。许多冲突在国家机器处于弱势甚至崩溃的地区发生,国家无力应对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其作为个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大大弱化。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见证了25次跨国战争和大约122次内战。跨国战争死亡的人数大约是330万;内战的死亡人数是1620万。<sup>[17]</sup>冷战结束以来,跨国战争减少,内战占据了伤亡人数的最大份额,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员伤亡发生在平民身上。由于绝大多数的内战是国家分裂造成的,因此国家对个人安全保护者的承诺遭到极大的破坏。国家治理失败,内部冲突事件急剧增加以及平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促使国际关注逐渐转向了对“人的安全”的需要。

(三)21世纪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涌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比照对象是传统安全问题,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范围很广,包括除政治和军事安全以外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环境等多种安全,其关注焦点也由国家安全转移到从个体到整个人类社会及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安全领域。以非洲地区的贫穷落后为例,国家政治混乱使国内人民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贫穷、疾病、奴役、卖淫、剥削等。在这些地区,国家治理的无效往往是导致人的安全处于困境的主要原因。布思和彼得·维尔在对南部非洲地区的人的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时指出,人们在讨论该地区的安全问题时,应该首先考虑安全的指涉对象是谁的问题。他们认为,该地区的安全指涉对象与其说是国家,还不如说是长期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普通民众。<sup>[18]</sup>

(四)国家安全再审视:人的安全问题凸显也促使学界从学理角度推进安全研究体系化的努力。巴里·布赞的《人、国家和恐惧》构建了“国家

安全”理念并且重新建立并扩大了它的范围,使之超越了军事范畴。在《人、国家与恐惧》中,布赞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重要的问题:一是安全的指涉对象(referent object)是什么;二是达到安全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布赞指出,在对安全概念进行分析时需要思考其指涉对象是什么,即“谁的安全”。他认为“国家的安全”这个答案显然不够充分。此外,安全对象和达到安全的必要条件紧密相关。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并正确理解国家安全,安全研究对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而是要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布赞认为这个层次可以是国家、个体、地区或者是国际体系;此外,仅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远远不够,要将关注范围扩展到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领域。<sup>[2]</sup>布赞率先对“安全分析层次”的划分、反对把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唯一指涉对象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然而其理论也存在明显的保守倾向,他坚持反对将“人的安全”概念纳入到安全研究的议程中来。尽管如此,“人的安全”概念对整个安全研究依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布赞将新元素加入传统安全论述中具有独创性,之后一些作者的作品也加入到了这种讨论之中,比如理查德·厄尔曼(Richard Ullman)和杰西卡·图赫曼·马修(Jessica Tuchman Mathews)的著作,他们都试图“重新定义”安全。厄尔曼将关注点放在美国国家安全身上,其在1983年“重新定义”安全的论文在提升“个人”作为安全指称物的重要性方面比布赞走得更远。<sup>[19]</sup>厄尔曼想象以个体人作为安全主要指称物,国家安全的目的不是去保护那些抽象的实体—国家和民族,而是国家的“居民”。此外,他观察到了外国的不安全和镇压行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件,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全世界的人的安全问题都被视为一个理应关注的问题,即使不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必需。杰西卡·图赫曼·马修在1989年的文章《对外事务》中也在“重新定义”安全问题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她主要研究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事务,认为“当代的全球发展预示着还需要……将国家安全的定义扩大到包含能源、环境以及人口议题方面的需求”<sup>[20]</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肯·布斯(Ken Booth)为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则更为激进,在批判安全研究设置的新安全议程中,国家安全不但不占据重要地位,反而要受到批判。不过,批判安全

研究并没有将个体的人作为最终的安全指涉对象,而是提出将人类共同体作为安全的责任保护主体,寻求人类最终的解放。

### 三、“人的安全”概念与特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人的安全研究的兴趣不断增长。人的安全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1994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人的安全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包括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人的安全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压迫等长期性威胁;二是免受在家庭、工作或人际交往等各类日常生活中的突发性、伤害性的威胁。此后,在联合国及加拿大、日本等国的推动下,人的安全问题开始进入世界政治议程。

作为一种安全理论,“人的安全”概念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安全指涉对象、主导安全的价值、威胁的来源、安全的责任主体、实现安全的方式等。第一,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是什么?显

然,个人而非国家是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第二,人的安全主导的安全价值:是保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等军事、政治安全?还是维护经济福利、社会团结与认同等经济、社会安全?抑或其他?不同学者及国家看法不同,主要围绕两种观点展开:一种主张把人的安全宽泛地定义为“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只是“免于暴力威胁的安全”;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人的安全仅界定为“免于恐惧的自由”<sup>[21]</sup>。到目前为止,关于人的安全的确切内涵仍存在很大争议,不同的国家及学者都有不同的答案。第三,关于人的安全威胁的来源。除外部威胁外,其威胁的范围还包括疾病、环境、自然灾害等。第四,关于人的安全的责任主体,即谁来保障安全。人的安全的责任保护主体除了国家以外,还包括地区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第五,人的安全的实现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地区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力量实现人的安全。

表 1 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

	国家安全	人的安全
安全指涉对象	国家	个人
威胁的来源	外部威胁	除外部威胁外,其威胁的范围还包括疾病、环境、自然灾害等
安全保护的主体	国家	国家、地区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
实现安全的方式	通过强大的国家实力实现安全	通过国家、地区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力量实现人的安全
两者关系	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既存在一致又存在背离的一面,二者是一致和互补的关系。国家安全是人的安全的保障和手段,提出人的安全的概念主要是呼吁国家更多的关注“人的安全”,并尽可能为个人提供安全保障。	

关于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异同与关系(参见表 1)。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既存在一致又存在背离。首先,两者存在一致的一面:在充满战争威胁的年代,国家是人的安全的保护伞,国家安全也就意味着人的安全,冷战时期是国家安全膨胀的顶峰。其次,两者也存在背离的一面:国家安全不等同于人的安全,甚至很多时候国家安全反而没有带来人的安全。正如巴里·布赞指出:“个人安全陷入一个循环的悖论,其安全既依赖于国家又为国家所威胁。由于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国家可从多面对其国内民众构成威胁。”<sup>[22](P.99)</sup>例如,第三帝国时期对犹太人的血腥迫害导致 500 万的犹太人

被屠杀,冷战时期,越南入侵柬埔寨杀害了超过 100 万的当地民众等。这些事件都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以大规模的牺牲人的安全为代价,使得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背道而驰。总之,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既存在一致又存在背离的一面,二者是一致和互补的关系。国家安全是人的安全的保障和手段,提出人的安全的概念主要是呼吁国家更多的关注“人的安全”,并尽可能为个人提供安全保障。

### 结语

在对人的安全进行的考古学探究中发现,在前现代时期,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人的安全是脱离国家安全范式的,在分析“国家”

时很少使用“安全”的提法。在中世纪时期,尽管君主的权力总会得到肯定与保卫,但是这种保卫与承认建立在保护其属民安全的义务基础之上。在论证国家起源的近代思想家中,霍布斯认为人类通过与国家签订社会契约的方式使得自身安全得到保证,国家是人类获取安全的一种手段,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目的。然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和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特殊地位的确立,自此,国家开始成为一个神圣的抽象概念,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安全成为惟一需要考虑的安全问题,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占据支配地位。直到20世纪,变化的历史环境才开始促使人们摆脱仅对国家安全关注的理念,为人的安全思想的发展打开了缺口。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战争与技术的变革,核武器的发明,全球化的冲击,对国家安全的批判呼声越来越大,安全维度逐渐由国家安全转向人的安全,二者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9·11”事件后,各国全面反恐,保护国家的紧急性限制了把个人放在第一位的势头,人的安全的发展变得极其困难。但尽管如此,人的安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已经难以忽视与逃避。当今世界面临着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众多对个人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促使各国不得不考虑人的安全因素。

站在人类进步史的角度考察,“人的安全”能够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关切,预示着重要的安全维度转向。在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的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观念也正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塑造的重要认同基石。

#### [ 参 考 文 献 ]

- [1] 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2]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Post - Cold War Era* [M]. London: Harvester Press, 1991.
- [3]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States*, 1995 (Summer).
- [4]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 [5] 王逸舟. 论综合安全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8 (4).
- [6] Daniel Philpott. *Revolution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7] S. Neil MacFarlane,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M].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8] Andrew 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s* [M]. New Jersey: Wiley - Blackwell, 1991.
- [9] Plato. *The Republ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John Finnis, Aquinas. *Moral,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1] Sohail Hashmi. *Islamic Political Ethics: Civil Society, Pluralism, and Conflict* [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2] David Kaiser. *Politics and War: European Conflict from Philip II to Hitler* [M].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3]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4]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5] John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K. J. Holsti. The Coming Chaos? Armed Conflict in the World's Periphery [A].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7] James Fearon, Davi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3 (February).
- [18] 刘永涛. 批评与重建: 对安全政治的新思考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 (8).
- [19] 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3 (Summer).
- [20] Jessica Tuchman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J]. *Foreign Affairs*, 1989 (Spring).
- [21] 李开盛, 薛力. 非传统安全理论: 概念、流派与特征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2 (2).
- [22] [澳] 克雷格·A·斯奈德, 等. 当代安全与战略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光 翟)

# 服务提升视角下的电子政务完善研究<sup>\*</sup>

杨 军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教务处, 广西南宁 530021)

**[摘要]** 互联网的普及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给政府政务工作带来了重大变化,其中电子政务的发展有效地简化了程序,提升了政务效率,方便了公众与政府的互动交流,对我国政府的政务发展趋势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由于网络的公开、自由、便捷性,政府与公众交流通道多了,意见却大了;我国在网络硬件、软件发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这些都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不适应,需要政府在服务提升视角下积极发展电子政务,使人力、物力、技术都能适应电子政务的发展形势。

**[关键词]** 政府管理; 电子政务; 完善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50-0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sup>[1]</sup>电子政务应用越来越普遍。所谓电子政务,是以互联网与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将各部门的人力、物力与信息资源整合调配的现代化公共管理平台,电子政务不仅能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还能够在沟通交流中提高各部门实施政府政策的执行力,是各国政府致力发展的新型政务处理方式,也是未来公共管理的大势所趋。

## 一、我国电子政务的现状

### 1. 电子政务意识增强

中国共产党对新媒体的运用是敏感而敏捷的。<sup>[2]</sup>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与社会各阶层对电子政务建设理念的认识程度不断增强,对构建电子政务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推动了政府、企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目前,我国在构建电子政务上已日趋成熟,中央集成网与国家政务外网相继建成,这不仅使内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还加快了统一、联动的政务体制的建设进程。

### 2. 政府上网稳中求进

所谓政府上网工程,是在20世纪末,国家邮电电信总局等四十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发起的,以实现政府办公电子化、改善干群沟通、提高政府处理效率为目的开展的电子政务工程,涉及到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

作为我国电子政务起步的标志,政府上网工程为我国各地政府应用互联网、计算机处理政务提供了方向,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随着技术发展及相关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政府上网工程从初期架设的寥寥几百个163/169站点,发展为当前互联网中接近6万个政府或职能部门网站,为我国经济发展、政策信息宣传以及政府内部的行政事务快速处理做出了极大贡献。

### 3. 信息化水平提升

电子政务的构建不仅给公民表达意见、诉求不满提供了便利,还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与执政能力。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网络政务体系,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在提高政府形象、服务民众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加大对信息资源的利用程度,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建立完善、全面的信息储备库。

\*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网络环境下政府公信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3EGL001)。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杨 军,男,河南遂平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教务处副研究员。

#### 4. 政务微博方兴未艾

时至今日,电子政务在各地方政府与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质的进步,尤其是在政务公开领域,电子政务近年来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最具代表性的微博平台为例,在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人气最高的新浪微博中,我国各级政府与各职能部门注册的实名认证微博ID数达到六万个以上,它们的微博用户关注量更是数以亿计。这些政务微博以或亲切平实、或轻松俏皮的语言风格,为民众解读政策信息、及时听取公众对当地政府部门的意见建议,接受来自民间的监督与管理,受到我国民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并隐隐有着向公民社会平台发展的趋势。而这一切,都是在微博平台建立不足3年的时间内完成的。

#### 5. 电子政务的中国特色

纵观各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发展方向虽然大致相同,但所采取的办法却大相径庭,且经济基础、技术能力不同的国家之间选择的方式南辕北辙,就连上层建筑一致的欧盟国家之间,在发展电子政务时也有不少差异。首先,这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电子政务的时间点并不一致,而电子政务所依赖的信息技术却是不断发展的,新科技、新的互联网应用方式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其次,没有社情民意完全相同的国家,这也就决定了各国政府在发展电子政务时存在不同的考量,制定出不同的方案。因此,我国在发展电子政务时,也必须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按照国内的经济实力与技术能力规划目标,要结合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开展电子政务建设工作。

## 二、我国电子政务的困境

### 1. 数字鸿沟

就目前来看,由于各国的经济基础与人口素质不同,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这种差距被现代公共管理学者称为“信息鸿沟”。这种“信息鸿沟”主要体现在互联网软硬件差距与民众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差距上。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非常巨大。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无论是网民数量还是光纤网络建设,都比20世纪进步许多,但距离欧美国家的硬件设施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举例来说,虽然我国的无线互联网早在本世纪初就上线使用,但直到2011年年

底,我国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才刚刚完成城市地区的覆盖,反观美国,早已在2006完成了相关硬件建设工作,如今已经完成了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LTE)覆盖。

### 2. 人才不足

由于政府员工的工资较稳定,技术人员的福利水平不高,从而导致人才流失、人口流动性大等现象,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通常都会出现公共资源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西部贫困地区更为严重,工作条件与工资待遇较差都是导致信息技术人才工作积极性不高、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的主要原因。

政府在维护电子政务上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难以在将电子政务外包之后还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行,加上如今仍然缺乏一个健全、有序的电子政务外包维护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同时,我国政府在电子政务运营上尚未建立一支专业性强、技术能力高的人才队伍,专门进行信息的管理、开发、分析等工作,以达到深入挖掘信息资源、增强信息技术开发能力与提高信息服务业综合实力的目的。

### 3. 立法滞后

制度是一切工作有序开展保障,电子政务也不例外。就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在电子政务的发展过程中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条文,但大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体系当中,不够系统。同时,我国的互联网法律法规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版权保护、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也让电子政务缺乏稳定的建设基础。所以,相关部门必须加快立法进程,为电子政务的发展保驾护航。

### 4. 门户网站建设悬殊

政府门户网站作为电子政务服务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展示自身形象、提供便民服务、加强公众监督的有效手段。<sup>[3]</sup>近年来,各地政府在中央号召下,对电子政务的发展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积极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部分政府虽然在表面上相应中央号召、建设电子政务,但在实际上却没有根据实际需求规划发展,也没有安排政府工作人员学习使用电子政务办公,导致过于超前的电子政务系统在耗费了大量资金后,却无太大的实用性。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电子政务建设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一是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服务功能较差,

仅作为一个单向的网络发布平台使用,缺乏与民众的沟通与互动,导致民众对电子政务建设的认同感不高。二是在普及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推行操作复杂、维护难度较大、硬件要求高的电子政务系统,公务员在难以上手的情况下情愿沿用旧有的政务处理方式,实用性较差。

### 5. 网络安全堪忧

由于电子政务本身所具有的公开性与开放性,政府内部的信息安全与公众获取信息的网络安全都是电子政务构建需要顾忌到的两个重要部分。信息的开发是无穷无尽的,与之伴随在信息发展过程中的病毒、黑客也会随之增多,对网络的维护工作也会越来越艰难。

对互联网信息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主要有:黑客攻击、病毒侵入与信息泄露。由于境内外黑客攻击的频率越来越高,病毒更新越来越快,信息安全问题正成为当前阻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我国的信息技术虽然在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军事信息保护与卫星信息加密上却不落下风,这也是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值得倚重的技术力量。

## 三、我国电子政务完善路径

我国目前的电子政务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国内实际情况、群众切实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建设电子政务的过程中应对西方国家的成功事例加以分析,去粗取精,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发展途径。

### 1. 加快电子基础配套建设

结合目前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可以得知,专业性强的复合型人才与相应的基础设备是电子政务得以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对此,政府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 加快信息技术人才培养

政府要想提高电子政务系统的绩效,惟有“技术——行政”协同转变。<sup>[4]</sup>信息技术人才是电子政务发展的硬实力,这一点是各国在电子政务建设中得到的经验。所以,建立一支业务水平高、政治立场坚定的信息技术人才队伍,是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必要工作。就目前来看,一支优秀的信息技术人才队伍,要在下列方面努力:一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基层政府工作者充分意识到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还要将符合我国国情的电子政务建设纲要普及到各基层政府中,并

针对电子政务知识定期进行考核。二是要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国内大部分公务员的信息技术水平尚处于计算机基本使用阶段,当然,这一水平勉强可以维持传统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但却与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目标相距甚远。所以,各地政府应与专业计算机培训机构合作,定期为公务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同时鼓励青年公务员在本部门的实际工作中应用所学内容。三是要大力招揽信息技术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为电子政务系统建设与维护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 (2) 构建“宽带中国”

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将互联网硬件设施建设作为发展电子政务的基础。不过,由于我国通信网络起点比较低,要做好互联网硬件设施的建设工作,要做到下列两点:首先,在持续扩大我国互联网覆盖范围的同时,加快农村地区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做到全国范围的每 0.5 平方公里内有线/无线网络带宽达到 12Mbps。同时,针对已经普及了 3G 网络的城市地区,应在光纤改造的基础上,试运行城市 WIFI 热点与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

其次,我们要从城市 3G 网络建设时出现的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供未来工作参考。例如,我国在 3G 网络建设初期,大力推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TD-SCDMA 网络,但经过近年来的发展,该网络的运营商“中国移动”却在 3G 市场竞争中处境惨淡,其主要原因在于 TD-SCDMA 网络过慢的速度与终端厂商开发热情不高;反而在国际通用的另两种 3G 网络(联通的 WCDMA 与电信的 CDMA2000)覆盖、运营情况喜人。这说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目光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所阻碍,而是要朝着“高精尖”的目标前进。

#### (3) 缩小“数字鸿沟”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鸿沟,在公众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就目前国内的现实情况来说,与其将目标定在过于困难的赶超发达国家人均素质上,倒不如从国内做起,缩小我国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首先,各地政府要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规划电子政务发展的方向。对于一些落后地区,应由东部沿海城市中组建技术支持队伍,帮助当地建设最基本的电子政务系统,并指导当地公务员学会操作与基本维护;同时,还要加强当地中小学校的基础信息技术教育、吸纳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生到政务体制



当中,为电子政务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其次,针对一些电子政务建设优秀的地区,要予以适当的激励与宣传表扬,鼓励情况相似的地区学习其成功经验。同时,还要以政策优惠等方式,促使当地信息技术相关企业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在建设电子政务系统的同时,还能与当地信息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氛围。三是要从基础抓起,发展电子政务。如上文所述,电子政务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与人口素质作为基础的,那么,缩小我国地域间信息鸿沟工作,就要先从发展落后地区经济与教育事业做起,而这两项工作都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持。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必须要向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倾斜,在帮助当地搞好经济教育的同时进行引导,必然能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完善的电子政务体系。

#### (4) 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各国在建设电子政务时都十分注重保护信息的安全性,为增强网络的防御能力还建立了配套的法律体系来予以辅助,对此,我国政府也应全面了解各个领域存在的不同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来防止危害范围的扩大。一是提高信息网络安全的安全性。要对信息网络实行全面的维护与保障,就要制定客观、可行的信息网络安全保护计划,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建立统一、完善的信息网络联动机制,定期对信息进行检查、整改,确保信息时刻处于安全的状态当中。同时也要健全信息网络预警防治体系,强化实名认证等安全工作。二是要与互联网安全厂商合作,提高信息安全防范工作。虽然我国在军事信息安全领域一直具备优势,但解放军是为了国家安全服务的,能够获得的资源与技术人才较为特殊,其防范措施难以为基层政府效仿。所以,应与国内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接触,使其能和政府本身的技术资源共同完成政府信息安全机制建设。三是要建立起完善的互联网安全密码证书体系,并将其与网站信用度评价进行挂钩。对于公务员而言,电子政务系统是其开展政务工作的平台,那么针对公务员登录时的安全密码认证就非常重要了,必须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公务员的政务处理账号进行违法活动,从中获利。在此方面,可以通过应用动态密保、指纹认证等新技术解决。四是互联网信息安全建设,尤其是政务信息安全建设。必须要在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前提下开展,否则反而会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行,无法为公众参政议政提

供必要的信息。

## 2. 推进电子政务管理和服务创新

信息技术是电子政务的支撑点,而创新则是信息技术的灵魂。虽然我国信息技术水平远不如发达国家,但这也是我国信息技术创新的机会,只有创新电子政务管理,才是信息时代下的第一生产力。

### (1) 开放服务外包模式

就发达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趋势而言,未来的电子政务处理系统应具备下列特征:服务性、参与性与高整合度。而这类电子政务系统通常有两种建设运营方式:一是政府调动自身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开发,并购买服务器等硬件设备进行运营;二是将电子政务系统的开发及维护交由市场操作,即与互联网信息服务商签订合同,由该厂商负责软件开发与硬件支持,但系统的管理还是由政府人员进行的。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建设运营方式,都能为公务员提供高效的政务处理平台,也能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

电子政务的精髓在于开放性、互动性、服务性。所以,一个功能完善的、终端多样化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要求电子政务系统的底层数据库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做到多动态扩展、数据云储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电子政务系统主要还是架设在网页中运行,虽然在政务公开工作上表现优异,但却缺乏互动性与服务性,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不足,也并未实现以政府为核心的在线多元公共治理结构。所以,为实现多元公共治理,方便民众参政议政;也为了将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我国可以参考欧盟国家的范例,与民间企业共同开发多客户端的电子政务系统,使得公众无论是在个人电脑前还是在户外使用移动终端,都可以方便地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获取服务。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政企两者的行为,避免在开发过程中出现权钱交易、挪用资金等贪腐现象。

### (2) 规范首席信息官制度

抑制虚假信息的影响和泛滥,要求政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消息。<sup>[5]</sup>从国外的成功经验中可以得知,首席信息官在促进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政府也应加强对电子政务的科学管理,培养和招揽专业人才推进电子政务的建设。在21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就以针对电子政务的建设发布了相应的

政策法规,确立了首席信息官的法律地位和在建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这对信息资源的管理产生了极大的促进意义,其中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国政府学习。

不过,当我们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建立 CIO 机制时,必须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出贴合国情的发展规划,不可盲目复制他国成功案例。就目前来看,各地政府虽然在 CIO 机制建设上有着很高的积极性,但实效性却不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 CIO 是从现任政府领导人中任命,专业知识水平十分一般,又缺乏相应的信息技术人才队伍来帮助 CIO 完成工作。同时笔者还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基层政府的信息办公室或是信息管理处都处于半运行状态,其日常工作主要是负责政府内部的信息传达与信息资源整合,并没有面向公众提供服务。此外,这些办公机构的信息工作也显得非常被动,缺乏主动协调各部门的意识与事权。要积极推行电子政务,构建无缝隙政府,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使公众享受网上办公带来的便利。<sup>[6]</sup>

### (3) 构建网络问政机制

健全相关网络问政机制是电子政务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而政务微博则是我国公众表达意见、诉求的公共途径,是政府提高公信力与群众满意度的有效方式。我国应在结合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客观、有效的政民互动长效机制,增强政府与群众的沟通交流,改善官民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现实需求。网络问政作为新型的公共服务方式,是政府通过网络来收集民情、获取民意,以能够为政府决策制定提供依据的有效工具,主要措施如下:

首先要开设公众留言窗口。以政府的名义在网站上开设公共留言窗口,对网民的留言要积极回复,及时解决民众的疑点难题。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问责机制,完善公众留言的交办制度,提高政务公开透明度。其次要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将现有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原有基础上,针对互联网特点进行微调,在公开政务信息的同时,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与群众间的桥梁,对政府权威、公信力有着很大影响,设置互联网发言人制度,能够体现出政府的亲民、务实的工作态度,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再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电子政务考核机制。将各部门相互之间的工作评价、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与民众对各

部门的工作评价汇总起来,按不同的权重比计算,科学评价各级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工作实效,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来自民间的意见建议,聆听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最急需的服务。总而言之,电子政务的服务性应体现在为民服务、解决民众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给予民众意见以足够尊重,创建服务型政府。

### (4) 开发创新服务模式

在发达国家,电子政务的发展已经从电脑硬盘走向了云端、走向了千万个移动终端当中。它们将电子政务系统通过一个不大的客户端装载到手机、电脑上,并实时更新数据,实现了与民众全天候维系在一起的公共管理形态,收到了良好的实效,为我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要注重技术上的发展与创新。发达国家实现全天候的电子政务平台,依靠的就是其开发的尖端信息技术,使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实时与民众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进而提供相应的服务,并将这一流程记录下来,研究公共需求的发展趋势。同时,发达国家通常会开发适应不同终端、不同操作系统的客户端,但用的服务器与通信协议却是统一的,这在无形当中就省下了大量硬件重复建设的人力、物力。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各地政府、甚至不同部门之间所采用的硬件设备、软件开发环境都不尽相同,因此即便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很难做到协调一致发展电子政务。所以,按照我国硬件设施的普遍情况,开发具有普适性的软件系统,使不同经济、硬件水平的政府部门都能够协同合作。其次,要做好云数据、云计算工程建设。使民众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能够连接网络的终端,就能够查看到详实、及时的公共信息。同时,还可以有偿提供民间企业以实时连接数据的权限,使企业能够运用这些数据进行二次开发,涌现出大量便民的应用程序,例如:国家气象局向一些手机程序开发企业提供实时气象数据,而这些企业在这一基础上开发出了手机实时查看天气的软件,使公众能够充分享受到现代化、信息化所带来的便利。再次,要加快我国“空中政务”建设,将电子政务系统无线化。这一工程的目的是提高电子政务的覆盖率与服务性,使公众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得到便捷的公共信息服务。近年来,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中都搭载有应用 CMMB 技术的移动电视广播,为民众提供单向的政策信息宣传,这是电子政务无线

化的第一步。在未来,我国要应用移动 WIFI 热点技术,做到城市空间下电子政务系统的全面覆盖,农村地区重点乡镇覆盖;同时,为各种终端、不同操作系统提供相应的客户端软件,使民众在应用中提高公共参与积极性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全面改善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水平。此外,通过对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发展的研究,笔者发现,他们的硬件发展较软件更为超前,使得官方与民间开发的各种政务应用都能够及时在电子政务平台中启用,为软件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超前的硬件设施建设是不符合国内经济基础的,但却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的适当倾斜,使现有的基础电子政务平台得到充分的运行保障,为我国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 [ 参 考 文 献 ]

- [1]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 2014 - 7 - 21.
- [2]高新民. 新媒体与党的建设[J]. 理论探讨, 2012 (6).
- [3]张继梅. 提高领导干部网络问政能力探微[J]. 理论与改革, 2010(5).
- [4]张锐昕. 电子化政府绩效评估系统的角色和功用初探[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3(1).
- [5]黄宇, 余华. "数字革命"背景下的执政风险与有效应对[J]. 观察与思考, 2013(1).
- [6]王勇. 政府公信力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 科学社会主义, 2012(6).

(责任编辑 光 翟)

---

(上接第28页)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与韩非相比有更加人性化的一面,但它也有其缺陷。

#### 四、结语

韩非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当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与他们的法治思想结合后,产生的效果也大相径庭,这体现出了东西方社会酝酿出的哲学思想的不同光辉。功利主义本身,在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下含义不同,在其指导之下产生的政治观念、法治观念也不同,我们对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评价不能脱离其产生的背景。可以说,韩非和边沁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今天看来,两人作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哲学家、法学家,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并没有过时,研究他们的思想对我们当代的哲学、法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我

们社会法治的完善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新思路。

#### [ 参 考 文 献 ]

- [1]J.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M]. London : Clarendon Press, 1923.
- [2]周辅成.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家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 [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3][英]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4]张乃根. 西方法哲学史纲[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 [5]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责任编辑 光 翟)

[主持人语]在文学中国的版图上,江苏区域文学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小说而论,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江苏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百花齐放,群星璀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作、评点、出版传播,成为全方位意义上的小说文化中心。新时期以来,江苏学者不懈耕耘,古代小说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又成为引人瞩目的研究重镇。本刊秉持传承文化、服务地方之宗旨,特辟“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栏,希望为古代小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繁荣,略尽绵薄。本期着眼于“小说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小说”,编发文章三篇,以飨读者。热切期待学者赐稿,诚恳欢迎读者批评。

## 《镜花缘》的文昌、魁星信仰与科举人格

王学钧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镜花缘》不可忽视的价值之一,在于生动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文昌、魁星信仰、国家意识形态与科举制度三者融合所产生的文化效应:成功规训了中国世俗普遍的科举人格。

[关键词]《镜花缘》;文昌;魁星;科举人格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56-07

### 一、引言

自胡适《〈镜花缘〉的引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研究者都注意到《镜花缘》的乾嘉汉学背景,也都是从学识的观点予以理解。胡适称乾嘉时期为“博学的时代”,鲁迅称之有“博识之风”,就都是从学识的观点所作的判断;而对《镜花缘》内涵的思想信仰、人生期待等基本内容,多所忽略,尤其是忽略了它据以生成的世俗基础。这种忽略构成了他们对《镜花缘》文本批评的共同前提而影响至今。下文将论述,这种忽略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对《镜花缘》主题的理解。在中国小说史上,《镜花缘》不可忽视的基本价值之一,在于生动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民间信仰、国家意识形态与科举制度相融合所产生的文化效应:成功规训了中国世俗普遍的科举人格。但长期以来,由于胡适的“女权”论、鲁迅的“博物多识之作”亦即“才学小说”论被不断重复、发挥,几乎已成常识,这一点也就被长期遮蔽了。

### 二、清朝小说中的文昌、魁星信仰

文昌又称文曲星。它和魁星信仰原是古代占星术中的星宿信仰,宋朝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达而演化为民间科举功名崇拜的信仰形式,至清朝嘉庆年间达到极盛:文昌始受朝廷敕封,纳入国家祀典。嘉庆六年五月甲申(1801年6月19日)嘉庆帝发布上谕:

京师地安门外旧有明成化年间所建文昌帝君庙宇,久经倾圮,碑记尚存。特命敬谨重修,现已落成,规模聿焕。朕本日度申展谒,行九叩礼。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着交礼部、太常寺,将每岁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仪文,仿照关帝庙定制,详查妥议具奏。<sup>[1](pp. 79-80)</sup>

从此,文昌帝君与关圣帝君并列,一文一武,受国家祭祀。与西方文化不同,大清国不是欧洲中世纪式的宗教和封建(feudal)国家,而是大一统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王学钧,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宗法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国家。在中国,君主不像西方那样需要宗教的认可加冕,而是相反,宗教乃至民间信仰需要君主的认可或默许才能生存。这是因为,中国自西周以来,便遵循宗法家天下的立国原则,视君主为天子,按宗法原则世袭,作为天下的主人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犹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sup>[2]</sup>(P.171)与此相应,作为教化原则的国家意识形态遵循《周易》“观”卦《象》辞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观念。按这个观念,民间的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包括民间文艺,虽然可以按各自的需要造神,但神灵则须由朝廷敕封,祀典由朝廷规定,因而有国家与地方官祭祀之别,封号、职能、礼仪之分,也因而有“淫祀”的罪名,以排斥邪教邪神。这使中国历朝君主得以按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将民间信仰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世俗教化和思想统治的工具,以“化成天下”,达到大一统君主专制所需要的“一道而同风”的世俗目标。这就是中国文化自西周以来王权至上的世俗特性,也是古代小说的世俗基础。嘉庆帝的上谕便体现了这种特性:凭借王权,通过敕封,将民间的文昌信仰纳入国家祀典,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崇奉的神灵。这个神灵的基本职能便是“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而“用光文治”。

所谓“主持文运”而“用光文治”,主要内容就是科举制度。这时,清廷的科举制度已大获成功,文昌帝君受“海内崇奉”确已蔚然成风。我们知道,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以后,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以一个只有不足30万八旗兵的少数民族,怎样征服拥有1.5亿人口的中国。除了武力之外,科举便是清廷征服中国的“文治”手段。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江南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sup>[3]</sup>(P.9353)清廷当即采纳他的建议,在战火纷飞的当年、次年就连续举行乡试、会试,此后逐年进行,将原属明朝的大批秀才、举人吸引到清廷的考场,通过考试成为清朝的举人、进士和官员,用科举功名作为征服中国“士心”从而征服中国的工具。

《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成书于乾隆年间。前者已经感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第1回)后者也感慨:“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第1回)这些不约而同的感慨,

印证了范文程对中国“士心”的洞察,透显了科举制度在清廷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儒林外史》第42回写南京乡试考场的情景:

放过了炮,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应天府尹大人戴着幞头,穿着蟒袍,行过了礼,立起身来,把两把遮阳遮着脸。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放开遮阳,大人又行过了礼。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

这是假托明朝而实写清朝。明朝的应天府尹相当于清朝的顺天府尹,因为应天府是南方的京都——“南京”,与清朝的顺天府——北方的京都“北京”对应。应天府尹是京城的地方长官,也是地方官祭的主祭者。“关圣帝君”不是明朝的封号,而是清初才有的封号。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敕封关公为“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1531)又“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以四孟岁暮应天府官祭”<sup>[4]</sup>(P.1304)。“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在这里是沿用民间旧称,也就是嘉庆六年敕封的“文昌帝君”。应天府尹亲临乡试考场祭祀,请它来“主试”,是因为在民间信仰体系中,它执掌天下“文运”;“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也与魁星的神职相关。《儿女英雄传》第35回写到北京旗人安学海府里的魁星楼供奉着魁星,便因“魁星是管念书赶考的人中不中的”。因为魁星有这种神职,所以在考试时请它来“放光”,表示神灵福佑,也表示神灵无私,考场公平。魁星的塑像是铁面獠牙,一手执笔,一手执斗,象征铁面无私,士子须经魁星在冥冥中“点额”才能考中。

魁星因执掌士子科举考试“中不中”的命运,所以深受世俗敬畏崇拜。《红楼梦》第8回写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初到贾府,贾母见他性情温柔,相貌漂亮,送给他“一个荷包并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这意味着魁星信仰已深入世俗,以致金魁星已被商人制成吉祥物供民间作为礼物馈赠。

由此可见,嘉庆帝说文昌帝君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既有现实根据,而他敕封文昌帝君,也顺应了民情。文昌、魁星信仰到嘉庆年间达到极盛,既与清朝的科举制度大获成功有关,也与清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40年的“盛世”,中国人口由明末的1.5亿猛增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3.6亿,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3.8亿有关<sup>[5]</sup>(P.832)。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导致科举之

途拥挤不堪。人们对文昌、魁星有多么崇拜,就意味着功名欲望有多么强烈。《儒林外史》第33回写迟衡山说:

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

这已透显一种现实:中国虽然一向以礼乐之邦自诩,但人民对功名的热衷却远远超过对圣贤的敬仰,传统的礼乐在世俗中已被功名崇拜排挤殆尽。迟衡山虽没有提到魁星,但不言自明,只要有文昌殿,就一定配有魁星阁,否则文昌殿既不全,香火也要受影响。魁星与文昌之间含有直接的信仰联系,一个在冥冥中执掌士子个人科举考试“中不中”的命运,一个执掌天下“文运”,犹如个人利益与国家伦理的关系。由于魁星与士子个人的功名前程直接相关,因而在世俗中比文昌更受欢迎崇拜。《镜花缘》便生动表现了这一点。

《镜花缘》的成书已在嘉庆末年。它不仅沉浸在文昌、魁星信仰中,而且援引佛教的“变相”观念为这种信仰继续造神。它的第1回就是“女魁星北斗垂景象”,又为魁星老爷造了一位“花容月貌”的夫人——女魁星。《镜花缘》的女主角唐小山的前身百花仙子原是天界“总司天下名花”的“群芳之主”。在她还是天上的仙姑时,就已是魁星信仰者了。她早已知道:“魁星专司下界人文。近来每见斗宫红光四射,华彩腾霄。今以变相出现,又复紫气毫光彻于天地。如此景象,下界人文定卜其盛。”百草仙子告诉她:“海外小蓬莱有一玉碑,上具人文,近日常发光芒,与魁星遥遥相映,大约兆应玉碑之内。”

所谓玉碑上的“人文”,就是指“天榜”,也是百花仙子心中的渴望:“不知小仙与这玉碑可能有缘?可借我们虽成正果,究系女身,将来即使得睹玉碑人文之盛,其中所载,设或俱是儒生,无一闺秀,我辈岂不减色?”“即使所载竟是巾幗,设或无缘不能一见,岂非镜花水月,终虚所望么?”(第1回)这已生动透显了百花仙子对下界“儒生”功名的羡慕。此功名当然是指科举功名。

在瑶池蟠桃会上,嫦娥为献媚于西王母,要百花仙子下令“百花齐放”。百花仙子因这个要求违背时序,不合天帝律令,不能服从,与之发生争执。

“那边女魁星早已执笔过来,把百花仙子顶上点了一笔,驾着红光,离了瑶池,竟奔小蓬莱保护玉碑去了。”(第2回)这就是魁星“点额”,注定百花仙子将名载玉碑——“天榜”。

### 三、魁星信仰与天榜

百花仙子因遭嫦娥、心月狐联手陷害,被谪转世为唐敖的女儿唐小山。她统辖的花仙也随之被谪转世为99名女子而散落在天朝和海外。之前,心月狐已秉承天命转世为武则天。武则天“一味尊崇武氏弟兄,荼毒唐家子孙”,又夺取儿子的帝位,篡唐建周。忠于李唐王朝的徐敬业、骆宾王等人起兵“勤王”,结果被武则天生镇压。他们的儿子徐承志、骆承志带着父亲的血书逃亡,继续“勤王”,志在推翻武则天,恢复李唐王朝。

唐敖与徐敬业等人是结拜兄弟,但他“功名心胜”,在武则天篡唐建周后,仍然不断赶考赴试,终于“连捷中了探花”,却又被言官参劾他曾与徐敬业等人结拜,结果“仍旧降为秀才”,致使“唐敖这番气恼,非同小可,终日思思想想,遂有弃绝红尘之意”。可见,唐敖“弃绝红尘”的原因,并非看破红尘,而是因为功名蹭蹬。这时仙人托梦告诉他,此时有百花滴落人间,“内有名花十二不幸飘零外洋”,如能救助她们,使她们“与群芳同得返本还原”,便是一大功德;然后,“再能众善奉行,始终不懈,一经步入小蓬莱,自能名登宝篆,位列仙班。”(第7回)适值他的妻舅林之洋这时准备出海贸易,唐敖便随之游历海外。在海外,唐敖救助了流亡淑士国的“勤王”志士徐承志,以及他的未婚妻司徒妩儿、女儿国“世子”阴若花等等“十二名花”;吃了肉芝、朱草等仙果异草,得以超凡入圣;同时,也见到海外多国的风土人情,发了许多议论,终于在小蓬莱出家。(第40回)

玉碑就座落在小蓬莱的泣红亭内。它之所以光华灿烂,是因载有“天榜”。唐小山得知父亲唐敖出家后,发于孝心,随舅舅林之洋商船出海寻父,与林之洋在女儿国所收义女阴若花一起寻到泣红亭。唐小山能识“天榜”,获悉天机,但天机不可泄露;阴若花不识“天榜”,尚在蒙昧中。除了“天榜”,玉碑还载有“泣红亭主人曰”的一段碑记。胡适摘引碑记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

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湮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便判定:“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何以见得这段话表达了“著者著书的宗旨”呢?胡适既没有解释,也没有论证,而是接着设问自答:

我们要问:著者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究竟他“所见”的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见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但我研究《镜花缘》的结果,不能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sup>[6](P.531)</sup>

然后,他便从小说中摘引相关片断,诸如在女儿国林之洋被迫缠足的故事、淑士国的关于天朝风俗的议论、黑齿国的女学馆、武则天的诏书等等,加以发挥,来证明自己的论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镜花缘》也说:

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sup>[7](PP.250-251)</sup>

可是,只要我们试图将这段话还原到小说的结构和语境中予以客观解读,就会发现,胡适的论断其实是明显的断章取义,曲解原文。

我们看碑记原文,原是针对“天榜”上“所列百人”而言的。这“百人”就是武则天将要举行的才女考试所录取的百名才女。小说为这百名才女排了名次,取了花名、姓名,也取了绰号。这个“天榜”以史幽探、哀萃芳为前两名,以花再芳、毕全贞为最后两名。碑记便是对这个名单和名次的说明,所以说:“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这种“……者,盖……”句式,犹如现代汉语的“之所以……是因为”句式,表示因果关系。按其原义,“史幽探”之名便寓有“穷探野史,尝有所见”之意;“哀萃芳”之名寓有“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之意。“花再芳”是“花之重芳”,“毕全贞”是“全贞毕”之意。碑记用“泣红亭主人”的名义解释“天榜”所列百名才女的名次,为什么从史幽探开始,以毕全贞结束,以此赞美她们

都如“琼林琪树,合璧骈珠”。可见,碑记所谓“穷探野史,尝有所见”之“所见”,已经交待清楚,就是指“因笔志之”的“所列百人”——百名才女。

可是,到了胡适笔下,这“天榜”所列百名“才女”,却变成了“妇女”。“才女”固然属于“妇女”,但“妇女”并不等于“才女”;正如武则天属于“妇女”,但“妇女”并不都是女皇一样。“妇女”要想成为“才女”,既须经魁星“点额”,“天榜”题名,也须人间帝王的“才女”考试录取;正如武则天由一个“妇女”成为女皇,既需秉承天命,也需自己动手“荼毒唐家子孙”,踏着尸山血海才能登上皇帝宝座。当胡适论定“李汝珍所见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时,已经将“天榜”所录取的百名“才女”等同于抽象的“妇女”,将特殊等同于一般,犯了逻辑学所谓实质性谬误——偷换了概念。

如此偷换概念的结果,是抹煞了泣红亭故事在《镜花缘》结构中既定的情境。“天榜”意味着人间的才女考试尚未进行,但录取名单早已由天命注定。这就是魁星信仰内涵的功名前定观念的表现。从而可见,如果没有这个信仰,就不会有玉碑和“天榜”,不会有泣红亭故事。这个信仰就是《镜花缘》整体结构的观念前提。《镜花缘》便是按这个信仰设置情节,展开叙事的。

前文已述,女魁星给百花仙子“点额”后,“竟奔小蓬莱保护玉碑去了。”现在,唐小山和阴若花来到泣红亭,首先看到的便是在这里“保护玉碑”的女魁星:

忽听亭内响了一声,现出万道红光。红光之内窜出一位魁星:左手执笔,右手执斗,生得花容月貌,美如天仙。驾着彩云,四面红光旋绕,霎时起在空中,直向斗宫去了。(第48回)

至此,女魁星完成了“保护玉碑”——“天榜”的职责,回归北斗宫,转而由唐小山以凡人的身份观看“天榜”。这就是由百花仙子经魁星“点额”而见之于唐小山命运的体现,前后因果相续,了然分明。她的故事,从前身到此生,都笼罩在魁星信仰中。然而,经过胡适断章取义的曲解,《镜花缘》的信仰被全然忽略,变成了他杜撰的所谓“妇女问题”。

唐小山和阴若花都是魁星信仰者。见到女魁星后,阴若花便对唐小山说:“我同阿妹素日最敬魁星。谁知此间竟遇女身出现,原来魁星却有两像。”唐小山说:“将来回到家乡,如遇庙宇供奉有魁星,妹子发个心愿,于男像之旁另塑一尊女像,也

不枉今日瞻仰一番。”于是，“二人随即对空叩拜。”（第48回）她们回国后，唐小山果然在“魁星祠内塑了一尊女像，以了海外心愿”（第56回）。

魁星信仰的人文内涵是功名崇拜和功名前定，所以当唐小山谈起人各有其“福命”时，尚在蒙昧中的阴若花便对她说：“将来得能附骥考个才女，心愿足矣。”（第48回）这就是阴若花的人生理想。

不仅阴若花如此，自从武则天要举行才女考试的消息传出，便立即轰动了天朝，也轰动了海外。在海外，黑齿国的少女亭亭获悉这个消息后，便对她的同学红红表示：“若不中个才女，至死不服。”（第52回）她的母亲缙氏已年近60岁，得知这个消息，便求唐小山帮忙：“老身年虽望六，志切观光，诚恐限于年岁，格于成例，不获叨逢其盛，尚望小姐俯念苦衷，设法斡旋，倘与盛典，老身得遂一生未了之愿，自当生生世世永感不忘。”（第50回）可见，功名已成为她们的人生终极价值，不获功名，死不甘心。

海外如此，海内也举国若狂。唐小山的母亲林氏本来执意不让唐小山出海寻父，而是坚持自己出海寻夫。她这样劝唐小山：“将来倘能中个才女，不但你自己荣耀，就是做父母的也觉增光。你若跟著舅舅去到海外，这水面程途最难刻期，设或误了考试，岂不可惜！”（43回）林之洋也为自己的女儿、义女求唐小山：“甥女如报名，可将若花、婉如携带携带，倘中个才女回来，俺也快活。”婉如是他的亲生女，阴若花是他的义女。在他看来，阴若花“将来倘在天朝中了才女，一时传到女儿国，也教那些恶人晓得他的本领。他们原想害他，那知他在天朝倒轰轰烈烈，名登金榜，管教那些畜类羞也羞死了”（第5回）。

在天朝“名登金榜”，居然能达到这种海外效应，何等荣耀！因而在《镜花缘》所呈现的世俗中，所有的人都以考试——功名优先。淮南节度使文隐有五个公子、两个小姐，河东节度章更兄弟四人共十个公子、四个小姐，都订了亲，也都到了婚嫁年龄，但这一大群未婚媳妇，不约而同，个个“都等应过女试，才能完姻”（第57回）。不仅这些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为才女考试主动让路，就连“勤王”大业也复如此。徐承志从淑士国带着堂妹徐丽蓉、未婚妻司徒妩儿一行回国后，联络骆承志、文隐、章更、史逸等“勤王”志士，准备发动“勤王”战争。可是“勤王”志士家的女儿个个都在盼望考试。听到武则天要举行才女考试的消息，徐承志

曾愤慨地说：“我同这恶妇乃不共戴天之仇，岂可令妻、妹在他跟前应试！”（第57回）但住进文府不久，徐丽蓉就对他说：“此处两位姐姐不日要赴县考，意欲约我二人同去。妹子因哥哥前在船上有不可去之话，所以再三推辞。谁知伯母竟将我们履历业已开报，并嘱我们陪伴同去。妹子只得含糊答应，俟哥哥回来再去复命。哥哥你道如何？”徐承志当即答道：“伯母既如此高兴，自应同去为是。”（第59回）转眼之间，他就把自己的誓言和国恨家仇置于脑后，转而以考试优先了。

可见，在《镜花缘》呈现的世俗里，已没有任何事情比考试——功名更重要，更吸引大众的期盼了。功名已成为这个世俗的无上荣耀和终极价值。武则天因而只用一场才女考试就使四海翘盼，天下归心。

#### 四、科举人格与文昌信仰

在《镜花缘》中，以唐小山为首的百名女子，都是为功名而来，也为功名而去，功名就是她们的人生终极价值，犹如百谷仙子对唐闺臣所说：“女菩萨，你要晓得，一经观光之后，也就算功行圆满，一天大事都完了。”（第51回）所谓“观光”，原是清人话语，指参加科举考试，目标便是“名登金榜”。只不过《镜花缘》将科举考试幻化为才女考试，将百花仙子所羡慕的“儒生”的功名幻化为才女们“名登金榜”。才女考试实质就是科举考试。《镜花缘》多处流露出这一点，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唐敖令唐小山改名唐闺臣的过程。

唐小山来到小蓬莱，原是为了将父亲带回家，以期一家团聚。唐敖却隐居不出，而由樵夫转交她一封信。信中命唐小山改名为唐闺臣，必须在考中才女之后才能相见。阴若花对唐小山解释说：

按“唐闺臣”三字而论，大约姐夫因太后久已改唐为周，其意以为将来阿妹赴试，虽在伪周中了才女，其实乃唐朝闺中之臣，以明并不忘本之意。信内嘱阿妹若不速回，误了考期，不替父亲争气，就算不孝。（第47回）

这里明言武则天“改唐为周”是“伪周”。但胡适却说：“《镜花缘》里，对于武则天，只有褒词，而无谤语：这是李汝珍的过人卓识。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则天帝来替中国女子出气的。”<sup>[6](P.550)</sup>再一次表明，胡适解读《镜花缘》，缺乏客观心态。

在汉语里，“伪周”是个含义严峻的贬词，表达



的是对武则天称帝的敌对立场。这种观念源于儒家的《春秋》大义。《镜花缘》第 52 回讨论《春秋》大义,阴若花说,其要领“不外乎诛乱臣、讨贼子、尊王贱霸之意”。武则天篡唐建周,当然是乱臣贼子,属于“伪”朝。臣事“伪”朝就是对本国的叛逆,而叛逆在中国文化里是不可原谅的罪过。所以,《镜花缘》采用史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法,编撰了完整的“勤王”故事贯穿于小说始末,直到恢复李唐王朝(第 100 回)。

忠与孝是儒文化的根本伦理,儒生的立身大节。从先秦到清中叶的儒家各派,也无论宋学、汉学,归根到底不过“教忠教孝”。唐敖明知这一点,仍奔竞于“伪周”科举之途,实质已背叛了他结拜的兄弟徐敬业等“勤王”志士。在“伪周”,他因功名蹭蹬而“弃绝红尘”。但事实上,他身在红尘之外,心系世俗功名,以至将女儿唐小山的孝心异化为自己的功名欲望——“误了考期,不替父亲争气,就算不孝”。

这已显现,在唐敖的心目中,功名的价值高于亲情,也高于忠义。对世俗的一切,他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自己的功名欲望。这是一种人生观。它内涵的人格可称为科举人格。科举功名已内化为这种人格的自我意识,而以功名为其人生的终极价值。功名欲望不能实现,人间的一切在他中都毫无价值。唐小山改名为唐闺臣而参加才女考试,便是将自己的孝道异化为唐敖的功名欲望,从而成为唐敖功名情结的化身。果然,“天榜”写着:“司百花仙子 第十一名才女 梦中梦 唐闺臣(第 48 回)”这与唐敖的指令相应,既意味着唐敖已经成仙,能预知天命,也意味着唐闺臣原属“梦中梦”。唐敖未能实现的功名梦,注定由唐闺臣来为之实现。“天榜”是科举金榜在冥冥中的依据,但只有天子才能使它成为人间的科举金榜。考才女和考进士一样,目标都是“名登金榜”,成为“天子门生”。在中国,唯有天子有权开科取士,赐予功名。现在武则天是皇帝,并不因她是女人而对皇帝的权力属性产生任何影响。唐闺臣等百名女子果然都如“天榜”所载,通过武则天的殿试,“名登金榜”。待到才女们满足了功名欲望,如同清朝士子考中进士后一样,拜老师、会同年,联谊欢宴,各展才艺,尽情欢乐以后,便与“勤王”志士一道推翻武则天“伪周”,既圆了功名梦,又挽回了忠义。唐闺臣既实现了唐敖的功名欲望,便到小蓬莱寻父,将自己的功名作为奉献于父亲的孝道去了。(第 95

回)

魁星信仰和“天榜”虽然意味着功名前定,但并不意味着人只能听天由命,主观的努力毫无作用,而是应“尽人事而听天命”。在《镜花缘》中,这种“尽人事”的主观努力的意义便源于文昌信仰的阴鹭观念。文昌信仰的代表作是《文昌帝君阴鹭文》,简称《阴鹭文》。这原是道教劝善书,也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结果,主旨在于教人积阴鹭,也就是通常所谓行善积德。《阴鹭文》写道: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鹭,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子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鹭中得来者哉!<sup>[8]</sup>(PP.6-7)

这是说,人能积阴鹭,就能感动上天,天必赐福,如同佛教所讲的善有善报。《镜花缘》便是以这个观念来解释个人在科举中的利钝成败。针对缙瑶钗进京赴考而忘带考试文书,犹如今天的人们参加高考而忘带准考证,唐闺臣大发议论,说:“妹子闻得古人言:‘科场一道,既重文才,又要福命。至德行阴鹭,尤关紧要;若阴鹭有亏,纵让文命双全,亦属无用。’以此而论,可见阴鹭德行,竟是下场的先锋;即如出兵,先锋得利,那主帅先有倚傍。自然马到成功了。”(第 63 回)简言之,“上天自能护佑善人”(第 63 回)。在她看来,缙瑶钗忘了带考试文书,“安知不是素日行止有亏,鬼神拨弄,以致如此?”相反,“若行止无亏,榜一注定该有此人,莫讲赴试文书,即使考卷遗失,亦有何妨”(第 63 回)。

总之,利钝成败都取决于个人的阴鹭。这是文昌信仰的要义,也是《镜花缘》的基本信仰。当这个信仰经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崇奉,并与具体的科举制度相结合,也就使科举的成功成为国家和世俗共同鼓励的荣耀,犹如在清朝一旦考得状元、榜眼、探花,就由朝廷主持为他们挂彩游街,向公众炫耀,他们不但获得许多实际的利益,而且被认为是行善积德而获神佑的结果,是阴鹭的报偿,从而在文化上对世俗产生引导、规训的作用。科举人格便是这种规训的结果。

(下转第 90 页)

# 论明清小说中的民间制度文化语汇

韩希明

(南京审计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9)

**[摘要]** 明清小说中的民间制度文化语汇具有世俗性、权威性、惩戒性和契约性的特点。世俗性表现为注重人情世故,集中表现为称谓语虚拟化;被冠以“常言”、“自古……”的谚语,在明清小说人物对话中,常常具有经典意义。权威性在称谓语上的体现,一是要求人们必须严格按照宗族称呼规范,二是交恶时在对方面前以长辈自居。惩戒性主要体现在詈语,这是建立在民间制度基础上、并且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口头惩戒,在舆论上将对方置于羞辱的语境。契约性是指语言在意识层面上的制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抗拒的约束力量,因而既不可能、也不想不去认真考察它的合理性,而只是绝对服从,并依靠社会的、宗教的、宗法的威力传承下去。

**[关键词]** 民间制度文化; 明清小说; 民间语汇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62-05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局势的变化,民俗体系经历着急剧地引进、斗争、分化、改组、融合等过程,这些生活相,反映在小说作品中,则由民间语汇将民间生活与制度相勾连。“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sup>[1](P.88)]</sup>民间制度存在于人们的风俗习惯礼仪之中,首先表现为一种民众认可的社会规范,常被某种社会组织掌管,以保证其强制执行。国家制度是统治者依靠国家机器、凭借国家权力来施行的。民间制度没有国家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严谨逻辑,也没有其强权色彩与坚挺;民间制度往往由规定语境的民间语汇得以生动形象的展示,因而,明清小说中民间制度文化语境的民间语汇具有世俗性、权威性、惩戒性和契约性的特点。

## 一、世俗性

《西游记》中猪八戒说“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第8回),显示了民间制度在百姓生活中的施行,既有作为戒律冷峻的一面,也有世俗温情

的一面;与此相应,明清小说作品的民间语汇,以其纷繁琐碎的世俗生活内涵,以平民熟悉的言语方式,于不经意间传达了民间制度的原则及其相关信息。

### 1. 注重人情世故。

此类民间语汇集中表现为对人的称呼上,常见的是称谓语虚拟化。事实上,虚拟的称谓,不能准确反映与被称呼者的关系,也不能准确表明对方年龄、身份、职业等客观情况,但是,出于功利化需求,还是成为明清小说人物常用的称谓语,主要表现为僭用官名和滥用亲属称谓。

用官名称呼其实并无官职的情形,集中表现为对三类人:一是用来称呼有钱有势的富人。《豆棚闲话》第三则云:“居住彼处富家甚多,先朝有几个财主,助饷十万,朝廷封他为朝奉郎,故此相敬,俱称朝奉。”可见“朝奉”起初是所得的封号,以后泛用成为对富人的尊称。二是用官名称呼有一定技艺者包括巫师、艺人。如《醒世恒言》卷十五称“泥水木件样样都精熟的蒯三”为“蒯待诏”,《碾玉观音》中璩待诏是裱褙匠,玉雕匠人崔宁被称为“碾玉待诏”。三是称呼当事人敬畏的对象,如侠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韩希明,女,江苏武进人,南京审计学院文学院教授,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和明清小说研究。

盗、捕吏等；有时对富豪人家的奴仆、伙计等人也用官名相称，这是为了取悦对方。其实，对这种现象，朝廷曾以律令禁止。如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曾有布告，奉旨禁约云医人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然而，记载市井细民生活的明清小说作品中，俯拾皆是虚称则反映这种现象已经形成了风气，成为一时难以更改的民间制度。明后期起，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大量有钱无权的商人，他们渴望进入仕途，虚称是他们愿望的一种曲折表达。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崇尚享乐的社会风气，事实上也曾给活跃于市井中的诸色伎艺人员、医生、工匠等提供了跻身官吏行列的机会。其中技艺出色的被召入宫廷或官府献艺、效力，幸运者还得到赏赐的封号，之后这种封号被广泛运用，作为本行从业者的敬称。由于长期僭用，有些官名甚至成为普通的称谓语，如“博士”有茶博士、酒博士、磨博士、染博士等。再如“待诏”，几乎可以用来称呼所有的匠工，如剃头、碾玉、打铁、做木工的匠人等等。《野叟曝言》第九十二回中“那汉看着素臣问道：‘这位可是郎中先生？’”可见民众已完全把“郎中”作为医生职业固定的称呼，另加称谓语“先生”以示尊敬。如果虚称僭用是官称的别名，如相公、阁下、府君等，这种演变就更难察觉。这表明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以传统身份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和伦理规范，在此时已发生剧烈的震荡，新的社会分层开始酝酿，传统的“四民”界限趋于淡化。

滥用亲属称谓，往往是虚拟血缘关系，用意是缩短交谈双方之间的距离，增强对方对自己的认可度，或者是强调某种权威。且看《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刘姥姥对贾府上下人的称呼。在贾府正门前，她跟守门人打招呼：“太爷们纳福。”向后门边上的孩子问讯说的是“我问哥儿一声”，称呼年岁比她小很多的周瑞家的为“周嫂子”，称王夫人为“姑奶奶”，但见到王熙凤，她“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张口告艰难时说道：“今日我带了您侄儿来……只得带了您侄儿奔了您老来”，其实，刘姥姥家与贾府的关系，“原不是一家子”，是因为刘姥姥的女婿祖上与王家“因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作官，偶然连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动”，但是交谈中王熙凤也居然顺着刘姥姥的意思说“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

来就该有照应才是”。周瑞家的批评刘姥姥“开口就是‘您侄儿’。我说句不怕您恼的话，便是亲侄儿，也要说和软些。蓉大爷才是他的正经侄儿呢，他怎么又跑出这么一个侄儿来了”，但是刘姥姥的这种称呼很见效，可见滥用亲属称谓还是交际妙法，在各个地域都适用。

## 2. 恪守风俗习惯。

谚语、俗语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语言形式，在明清小说人物语言中常以“自古……”、“常言……”形式出现，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常用于说话人向对方施教、令其遵守某种规范的场合。

关于父母尊长：

孙悟空：“古人云，顺父母情，呼为大孝，师父说不打，我就且饶你。”（《西游记》第32回）

常言道，家无二主。（《西游记》第39回）

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石点头》第11回《江都市孝妇屠身》）

关于婚姻：

常言男大须婚，女大须嫁。（《石点头》第6回《丐妇重配鸾俦》）

常言道：会嫁嫁对头，不会嫁嫁门楼。（《醒世恒言》卷20）

关于亲戚：

俗语说得好，六亲合一运，那朱恩家事也颇颇长起。（《醒世恒言》卷18）

常言道，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西游记》第40回）

关于礼教：

古者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你今一十六岁，却出外游学，男女不分，岂不笑话？（《喻世明言》卷28）

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戴顶髻儿？还好看相，恁般乔装打扮回来，不雌不雄，好不羞耻人！（《喻世明言》卷28）

古人云，礼至不争。（《警世通言》卷25）

“谚语是民众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艺术化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其特质，兼具语言、文学、语俗及百科文化载体等四性。”“‘谚语’是‘熟语’这一‘特殊语汇’中的‘特类’，是任何其他‘熟语’所难与为匹的‘文化语汇’，是毋庸置疑的‘文化大百科’。”<sup>[2]</sup>

这些被冠以“常言”、“自古……”的谚语在明清小说人物对话中常常具有经典意义,而从这些文化语汇中我们也可窥见当时社会民间制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规范。

## 二、权威性

明清小说中民间语汇的权威性在称谓语上的体现,一是要求人们必须严格按照宗族称呼规范,二是在对方面前以长辈自居。

家族是社会各项制度的汇聚中心,传统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以五伦为核心、以亲情为纽带、从亲属差序向外扩张的关系网,即由家庭扩展到宗族,再延伸至亲戚,再扩大到朋友。家庭以血缘和姻缘组合而成,亲属在一起共同生活,家父权至上;族则以同宗共祖的承继关系综合而成,宗族权为上。执掌家父权的家长,享有管束、责打、惩戒家庭成员并处分家庭财产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得到国家法律支持和社会广泛认可,交际中的亲属称谓词表明对这种规则的遵守和顺从。《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汤镇台被降职回家时,六老爷违反了亲疏原则,按照一般非亲属关系的社会成员的称谓方式称呼汤镇台“老爷”,称呼汤镇台两个公子“大爷”、“二爷”,结果惹得汤镇台大怒。他们之间本应按亲属称谓来称兄道弟或称呼排行,而不应按照一般社会成员那样称呼官职,六老爷遭到痛骂,是因为这样称呼不仅使原本的亲密关系变得生疏,还意味着六老爷对汤镇台在家族中权威的漠视。

人们在责骂或詈骂时,往往将对象设置为卑微的一方,以突出说话人的强悍,达到某种心理满足。说话人往往有意抬高自己辈分,男性主要有老子、老爷、老爹、爹爹、爷爷、祖宗等,男性还自称为女性对方(尤其是未婚者)的丈夫、情夫,女性常自称老娘、祖奶奶、姑奶奶、大姑、师太,《西游记》中常用“外公”、“爷爷”,《水浒传》常用“老爷”,如第34回石勇“便焦躁道:‘也有个先来后到!甚么官人的伴当要换座头!老爷不换!’”《西游记》中孙悟空称玉皇大帝“老儿”,以极具戏谑效果的口吻表现了他的反叛意识。用社会地位低微、卑贱的称谓语称呼人,以图在声势上先发制人,如孙悟空师兄弟三人在对阵妖魔时总是大呼对方“儿子”;这是借宗法制度的威严宣扬本我的强大。与此相应,一旦伏低做小被认为是奇耻大辱,《西游记》中孙悟空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第34

回中孙悟空扮小妖请老妖,“在二门头忤着脸,脱脱的哭起来”,是因为他平生不拜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如今必须向老妖磕头,因而“泪出痛肠”。第42回中红孩儿劫持唐僧,孙悟空“虽不曾救得师父,老孙却得个上风来了”,喜不自禁的原因却是“他叫父王,我就应他;他便叩头,我就直受,着实快活!”

在民间流传的童谣也有类似的情形。《野叟曝言》中天子云:“数年前童谣有‘只知猪能吃糯米,不知糯米醉杀猪’之说,联想,猪与国姓同音,糯米亦称元米,猪吃糯米,已应太祖灭元之讖!今贵州反妇适名米鲁,鲁糯声同,惧其复应童谣末句。”(第123回)因为这种语言形式来自民间,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便于传唱,极易造成广泛影响。

## 三、惩戒性

明清小说中特别是通俗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詈语,既是当时社会一种语言习俗,更是一种社会行为,表面上是一种情绪宣泄,实质上受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小说作品中詈词的大量出现,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明代中期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变化心理的转变。

詈骂是一种违禁行为,明清律令中有各种细致条款禁止人们的詈骂,但是显然禁而不绝,作品中屡屡表现这些现象,表明詈骂者的情绪已经处于极端状态,用侮辱性语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已经是警告对方必须注意自己态度、情绪的变化、并领会话语目的和实际含义。同时,詈骂还是建立在民间制度基础上的并且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口头惩戒,在舆论上将对方置于羞辱的语境。

明清小说人物骂人的目的有泄愤和威胁。詈语是对个人违反社会规范否定和攻击的一种极端表达形式,这些社会规范包括妇女贞节操守,长幼尊卑,重传宗接代,出身门第等等,詈语是一种结论性语言,总是刻意贬低对方的人格道德:如《水浒传》第19回林冲骂王伦道:“这是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人!我其实今日放他不过!”还有的是用与污物有关的东西形容人。与社会地位、行业有关的詈语主要有:贼、强盗、配军、破落户、村人、落第腐儒、乞丐、文面俗吏、无名小将、奴婢、囚徒等,都是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地位的人,这种詈骂

是揭短,是侮辱对方。

詈语侮辱对方的父母或祖先,这是最恶毒的一种詈骂方式。类似的詈语的还有以“光棍”“绝户”指骂人,中国古代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妇孺皆知,以没有后代为骂语是彻底否定对方的道德水准,属恶毒之语。作品中更多的是将詈骂对象设置为动物,如猪狗、虫豸,用这些词语来表达愤怒并威胁对方,赋予对方以这些动物习性所象征的不良品行,如《西游记》中唐僧骂劫盗:“只是这世里做得好汉,那世里变畜生哩!”(第56回)

还有一些詈语是刻薄揭露对方生理缺陷的,如《西游记》第67回中驼罗庄的李老者骂孙悟空“你这厮,骨挝脸,磕额头,塌鼻子,凹颊腮,毛眼毛睛,痲病鬼,不知高低,尖着个嘴,敢来冲撞我老人家!”则可谓集詈语之大成。

诅咒是说话人用恶毒咒骂的言语形式来提升承诺或期许的可信度。如《水浒传》第81回燕青道:“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西游记》中猪八戒骂红孩儿:“泼怪物!……骗了我吃,管教你一个个遭肿头天瘟!”(41回)诅咒也是詈骂的一种,往往多与死亡关联。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人所共惧的一种结局,因此以死来诅咒证明说话人承诺的真诚或怨恨的极致。

詈骂语多采用社会禁忌语。“语言禁忌是真人成为人、对主客观及其区别有了认识之后,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物之别的认识所产生的语词回避。”<sup>[3]</sup>“三纲五常”是明清时代宗法文化的要素,是社会交往关系的前提,当时社会文化的禁忌就是等级观念,人们应该服从上级或长者;注重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詈语要人们确信,违背这些原则就是违反禁忌,就会受到超人神秘灵力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甚至这种惩罚时效性很强,又极具能量。作品以这样的话语方式来确立个体教化行为规范,接受家风民约及社会伦理的教化,并造就人的价值和行为取向。

#### 四、契约性

盟誓是对神灵承诺诚信,申明如果违背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由于对鬼神的极端信仰,古人对盟誓看得很重。如果同时还举行歃血等神秘仪式,神灵介入世俗事务,更大大增强了约束力。好汉

聚义必发毒誓。如《水浒传》中写了折箭为誓、以残酒为誓等多种发誓方法。“仪式及其包含的符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人成其为个人,社会成其为社会,国家成其为国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所造就的。”<sup>[4]</sup>

盟誓的作用在于表明心迹,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通过盟誓,获得安全感、认同感,说话人坚信言语寄托了人们的希望并带有神秘而令人恐惧的力量。与此相关的形式是赌咒发誓。咒己的,设定自己若不能完成或实现某件事情或某项事业、以致背弃别人,自身将遭到如何报应;咒人的,设定本应对自己感谢却不满、甚至仇恨的人如何处置,着眼点是说话人承诺的诚信度。“生活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共有的心理意识基础上,依据共同的观念体系,形成一个意义世界,筑成一个可以被遵守的行为规则。而这一过程又是伴随着一个共同体形成而逐渐形成、发展并构成一个共同体特征的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共同体特性的突出表现。”<sup>[5]</sup>如《水浒传》中阎婆对宋江所说的“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做驴做马报答押司”之类;承诺性是其鲜明的特点。《石点头》第六回中“深通相法”的严几希相得丐妇长寿女“骨里头富贵,当有诰封之分”,为了让众人坚信,赌咒道:“若这百日内仍复求乞,可将我这两只不辨玉石的眼睛刺瞎了”。“若负义忘恩,誓生生世世永堕猪狗胎中”,类似这样的誓词,要么与个人身家性命乃至后世荣辱相关,要么与某种规模的集团(家族、兄弟联盟或其他利益联盟)存亡、团结相关,以违背誓约可能产生的恐怖情景造成心理威慑。

赌咒发誓是一种仪式。很多人相信,这种意识层面上的制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抗拒的约束力量,因而既不可能也不想不去认真考察它的合理性,而只是绝对服从,并依靠社会的、宗教的、宗法的威力传承下去。有些人意识到了,赌咒发誓的约束力在于当事人内心的自律,他人并不一定能惩罚得了那些发了誓又违背誓言的,正如《警世通言》卷24中妓女所言“发誓只当玩笑”。“只有在同一的、既有的文化中,人们的心理意识才可能稳定,人们才可能在从事活动时,在既定的行为和语言模式下或者说具体的仪式、场景中预测可能的后果。”<sup>[5]</sup>

《警世通言》卷25中对于背信弃义的桂迁,小

说作品刻意设计了人物结局。桂迁获得帮助时说“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得补答,来生亦作犬马相报”,小说描述桂氏母子在桂迁在世时就变成了狗,以此让人坚信“冥中最重誓语”。《警世通言》卷34中,周廷章与王娇鸾誓偕伉俪,央曹姨为媒,口中咒愿如流而出,曹姨为有情人举行了盟誓仪式;在离别之际,王娇鸾要求周廷章重申前盟。之后,虽久无音信,曹姨坚信:“誓书在此,皇天鉴之,周郎独不怕死乎?”周廷章最后虽未如誓言所说“男若负女,乱箭亡身”,官府判曰:“我今没有乱箭射你,用乱棒打杀你,以为薄幸男子之戒。”印证了小说结语:“向贪新娶之财色,而没恩背盟,果何益哉!”

与小说的描述相映成趣的是,在司法审判中,清朝一度还局限保留了传统的“人誓”习俗,如遇到疑难案件,令当事人宣誓,宣誓后的证言具有可信度,也起到了某种倡导作用,尽管在国家层面上并未广泛认可,但在于某一社会共同体中,作为一种规范,赌咒发誓能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 五、结语

明末以降,人们在物质消费生活中出现追新慕异、竞趋奢靡的风尚,生活观念发生变化,社会变迁的波动轨迹亦颇为清晰。人们渴望张扬个性,力图突破传统等级限制,传统的等级规定和礼仪制度面临空前严重的挑战,生活情趣多元化,婚丧喜庆、社交礼节以及两性关系中出现了各种不守旧规、标新立异的现象,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表现出新的价值取向;“人治”的传统使得中国人疏于法律、规则,而亲于人情、伦理。除此而外,明清小说作者还看到了社会转型初期新道德观念发展的不成熟性,痛心于变动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病和道德失范现象。物质生活的困窘,使小说家的内心期待与现实生活产生种种矛盾冲突,儒学文化教养又能使他们在困顿中不断调整心态,他们意识到国家律令的缺失和疏漏,关注民间制度对

社会的调控作用。通过作品,在民间制度文化语境,话语表述的中心是伦理,以及构建于伦理基础之上的自律与他律并重的文化心理。“有时候国家的力量威威赫赫地摆在那里,有时候国家以隐蔽的方式存在。”<sup>[4]</sup>国家法律与民间制度构成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从《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言必称律条可以看出,即便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其实并不是经常受制于法律,而是更多更直接地受到民间制度制约和规范。道德伦理基于人的内心的评价机制而起作用,依赖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得以奏效。

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在根本法、公民法和刑事法之外,还存在着第四种法,而且是更重要的法;它既铭刻在大理石上,也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是国家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过时或消灭时,它会使它们恢复活力或代替它们,它会维持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用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这就是民间制度。明清小说中民间制度文化语汇生动具体地证实了,对于社会秩序,民间制度具有补偿性的法律控制功能;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它又比儒学教义有了更具体的可操作性。

## [参考文献]

- [1]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9.
- [2] 李耀宗. 中国谚学若干问题谭要[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4)
- [3] 孙炜, 许嘉璐.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禁忌现象解析[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07(2)
- [4] 高丙中.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 [5] 张永和. 赌咒发誓被异文化认同之可能[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4)

(责任编辑 南山)

## 《西游记》情爱世界与游戏世界的同构

丰 竞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精心构建的情爱世界充盈着饱满的游戏精神,情爱与游戏在主体的身份与装扮、目的与规则、情感与过程上形成了自然的重叠与交叉,不仅使游戏成为推动情节发展、丰富人物个性的重要元素,也使作品的情爱世界充满了温馨与和谐,使情爱世界与游戏世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关键词]** 情爱; 游戏; 装扮; 规则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67-04

作为一部优秀的魔幻小说,《西游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鬼妖魔争杀抢斗的魔幻世界;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温馨质朴,但又或令人哑然失笑,或令人唏嘘感伤的情爱世界。这个情爱世界既现实,又浪漫,为光怪陆离、变化莫测的魔幻世界增添了儿童生活的游戏性和现实生活的世俗性,是作品之所以高于其他魔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人性化特征。

游戏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成人眼里,游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不成熟”行为,而事实上,不只是儿童,成人甚至某些动物也不乏游戏行为。目前,虽然学术界对游戏还没有一个完整确定的定义,但在游戏性质的研究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自主性、灵活性、非真实性和规则性。魔幻小说以其狂欢式的想象,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具对现实的超越,因而也更具有自由性、非真实性和游戏性。作为一部优秀的魔幻小说,《西游记》一定充盈着饱满的游戏精神,其情爱世界中的游戏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异彩纷呈。

### 一、游戏主体外貌和情感亦真亦假

一般游戏的主体多以甲乙双方的模式为主,《西游记》中游戏主体的关系多种多样,有人与人的(渔翁与樵夫)、人与妖的(唐僧与诸妖)、妖与妖的(孙悟空与红孩儿)、妖与仙的(下界妖魔与上界

神仙)、兄弟间的(孙悟空与猪八戒)、师徒间的(唐僧与其徒)和男女间的(猪八戒与蜘蛛精)等等,而未婚或已婚的男女双方的游戏主体,则体现出了与其他人物关系不同的亦真亦假的独特模式,这类游戏可称为社会戏剧性游戏。与建构性游戏(搭积木)不同,社会戏剧性游戏有很强的装扮性。

一般的社会戏剧性游戏,其主体双方都是装扮的,双方情感也都是非真实的,即双方的条件相同,加之规则和目的是公开的,所以,游戏是平等和公平的。《西游记》中游戏的主体则比较复杂,可以是双方装扮的,也可以是一方装扮的,但至少有一方要以真实的情感参加,这就使游戏带有欺骗性和不公平性。装扮一方,即欺骗一方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可以貌假情真、貌真情假,也可以貌假情假,总之,在貌与情上,至少有一个元素不是真实的,这就说明《西游记》中的游戏,除具备了一般意义上的游戏的非真实性之外,还带有很强的欺骗性和不公平性。

#### 1. 双方貌假情真

这类游戏的主体双方貌皆假,但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变化而成的,且都以真情投入到游戏当中,所以,这类游戏不存在作弊行为,与儿童的装扮性游戏最为接近,因而最诙谐,也最富有情趣。在师徒四人中,猪八戒最需遮丑,常常不敢以真相示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丰 竞,女,内蒙古包头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人,需要变化或装扮;而面对女性时,他的内心又最为真情,极少防备,所谓“貌假情真”,所以,此类游戏的参加者非猪八戒莫属:

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萨,在这里洗澡哩。也携带我和尚洗洗,何如?”那怪见了,作怒道:“你这和尚,十分无礼!我们是在家的女流,你是个出家的男子。古书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你好和我们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气炎热,没奈何,将就容我洗洗儿罢。那里调甚么书担儿,同席不同席!”呆子不容说,丢了钉钯,脱了皂锦直裰,扑的跳下水来。那怪心中烦恼,一齐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势极熟,到水里摇身一变,变做一个鲇鱼精。那怪就都摸鱼,赶上拿他不住;东边摸,忽的又渍了西去;西边摸,忽的又渍了东去;滑托龛的,只在那腿裆里乱钻。原来那水有挽胸之深,水上盘了一会,又盘在水底,都盘倒了,喘嘘嘘的,精神倦怠。”(第七十二回)<sup>[1](P.656)</sup>

这段叙事中,游戏主体一方为蜘蛛精变化的七个美女,一方为猪八戒变化的鲇鱼,双方形貌皆假,但情却是真的:作为女性,蜘蛛精一心要捉住这条有辱女性自尊的鲇鱼精,而作为男性的鲇鱼精只在戏弄对方,消解其士气,当然也包含了对于异性的挑逗。这类追逐打闹的动作型游戏,要求游戏一方能够准确猜测对方的位置和意图,然后采取突然的、出其不意的动作来逃避或抓住对方,可以说,猪八戒在这场游戏中,动作灵敏,判断准确,表现得非常出色。这场游戏除了以捉迷藏的形式展开,充满了情趣之外,还在一方的美与另一方的丑、一方的认真紧张与另一方的惬意轻松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而产生了滑稽性的喜剧效果。

### 2. 一方貌真情假,一方貌假情真

这类游戏中,因为一方貌真情假,而情真的另一方很难看出对方的假情假意,所以,这类游戏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西游记》中,这类游戏的最佳参与者是唐僧,因其为师徒四人,乃至取经途中最为貌美的一位,且又不善变形,因此不需、也不能变化其形貌,而游戏的另一方则多为真情而多情的女性。身为师父的唐僧不仅满腹经纶,而且演技极佳,与孙悟空不相上下:

三藏道:“谢娘子指教。其实贫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个红桃。妖精也去摘了一个青桃。三藏躬身将红桃奉与妖怪道:“娘子,

你爱色。请吃这个红桃,拿青的来我吃。”妖精真个换了,且暗喜道:“好和尚啊!果是个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这般恩爱也。”那妖精喜喜欢欢的,把唐僧亲敬。这唐僧把青桃拿过来就吃。那妖精喜相陪,把红桃儿张口便咬。……妖精害怕,对三藏道:“长老啊,这个果子利害。怎么不容咬破,就滚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开园的果子爱吃,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撵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吃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第八十二回)<sup>[1](P.747)</sup>

这段叙事中,唐僧与金鼻白毛老鼠精变化的美女进行了一次波起澜伏的言语对答。他机智沉稳,一口一个“娘子”,与鼠精对答如流,俨然一位温柔慈爱、体贴入微的丈夫,最终以出色的演技骗得妖精吃下了那颗孙猴子变化的红桃,并以机智的回答打消了鼠精所有的疑虑。类似这样出色的表演,文中还有很多,如第五十四回中,为了拿到通关牒文,唐僧与西梁国女王“同登凤辇,并肩而坐”,使女王对这一段姻缘坚信不疑。

### 3. 一方貌假情假,一方貌真情真

因一方貌假情假,另一方貌真情真,所以这是一类最具欺骗性,也最具戏剧性的游戏形式。这类游戏的主角(貌假情假的一方)不仅要有很好的表演素质,还要有良好的口才和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因此,这类游戏比其它游戏具有更强的悬念感和紧张感。在《西游记》中,善变化,又智勇双全的孙悟空必然成为这类游戏中的主角:

两人谦谦讲讲,方才坐下巡酒。大圣不敢破荤,只吃几个果子,与他言言语语。酒至数巡,罗刹觉有半酣,色情微动,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将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圣假意虚情,相陪相笑;没奈何,也与他相倚相偎。……

大圣见他这等耐然,暗自留心,挑斗道:“夫人,真扇子你你收在那里?早晚仔细。但恐孙行者变化多端,却又来骗去。”罗刹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个杏叶儿大小,递与大圣道:“这个不是宝贝?”大圣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道:“这些些儿,怎生扇得火灭?……怕又是假的。”(第六十回)<sup>[1](P.550)</sup>

孙悟空的表演比唐僧更放得开,他不仅大胆,



而且多疑,很符合猴子的物性。

《西游记》中还有一类在真实夫妻间展开的情感游戏。主体双方不需装扮,但其中一方以谎言诓骗对方,以达到某种目的,加之没有装扮,因此这类游戏情感成分较多,游戏成分较少,如第二十九回,百花公主诓骗丈夫黄袍怪放走唐僧,第七十回金圣宫帮孙悟空骗走金毛猿的紫金铃等。与金圣宫一心要离开妖魔,回到朱紫国国王身边不同,百花公主与黄袍怪早有前世姻缘,下凡后,他们相亲相爱,并育有两个孩子,但百花公主思念父母,放走唐僧,让其为自己传递家书的举动,虽然最终达到了与父母相见的目的,但却付出了孩子被沙僧、八戒摔死和夫妻分离的代价,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伤感的爱情故事。

## 二、游戏内容复杂独特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西游记》中的游戏,必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游戏,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的区别。

### 1. 游戏目的隐秘

一般意义上的游戏要求游戏目的公开,但是,《西游记》中的游戏目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隐秘性,如猪八戒的贪恋美色,唐僧的脱身、护住“真阳”,以及孙悟空的解救师父、骗取宝物等,这些目的是绝对不能让游戏对方知道,甚至察觉的。知情的装扮的一方,是设计游戏环节,主导游戏进程的主角,而另一方因为不知情,所以只是配合主角,实现其隐秘的目的。这样,游戏一方的“作弊”行为,决定了主体双方的不平等性和游戏竞争的不公平性。所以,当游戏结束时,常常是主角达到了目的而得意忘形,而配角发现自己受骗后,或伤心失落(如五十四回中愿以一国之富、一国之君送与唐僧的西梁国女王),或恼羞成怒:

大圣闻言,切切记在心上。却把扇儿也噙在口里,把脸抹一抹,现出了本像。厉声高叫道:“罗刹女!你看看我可是你亲老公!就把我缠了这许多丑勾当!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见是孙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尘埃,羞愧无比,只叫:“气杀我也!气杀我也!”这大圣,不管他死活,摔脱手,拽大步,径出了芭蕉洞。正是:无心贪美色,得意笑颜回。(第六十回)<sup>[1](p.550)</sup>

牛王切齿道:“猢猻那厮去了?”罗刹捶着胸膛骂道:“那泼猴赚了我的宝贝,现出原身走了!气杀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

心焦。等我赶上猢猻,夺了宝贝,肅了他皮,锉碎他骨,摆出他的心肝,与你出气!”(第六十回)<sup>[1](p.551)</sup>

此回中,孙悟空装扮成牛魔王,与铁扇公主情意缠绵地秀了一场夫妻恩爱,这与第八十一回中,他假扮小和尚戏弄吃人的金鼻白毛老鼠精有很大的不同,确有不顾兄弟礼仪、欺辱朋友之妻和骗取朋友宝物之过,因此,作者着力描写了铁扇的羞愧无比和牛王的暴跳如雷。

### 2. 游戏方法灵活

与邪恶的妖魔博弈,游戏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随机应变成为取经人在游戏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猪八戒的游戏以贪恋女色为目的,因此,他的游戏方法主要是在女性面前表现得温柔体贴、斯斯文文,但常常因为把持不住而胡言乱语,丑态百出。

唐僧的游戏目的是脱身和护住“真阳”,因此,面对不同的女性,他会审时度势,灵活变化游戏方法。在一开始情况不甚危急时,面对女性的以情相邀、投怀送抱,唐僧最常用的方法是装傻,如第二十三回中,当黎山老母扮演的老妇人向师徒四人提出招赘之事时,唐僧“推聋妆哑”、“如痴如蠢”、“好便是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sup>[1](p.201)</sup>但是,当唐僧被女妖所困时,“装傻”这一招就行不通了。在第六十四回中,面对树精,唐僧先以诗与之对和,这是古代文人中流行的一种文字游戏。在游戏中,唐僧雅兴大发,甚至面露得意之情。但当树精以色相诱时,唐僧一改先前的和颜悦色,转而义正辞严,高声喝斥,吓退树精;而当遇到比树精更加邪恶的妖魔而难以脱身时,他又能迅速进入角色的扮演之中:

那怪将一个素馍馍劈破,递与三藏。三藏将个荤馍馍囫囵递与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么不劈破与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荤。”那女怪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荤,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邓沙馅?”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马行迟。”(第五十五回)<sup>[1](p.502)</sup>

唐僧不动声色,与蝎子精暗语周旋,拖延时间,不仅骗过了妖魔,甚至连孙悟空都“恐怕师父乱了真性,忍不住,现了本相”。正因为唐僧在游戏中能够随机应变,变换对策,所以能一次次配合孙悟空,得以脱身。

孙悟空的游戏目的是打败对手,获取宝物,解

救师父,游戏难度最大。虽然与唐僧一样,孙悟空的游戏也偏重于智力型。但与唐僧不同的是,他更善于察言观色,胆大心细,但有时自吹自擂,炫耀自己,有时又贼喊捉贼,贬损自己,甚至背离纲常,抛弃兄弟之谊,可谓不择手段。

### 3. 游戏规则严谨

准确把握角色的音容与心理,符合角色的身份与性格,是《西游记》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如果主角没有严格遵守游戏规则,目的将不能达到,应该说,唐僧师徒四人都很好地遵守了这一游戏规则,这取决于他们的机智与演技,尤其是孙悟空,他扮演的主要是夫妻中的一方。夫妻间彼此了如指掌,因此,不露破绽,不让对方察觉到一丝一毫的异常,实在不易:

那怪果先解衣上床。行者忽然叹口气,道声:“造化低了!”那怪道:“你恼怎的?造化怎么得低的?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行者道:“不是这等说。今日我的父母,隔着墙,丢砖料瓦的,甚是打我骂我哩。”那怪道:“他打骂你怎的?”行者道:“他说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门下一个女婿,全没些儿礼体。这样个丑嘴脸的人,……”那怪道:“我虽是有些儿丑陋,……我以相貌为姓,故姓猪,官名叫做猪刚鬣。他若再来问你,你就以此话与他说便了。”(第十八回)<sup>[1](p.161)</sup>

在这段描写中,孙悟空准确把握了高小姐不甘嫁给丑陋的妖魔,使家门受辱的心理,对猪八戒采取了“诉苦”和“嗔怪”的语言策略,让他如实交待了自己的住址与身份,为其后来降服八戒打下了基础。在主体双方为夫妻的假扮游戏中,读者的阅读心理最为紧张,担心由于假扮方的演技不到位,而使整个计划落空。所以,游戏规则的严谨性,给故事情节的发展增加了紧张和悬念。

### 4. 游戏过程幽默

与一般游戏一样,《西游记》中的游戏也具有娱乐性的特点,但其中不乏“戏弄”的成分,即恶意用某种动作来取乐对方,带有幽默和玩笑的性质,如第七十二回中,孙悟空变作老鹰,把正在沐浴的蜘蛛精的衣服偷走,并以此诱惑猪八戒欢天喜地地去打杀蜘蛛精,这段游戏中,既有孙悟空对猪八戒的戏弄,又有猪八戒对蜘蛛精的戏弄。在《西游

记》中,作为一号丑角,猪八戒常常成为被戏弄的对象:

那呆子顶裹停当,道:“娘,请姐姐们出来么。”他丈母叫:“真真、爱爱、怜怜,都来撞天昏,配与你女婿。”只听得环珮响亮,兰麝馨香,似有仙子来往,那呆子真个伸手去捞人。两边乱扑,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来来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动,只是莫想捞着一个。东扑抱着柱科,西扑摸着板壁。两头跑晕了,立站不稳,只是打跌。(第二十三回)<sup>[1](p.206)</sup>

以黎山老母为首的四圣一方貌假情假,与另一方貌真情真的猪八戒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撞天昏”,类似于儿童游戏中的“躲猫猫”,但这场游戏并不公平,明显存在着四圣对于八戒的戏弄。又如:

那怪不识真假,走进房,一把搂住,就要亲嘴。行者暗笑道:“真个要来弄老孙哩!”即使个拿法,托着那怪的长嘴,叫做个跌。漫头一料,扑的攢下床来。(第十八回)<sup>[1](p.160)</sup>

“戏弄”通常包括言语戏弄和动作戏弄,孙悟空假扮高小姐对猪八戒的戏弄使两人的情爱世界充满了幽默滑稽的喜剧元素。所以,与一般意义的游戏相比,《西游记》的游戏显得内容更丰富、更复杂,也更具有艺术性。

明清的一些小说,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虽也有男女情爱世界的描述,但这些世界更多地被政治、战争、凶杀以及伦理道德的说教所充斥,显得冷酷乏味。而《西游记》中饱满的游戏精神,不仅为苦闷、孤独的取经人带来了轻松和快乐,使他们在艰辛、凶险的取经道路上情绪得以暂时的释放,同时也为作品中的情爱世界注入了温馨与和谐,使这部魔幻作品闪烁着世俗与人性的光辉,让我们在责任与自由关系的思考中获得启迪。

###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南山)

# 郁达夫旧体诗研究百年史述

蒋成德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 江苏徐州 221111)

**[摘要]** 关于郁达夫旧体诗的研究,几乎与其创作同步,已有100年历史。这100年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从1914年创作伊始到1945年郁达夫殉难为第一个时期,从1946年纪念郁达夫逝世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为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为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结束为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改革开放到2014年整百年止为第五个时期。每一个时期由研究的程度与范围又分为若干类。这100年中,郁达夫旧体诗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其文学创作的小说、散文鼎足而三。概括总结100年来郁达夫旧体诗研究的经验与局限,可以为未来的郁达夫旧体诗研究明确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 郁达夫; 旧体诗; 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 I2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71-12

郁达夫虽以小说闻世,却以诗词起步。他九岁即已题诗,现在看到的他最早的诗是写于1911年的《咏史三首》,先于其小说创作十年,发表于1915年上海的《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此后他一直作诗不辍,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为我们留下了600余首诗词。若从1914年其嫂陈碧岑寄其诗作为对诗评论的开始,那么,对郁达夫诗词研究也已整100年了。这100年间,仅就其诗词评论文章有500余篇,虽不及论小说、散文之多,也已相当可观,且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纵观郁诗研究的100年,可分为五个阶段,现作综述,以见其貌。

## 一、第一个时期(1914年—1945年)

这一时期为其逝世前的30年,评文不多,含和诗赠答仅二十来篇,可分为三类。

### 1. 寄赠类

有陈碧岑的《寄怀达夫弟》(七绝二首),载1916年2月9日杭州《全浙公报·杂货店·诗选》;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35年5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集外集》;潘正铎《水调歌头·槟城喜遇郁达夫先生,慨话杭州》,载1939年2月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15期;李铁

民《西浪作诗为达夫先生贤伉俪睦承索步韵因作》(七律)、胡迈《赠达夫先生步西浪原韵》(七律)、一泓《西浪赠达夫伉俪,铁民贺之邀同作》(七律)、绯燕女士《赠郁达夫先生》(七律附言)、贞《赠达夫先生和西浪兄原韵》、陈宗《赠郁达夫先生步西浪原韵》,以上6篇皆刊于1939年6月1日、3日、5日、6日、12日新加坡《星中日报·星宇》;广勋《赠呈达夫先生》(七绝四首),载1940年4月2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梦蕉《喜晤郁达夫同仁》(七律),载1941年11月1日上海《小说月报》第2卷第2号;王云《赠郁达夫》(七绝),载1942年3月1日《小说月报》第2卷第6号;若瓢《吉祥草——怀郁达夫》(七绝四首),载1943年11月1日《万象》月刊第3卷第5期等。

1913年9月,郁达夫随兄郁华赴日留学,其嫂陈碧岑同行。一年后兄嫂回国,郁达夫少小离家,自觉“变成了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海上——自传之八》),故陈碧岑于这年冬作《寄怀达夫弟》二首,表达兄嫂对他的思念之情,“犹忆当年同作客,哪知今日独思君”,并期望“小屏红烛”之日,再“相将斗句理盘餐”。以诗寄怀,虽非论诗,却体现了

**[收稿日期]** 2015-01-06

**[作者简介]** 蒋成德,男,江苏阜宁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叔嫂之间的手足之情<sup>[1](P.11)</sup>。

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最为人们所熟知,其为鲁郁两人研究的热点。1934年的中国,社会矛盾复杂,政治斗争尖锐,郁达夫为避祸,遂移家杭州,鲁迅即写诗劝阻他,告知他杭州并非桃园乐土,钱武肃王的酷政尤在,劝他效屈大夫,于“风波浩荡”中,亦足堪行吟。惜郁达夫未听劝阻,遂致后来的家庭悲剧。鲁迅的诗表达了他对战友的关注,当时并未发表,后收入《集外集》,这是关于郁达夫的一篇非常重要的作品,并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郁达夫研究的大门。

继鲁迅的赠诗之后,1939年郁达夫为抗战到新加坡,由于发表《毁家诗纪》而致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婚姻危机,郁达夫的友人李西浪作诗《柬达夫伉俪》:“富春江上神仙侣,云彩光中处士家。十载心香曾结篆,少陵诗笔动悲茄。鸾笺应画双飞燕,血泪遍浇并蒂花。留得千秋佳话在,一杯同祝爱无涯。”<sup>[2](P.223)</sup>此诗遂引来大量和诗赠郁,新加坡《星中日报·星宇》于1939年6月连日发表,成为一时之盛。这些诗旨在劝和,如潘寿的“看到波生方爱水,折来刺在更怜花”<sup>[3]</sup>,温婉含蓄,深意内藏。这些诗都体现了友人对郁达夫真挚的关心之情。此外,则为一般的相赠,如广勋《赠呈达夫先生》,梦蕉的《喜晤郁达夫同仁》等。

## 2. 次韵类

这是郁达夫有诗作,而他人步其韵的诗。最早即是胡浪华的《无题——次郁达夫韵》(七律),发表于1915年8月8日上海的《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胡浪华是郁达夫留日时的同学,两人相交甚深,初次相见,“便‘论诗多时’,浪华示以《远游》一诗,达夫则以‘元旦作断句’回报”<sup>[4]</sup>。胡浪华的这首次韵诗,今仅见题,未知内容。

1936年,郁达夫有一首《醋鱼》的七绝,曾引得看云楼主和半上流的唱和。而唱和之盛当是在郁达夫1939年初到新加坡写的一首诗,以至“和者如云”<sup>[5](P.185)</sup>,极一时之盛。这些和诗,虽非对郁诗的评价,但带动了原本文化就比较落后的南洋诗词创作的高潮。

## 3. 介绍类

郁达夫生前没有把他的诗结集出版,只是零零散散地发表于一些报刊上,因其在文坛上有盛名,所以就有一般介绍其诗的文章,如青龙《郁达夫喜作旧诗》,载1932年11月12日《申江日报·

江声》;无名作者的《郁达夫的应酬诗》,载1934年4月3日北平《东方快报·大观园》;爱悌《郁达夫之近诗》,载1936年4月15日《东南日报·小筑》第156期;梦笔《达夫的诗》,载1939年5月27日新加坡《总汇报新报》;张祥沅《达夫与金缕曲》,载1944年1月1日杨之华编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文坛史料》“文坛逸话”栏等。

上述三类诗文,都还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但郁诗的研究却是由此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 二、第二个时期(1946年—1949年)

这是郁达夫逝世后的几年,时间虽短,但所出文章已与前三十年相当。

### 1. 怀吊类

郁达夫遇难后,最先出现的是怀吊悼念他的诗作,如风夫婿(郁风苗子)《读达夫杂忆诗,即用原韵诗以悼之》(七律十一首),载1946年1月1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第105号第4版。其后则有冰人《挽郁达夫——即依杂忆原韵》(七律八首),载1946年7月4日曼谷《中原报·万象》第11版;紫荷《吊达夫》,载1948年11月19日曼谷《中原报·万象》第230期等。

### 2. 介绍类

怀吊之诗出现后,介绍郁达夫诗的文章也陆续发表。有梅平《郁达夫近诗》,载1946年4月1日北平《东方快报·大观园》;无作者名的《郁达夫最后遗诗》,载1946年5月5日《消息》半周刊第9期;大白《达夫的诗》,载1946年5月28日、29日《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无作者名的《郁达夫的旧诗》,载1946年10月1日《青年文化》第2卷第1期;妙手《郁达夫的诗》,载1947年11月24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妙手《再谈郁达夫的诗》,载1948年4月10日《新民晚报·夜光杯》;伊《郁达夫的诗》,载1948年4月30日曼谷《中原版·万象》第176期;鸿瑞《郁达夫词》,载1948年10月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等。

### 3. 序论类

随着对郁达夫诗词研究的深入,这时已由一般性的介绍进入到较深的研究的层面。这方面的文章有:丹林《郁达夫的诗词》,载1947年12月2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郑子瑜《〈达夫诗词集〉序》,载1948年5月1日《文潮月刊》第5卷第1期;黎辛《郁达夫的诗》,载1948年8月9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柳风《论郁达夫的诗》,载

1948年9月3日《星洲日报·星云》；陆丹林《郁达夫的旧体诗》，载1948年9月14日曼谷《中原版·万象》第213期；金密公《郁达夫遗诗辑序》，载1948年12月1日上海《永安月刊》第115期等。

上述三类，尤其是第三类，显然是真正研究性的文章了，且多集中于郁达夫晚年生活过的新加坡。在研究者中，郑子瑜其后更成为郁诗研究的一位大家，陆丹林先生因亲手发表过郁达夫的《毁家诗纪》，与郁有诗唱和，故对郁诗颇有心得。

### 三、第三个时期(1949年—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前的十几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郁达夫虽被追认为烈士，但对其研究仍是寥寥，于诗就更少，唯新加坡、香港、台湾略多一些，共三十余篇，亦可分为几类。

#### 1. 辑佚类

郁达夫一生作诗很多，但从未结集，散失很多。故欲研究郁诗，辑佚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这方面的文章有：李冰人《郁达夫的遗作和佚诗》，载1955年7月11日—1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郑子瑜《郁达夫遗诗续辑》，载1957年11月香港《文艺世纪》11月号；李冰人《再谈郁达夫的佚诗》，载1959年7月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江郎《郁达夫佚诗钩沉》，载1960年1月8日新加坡《南方晚报》；天石《郁达夫的一首集外诗》，载1961年4月1日《雨花》第4期；郑子瑜《郁达夫遗诗的再发现》，载1961年4月27日、5月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许乃炎《郁达夫遗诗一首》，载1965年5月1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方江水《郁达夫遗诗又一首》，载1965年5月2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徐克弱《新见的郁达夫诗》，载1966年2月26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等。

辑录佚诗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还时有郁诗的发现。

#### 2. 释《阻》类

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这个时候开始，既是鲁迅研究的一个课题，也是研究郁达夫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关的文章如：吴木《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56年10月15日《文汇报》19号“轶闻集锦”栏；日本松枝茂夫《〈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译注》，载1956年10月7日岩波书店版《鲁迅全集》第12卷；张向天《〈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注》，载1959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鲁

迅组诗笺注》；周振甫《〈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注》，载196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鲁迅诗歌注》；钱璁之、马莹伯《诗·哲理·座右铭——读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62年9月15日《光明日报·东风》等。

这些译注、解释鲁迅的诗是后来研究郁达夫的一个很特别的门类，它是鲁诗之论，而非郁诗之评，但由此可知鲁郁的关系，以及郁达夫的性格与思想。

#### 3. 赏析类

这一时期对郁达夫的诗由单篇到组诗的赏析逐渐多起来，文章有：南宫博《谈郁达夫〈毁家诗纪〉》，载1954年6月7日香港《新希望周刊》复刊第15号；蕓蒲《郁达夫诗词六首选析》，载1958年1月1日、16日《乡土》第2卷第1、2期；蕓蒲《郁达夫爱国诗选》，载1962年9月18日《光明日报·东风》；冰心《郁达夫〈满江红〉词读后》，载1962年9月29日《光明日报·东风》等。这里所谈及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满江红》都成为后来郁诗研究的重点，此处仅开了个头。

#### 4. 序论类

这一类的文章在这一时期不仅比较多，约有二十余篇，且有相当的深度。郭沫若、郑子瑜的文章提高了郁诗研究的水准。这里列举几篇比较重要的有：远观《读郑编〈达夫诗词集〉后》，载1954年《南洋青年》新第11期；郑子瑜《谈郁达夫的南游诗》，载1956年6月新加坡《南洋学报》第12卷第1期；日本服部靖《郁达夫的诗》，载1957年7月日本《中国古典诗》第1卷第3号；陆丹林《〈郁达夫诗词抄〉编者前言》，载1962年8月香港上海书局初版《郁达夫诗词抄》；郭沫若《望远镜中看故人——序〈郁达夫诗词抄〉》，载1962年8月4日《光明日报·东风》；孙凌《〈郁达夫诗词汇编〉序》，载1962年10月台北《反攻》月刊第248号；黄苗子《郁达夫的诗》，载1962年10月8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第10版；郑子瑜《郁达夫旧诗研究》，载1963年10月郑子瑜著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东都习讲录》等。

郁达夫的诗由辑佚到汇集出版，这对全面研究郁诗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而序文则是提要钩玄之论。郭沫若是郁达夫留日同学，又共同组建创造社，两人相知之深，无人过之。故郭沫若的序有许多乃是郁诗研究的经典之论。郭沫若首先

指出郁达夫诗文风格的清丽是受到他所生活的故乡富阳“这种客观环境”和“清代的诗人黄仲则”的影响。然后对他的诗作出总体的评价,郁达夫做旧体诗“已经做到了可以称为‘行家’或者‘方家’的地步”,“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他的小说笔调是条畅通达的,而每每一泻无余;他的旧诗词却颇耐人寻味”。他的诗“大都是经心之作,可作为自传,亦可作为诗史”。<sup>[6]</sup>这虽是印象式的,却是非常深到的知人知诗之论,常为后之郁诗研究者所称引。郑子瑜先生可以说是早期郁达夫诗词研究的一位开拓者,他不仅辛勤地辑佚郁诗,編集郁诗,更有精心的研究之作。他的《谈郁达夫的南游诗》开启了后来郁达夫南游诗主题研究之先例。在这篇文章中,郑子瑜介绍了自己编的《达夫诗词集》所收郁达夫三十余首南游诗,认为郁达夫的南游诗最值得称颂的是那些“对于国家的兴亡之感”的诗。这些诗篇“有时表现着磅礴的气概,有时却又无限的感伤和颓唐”。对流亡时期的《乱离杂诗》十一首,郑先生认为:“《乱离杂诗》是达夫先生生平最佳的诗作,用典切当,笔调清新,文情并茂。从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更可以看出他在感伤凄楚之余,也有严肃、悲愤、慨慷之致。至各章所流露出来的家国之思,乡园之感,尤足以动人肺腑。”郑先生的评论指出了郁诗感情上的矛盾性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在《郁达夫旧诗研究》一文里,已是粗具规模地综论郁达夫的诗词了,郑先生认为:郁达夫杂诗,“写作年代已不可考,但从诗的工力未深,且多摹仿唐人诗句这两点看来,大约当是早年的习作”。这一论断大致是对的,郑先生又把郁达夫的诗结合他的小说、他的生活与思想来研究,揭示出郁诗“全部作品中间那种忧抑而又痛愤的基本情调”。在这篇论文里,郑先生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达夫的旧诗,受宋人的影响最深。”这成为他后来一系列郁诗研究论文的基本观点。郑先生进一步指出郁达夫受宋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与宋朝有若干仿佛之处。但宋诗主说理,达夫诗却以道情取胜。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宋代诗人,喜欢以文入诗,这就正合达夫的脾胃了。但平心而论,郁达夫的诗,无论从那一角度来看,都比宋诗要好得多……若说达夫有心要摹仿宋人,那就未免太小看达夫了。”<sup>[7]</sup>为证明这一观点,他后来又作长文考证,却引起于听、刘麟、詹亚园等人的考辨。郭沫若、郑子瑜的文章为郁诗全面

深入的研究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这一时期的郁诗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除大陆之外,香港、台湾、日本皆有作者加入,而以新加坡的研究者为最多。由于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晚年客居新加坡,故这两个地方后来成为郁达夫研究的重镇。

#### 四、第四个时期(1966年—1976年)

这一时期,大陆在轰轰烈烈搞“文化大革命”,一切学术活动都已停滞,唯香港、台湾与日本、新加坡的郁诗研究还在继续,总量虽少,仅二十余篇,但颇有佳作。以类来分可有几个方面。

##### 1. 辑佚类

郑子瑜《郁达夫遗诗的新发现》《郁达夫早年的诗》《郁达夫遗诗》,载1968年8月香港编译社出版《青鸟集》;郑子瑜《〈星洲日报〉及日本所见郁达夫的佚诗》,载1973年1月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冯永材《郁达夫情诗选辑》,载1976年4月台北《中外杂志》第19卷第4号等。

##### 2. 释《阻》类

江天《〈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解》,载1974年香港文教出版社《鲁迅诗新解》;姜添《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76年12月香港集思图书公司《现代中国作家选论》等。

##### 3. 介绍类

日本稻叶昭二《大正丙辰丁巳郁文诗》,载1969年2月日本《龙谷大学论集》第388号;又《郁文诗——第八高等学校时代》,载1969年5月21日《龙谷大学论集》第389、390号合刊;何勇仁《我怎样与郁达夫交往及读其诗》,载1970年3月香港《文坛》第117号;陈竹七《郁达夫的旧诗》,载1971年2月28日台北《浙江月刊》第3卷第2期;周新邦《郁达夫其诗其遇》,载1972年3月台北《中国诗季刊》第3卷第1期;汪洋《从胡适与郁达夫谈到旧体诗》,载1972年4月香港《春秋杂志》第354期;日本稻叶昭二《郁达夫的留学生活与他的诗——〈沉沦〉的完成》,载1974年日本《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语言论文集》;日本加藤诚《关于郁达夫的旧诗》,载1976年4月30日、1977年8月1日日本《野草》第18期、20期等。

稻叶昭二是日本的一位研究郁达夫的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推出了郁达夫研究的专著《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这里的几篇介绍性的文章让人们了解到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与诗歌

创作的情况。

#### 4. 序考类

胡秋原《刘心皇编〈郁达夫诗词汇编〉序》、刘心皇《〈郁达夫诗词汇编〉编者序》，载1970年9月刘心皇编台北学林出版社《郁达夫诗词汇编》；胡秋原《刘编〈郁达夫诗词汇编〉序》，载1971年3月8日台北《中华杂志》第3卷第9号；郑子瑜《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载1971年1月1日新加坡《南洋商报》等。

由于郁达夫受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影响比较大，这个时期出现了郁黄比较的文章，有陈仰云《郁达夫与黄仲则两人诗的欣赏》，载1970年6月台北《建设》第19卷第1期；陈仰云《郁达夫与黄仲则》，载1971年9月台北《中国诗季刊》第2卷第3期，又载1976年8月台湾《夏声》第141期。三篇一人，内容相同，其意义在于为下一时期开启了比较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文章以郑子瑜的《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最为重要。郑子瑜为了证明他的“达夫的诗受宋人的影响最深”这一观点，就在这篇长文里考证了郁达夫四十余首诗与宋诗之关系，如说郁达夫的“他年归隐西湖去，应对春风忆建溪”（《题闽县陈贻衍氏西湖纪游画集》）出自苏轼的“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农家旧住西”（《次韵代留别》）；郁达夫的“满天明月看潮生”（《毁家诗纪》之一）出自苏舜钦的“满川风雨看潮生”（《淮中晚泊犊头》）；郁达夫的“十月清阴水拍天”（《游西湖岳坟》）出自陆游的“二月镜湖水拍天”（《吴娃曲》）等等。郑子瑜早在郁达夫生前即欲写这篇文章，1936年，郑子瑜“在厦门天仙旅社拜见郁达夫的时候，我告诉他有意写一篇题为《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的文字，达夫没有否认他的诗与宋诗有关缘，只是笑着说：‘什么时候大作写成了，请寄给我看一看。’”<sup>[8]</sup>（P.46），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写出来，郁达夫自然没法看到，也就无从说自己的诗与宋诗到底有没有“关缘”。郁达夫自己是推重唐诗的，认为“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致郁曼陀、陈碧岑信》），故尤喜“晚唐与元诗的艳丽”，并把它与“渔洋山人的神韵”“六朝的潇洒”作为诗的“三一律”<sup>[9]</sup>（P.351），独不及宋诗。所以到了后来，于听撰文与之辩，詹亚园、刘麟又撰《郁达夫诗出自唐诗考》。这一段考辨把郁诗的研究从一般性的介绍引到了真正研究的层面，提高了郁诗研究的水平，并使郁诗研究走向深入。

## 五、第五个时期（1977年—2014年）

这是郁诗研究最重要的时期，时间上占百年的三分之一长，数量上有三百多篇，作者众多，新人辈出，尤其是研究的方面宽了，层次深了，水平也更高了。前面所分的几类已远不能涵盖了。从这数百篇文章来看，起码可以分为八大类。

### 1. 释《阻》类

新时期的郁达夫研究是从解释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开始的。郁达夫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颓废文人”“黄色文艺大师”，在极左文艺思潮影响下，研究郁达夫是危险的。而鲁迅则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将，从鲁迅逝世以后，鲁迅研究在大陆就一直长盛不衰，且成为“鲁学”。鲁迅与郁达夫有着很深的友谊，30年代又共同加入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既是文友，更是战友。所以，研究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是研究郁诗、研究郁达夫最好的破冰之举。

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底，在大陆就已经出现了单演义的《两句诗看法的商榷——关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二四句的解说问题》，载1976年《杭州文艺》第5期，俞炎祖的《“憎健翻”“蔽高岑”备解》，载1976年《语文战线》第6期，这两篇文章，实乃春信之作。随后，1977年伊始，直到八九十年代，释《阻》之作，长作不辍，粗略统计有37篇之多。光有名的作者即有吴奔星（《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的理解》，载1977年5月20日《语文教学》第2—3期）、倪墨炎（《平楚日和憎健翻 小山香满蔽高岑——浅说〈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鲁迅旧诗浅说》）、赵景深（《读鲁迅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77年9月安徽阜阳市委宣传部鲁迅作品学习小组、安徽师大阜阳分校中文系编《鲁迅诗歌研究》上）、郁正民（《读鲁迅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有感》，载1978年3月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总第75期）、丁景唐（《关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的一些史实》，载1978年11月10日《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陈有雄、郑心伶（《有关鲁迅“阻郁”诗的若干问题》，载1979年《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钟敬文（《关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8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文丛》第2辑）、张紫晨（《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载1982年2月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鲁迅诗解》)、钦鸿(《〈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有关问题》,载1983年7月11日《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徐重庆(《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研究二题》,载1984年6月乌蒙师专《文科教学》第2期)、钱文辉(《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释句》,载1985年《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等。其中既有专家学者,也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形成了上下联动全面合围的研究格局。由研究鲁迅,也就很自然地开始了郁达夫诗词的研究。

## 2. 说《抄》类

郁达夫的诗,在其逝世后,新加坡的郑子瑜广收博辑于1948年6月在广州宇宙风社出版了《达夫诗词集》之后,香港的陆丹林又编了《郁达夫诗词抄》于1962年8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台湾的刘心皇也有《郁达夫诗词汇编》于1970年9月由台北学林出版社文艺月刊社共同出版。这几本集子或出版于解放前,或出版于港台,难为现时的大陆人所知。在解放后的大陆,周艾文、于听在50年代就开始收集郁诗,也名《郁达夫诗词抄》,拟于出版,郭沫若还为其写好了序文,早早即于《光明日报》发表。然直到1981年1月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诗494首,词11首,以及若干联帖与断句,较之郑、陆、刘的集子是收诗词最多的。(后又据此出《郁达夫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2月出版,收诗达600首)

周艾文、于听编的《郁达夫诗词抄》一出版就引起学术界重视,以及郁诗爱好者的极大关注,评说蜂起,一时之文,有二十余篇之多。或订误(张向天《〈郁达夫诗词抄〉订误》载1981年3月22日、23日香港《文汇报·笔汇·文史掌故》)、或简介(钟永水《〈郁达夫诗词抄〉简介》,载1981年3月25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或喜读(张春风《读〈郁达夫诗词抄〉》,载1981年3月25日香港《文汇报》“西窗闲话”栏、又鸣鹤《喜读〈郁达夫诗词抄〉》,载1981年4月20日《瞭望》第1期)、或校勘(盛巽昌《〈郁达夫诗词抄〉校勘补遗》,载1981年12月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12期)、或拾遗(尚文《郁达夫诗词补遗》,载1982年8月4日《福州晚报·兰花圃》)、或探谜(吴泰昌《〈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载1983年1月《百花洲》第1期)、或补正(胡迈《对〈郁达夫诗词抄〉的补正》,载1983年2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1期)、或感赋(王翼奇《〈郁达夫诗词抄〉感赋》,载1985年9月20日《杭州日报·花港》第67

期)、或抒感(严北溟《〈郁达夫诗词抄〉读后感》,载1986年4月《书林》第9期)、或赋诗(朱正《读〈郁达夫诗词抄〉》七律,载1987年3月28日《富春江》第2期)等等。

王翼奇读了郁诗,不禁“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认为郁诗在前后期风格是不同的。“他的青少年时代的诗,多是清新俊逸的绮怀丽句,而中年以后的诗,则更多的是沉郁苍凉的悲歌痛哭。”<sup>[10]</sup>胡迈先生是郁达夫在新加坡时的诗友,多有唱和。他的文章为《诗词抄》多处作了“补正”。如指出“芦花瑟瑟雁来时”一绝非郁达夫之作;“富春江上晚凉生”应为“富春江上暗愁生”;“大堤杨柳记依依”一律非南天酒楼饯别之作;“六陵遥拜冬青树”与“生同小草思酬国”两律应是作于同一时期,均为答李西浪所作《柬达夫伉俪》等等。<sup>[3]</sup>这些意见后来都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重出的《郁达夫诗全编》所采,或删、或改、或正之,为研究郁诗提供了信实之作。蒋寅的《〈郁达夫诗词抄〉斟补初录》以及《续录》分别发表于1983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与第4期。蒋寅据日本稻叶昭二先生的著作《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认为:这本书反映的“是郁达夫从18岁到28岁这10年留日期间的生活与诗歌创作”,它“将散乱的材料整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其中颇不乏精到的论见。尤为可贵的是,他吸收了最近发现的一些材料;而这些材料有些我国也未见。因此,这本书不少地方可补《郁达夫诗词抄》(周艾文、于听编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遗阙。”于是他在初、续录中对《诗词抄》中二十多首郁诗作了校补。如《晴雪园卜居》一诗,《诗词抄》系为1913年是错的,应作于1916年春天。《元日感赋》一首,《诗词抄》将之系于1914年不可靠,也应作于1916年,等等,大多是校正诗的写作系年。还有是补《诗词抄》之无的。如《日本竹枝词十二首》原本诗前有一则小序,而《诗词抄》没有。或正字误的,如《游人事山中,徘徊于观音像下者久之》,蒋寅指出“人事山”应为“八事山”,为了正讹,特致函询问稻叶先生。蒋寅的“斟补”,也多为后来的《郁达夫诗全编》所采。

正因为有多人对《郁达夫诗词抄》不辍地勘误正讹,才使得后出之《郁达夫文集》第10卷诗词(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郁达夫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郁达夫全集》第7卷诗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



郁诗集日臻完善,更加信实可靠。

### 3. 辑佚类

辑佚郁诗,自郁去世后,从未停止过。《郁达夫诗词抄》当郭沫若看到其初本时只有一百多首诗词,到80年代初出版时已是四百多首了。新一轮的拾遗补缺工作在《诗词抄》之后又已开始。

这类标题“新发现”的文章就有三十余篇,举其要者有:陈子善辑《郁达夫早期诗十五首》,载1981年10月《西湖》10月号;张苍《新辑得的郁达夫诗》,载1981年12月8日香港《新晚报》第11版;无作者名的《新发现的郁达夫早年的一首白话诗》,载1982年3月8日《星洲日报·文化》;单黎辑于听注《郁达夫佚诗三十首》,载1982年3月11日、4月23日香港《文汇报·笔汇》;陈松溪《郁达夫的一首佚诗》,载1982年4月9日《福州晚报·兰花圃》;龚重谟《郁达夫与汤显祖的一首佚诗》,载1982年10月31日《江西日报·星期天》第148期;尚文《郁达夫的佚诗三首》,载1982年7月18日《福州晚报·兰花圃》;马前卒《〈郁达夫诗词抄〉补遗》,载1983年2月21日新加坡《南洋商报·人文》;谷丰《郁达夫新诗一首》,载1983年6月25日《中州学刊》第3期;晨曦《郁达夫在福州的逸诗》,载1984年8月26日香港《文汇报·笔汇》;陈子善《新发现的郁达夫佚诗》,载1984年9月16日香港《文汇报·笔汇》;陈松溪《郁达夫为徐悲鸿题画及佚诗》,载1984年9月25日《福州晚报·兰花圃》;蒋寅《郁达夫佚文〈将之日本别海棠〉(有序)浅解》,载1984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辑;蒋寅《郁达夫逸诗二十一首》,载1985年4月《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钟敬文《达夫先生的一首佚诗——集龚句题〈城东诗草〉》,载1985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大地》;陈子善《新发现的郁达夫诗幅》,载1985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王维康《郁达夫在闽佚词一首》,载1985年9月18日《福建日报》“八闽·九州”第67期;周书荣《郁达夫“佚词”不佚》,载1985年9月25日《福建日报》“八闽·九州”;天逸《郁达夫的一首佚诗》,载1986年7月5日《北京晚报·广场》;铃木正夫《郁达夫的逸诗二首》,载1986年7月3日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60号;《郁达夫的佚诗一首》,载1986年11月30日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62号;陈松溪《郁达夫的两首佚诗》,载1987年2月2日《福州晚报·兰花圃》;郁云《郁达夫的两首逸诗和一副挽联》,载1987年2月8日《解放日

报·朝华》;钦鸣《新发现的郁达夫佚诗〈寄浪华南通〉》,载1990年9月5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陈松溪《新发现的郁达夫佚诗》,载1998年8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陈松溪《新发现的郁达夫墨宝和佚诗》,载1999年11月《郁达夫研究通讯》第16期;陈松溪《郁达夫四首佚诗的发现》,载2006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蒋成德《新版〈郁达夫全集〉未录之书信、日记与诗文》,载2012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等。

从上所录来看,《郁达夫诗词抄》出版后的几年,辑佚补遗的“新发现”之作相对比较,90年代之后逐渐减少,到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郁达夫全集》第7卷诗词已相当完备,基本已收录这些“新发现”而被考证了的郁诗。从辑佚者来看,陈子善、蒋寅、陈松溪几位先生在辑佚郁诗方面成绩显著。

陈子善在80年代初与王自立合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与《回忆郁达夫》两本书,为郁达夫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所辑佚诗不仅有旧体诗,还有郁达夫的一首德文诗。陈子善在《郁达夫的德文诗》一文中介绍了郁达夫的一首用德文写诗与郭沫若诗剧《女神之再生》的关系,抄录了已由郭沫若译成中文的诗,并说:“郭沫若对这首诗非常欣赏,认为‘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这首译诗未曾收集,而且很可能是郭沫若翻译的唯一的一首中国人写的外文诗。”<sup>[11]</sup>随后这首白话诗就被收入《郁达夫诗全编》,补充了郁达夫没有新诗的空白。

蒋寅因翻译《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与该书的作者稻叶昭二而有了联系,以此优势而得郁达夫在日本的一些诗。郁达夫的《将之日本别海棠》在《诗词抄》中原本没有序,标明的写作日期是1921年12月。蒋寅则补上了骈文的序及第一首所发表的时间和刊物:“这首诗及序刊登在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2月15日发行的月刊《雅声》第7集上。”并指出发表后的诗第五句“何堪北里苏中散”和尾联“此去乘槎消息断,不劳花底祝长生”与《诗词抄》的不同。蒋寅认为这个序与修改的诗句非常难得,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郁达夫当时思想与创作情况的新材料”<sup>[12]</sup>。蒋寅还从日文资料获得郁达夫21首佚诗,它们是《金陵怀古》《过易水》《村居杂诗》(四首)、《寄永坂石埭武藏》《寄小馆月海羽后》《看红叶雁寒韵》(二首)、《重阳日鹤舞公园看木犀花》《暮归御器所寓》《永坂石埭以留别

欧社同人诗见示即步原韵赋长句以赠》《野客吃梅赋此却之》《题山阳外史》《出晴雪园寄石埭》《丙辰中秋桑名阿谁儿雅集分韵得寒》《梦醒枕上作》。蒋寅对这14题21首诗均作了作年考证,并述及郁达夫与日本汉诗人之关系以及郁诗的诗风。对把握不准处,则存疑,如“‘山阳外史’未详,姑俟博雅者指点”<sup>[13]</sup>。可见其学术态度的谨严审慎。蒋寅于翻译了稻叶昭二的专著《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写作了四篇有关郁达夫的文章外,即转向中国古典文学(清诗)的研究,不再有关于郁诗的文章。

陈松溪于郁达夫诗文的辑佚非常辛勤,时有发现。其辑佚郁诗共有六篇文章,最近一篇是发表于2006年《出版资料》与《新文学史料》的《郁达夫四首佚诗的发现》。陈松溪说:“1992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全集》(诗词卷)收录其诗590首,词11阙,还有对联、断句、集句诗、新诗和德文诗等,可谓相当可观。但是,散珠难拣,难免仍有遗珠之憾。近十几年来,笔者先后搜集到的郁达夫佚诗共四首,都是上述《全集》未收录的,中日两国学者分别编的郁达夫《资料》和《年谱》亦均未记载,弥足珍贵。”这四首诗是:《渔夫泪》《弄潮儿歌》《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寄题龙文兄幼儿墓碣》。陈松溪对这四首诗分别作了考证,“为读者了解和研究郁达夫增加了新的文学史料,希望《郁达夫全集》再版时能补充编入,使这部全集更趋完整”<sup>[14]</sup>。但是,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郁达夫全集》时,第7卷为诗词只收录了后两首,《渔夫泪》《弄潮儿歌》没有收入。

关于郁达夫诗词的辑佚,到这一阶段,已大致完成,虽不排除可能还会有“新发现”,就现在所集的郁诗,应该是基本完备了。

#### 4. 考辨类

随着对郁诗的探佚,补遗,难免把非郁之诗收入,或还有其他问题,这样,一些辨误类的文章也就出现了。有马前卒《“妻太聪明夫太怪”的联句并非郁达夫所作》,载1982年12月7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商余》;张春风《郁达夫佚诗辑注评误》,载1983年2月26日香港《文汇报·笔汇》;铃木正夫《萧红书简辑存注释与〈郁达夫诗词抄〉的编集错误》,载1983年5月15日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40号;周书荣《“吉了”不是人名——读郁达夫的一首题画诗》,载1984年11月28日《福州晚报·兰花圃》;周书荣《郁达夫“佚词”

不佚》,载1985年9月25日《福州晚报》“八闽·九州”;陈子善《〈题徐悲鸿为王莹绘〈放下你的鞭子〉〉诗确系郁达夫的“佚诗”》,载1985年10月9日《福州晚报》;陈松溪《并非郁达夫的“佚诗”》,载1985年11月7日《福州晚报》第2版;于听《郁达夫“海外佚诗”辨证》,载1987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大地》;蒋祖勋《关于〈郁达夫旧体组诗笺注〉中几处注释错误的纠正与补充》,载1996年12月《富春江》文艺季刊总第21期;沈慧君《〈郁达夫诗词集〉中“春江钓徒”诗作者献疑》,载1997年5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等。

上述这些文章为郁诗正误,使郁诗更为精准。如顾鉴明的《误为郁达夫作的一首诗》即指出《郁达夫诗词抄》中《赠山本初枝氏》一诗之误:“隐隐江城玉漏催,劝君且尽掌中杯。高楼明月笙歌夜,知是人生第几回?”经查“此诗非郁达夫诗,而是明人张灵所作。张灵字梦晋,……曾写《对酒》一诗……张灵的这首诗与编入《郁达夫诗词抄》的《赠山本初枝氏》那首诗比较,只是‘须’换了‘且’,‘清’换了‘笙’,相差两字而已,显然这是郁达夫借用了张灵的诗赠给山本初枝的。”<sup>[15]</sup>这个意见即为后来的《郁达夫诗全编》与《郁达夫文集》第10卷的诗词,《郁达夫全集》第7卷的诗词所采,并予删除。

辨误文章之外,尚有一些文章对郁达夫诗词的出处进行考证,这要源自郑子瑜先生的《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前面已说过,郑子瑜先生认为郁达夫的诗受宋人诗影响很大,并作了考证。但此说并不为一些郁诗研究者所接受。詹亚园、刘麟各自撰写了《郁达夫诗出自唐诗考》,分别载2001年9月《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3期和2002年4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韩立平更直接与郑子瑜商榷,在2010年第1期的《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郁达夫旧体诗的取径——与郑子瑜先生商榷》。由这一诗的出处考而又有张均的《关于〈毁家诗纪〉第四首的考述》,载2002年11月《郁达夫研究通讯》第21期;赵颖《郁达夫南洋主题旧体诗考略》,载2013年第4期《理论界》。

詹亚园、刘麟、韩立平的文章正如其题是与郑子瑜先生的观点相反,认为郁诗乃出自唐诗,并列举出大量的例证,远多于郑所举之宋诗。詹文从多用唐人诗意、多用唐人成句、多仿唐诗句式、多用唐人诗“这四个方面对郁诗分别加以考察,以见郁诗对于唐诗的学习与继承”。在文章的结尾处又说:“著名学者郑子瑜先生是郁达夫诗词的研

究专家,他撰有一篇《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的论文,举出郁诗40余例,证以宋诗,说明郁诗出自宋诗。郑先生学力深厚,钩稽亦勤,从他的立场来论证郁诗出自宋诗,应当说不无道理。我们考证郁达夫诗出自唐诗,自然不是要与郑先生唱一次对台戏,相反的倒是受到了郑先生的启发,有意也来对郁诗来源作一次认真考察。”<sup>[16]</sup>这段话说出了学术研究的启发性及其承续关系。刘麟的文章也是说“有幸读到郑子瑜先生写于30年前的大作《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深受启发,不揣浅陋,大着胆子试作仿效”。“但方向与结果各不相同。我发现郁达夫的诗,借用郑先生的话,不仅‘出自宋诗’,而且更‘出自’唐诗。”于是从三个方面,即郁达夫照搬唐诗诗句、郁达夫化用唐人诗句以及郑先生认为仿宋者实采自唐人之诗,亦举出大量诗例以证“郁达夫诗出自唐诗”<sup>[17]</sup>。韩立平的文章是“与郑子瑜先生商榷”的,他认为,郑子瑜先生所考“近一半例句实本自唐诗,另有数例则强考出处”。韩立平指出郑文之缺陷:“子瑜先生对达夫诗的考证多从《宋诗纪事补遗》中找出处,故此项研究首先在材料的酌选上即有弊病。《宋诗纪事补遗》为辑佚钩沉之作,所收多为散佚、偏僻之作,名篇佳作已不多。郁达夫创作旧体诗,即便化用宋人诗句,也多从宋诗名篇佳作中出,不太可能从《宋诗纪事补遗》为取径对象。故欲论达夫诗与宋诗之关系者,应首以《瀛奎律髓》《宋诗钞》《宋诗纪事》等著名选集、总集为研究材料。”<sup>[18]</sup>这三篇文章虽都与郑论相反,却又都是受郑启发,是郁诗研究的一个深化。

## 5. 相关类

在郁达夫诗词研究中,还有一些文章是研究与郁达夫相关的人物,如郁达夫的第一任妻子孙荃,郁达夫的兄嫂郁曼陀、陈碧岑的诗,因郁达夫与他们的关系密切,因而对他们的研究,为数虽不多,但从另一侧面可以了解郁达夫诗词创作的情况,乃至所受的影响。

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景山《鲁迅、郁达夫、柳亚子之间的一段诗歌因缘》,载1982年4月文化艺术出版社《鲁迅书信考释》;于听《幽兰不共群芳去——说郁达夫原配夫人孙荃的诗》,载1983年5月23日香港《文汇报·笔汇》;林真《自铸新词入旧诗——读郁曼陀〈静远堂诗〉》,载1983年6月3日、4日香港《文汇报·笔汇》;晨曦《他年重忆毁家诗——新见郁华谈郁达夫〈毁家诗纪〉一首诗》,

载1983年6月30日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商余》;嵩文《风骨气节跃然纸上——读〈郁曼陀陈碧岑诗抄〉》,载1983年7月11日《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商余》;于听《郁达夫与〈夕阳楼诗稿〉》,载1983年7月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化史料丛刊》第7辑;遐翁《读〈郁曼陀陈碧岑诗抄〉七绝八首》,载1983年8月13日《团结报·百花园》;金泽民《柳亚子与郁达夫的诗交》,载1985年5月29日《经济生活报》;陈松溪《郁达夫与新诗》,载1985年5月24日《福州晚报·兰花圃》;黄清华《心有灵犀一点通——郁达夫郭沫若的赠诗》,载《艺谭》1985年第3期;黄清华《中日诗坛上的一对忘年交——郁达夫与服部担风》,载《人物》1985年第6期等。

于听原名郁天民,是郁达夫与孙荃所生之子,故他的文章乃是写其父母。《幽兰不共群芳去》的副标题是“说郁达夫原配夫人孙荃的诗”,在文中,于听用郁达夫的数则日记、郁达夫为孙荃改名改诗编诗集稿(《夕阳楼诗稿》)、郁达夫与孙荃以诗唱和以及把孙荃的诗夹在他自己的两组绝句中发表等,以说明郁孙早年的夫妻之情。于听又抄录了19首孙荃的诗,然后说:“她的诗,受到了郁达夫因‘时代的苦闷’所赋予的感伤气质的深厚影响,但她没有呼喊,只是如泣如诉。”“如果说,郁达夫的作品是这狂潮中的一朵鲜明的浪花,‘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纪实’(郭沫若语),那么,孙荃夫人的这些诗,就像浪花中的一星点泡沫,反映着处在狂潮冲击边缘上的她自己,也反映着在狂潮翻滚中的郁达夫早期思想和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朴素的痕迹。”<sup>[19]</sup>这就把孙荃的诗所受郁达夫影响,孙荃作为一个旧式女子,她的诗作为大时代边缘的“一星点泡沫”,以及这些诗从侧面反映了“郁达夫早期思想和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朴素的痕迹”做出了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分析。

## 6. 志悼类

郁达夫逝世于抗战胜利之后,是为国而殉的民族英雄。在他死后的第二年(1946年)就陆续出现了一些悼念的诗文。建国后,郁达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作为“颓废作家”打入冷宫,直到改革开放后,文艺界的春天到来,不久即迎来郁达夫逝世40周年纪念,一些志哀悼念的诗作大量涌现,人们热切地表达着对诗人的缅怀之情。

这类文章以诗词的形式发表,如宗芾《次郁达夫先生杂忆原韵赋诗志悼》,载1983年5月30日

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人文》；陈瘦愚《风流子·郁达夫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载1984年5月22日《福州晚报·兰花圃》；陈衡《悼念爱国诗人郁达夫兄弟——并谈郁达夫的几首诗》，载1985年《江南诗词》第3期；泰国吴继岳《郁达夫先生四十周年祭》（七绝六首），载1985年8月10日香港《文汇报》；史蕴光《为郁达夫纪念会作》，载1985年8月24日香港《文汇报·文艺》第380期；斯尔鑫《郁达夫烈士就义周年》（七绝三首），载1985年9月15日《新民晚报》第5版；马国征《纪念郁达夫逝世四十周年》（七律），载1985年9月26日《文学报》第235期；汪静之《郁达夫烈士赞》，载1985年9月28日《新民晚报》；文稷《一腔热血 敬荐轩辕——谈南洋诗人挽郁达夫的诗》，载1985年11月4日《福州晚报》第3版；李剑华《忆郁达夫先生》（七绝），载1986年1月李剑华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晚清诗稿续编》。

这些诗词几乎都发表在1985年郁达夫逝世40周年期间，显然悼念的意义远大于研究的意义。

### 7. 译注类

由于郁达夫的诗词是旧体，郁达夫又好用典故，常一诗数典，或整首用典，乃至诗用僻典，这就为今天的读者阅读带来不便。那么，注释翻译郁诗也就成为郁诗研究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而又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詹亚园在这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他自1990年至2000年，先后在《淮北煤师院学报》《舟山师专学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了数篇文章，对郁达夫的《乱离杂诗》《毁家诗纪》《自述诗十八首》《杂感八首》《日本谣十二首》《将之日本别海棠三首并序》《春江感旧四首》《西归杂咏十首》《论诗绝句两组》《盐源诗抄十首》等组诗作了笺注，每注之前，都对组诗作一“说明”，以揭示作诗之旨，或述作诗背景，为深入研究郁诗，进一步探究郁诗的思想与艺术做好了前提性的工作。

其他作者的注译尚有：于听、周期编选的《郁达夫诗词选》（附《编者按》和《编订后记》），载1978年《西湖》10月号；于听选注《郁达夫在日本诗选》（二十首），载1979年8月《西湖》8月号；郑山石注释《福州于山的郁达夫词》，载1982年5月16日《中学生语文报》第8期；沈石《郁达夫诗选注》，载1985年《南京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沈石《郁达夫诗选注（续）》，载1986年《南京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蒋祖勋注译蒋祖怡赏析《毁家诗

纪》，载1989年10月、1990年4月《郁达夫研究通讯》第5期和第6期；王向阳《郁达夫寄怀孙荃诗注——〈郁达夫诗词注〉稿选载》，载1991年4月《郁达夫研究通讯》第8期；张均《郁达夫早期诗七首笺释》，载2000年4月25日《福州师专学报》第2期；何坦野《郁达夫〈西归杂咏十首〉补笺》，载2000年《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袁本良评注《郁达夫五首》，载2005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诗词注评》。

何坦野的文章正如其题，是对詹亚园的《〈西归杂咏〉十首笺注》的补笺，指出詹注的不足，“在于地域、资料所限之故”。何补在詹注基础上，“同时更正和补阙了郁氏在其诗中自注之疵误，着重对诗中的乌衣、苏小小、南浦、鸳湖、最忆、白头、朱太史、红袖、新歌、棹歌等词语加以诠释，并胪陈了郁氏撰写此诗的历史状况与内在原因”<sup>[20]</sup>。《补笺》将对郁诗的理解更趋向于正确。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极有意义的。

### 8. 评论类

郁达夫诗词研究的主体，评论类文章这一时期开始大量出现，超过以往的总和，达一百六七十篇之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除了一般泛泛的介绍性文章，这些评论文章又可分为诗人论、作品论、主题论、比较论、艺术论、诗学论、综合论等几点，已涉及郁诗的诸多问题，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由于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请待另文详述。

## 六、结语

### 1. 研究特点

#### (1) 逐渐深细

郁达夫诗词的研究在前30年，主要是一般性的介绍以及诗友们相互唱和赠答之作，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郁达夫殉难后，有人搜集郁诗出版，一些稍带研究性的序论文章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受极左思潮影响，郁诗研究停滞；但在大陆之外的港、台与外国的新加坡、日本，郁诗颇受关注，不乏研究力作。新时期后，郁诗的研究在大陆全面展开，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远超以前，且逐渐地深化细化，既有单诗组诗的赏析，又有思想艺术的研究，等等。郁诗的研究已步入快车道，与其小说、散文、评论受到人们同样的重视。

#### (2) 体式多样

从开始的唱和、次韵、赠答、怀吊类诗体形式

外,研究的体式随着研究本体的深入,也多了起来,有序、考、注、译、析、论、评、赏,还有的文章考论、译注、析论并用,体式的选择反映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认识的程度。

### (3) 重点突破

《毁家诗纪》是郁达夫的经典之作,被称作诗之“绝唱”,自发表后即备受关注,在一阵热读后,也进入了冷静的批评。既有在综论里述及的;更有专文研究的,或从本事的角度探其有无,或从史实的角度揭郁心理,或从社会的角度论郁悲剧,或从诗事本身由序而诗论诗之意义;更多的还是就诗论诗,研究诗的内容、艺术与思想意义。较之郁达夫其他的诗,《毁家诗纪》是被研究得最多的诗。

## 2. 存在问题

### (1) 选题不宽

郁达夫的诗词六百余首,就题材来说,有爱国诗、思乡诗、恋情诗、怀亲诗、友谊诗、写景诗、咏物诗、山水诗、说理诗、感事诗、抒怀诗、农事诗、论诗诗、题画诗等等;就体制来说,有律诗、绝句、古体诗、词、散句、对联等。目前的研究,许多方面都没有涉及,或者也只是泛泛而论,点到即止,缺少专题的深入的研究。

### (2) 冷热现象

郁达夫诗词研究存在忽冷忽热之症。20世纪80年代后,郁达夫诗词的研究,特别是随着《郁达夫诗词抄》的出版,郁诗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一时说《抄》、补正、辑佚、评论之作蜂起。1985年是郁达夫逝世40周年,有关郁诗的论文达51篇之多,为历年之最。但到了90年代后,即冷了下来,一年之中,很少超过10篇的。1994年则为零篇。进入21世纪的14年间,总篇数还不到50篇(主要根据中国知网),不及1985年一年之多。另一个冷热现象是海外(主要是新加坡、日本)热的时候,大陆即冷(50、60、70年代);大陆热的时候,海外却冷了(如80年代后)。

### (3) 释《阻》扎堆

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对了解郁达夫的生活思想固然有一定的作用,研究当然也是必要的,但一时扎堆之作特别多,从1977年至1985年,释《阻》的文章近40篇。作为鲁迅研究未为不可,当作是郁诗研究未免欠妥。笔者以为,鲁迅这首诗的意义就在于打开了郁达夫诗词研究的禁区,也开启了郁诗研究之门。

### (4) 青黄不接

这是指研究的队伍。郁达夫诗词研究,在20世纪尚有郑子瑜、郭沫若、蒋祖怡、于听等名家;80年代,蒋寅、黄清华亦为郁诗研究的重要力量。蒋寅在1983年至1985年连续写出四篇校补、辑解的文章,还翻译了日本稻叶昭二的著作《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其后即转向古典文学,而于郁诗不顾了。黄清华在1984年至1987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也一连写出过五篇文章,并有关于郁诗笺注的计划;但后来据说为官,也就无暇郁研了。1990年代之后,正像前述的郁诗研究趋冷一样,研究的队伍也不太成气候,多是散兵游勇,偶一为之,稍有韧性持久之人不多。这期间,有一些研究生走入郁诗研究队伍,且时有佳作,也为郁诗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

## 3. 未来走向

郁诗研究已走过了100年。未来的100年怎么走?笔者非神算,难测百年,就现在郁诗研究的状况,来看将来的郁诗研究,笔者以为应当把握这几点:

### (1) 要拓宽领域

郁达夫诗词的题材还是相当宽泛的,目前的研究尚局限于爱国诗、爱情诗之类,许多领域有待开拓。比如论诗诗,是反映郁达夫的诗学思想的,仅蒋祖怡一文,其他则无人论及。除了《毁家诗纪》《乱离杂诗》两个组诗外,郁达夫还有很多的组诗,异域风情诗(如日本竹枝词)等,也无人进行分类的专题研究。这些都有待开拓。

### (2) 要接通古代

关于郁达夫诗的渊源,多有论及,但都相似重复之论,而少有深入比较之文。郁达夫与中国古代诗人的比较,也仅见屈原、李商隐、黄仲则;而说到郁达夫受到古代诗人的影响能列出一大串,却无具体的比较。比如郁达夫与李白,郁达夫与杜牧,即未见人写。郁达夫说“依诗粉本出青莲”,明说是出自李白;又说“销魂一卷樊川集”,又明说是深爱杜牧。至于与清代诗人吴梅村更是关系不浅,“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尚不是深入,而是阙如。郁达夫与传统文化或说与中国古代诗人,论皆提及,而无深论,是远远不够的。

### (3) 要纵向深入

郁达夫诗词研究的整体水平,还远不及对其小说、散文的研究。虽然,论者如郭沫若、刘海粟等人认为郁达夫的诗要好于他的小说,但对于郁

诗研究却并未紧紧跟上,像曾华鹏、范伯群那样的《郁达夫论》、董易那样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这样的鸿篇巨作,在郁诗研究论文中尚未出现。所以,郁达夫诗词的研究尚须深入,在各个题材领域都要深入,只有纵向深入,深入挖掘郁达夫诗词的内蕴,才能提高郁诗研究的水平与程度,才不至于跛脚而成为小说散文研究的陪衬。

诗要承传统,当代要好诗。一场承续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中华大地掀起。郁达夫诗词虽是旧体的,却赶上了好时运。相信,今后的郁诗研究一定会开出绚丽之花,结出累累硕果。本文写作因搜集材料不够完全,尤其是海外的资料更是难得,故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

谨以此文纪念郁达夫逝世 70 周年。

#### [ 参 考 文 献 ]

- [1] 吴祖光. 陈碧岑夫人传略[A]. 郁曼陀陈碧岑诗抄[M]. 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 [2] 郁达夫. 郁达夫诗全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 [3] 胡迈. 对《郁达夫诗词抄》的补正[J]. 新文学史料,1983(1).
- [4] 钦鸿. 新发现的郁达夫佚诗《寄浪华南通》[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3).
- [5] 郁达夫. 前在槟城,偶成俚句,南洋诗友,和者如云[A]. 郁达夫全集:第7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6] 郭沫若. 望远镜中看故人——序《郁达夫诗词抄》[N]. 光明日报·东风,1962-08-04.
- [7] 郑子瑜. 论郁达夫的旧诗[A]. 东都习讲录[M]. 新加坡南洋学会,1963.
- [8] 郑子瑜. 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A]. 诗论与诗纪[M]. 北京:友谊出版社,1983.
- [9] 郁达夫. 序《不惊人草》[A]. 郁达夫全集:第11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10] 王翼奇. 悲歌痛哭音容在——读《郁达夫诗词抄》[J]. 丽水师专教学与研究,1981(2).
- [11] 陈子善. 郁达夫的德文诗[J]. 新文学史料,1981(4).
- [12] 蒋寅. 郁达夫佚文《将之日本别海棠》(有序)浅解[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3).
- [13] 蒋寅. 郁达夫逸诗二十一首[J]. 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2).
- [14] 陈松溪. 郁达夫四首佚诗的发现[J]. 新文学史料,2006(4).
- [15] 顾鉴明. 误为郁达夫作的一首诗[J]. 读书,1982(2).
- [16] 詹亚园. 郁达夫诗出唐诗考[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1(3).
- [17] 刘麟. 郁达夫诗出自唐诗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
- [18] 韩立平. 郁达夫旧体诗的取径——与郑子瑜先生商榷[J]. 社会科学论坛,2010(1).
- [19] 于听. 幽兰不共群芳去——说郁达夫原配夫人孙荃的诗[N]. 香港:文汇报·笔汇,1983-05-23.
- [20] 何坦野. 郁达夫《西归杂咏十首》补笺[J]. 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

(责任编辑 刘敏慧)

## 访谈:跨学科研究与专业建设

[美]托马斯·德皮耶罗<sup>1</sup> 周韵<sup>2</sup>

- (1. 罗彻斯特大学艺术和科学学院, 美国纽约 14672;
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本次访谈做于2013年5月1日,主要就跨学科研究与专业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流,旨在强调跨学科研究给传统人文学科及其专业建设带来的新机遇。20世纪90年代初,视觉文化和数字人文研究在美国悄然兴起,而罗切斯特大学率先创建了视觉文化研究专业。进入新世纪,又投入了数字人文的建设。新专业建设源于教师的专业兴趣和责任,但同时无疑也给教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 跨学科; 视觉文化; 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83-03

**周韵:**经过两周的访问,我们对罗切斯特大学的视觉文化研究专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课程发展和专业运作看,跨学科研究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确保跨学科研究的有效运作,院系层面做了哪些有效的工作?

**德皮耶罗:**问得好。这需要回顾一下这个专业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个专业的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由专业教师发起的。也就是说,视觉文化专业的初创与几位专业教师的兴趣不可分离。这个专业的名称原本是比较艺术。因为我们有比较文学专业。这几位教师认为,如果我们开展视觉研究,我们何不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跨越国界,引入不同的视角。1990年,大概有四到六位教师,碰头讨论该如何建设这个专业。我以为,这些研究者和教师是这个专业的力量所在。因为他们愿意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的新路径。他们做好课程计划后,找到了当时的行政领导。他们提出建议,由几个不同的系联合构建一个新专业。领导就这么答应了。当然,有些事务的完成需要预算。因为对于系内专业,这很容易,

就是说,对于研究生和教师,钱都由系部管理。但是,这个专业的情况不同。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在几个系之间对预算进行统一管理。第二件要考虑的事是,教师们都来自不同的系。有些情况下,这是个问题。因为教师在系里获得了终身教职,如果到系外工作,就要考虑和谁一起工作的问题。像在本院,只要各系接受这个事实,即有些教师必须做一些系外工作,他们会评估这些工作及其成果。每年我们都要评估教师。教师都要写出工作报告,系主任对这些教师做出评估。只要各系同意教师做这项工作,且是件好的工作,院行政部门也没有不乐意的。这一切都很顺利。因为这又始于教师。这一点很重要,是做研究最有力最具创新性的路径。这是你必须有的基点。一旦确定下来,行政部门只要确保专业建设的可能条件。这就是这个专业的简要建设史。我以为,这主要依靠教师们强烈的研究观念。

**周韵:**跨学科研究给这里的人文学科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德皮耶罗:**这给教师们提供了很大的自由,促

**[收稿日期]** 2014-03-20

**[作者简介]** 托马斯·德皮耶罗(Thomas DePiero),男,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艺术和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人文和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法国文学和视觉文化研究。

周韵,女,江苏溧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和文化研究。

使他们追求他们想做的种种不同的有独创性的工作。例如,我们建立了媒体研究专业。几位来自不同系但对电影有着共同兴趣的教师创立了媒体研究系。当教师们无法适应传统的禁锢,跨学科研究可以点燃他们的研究兴趣。为此,越来越多的教师不再陷入传统的禁锢或系的局限。我本人受到很专业的专业训练。当我还是研究生时,我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禁锢。我以为,21世纪应该是另一幅景象。当然,我不是说,系或专业训练就是错的。事实上,我仍然在研究法国文学。但是,世界不再是从前的世界。我是说,信息运作的方式,民族边界运作的方式,都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所以,我认为,如果继续用19世纪教育小说里的方式来思考问题,那是太局限了。我们要继续,怎么办呢?让教师们做他们擅长的和他们想做的工作。这就要改变知识结构和人文学科结构。视觉文化研究专业是最好的例证。因为它非常成功。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教师都做得很好。其他大学都模仿我们的专业模式。这就证明我们做对了。即使在各系,例如英语系,一直以英语文学为主,但他们也在课程设计中加入了其他课程,包括了戏剧和媒体研究。现代语言和文化系和英语系还合作建立了文学翻译专业,一个跨系专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要研究和教学的产出是好的,就没有理由限制人们思考。

**周韵:**从你的研究看,似乎其中存在着某种变化,前一部著作《法国小说的演进》是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后一部著作《白人男人的焦虑》是跨学科的研究,<sup>①</sup>我或许使用了“宏大叙事”,但是我想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对你个人的研究有何影响?

**德皮耶罗:**问得好。我的第一部著作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的,做了全面的修改。我不喜欢我的博士论文。事实上,痛恨它。所以,后来基本上是重写了一遍。我对17世纪小说非常感兴趣,尤其是现实主义问题,如现实主义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等等。大体上,这是非常传统的学科研究为基础的著作。我为什么写这部书呢?主要是在这里的最初四年,我不断地阅读和研究,我们有很多学者来访,所以有机会接触很多不同的研究。我对性别研究、种族范畴等越来越感兴趣,尤其在欧美这方面的争议越来越多。另外,我的理论兴

趣主要在心理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心理分析教给了我抽象思考的方法,而性别是心理分析的兴趣所在。对于我来说,有思考种族问题的方法,有心理分析的方法。我仍然对欧洲小说感兴趣。所以,我就思考西方语境中的种族问题。作为我们认同的基础,就像性别是心理分析的基础,我就考虑把我们如何思考种族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

**周韵:**的确,你的研究很有吸引力。我们对这里的数字化人文学科也令人印象深刻。星期一早上,我们听了莫里斯·伊维斯教授召开的威廉·布莱克档案数字化研究的每周例会。这也是艺术和科学学院的一大特色。这个研究项目什么时候开始的?和媒介研究专业建设有什么联系?

**德皮耶罗:**数字媒介研究今年刚刚开始。伊维斯教授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布莱克档案研究。他的研究是一个典型案例。谈到数字媒介研究,我想应该用大写的D和M来指称。这是一个新专业。这个名称的产生和伊维斯教授的研究一样,是这一语境中第一个超级媒介研究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英语系的中世纪研究专家帕克教授也开始做这一工作了。他们有很大的数字化收藏,有的就只有数字化的材料。这使得中世纪文献的研究成为可能,因为很多都是孤本,在数字化之前很难看到。他们从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得到了资助。研究已经进行了23年。虽然做了很长时间,但最近我们才有了数字媒介研究的本科专业。这是我们的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例证。人文和科学的结合十分必要,尽管有点激进,也不是所有大学都在做这项工作。

**周韵:**听说为数字媒介研究专业的建设,艺术和科学学院正在建设研究中心大楼。你为此也感到非常自豪。在你看来,新大楼的建设对加强学校的跨学科研究有什么重大意义?

**德皮耶罗:**首先,这个专业的产生和视觉文化研究专业的方式很相似。对数字媒介研究有兴趣的教师提出并讨论,所以有了今天的这个专业。学生,艺术专业的学生,和你们的学生一样,不再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维看问题了。我上大学那阵子,艺术学科和科学是分离的。我是说,我们不会跨越艺术的界限。但是,今天的学生不一样了,他

<sup>①</sup> 访谈中提及的德皮耶罗教授的著作是 *Dangerous Truths and Criminal Passions: The Evolution of the French Novel/1569 - 179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White Men Ar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们常常跨越界限。有时候,我们经常抱怨,学生不爱阅读,尤其是深度阅读。但是,他们做浅层的阅读和其他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教会他们如何批判性地思考他们如此热爱的东西,如网络。我以为,21世纪的一种新的读写模式是数字读写模式。要成为老练的数字媒介的消费者,就必须了解它如何运作。如果你研究一幅画,你必须了解油彩和画布,以及其他材料。如果你研究数字媒介,你当然要懂得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们依循一种传统的研究方式,但同时利用数字媒介,给学生机会看到人文和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周韵:**是啊,批评家们都说,现在是一个数字转向的时代,可能会取代其他转向,如文化转向。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德皮耶罗:**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也不会什么都同意。我不想把人文学科变成电脑专业。因为我们研究的大部分东西是不可量化的。例如,美或人文观念都是不能量化的。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量化的,甚至没有这些先进技术,研究难以进行的。……有的工作人虽然可以做,但是需要很多时间。但是,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速,使得原本不可能的视觉呈现和阐释成为可能。同时,虽然我们必须关注我们原来用历史、哲学、统计学等知识来完成的研究,但是量化视角进入了人文学科。没有完全封闭的学科。我们必须确保了解它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限度。要做到这点,我们还要学习。

**周韵:**据你所说,你是属于那些支持数字技术的人文学者,但是对于有些比较保守的学者,如斯坦利·费希在去年的《纽约时代周刊》上发文,认为数字人文研究追求革命性日程之际,也动摇了各学科的传统标准和权力。<sup>①</sup>对此,你怎么看?

**德皮耶罗:**他去年十月来这里访问,演讲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我以为,对于数字人文研究的某些方面,斯坦利·费希并不完全了解。他似乎只想到软件,只要把书放到软件里,按一下按

钮,就有研究结果了。其实,制作软件的人都必须了解人文学科。如果不懂詹姆斯·乔伊斯,或者不懂18世纪绘画的绘制方式,没有办法制作出相关软件。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文学者和技术专家联合开发以前没法制作的东西。斯坦利·费希提出的观点中,有个观点是,人文学科是无用的,换言之,我们就是为研究而研究。也许阅读乔伊斯或者看戈雅的画,你并不能获得任何有关世界的实用知识,但是你会更了解自己 and 世界。这一点,我很赞同。我研究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变成现实世界。这也是我上次和斯坦利·费希争议的观点。我以为,我们无法把人文研究和现实世界分离。因为我就是完成这项工作的独特的人。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把你和你所做的工作分开。我认为,不能说人文研究是无用的。但他坚持说是。他是中世纪学研究专家,认为没有数字电脑照样可以做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受教育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知识,而数字技术是传播这些知识的路径之一。这将会是学生在课堂里体验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用技术把更多的信息和人文文本提供给更多的人

**周韵:**跨学科研究在这里发展很快,也很有成效。你对这一研究的未来有何看法?艺术和科学学院会有哪些具体发展项目?

**德皮耶罗:**我想不同媒介的联合是一个趋势。因为我们有电影研究,和你们明天去参观的乔治·伊斯特曼博物馆有着密切合作。我以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很多事,进一步强化人文和科学的联系。例如,我之前提到过,我们有人专门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技术,尤其是电影保护和修复技术,他们中有物理学专家、影像专家等。嗯,我希望我有个水晶球,可以告诉你更多的预言。总之,我们会把更多的学科联合起来,包括传统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史。前景是令人振奋的。

**周韵:**谢谢给我们时间做这个访谈。

(责任编辑 南山)

<sup>①</sup> Stanley Fish,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Transcending of Mortality," The New York Times (2012.01.09).

# 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福克纳短篇小说

薛 瑞 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本文重点分析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乌托邦特性,解析作者编织神话表达对南方的爱与憎缘由;分析文体、内容与文本的杂糅化特征,以及将现实与幻想魔幻化的特征;同时关注到主题、形象、语言、叙述视角及小说结尾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 福克纳短篇小说; 神话; 杂糅; 魔幻;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86-05

关于威廉·福克纳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评价可说是角度各异,众说纷纭,仿佛是个千面人:一个自然主义作家,一个热衷于拿周围人说事的恶棍,一个控制不了词语的喋喋不休的家伙,一个描写性与暴力的廉价的通俗作家,一个文体家,一个模仿乔伊斯的现代主义作家。其实,不论有多少个福克纳,都有其自身独有的价值。不论这个福克纳是恶是善,作为一个现象还是一种精神,终将存在下去。事实上,福克纳难以把握:作为福克纳本人同时代的福克纳,一个疏离的、令人厌恶的福克纳,一个不断革新语言与文体、含混而鲜活的福克纳。这里我们将重点分析现代、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福克纳短篇小说。

## 一、乌托邦与神话化

首先,福克纳短篇小说具有乌托邦特征。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曾有论断:“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sup>[1](P.166)</sup>事实上,福克纳一直都有自己的“乌托邦式的设想”。他创造了南方种植园神话世界与淑女神话世界,精心编织了突破时间与空间局限的象征性的神话,虽然他在关注南方社会各阶层的命运以及与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之间乖谬关系时,情感基调悲观、内向,对美国内战后的南方世界进行内省式反思,甚至也在神话

中嵌入了反讽与憎恶。

福克纳也善于将欧美神话变形化用到自己的短篇小说世界中,诸如天堂神话、原罪与堕落神话、古希腊神话、启示录神话、印第安神话等,尤其是“伊甸园”神话,表现了作者及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

其实,南方人一直在创造神话,他们从移民来新大陆之日起就编织只属于他们的“创世纪”。在南方人的认识中,“创世纪”似乎就是美国南方世界的真实写照,这块被白人称为流淌着蜜和牛奶的神圣土地上的选民是白人,而非其他种族。白人、黑人与印第安人应该按照上帝的命令,各行其道。在这个“创世纪”过程中,福克纳似乎没有预设种族立场,但是在上帝、他青睐的选民及选民的命运问题上,作家内心很矛盾:为什么黑人、南方的穷白人就不配享有好命运?为什么各种族彼此伤害?穷白人沃许敬佩白人塞德潘上校,宁愿献出孙女,在目睹孙女命运竟然不及一头生产的母马后最终亲手毁掉了她们;白人约翰·麦克莱顿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就带领一拨白人将黑人威尔·梅耶斯私刑处死;印第安酋长伊塞梯贝哈为了延续在世时的好日子就让侍奉他的黑人陪葬;穷白人梵奇因为对方是混血儿又或者不经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妹妹就设法置对方于死地。为了维护

[收稿日期] 2014-12-10

[作者简介] 薛瑞东,男,江苏扬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创世纪”、伊甸园,维护幻想中的纯洁与美好,他们频频使用暴力。阿伯纳·斯诺普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十岁儿子的记忆里就搬家十多次,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一家人寻找美好的地方,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前行。但他偏狭的性格,以及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灵魂注定了没有善果,他只有与火为伴,火成为他一路上最忠诚最亲密的伴侣与战友,帮他解决难题,助他泄愤,走一路烧一路。他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就是放火,用火摧毁一切,此时他就成了吞噬一切的火神,是火神的凡胎肉体,火是他的同谋,是他的化身,也是他的代言人。

福克纳之所以神话化南方世界,是因为他爱得深沉执着,但又充满矛盾。瑞典科学院院士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隆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这么说道:南方“机械化、标准化的生活对他们既陌生又有敌意,……福克纳的小说连续地、深入地描写了这个他有着切身体验并且感觉强烈的痛苦过程。”<sup>[2]</sup>(PP.225-226)在他的内心里,一直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种植园式的伊甸园世界,一个是种族纷争的现实世界;盘踞着两种力量,一种是未被玷污的净化灵魂的传统的神圣力量,一种则是反传统的颠覆性力量。他要重新构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南方世界,但作家的良知敦促他正视现实,使他不得不在夸张、反讽中一一揭开时刻存在的破坏性力量。

福克纳之所以不断创造南方神话,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对人性的无情压迫,迫使作家寻求历时共时层面的可能路径;又或许蕴藏着太多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意义的神话,适合福克纳表现个人与社会行为的永恒模式,甚至是超乎其上的某些基本规律。无怪乎他在创作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时不断诉诸神话了。有的评论者认为福克纳运用神话,“一方面是没有上帝的现代社会混乱无序;另一方面是语言的极度贫乏。”<sup>[3]</sup>(P.63)在笔者看来,大概没有比运用神话构建秩序反对现代文明那么更有效更直接且更简单的武器了。

## 二、杂糅性与魔幻化

杂糅性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表现在文体、内容的杂糅与文本的碎片式集锦。

福克纳在一些成功的短篇小说中常常实验性地杂糅不同的文体类型,如侦探小说、历史小说、

传奇、诗歌、喜剧、闹剧或诙谐剧等。《烧马棚》就杂糅了众多文体:一则侦探小说。究竟是谁烧毁了马棚?出于何种动因?有哪些具体实施步骤?主谋是谁,有无从犯?结果如何?一个神话。腿脚不便的穷白人斯诺普斯,好似奥林匹斯山上的匠神赫怀斯托斯,他执掌火器,用火烧尽不公与内心的愤怒,烧马棚就是他的一个杰作,他需要借此报复社会。一部闹剧或诙谐剧。主人公目空一切,目不斜视,马粪当道,勇踏马粪,粪污地毯;儿女架起洗衣锅,烧碱水洗地毯,残痕犹在。一则历史小说。一驾马车,四处开拓,四方漂泊,居无定所,十多年搬迁十余次。阿伯纳·斯诺普斯一家的漂泊史,既是先民们移民史、开拓史的缩影,也是美国南方社会各种族的矛盾史,白人内部的斗争史。再如《殉葬》,分明就是一则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黑人逃亡传奇与印第安酋长的发家传奇。按照印第安传统,酋长死去,需要贴身奴仆殉葬。在族人看来,那个黑人理应懂得荣誉、体面,尊重风俗习惯,陪葬老主人。可他居然不识好歹,逃跑了。于是新任酋长亲自率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狩猎”活动。黑人原本可以逃脱,可他又折了回来,最终在沼泽地里被抓住。在两瓢水的浇灌仪式下走向生命的终点。酋长杜姆一家三代的发家过程,似乎主要依仗黑人。一开始黑人不大需要干活,主要用来娱宾,就是让狗追逐。后来他们终于知道黑人可以用来繁衍后代,卖钱,也可以用来种地,最后拥有了更多的土地、奴隶与财富。

杂糅性还表现在内容上,包括了诸如建筑学、历史与风俗史、社会学、性变态理论、神话学等。只要细究,我们会发现福克纳在小说中杂糅了其他学科知识。譬如,建筑学,《烧马棚》中的杂货店,拥有砖砌的门柱、铺毯回梯、枝形吊灯的德斯班少校府邸,《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四方形大木屋,《殉葬》中的黑奴居住区及其陈设,《莱巴嫩的玫瑰红》中的房子;历史与风俗史,诸如《莱巴嫩的玫瑰红》中的舞会、战前动员、交通状况。

杂糅性还表现在文本碎片式的集锦上,例如《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包括纳税之争、气味之争、爱情之争、死亡,还穿插进父女之争、淑女教育等,这些碎片化的文本几乎可以独立成篇,不同文本杂糅在一处,形似集锦。

魔幻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另一特征,即将现实魔幻化或者把魔幻现实化,将现实与幻想纯熟

地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亦幻亦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事皆有可能,每件事皆真实可信。《烧马棚》中孩子与父亲去当地富人家现实与想象交错的情景,“他们沿着一道攀满忍冬和野蔷薇的篱笆走去,来到一扇洞开的大门,两边有两道砖砌的门柱,孩子一见到这些就把爸爸忘了,也把心头的恐怖和绝望全忘了……爸爸惹不了他们。他又望了望那直挺挺的黑色的背影,看见了那生硬而坚定的颠颠跛跛的步子,他这种安心而欢喜的感觉一时间又消失了。……或许爸爸也会感受到这股魔力呢。”<sup>[4](pp.8-9)</sup> 儿子将主人的房子魔幻化了,化作了父亲不敢碰触的庄严神圣的庞然大物,觉得今后无需到处漂泊了。《夕阳》中南希的世界就是被凌辱的现实与被丈夫割喉的幻想的融合。《干旱的九月》中对环境的描写,如“遮天蔽日的风沙吞噬了白昼。精疲力竭的尘土笼罩着昏暗的广场。广场上空,黄灿灿的穹窿像口铜钟。东方天际,一轮比平时大两倍的月亮时隐时现。”<sup>[4](p.59)</sup> 《阴间》中逝者如生者的所感所见,“这时光线消失了,一个静默、微弱、谦恭、空洞的声音在瞬息间将被杀的花朵的可怕的、阴惨的气味压倒他身上……他听到或感到周围有谦恭的拖脚走动的声音,而他躺在封闭的黑暗中,像老人睡觉那样把手交叠着放在胸前,睡在那里,等待着那一刻。它到了。”<sup>[4](p.243)</sup> 这时的逝者穿行在阴阳两重世界间。《花斑马》中人马相斗的场景,“他把三四匹马逼到角落,往马背上一跳。接着,尘土飞扬,有好一阵子,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尘土像乌云似的遮天盖地。那些目光呆滞、花花斑斑的畜生从灰土里窜出来,一蹦足有两丈高。它们至少往四十个方向乱跑……除了带花斑的马皮和鬃毛,还有得克萨斯人像用线拴着的两个核桃似的皮靴跟外,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一会儿,那顶高帽子悠悠地飘过来,活像一只肥胖的老母鸡飞过篱笆。”<sup>[4](p.264)</sup> 一幅亦庄亦谐、是畜似人的奇幻画面。可以说,这种对现实生活魔幻化的处理也是福克纳对传统南方贵族文化的消解、解构。

### 三、不确定性

有学者将后现代主义文本概括为“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将清楚的东西模糊化,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sup>[5](p.41)</sup> 我们不妨遵循旧例,称这种写作方式称为不确定方式,即在一个文本中,就某一事件或其他叙事对象进行各种可能的叙述,进行

各式否定、修正性处理,致使文本内部相互矛盾,彼此颠覆,终致几乎没有确定的理解。这里,我们要明确的是,不确定性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美学原则,它同样也是现代主义文本的美学原则。具体地说,作者在处理文本时,首要的策略是消解、重构传统的叙事方法,将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件予以陌生化。其间,还修正作品的价值判断方法,包括思想主题,进而模糊思想,甚至混乱价值判断。而且在叙述进程中不断变换视角,非线性地甚或断裂性地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地显示出来。

在作品中,不确定性具体表征为主题、形象、情节、语言、叙述视角,包括小说结尾的不确定,等等。

主题的不确定。作品中的主题不易捕捉,读者难以像阅读传统作品那样相对清楚地提炼主题,而只能将文本呈现的各部分加以拼贴、集成、整合,借此深化信息。以《夕阳》为例,主题不明朗,读者无法给出确定的主题。这里有的是材料:南希做饭心不在焉,南希被银行出纳打,南希在监狱中上吊,南希丈夫离家出走,男主人及三个孩子送南希回家,南希口中不断叫唱,女主人的抱怨,继续每天送南希回家,南希担心丈夫杀了自己,南希讲故事,孩子争辩自己不是黑鬼……可以说无法明确主题,是种族主题,嫉妒主题,暴力与性主题,贵族衰亡主题,司法黑暗主题?主题的确不甚了了。

再以《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例,该小说主题同样含混,既包含了女主人公生存境遇的荒诞,也有个体的孤独与无法排解的黑暗。可以说,小说的意义甚至在文本之外,文本揭示意义,却又为文本遮蔽着。爱米丽是传统的化身,是欧洲大陆文化在美国南方的代言人,而南方种植园文化又充满了罪恶、占有、顺从、死亡与蒙昧。种植园文化孕育下的子孙们,无法置身于一代代编织的神话之外,身在其中的爱米丽无法看清黑暗与激情交织的内在欲望,无法参悟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冲突的内在原因。爱米丽生命旅程的意义在于自身要求与父亲代表的南方文化的似是而非的结合。小镇上的人们最终认识了大众塑造的纪念碑似的人物与爱米丽本人之间的差异,仿佛爱米丽生活在多个面具下,具有多重人格。大木屋、小镇人想象中的爱米丽父母肖像、砒霜、尸体,这些环绕着爱米丽。贯穿故事始终的是对死亡的

表述。爱米丽与南北战争时阵亡的无名军人一道安葬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sup>[4](P.41)</sup>。小镇新当权者要求她交税时的爱米丽“看上去想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尸体,肿胀发胖”<sup>[4](PP.42-43)</sup>。当她父亲死后以及心上人离开之后,“她居住周围惟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男子拎着一个篮子出出进进。”<sup>[4](P.44)</sup>“她的身影,像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她死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笨重的胡桃木床上还挂着床帷,她那长满铁灰头发的头枕着的枕头由于用了多年而又不见阳光,已经黄得发霉了”<sup>[4](P.50)</sup>。雪松是常青的,雕塑可以长存,但与爱米丽肉体相关的东西却在走向腐朽或已然腐朽,惟有墓园可为她提供心灵的宁静,令她获得永久的慰藉。自私、孤独存在于每一个灵魂深处,已然败坏的南方种植园文化的黑暗大幕很难透射入光线。当爱米丽完全陷入传统的文化包围中时,所有现代的、进步的文化与道德都无法拯救她,而她只有自我沦陷,甚至采取疯狂的行动。那么,这篇小说的主题除了上文提及的还有什么呢?是颂扬淑女文化,缅怀种植园文化,揭露南方种植园文化的腐化堕落,揭露畸形发展的现代工业文化的无情,揭露现代文明所导致的人性堕落以及人的本质的失落,揭示人生的无意义、滑稽、痛苦,颂扬死亡的绝对威权,还是歌颂时间的无所不能?概言之,主题不确定。

形象的不确定。一方面是叙述者的形象,叙述者一般以回忆者、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空间里自由出入,向读者传递各种信息,包括一己情感好恶的信息。文本中的叙述者并不具有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品格,即使个人身份属性有时也往往难以辨清。另一方面是文本中主要人物的形象,这类人物常常因社会、历史、环境、宗教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无法确定。他/她混合了过去与未来,成为任何一个集体都无法理解的陌生人,成为一个隐身人。《沃许》中的塞德潘是人是鬼?他以什么判断事物的价值?是实用主义的原则,是种族主义的陈规,是弱肉强食的逻辑,还是嗜血动物的无情?沃许爱孙女,为什么让一个爷爷辈的男人欺辱孙女,最终为什么又亲手毁掉那个男人、自己的孙女?

语言的不确定。无论在现代语境还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文本主要通过象征性、隐喻性包括意识流式的语言来实现表意功能的;通过象征性语言传递着作者对世界丰富而多义的把握和解读,使

得小说具有复义性;通过语言传达对生命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又往往游离不定。德里达对后现代语言的论述很透辟,他说:“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原始的一切指涉意义。”<sup>[6](P.141)</sup>福克纳虽然没有对语言做出这样的明示,但是语言的流动性他心知肚明,在《我弥留之际》通过艾迪之口表述过。福克纳在文本中不断运用象征语言,比如,“玫瑰”(《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题名是“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但这朵玫瑰到底该献给谁?玫瑰象征着什么?“夕阳”(《夕阳》)象征了什么,是南方传统文化的夕阳,还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夕阳?是黑人的夕阳,还是白人的夕阳?再如,“山上的胜利”,到底是北方的胜利,还是南方的胜利,或者就是一个嘲讽?在表述微妙的种族关系时,福克纳调用了意识流手法,以表达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之流、文化之流、生活之流,诸如《路喀斯·布香》就是如此。

叙述视角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以不同的人物主导叙述。其时间观符合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时间被叙述者按照个人意志自由地切割、重组,与空间的关系也被割裂了,时间也成为文本的主题。有时,读者甚至产生这样的错觉,即历史与现实是借助语言来实现的符号游戏,语言就是合谋者。譬如,《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中作为回忆者的“我们”,穿插于过去与现在,通过视角的自由变换与交错的时间、场景叙述,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与时空关系,充满神秘性的悬念设置也充斥其间,对蓄奴制的书写,尤其是人性丑恶等隐秘方面的探求委婉含混,因此需要读者积极地参与解读、解构与重构。小说通过对传统文化表层的书写,为读者提供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解读视角,消解了传统的种植园文化与淑女神话,解构了南方贵族文化。《莱巴嫩的玫瑰花》也是通过不同叙述视角对内战时的传奇人物露易丝·兰道夫进行了表述。

小说结尾的不确定(开放性)。小说结尾的不确定或开放性也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性。福克纳的一些短篇小说没有封闭性结尾,事实上,文本之外有无限的可能。如《烧马棚》中以沙尔蒂离家出走作结,《两个士兵》以弟弟被送回家作结,《夕阳》以康普生父子回家作结,这些结尾都是开放的,沙尔蒂离家出走之后怎么样不

得而知,康普生父子回家之后的情节如何发展不得而知。

总之,本文从编织神话、杂糅化、魔幻化与不确定性诸方面分析了福克纳短篇小说的现代与后现代特征,进一步感受了福克纳对现代文明的敏锐观察力,理解了对美国南方传统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方式,认识了福克纳对传统小说的突破与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 [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李文俊编.福克纳的神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3]刘建华.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与历史[J].国外文学,1997(3).
- [4][美]威廉·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福克纳短篇小说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5]王治河.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J].国外社会科学,1995(1).
- [6]王逢振.最新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南山)

---

(上接第 61 页)

[参考文献]

- [1]清实录[M].第2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张廷玉等.明史(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M].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1.

- [6]胡适.章回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书店,1979.
- [7]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南山)

# 哈金小说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许 镡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 系统地回顾近十五年(2000—2014)来哈金小说的国内研究现状,研究者不难发现其中还存在着诸如研究主题过于集中、缺乏系统而全面的专项研究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解决与否将直接影响国内哈金小说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 哈金; 东方主义; “文革”书写; 叙事风格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91-07

## 引言

国内学者之所以注意哈金,主要是缘起于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 1999),这也是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仅有的两部哈金长篇小说之一<sup>①</sup>。依据中国知网所提供的数据,国内的哈金研究肇始于2000年。是年,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以“拿诚实做交易”为题对哈金及小说《等待》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sup>[1]</sup>。但是,从2000年到2004年的5年间,国内只发表了11篇<sup>②</sup>与哈金作品相关的文章,其中,2002年的论文数为零;而且,这些多是刊发于报纸之上的、有关哈金及其作品的介绍性文章。到2005年,国内才出现专章讨论哈金作品的学术论文,随后,哈金及其作品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相关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仅2011到2012年,直接以“哈金”为题的期刊论文就有45篇之多,研究者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哈金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阐释与解

读,渐趋客观的学者们希冀以平和的心态探讨哈金作品本身的文学深意与价值。本文将从介绍性文章和研究型的学术论文两个大的方面对国内的哈金研究现状(2000—2014)进行一个梳理,以期找出现有研究的症结所在,并找寻相应的解决之道。

## 一、介绍性文章(2000年—2004年)

其实,在《等待》之前,哈金已经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池塘》(In the Pond, 1998)、两部短篇小说集:《辞海》(Ocean of Words, 1996)与《在红旗下》(Under the Red Flag, 1997)<sup>③</sup>。其中,《辞海》获得了1996年的笔会海明威奖(The PEN/Hemingway Award),而《在红旗下》则赢得了当年的短篇小说福克纳瑞·欧克纳奖(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可是,此时的哈金并不为国人所知,学界对其的关注也极少,只有个别学者做过零星的介绍。如董鼎山先生就曾在《等待》获奖之

\* [基金项目] 2013年安徽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3SQRW100ZD); 2014年安徽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项目编号:商务英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014zy127))。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许 镡,男,甘肃镇原人,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副教授。

① 2002年,小说《等待》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引进,金亮翻译;2013年,小说《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 2011)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引进,季思聪翻译。

② 本文数据均源于中国知网(CNKI),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

③ Ocean of Words 又译为《好兵》,由卞丽莎、哈金译,2003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Under the Red Flag 又译作《光天化日:乡村的故事》,由王瑞芸译,2001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将其引进时则译为《小镇奇人异事》。

后及时撰文指出哈金用英文写作的可贵之处<sup>①</sup>。2000年,《等待》在海外的巨大成功让哈金逐渐走入国内学者的视线,他们开始对小说《等待》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内容介绍或相对宽泛的书评。只是,这些尚未触及小说文学内涵的文章一开始便表现出极大的争议性:对于小说,学者们或褒或贬,立场截然不同,这似乎也预示着哈金作品所蕴含的独特而深邃的魅力。概括地说,从2000年到2004年,国内学者对于小说《等待》的评论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型:

### 1. 对《等待》的完全否定与批判

国内研究者对小说《等待》的不满根源在于:身为华人新移民作家,哈金本可利用自己英语写作的优势来顺利地跨越语言障碍,但是,他却依旧选择在中国故事中肆意地扭曲国人的形象、暴露其愚昧与落后的一面,以整个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为代价来契合美国社会中的某些政治标准。因此,刘意青教授<sup>[1]</sup>以小说中有悖现实的情节、小说出版时的封面设计为例,对哈金及其代表作《等待》进行了全面的驳斥。时任江苏省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的刘俊也将小说《等待》定义为“一部在西方语境下由东方作者书写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作品”<sup>[2]</sup>,他还指出,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展现了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传统中国,而非作家哈金本人出色的英文写作能力或深厚的英美文学修养。除此之外,陈爱敏<sup>[3]</sup>和应雁<sup>[4]</sup>也持有与此相似的观点。二人均指出,文化语境的改变和现实生存的生存需求都促使哈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族裔背景和历史亲历者的身份,通过对作品题材与内容的选择性书写、“郑重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并因其‘真实’而备受褒奖”<sup>[4]</sup>,主动迎合主流读者以保证小说的畅销。

至于这些评论中所运用的东方主义批评范式,后文有专节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仅就以上学者对于哈金及小说《等待》所作出的批判本身而言,自然是有其合理性的,而且,这种指责之声在国内的哈金研究中一直存在,直到2014年,仍有学者在讨论与之相关的话题<sup>[5]</sup>。毕竟,小说中的确存在着诸如情节上的漏洞、意识形态痕迹过于明显等不足,妨碍了小说价值的充分体现。但是,考虑到哈金的现实处境,他所采用的书写方式不过

是新移民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体式,更为重要的是,哈金是在家国之外、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故乡的人与事,从中探析国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人性的弱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上学者对哈金的驳斥也就失之偏颇。

### 2. 对《等待》的肯定与褒奖

在同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等待》和作家哈金的欣赏与赞同。通过文本细读,这些研究者试图透过小说中的婚姻和爱情主题揭示哈金真实的创作意图以及长期而痛苦的情感纠葛背后所蕴含的特定时代的国人的本真生活,藉此走进哈金的文学世界,客观而公允地探求哈金作品的独特的文学价值与意蕴。2001年,郭栖庆撰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小说《等待》的主要内容。郭认为,小说书写的是特定年代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现实:男主人公孔林的懦弱、女主人公曼娜的爱情投机主义及对男性的过分依赖注定了二人根本无力相爱,而孔林与妻子间的离婚闹剧不过是一种“无奈的情感折磨和无味的婚姻生活”<sup>[6]</sup>,三人只能在等待中体味人生的无奈。施战军也认为,《等待》看似平淡无奇,却用“不多嘴不插话只靠叙事本身呈现主体伦理标准的风格”<sup>[7]</sup>忠实了小说艺术本身,真实再现了中国当代普通中年人的情感成长史,而这恰恰是国人续写本土历史人生样态时最可资参照的地方。

与以上二位学者的中肯态度不同,书玉与残雪则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小说《等待》的喜爱。在《〈等待〉的意外》一文中,书玉直言,哈金“把人物性格的生成和人物关系的建立放置在生活缓慢而逐步地自我展现的过程中”<sup>[8]</sup>,在心平气和的叙述中洞察人性的弱点、反映生活的本质,其中的些许败笔并不影响故事的整体结构和人物的刻画;至于小说在发行阶段的具体操作方式更远远地超出了作家所能掌控的范围。那么,过分地强调小说中所展现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就显得简单而且粗暴。残雪也指出,《等待》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所达到的人性的深度”<sup>[9]</sup>:哈金揭露普通国人人生的黑暗真相,其意不在简单的批评,而是为了认识自我,展示绝望背后的某种朦胧的希望。因而,小说满足是人道的关怀和批判精神的境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国内学者已经

<sup>①</sup> 相关论述可参见书玉,《等待》的意外——聆听小说的声音[J]. 读书,2001.11:115; 杨联芬,母语还是翻译?——谈海外华人文学的写作语言[J]. 华文文学,2006.1:19



试图避开常见的“东方主义”视角,而从词语的使用和文学形象的创造来解读小说《等待》。例如,张体从小说篇名——“等待”——的基本词义分析入手,探询小说描绘的生命意象和其中蕴含的文化、哲理况味。张认为,“等待”在词义上本就“暗示出主体的被动性和消极状态”<sup>[10]</sup>。一来,孔林、淑玉和曼娜已习惯于听天由命、隐忍不发,“等待”就是他们“处理时间、打发生命的方式,至于等到怎样的结果或等不等得到结果却并不重要”<sup>[11]</sup>。另一方面,“等待”本就是普通人的一种生命状态,生活的现实逼迫孔林等人进入了痛苦而麻木的长期等待之中,在此期间,人性中的善良与美好被消磨,自私与丑恶却变本加厉,而希望的再次落空则令人体味到人生的悲凉。而江宁康则在探讨英语文学的跨界性和文化混杂性时提及了哈金的小说《等待》。江指出,“小说的文学形象是英语表述的中国文化形象,从中国北方的风土人情到一男二女的人物冲突模式都没有他者文化的浸染”<sup>[11]</sup>,这样一个典型的当代中国故事在美国能被接受,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英语文学中出现的多民族文化的新传统,而这恰恰反映了英语文学疆界的扩大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混杂性造成了英语文学形象的身份的多元化。

## 二、研究型的学术论文(2005年—2014年)

如上文所述,时至2004年,国内学者已不再只聚焦于哈金的故事“是写给谁看的,为谁写的,写的是什么”<sup>[4]</sup>,而是试图回归到文学本身,多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哈金作品的题材、创作风格以及作品的翻译等,以便从一个更广、更深的层面上挖掘哈金作品所具有的、却被“东方主义”批评范式所遮蔽的文学价值。因而,相关的文章由之前的单一作品介绍或简单书评转向对哈金作品对现实生活、人性与道德以及国人的国民性的关照、反省与批判,相较而言,研究者更着重于哈金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手法、叙事模式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深入探讨。与此同时,随着哈金的另一长篇小说《战争垃圾》(War Trash, 2004)再次获奖<sup>[12]</sup>以及《等待》中译本在国内的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哈金,还有人将其放置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大框架中,对其作品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整个华人文学做出的贡献进行综合考量。简言之,从小说的内容到艺术特征,国内学者对于哈金及其作品的认知渐趋全面与深化。纵观2005年至2014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哈金作品

的研究性论文,不难发现,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东方主义批评范式、文革书写、语言与叙事风格三个方面对哈金及其作品逐步展开解读与分析的。

### 1. 过度使用的东方主义批评范式

哈金的移民作家身份及其在多部中国情境小说中对于故国往事的选择性呈现与书写使哈金的作品成为当下新东方主义的典型代表,于是,东方主义批评范式在目前的国内哈金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内最早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分析《等待》的学者——刘俊<sup>[2]</sup>就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环境设置和作为小说主线的爱情故事都意在满足西方社会(和文学)对“东方”的预设和要求。2005年以后,学术界对于哈金作品中存在“新东方主义”的批判之声也从未消失过,指责作家一直秉承“自我东方化”的写作策略以取悦西方读者。由于相关的论文数量很多,而本文的篇幅有限,笔者仅选择两位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论述。

周冰心是在讨论海外出版的、以中国大陆为背景和经验的“中国语境”小说时论及了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与《疯狂》。首先,周认为,描述出“中国普遍经验的独特性和深刻性”的《等待》与《疯狂》称得上是“伟大的中国小说”。<sup>[13]</sup>但是,他也明确指出,《等待》“是一部描写中国男人被剥夺情感后自行矮化的残忍之作”<sup>[13]</sup>,充斥着新、老东方主义的各种隐喻。其中,淑玉的“小脚”及她与曼娜关系定位、野战军首长洪彭帆、魏副政委及恶棍军官杨庚三人旺盛的性欲、心有怨恨的曼娜在婚后对性爱的无节制索取、孔林的懦弱与无用以及小说中美国诗人惠德曼诗集的情节设计无不说明中国是一个亟待西方拯救的、落后且野蛮的国度;而小说对于毛泽东画像和像章的强调则表明作家对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新东方主义——的附和。《疯狂》中古诗副教授杨慎民的一生则是一种意念化、隐喻化的所指,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豢养”、“抄写”的处境,这与福楼拜小说中的“抄写员”是一致的,即东方是西方的抄写员。对于哈金小说因其中所隐藏的“东方主义”而出现的失真,陈广兴也提出了相同的质疑与批评。陈在文章中指出:哈金的中国故事原意在反思与批判权力、不合理的体制或制度对人性的压制,但是,不论是小说的细节书写或是小说的人物塑造,哈金的小说均是与其创作初衷相悖的。一来,哈金小说在细节上存在的诸多漏洞:要么与历史相悖、要

么缺乏基本的逻辑性、要么是太具有西方色彩,它们“消解了中国经验和真实性”<sup>[14]</sup>。二来,在人物的设计上,主人公缺乏灵魂与信仰:男性虽多为“知识分子”却“是一些缺乏行动能力的苍白贫血的窝囊废”<sup>[14]</sup>;或“麻木不仁和精神贫弱”<sup>[14]</sup>、或因“求名利不得而疯狂”、或因无能而走投无路;而女性则直接沦为“面目模糊、言行缺乏逻辑的叙事道具和表意符号”<sup>[14]</sup>,完全缺乏独立性。进而,陈认为,哈金在写作的过程中运用了西方人的视角以一种“轻视的怜悯”<sup>[14]</sup>由上而下地凝视着中国的人和事,藉由对中国的控诉与揭露来获取主流市场的认可。

但是,随着学界对哈金作品研究向深度拓展,2010年左右,逐渐有学者开始反思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在哈金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其实,早在2006年,刘俊再次论及《等待》时,也坦承,小说虽“暗合”了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但它“对惨痛历史的揭示和反思,以及对人在遭受苦难、折磨时仍保持人的尊严的描写,对复杂人性的深度开掘,都具有相当的道德勇气和思想深度”<sup>[15]</sup>,因而,运用“东方主义”之外的理论来重读这部小说,仍可看出其十分突出的“独特性与深刻性”<sup>[15]</sup>。2013年,哈金在接受国内报纸采访时,以“他们为什么不去‘贩卖’中国元素”<sup>[16]</sup>反击了国内研究者对其作品中“东方主义”元素的过分解读。

罗兴华、邹建军二人认为“东方主义”批评范式简单而过度的使用是哈金研究乃至当代美华文学研究的症结所在。因为,“‘东方主义’或者‘新东方主义’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中才可能具有较为确定的意义,但它能否成为衡量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商榷”<sup>[17]</sup>。而且,“东方主义”话语关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与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元并存的现状相左的。周聚群<sup>[18]</sup>认为,比关注哈金小说中的“(自我)东方主义”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应当持有的“客观公正的态度、‘见树又见林’的视野和对文学作品的综合分析”<sup>[18]</sup>,过于纠缠作品细节上的败笔或作家对于中国现实、中式文化的揭露与批判难免会抹杀哈金小说“应有的文学审美魅力和思想批判意义”<sup>[18]</sup>。毕竟,“从一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自己本民族的弱点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剖析”<sup>[19]</sup>的首创者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五四”作家,而且,哈金在其他的作品里也对其现居地——美国的社会现实展开了深度的揭露与严厉的批判。如王宁教授

所言,哈金的小说更多体现的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社会良知”,而非什么政治意识形态因素。

## 2. 文革书写

究其根源,国内研究者对哈金小说的诸多非议及其在国内出版时所遭遇的困难都与哈金的中国语境小说对于“文革”题材的涉及与书写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辞海》《在红旗下》到《等待》,这些小说(集)集中地描写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普通民众在“文革”——这一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的生活状态,而哈金借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经历的是是非非、遭受的精神桎梏叙述了普通国人在特定年代的伤痛体验,批判历史的反复无常对个体造成的无尽伤害。在小说中,哈金采用了一种近乎“零度写作”的方式<sup>[20]</sup>描摹刻画着人物本真的生活,在对人性的体现中“揭示政治的残酷和社会的弊端”<sup>[21]</sup>,同时他又从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来反思非常时期的中国经验,从而阐发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目前,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国内对于哈金的“文革”题材小说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其中还有不少是研究者在梳理海外华人文学对故国历史或记忆的书写时顺带论及了哈金的“中国故事”,如周聚群的博士论文《“红色”中国的“杂色”呈现——论海外华文/华人小说中的“文革”书写》(2009)、杨匡汉的《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2009)、刘俊的《论北美华人文学中的故国历史和个人记忆》(2014)。然而,在为数不多的论述哈金小说的“文革”书写的期刊论文中,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

就反对的声音而言,如刘克东等人的文章《哈金对中国的选择性呈现》<sup>[22]</sup>,研究者多是沿用之前的“东方主义”批评话语,认为哈金刻意在创作中误写或扭曲中国,试图用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中国来替换整个的现代中国,迎合和误导主流的读者以满足图书市场的需求。刘克东的论文便是以“清一色的负面主题”、“以偏概全的场景”和“怪诞的人物形象”为小标题对哈金的中国小说进行解读,刘认为,哈金之所以选取文革前后的中国作为其故事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外乎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胃口,符合西方对东方的思维定式,是东方主义的呈现”<sup>[22]</sup>,更何况小说中所选取的主题、场景和人物皆不具有代表性,因此,那些都是作家为了保证图书出版而制作的一种噱头而已。

从今天来看,上述这种东方主义的研究方法

显然不能很好地诠释哈金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的独特审美价值和意义。哈金对于“文革”题材的选用应与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也可能处于某种现实的考虑。毕竟,当代美国文学的感受力是建立在盎格鲁文学共同体的凝视基础上的<sup>[23]</sup>,身为华人移民作家的哈金是不可能随意跨越美华英语文学的题材界限的<sup>[24]</sup>。但是,相较而言,哈金在小说中,“文革”更似一朵阴云笼罩在70年代的边境军营、歇马亭小镇、木基市,只为芸芸众生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让他们在其中演绎着各自的人生,在一举一动中展露出人性的善与恶、也将国人的内心的阴暗面、国民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即便是最初颇受争议的小说《等待》,文革这一历史背景的建构也是完全为故事服务的,而作家对于“人”的关注则是小说的最大成功之处<sup>[25]</sup>,也是作家的写作深意所在。

杨匡汉<sup>[26]</sup>认为《等待》是哈金在“悲情”这一文化母题下所讲述的一个悲情故事,讲述的是“距离西方读者经历相当遥远,又往往被东方读者集体遗忘的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sup>[26]</sup>,只是,作家采用的远距离、隔岸式的客观关照“让一段‘文革’动乱的夹缝中生成的苦难爱情,以长夜漫漫‘等待’而来是麻木与苍白,却让人不寒而栗”<sup>[26]</sup>。罗义华<sup>[27]</sup>认为《等待》折射了作家对文革时代体制的反思与批判,但是,它“蕴含的有关于文革时代中国人‘存在’的生命哲学意义是伴随着对社会体制和个体心灵的道德性思考来获得的”<sup>[27]</sup>,而由于作家对“‘道德’的多维视角的深度观察”,它超越了一般的问个题材小说“而进入到一个时代中国人‘存在’的本真状态”,从而为当代的“文革叙事综合征”提供一种解决之道。正如哈金本人在在一次演讲中所提及的,他要写的就是一些普普通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故事,“透过一个人的经验来折射、反射当时的历史经验,而这从长远来看,就是对人生的一些基本现象进行思考和发问”<sup>[28]</sup>。

### 3. 语言与叙事风格

与引发众多争议,乃至遭人诟病的小说故事相比,哈金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叙事策略倒是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大多数的学者都在论文中表达出类似的观点:哈金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简洁而冷静的文风、平缓亲切的叙述语调<sup>[29]</sup>、浓厚中国色彩的英语和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而非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刻意迎合。作为一个在他乡

写作的异数<sup>[30]</sup>,哈金一直坚持用英语向西方读者讲述当代中国的故事,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其实不必多言。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作品几乎都获得了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为主流文学界所认可。应当说,哈金的非母语的文学创作应是相当成功的。

裴在美就对哈金短篇小说的语言风格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裴认为,哈金精准流畅的富有浓厚中国风味的英文行文铸就了中、英文“互为表里、相依相持、相互为用的英语中文叙事化的创作风格”<sup>[31]</sup>,这有利于其中的中国故事的展开和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而作品本身的真实性凸显现实的残酷、诡异、反复与变化。因而,哈金用英语写作中国故事能“使英语读者得以进入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阅读世界和深度的中国经验”<sup>[31]</sup>。马建在对高行健和哈金二人的对比分析中找出哈金小说语言的特点<sup>[32]</sup>:一方面,从未进行过中文写作的经历使他免受母语创作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单纯的写作动机——只为求生存——决定了哈金只会平铺直叙地讲述其所想讲述的中国故事,而非一种语言的翻译。实际上,“语言与思想、语言与艺术表达之间的”<sup>[33]</sup>唯一性决定了哈金的英文小说并非简单的中国故事的翻译。而高伐林<sup>[34]</sup>则从哈金对创作语言的选择中看出华人移民作家内心的挣扎。

较早关注哈金小说的叙事策略的康正果在分析小说《疯狂》时指出,作家“对叙述者的知情度作出严格限制的设计,本身就巧妙地制造了悬念,故此书中虽无离奇情节和强烈的戏剧化冲突,故事依然讲得引人入胜而耐人寻味”<sup>[35]</sup>,而这种叙事程式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在《战争垃圾》(War Trash, 2004)和《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 2011)出版后,亦有学者探讨了两部作品中的独特叙事模式。卫景宜认为,设计巧妙的小说《战争垃圾》虽显示出哈金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驾驭和对细节的重视,但是,小说叙事策略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削弱了小说应有的批判深度,致使这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本以真实的历史史料进行意识形态诠释的文本,它与一部伟大小说所应达到的人性认识有相当的距离”<sup>[36]</sup>(P. 303)。单德兴是从战争记忆的角度剖析了小说《南京安魂曲》,关注的是哈金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而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沉痛的民族记忆的重构与言说。单认为,哈金以文学的方式重写南京大屠杀“这个被忽略的悲剧”<sup>[37]</sup>以反抗“失忆和不公义”,其独特性在于作

家的想象力将众多的历史史料转化为文学艺术,即“使真实的细节发挥作用,使所叙述的史实足以取信并感动人,藉此产生一部独特的艺术品”<sup>[37]</sup>,而文学的再现则使南京大屠杀以一种升华的方式留在读者得到心中。

当然,与这些肯定与赞扬声同在的还有一些对哈金写作能力与水平的质疑甚至是责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是郜元宝的《谈哈金并致海外作家》一文。作为国内较早专文评介哈金及其作品的学者,郜元宝肯定了哈金作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也明确地指出,只用英文写“中国人的故事”的哈金是无法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因为,成年后出国的哈金很难领悟美国意识的精髓,却又与祖籍国现实隔离,在“对外既隔膜,对内亦脱节”<sup>[38]</sup>的困境中,英文写作、美国写作班的笔法、甚至文学描写技法的提高都无法掩饰哈金作品缺乏“精神背景的突进和对自我意识的建构”<sup>[38]</sup>——这一真正的文学内核的事实。

### 三、结语

在从2000年到2014年的15年间,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哈金作品的陆续译介与出版,哈金的小说逐渐成为国内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最初对小说内容的诸多非议到细致、深入地研讨作品本身的审美特质和艺术价值,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哈金的小说进行着不断的阐释,不断拓宽的研究视角帮助人们认识到哈金在作品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反思与批判,而作家对于普通小人物的关注、对人性中隐秘的阴暗与复杂的揭露与深入挖掘都体现出哈金文学创作与众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从上文笔者所做的文献综述也可以清晰地看出,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哈金小说的解读与分析还是较为客观和理性的,这仅从刘俊教授在2003—2014年间所发表的三篇论及哈金小说的期刊论文便可窥见一斑。但是,综观国内日渐深入且成果颇丰的哈金小说研究,研究者还是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与不足的。

#### 1. 研究主题和内容主要集中于哈金的代表作《等待》

仅就国内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这一项来看,在过去的15年间,直接以小说《等待》为题的论文就有20篇之多,约占全部论及哈金作品的研究论文的11.43%,其中,研究者分别从小说的标题、“等待”的生存哲学、人的个人情感和普遍人性等

多个角度展开了详细的解读。研究者对于哈金的代表作给予了极大的热情,相比之下,哈金的其他长篇小说,讲述中国故事抑或是华人移民生活,所受到的关注度要小很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源于国内学者初识《等待》时的特殊语境和心态,之后,哈金的作品频繁获得美国的文学大奖,这又促使国内的学者重新审视这部哈金的成名作,因而,相关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增加。

#### 2. 尚无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

应当说,在海外的华人文学抑或是美国华裔文学中,哈金所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成就是不可小觑的。然而,目前,不论是国内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还是海外华人/华文研究,都没有对哈金及其作品展开一个专门而系统的研讨,而更多的是将哈金的成功作为一个现象而非经典作家放置在美国华人/华文文学或华裔文学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论述。例如,胡勇所著的《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2003)和李贵苍所著的《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美国华裔文学》(2006)均未提及哈金。换言之,国内的学者更多的还是立足于某个视角对哈金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小说,进行专项的分析,或许,哈金确是一个在异乡写作的“异数”(单德兴语)。

受文章篇幅所限,此处笔者仅涉及目前国内哈金研究中存在的较为主要的不足。作为在海外直接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哈金的成功终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既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也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如邱华栋所言,“在哈金的身上,既体现了这个全球时代里文化交融与多远汇合的特征,也体现出他游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文化身份的差异和认同上的内心的复杂感受”<sup>[29](P.85)</sup>,这些都亟待研究者的重新认知与肯定。

#### [参考文献]

- [1]刘意青.拿诚实做交易——哈金和他的小说《等待》[N].2000.6.14.
- [2]刘俊.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呈现——论哈金的《等待》[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1).
- [3]陈爱敏.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观照[J].文史哲,2003(4).
- [4]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J].外国文学评论,2004(1).
- [5]欧阳婷.流散作家哈金的中国想象[J].中南大学

-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 [6]郭栖庆.无奈的等待等待的无奈[J].外国文学,2001(4).
- [7]施战军.《等待》:不要花招的杰作[N].中国图书商报,2003.2.28.
- [8]书玉.《等待》的意外——聆听小说的声音[J].读书,2001(11).
- [9]残雪.哈金之痛,2003,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2/27/content\_747909.htm.
- [10]张体.等待与生命的对话——浅析哈金的《等待》[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4).
- [11]江宁康.论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及形象阐释[J].南京社会科学,2004(2).
- [12]康慨.哈金赢得第三个小说大奖[N].中华读书报,2005.3.30.
- [13]周冰心.迎合西方全球想象的“东方主义”——近年来海外“中国语境”小说研究[J].华文文学,2006(1).
- [14]陈广兴.自由写作?——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悖论[J].中国比较文学,2009(3).
- [15]刘俊.第一代美国华人文学的多重面向——以白先勇、聂华苓、严歌苓、哈金为例[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6).
- [16]舒晋瑜.“如果我是‘贩卖’中国元素,他们为何不去‘贩卖’呢”——专访哈金[N].中华读书报,2013.4.10.
- [17]罗义华、邹建军.寻找东方主义:当代中国美华文学研究的文化症结——以哈金研究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0(3).
- [18]周聚群.论哈金小说中的国民性批判问题[J].华文文学,2011(2).
- [19]王宁.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华裔流散写作及其价值[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6).
- [20]赵毅衡.中国血统作家用外语写作[N].文艺报,2008.2.26.
- [21]刘俊.论北美华人文学中的故国历史和个人记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9).
- [22]刘克东、傅利.哈金对中国的选择性呈现[J].世界文学论坛,2011(2).
- [23]转引自王光林.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J].外国文学评论,2002(4).
- [24]李亚萍.论美华英语文学的题材局限[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2005(1).
- [25][美]王瑞芸.谈哈金小说写作中的无我状态[J].华文文学,2006(2).
- [26]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J].文艺研究,2009(2).
- [27]罗义华.《等待》中的道德问题和哈金的批判指向[J].外国文学研究,2010(6).
- [28][美]哈金.历史事件中的个人故事——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演讲[J].华文文学,2011(2).
- [29]邱华栋.哈金:中国底片和美国景深[J].南方文坛,2009(6).
- [30][台湾]单德兴.在他乡写作的异数与艺术[J].华文文学,2011(2).
- [31][美]裴在美.逼人的境况——谈哈金的短篇小说[J].华文文学,2006(2).
- [32]马建.重新开辟的语言境界——比较高行健与哈金的小说语言[J].华文文学,2006(2).
- [33]杨联芬.母语还是翻译?——谈海外华人文学写作语言[J].华文文学,2006(1).
- [34][美]高伐林.华裔作家哈金用语言体现移民的挣扎[J].中国新闻周刊,2008(11).
- [35][美]康正果.告别疯狂——评哈金的小说《疯狂》[J].华文文学,2006(2).
- [36]卫景宜.《战争垃圾》的叙事倾向[C].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二十辑),2014年春.
- [37]单德兴.重回战争,重拾记忆——评论哈金的《南京安魂曲》[J].华文文学,2012(4).
- [38]郜元宝.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责任编辑 南山)

# “道”载万物\*

——论库切的动物观

洪 芸 姜礼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 库切在小说中擅于运用动物意象。动物是他思考种族、文化、他者、生态等议题的重要载体, 种种议题又是他思索动物问题, 呈现独特人文关怀、深刻文化反思、强烈生态意识的媒介。库切并不否认动物的工具性, 而是利用动物的工具性价值挖掘出动物与人的互益关系。

**[关键词]** J. M. 库切; 动物观; 人文关怀; 文化反思; 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098-06

库切小说异彩纷呈, 包罗万象, 不仅涉及南非种族问题, 还深入剖析现代文明, 检视人类命运。这些宏大主题其呈现往往借助动物意象。在创作中, 库切将人类问题与动物问题作类比, 借动物问题实现与人类问题的联接。在某种程度上, 理解动物是打开库切小说深刻内涵的一把金钥匙。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做出检视之后, 他探究生态主义思想下人与动物如何和谐共处, 在对动物问题历经了从人文关怀, 到文化反思, 再到生态衡量的嬗变之后, 他逐步完成了动物观的构建。

本文主要选取《等待野蛮人》(1980)、《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铁器时代》(1990)、《耻》(1999)以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 八堂课》(2003)等五部重要小说来探讨库切的动物观及其在不同阶段历经的改变, 揭示在种族纠葛、文化反思和身份构建过程中动物同人类问题的相似性和连接性。研究认为动物与复杂人类社会关系的并置, 不仅是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也是对动物种群人文关怀的体现。探讨动物形象

的嬗变, 看清动物如何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过程, 对我们理解库切的动物观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对于“道”的参悟是他动物观的集中体现。

## 一、人文关怀: 工具型动物到主体型动物

库切对种族问题的关注是毋庸置疑的, 黑白种族之争致使两个民族相互仇视, 白人用暴力武装自己, 宣称带来文明; 黑人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最终反败为胜。在这二者争斗的过程中, 动物作为毫无反击能力的一方也被迫卷入其中。库切有意将人类的生存与动物的处境并置在作品中, 通过工具型到主体型动物形象的转变, 反思人类在殖民活动中的罪恶与悲怆, 试图基于同情和爱的人文立场实现种族之间的和解。

库切在作品中再现了工具型动物的悲惨命运, 人类对其的杀戮如同黑白种族之间的战争一样残忍。自人类掌握先进工具以来, 动物就作为人类的附属而存在, 其价值体现在人类的食谱、衣物和娱乐功能上。西方传统价值观认为, 人与动

\*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创新基地(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道载万物——论库切的动物观”(kfj20130230)、“后殖民动物批评理论研究”(NR20120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优秀工程建设项目“西方文学‘研究型’教学的新探索”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4-10-10

**[作者简介]** 洪芸, 女, 安徽安庆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姜礼福, 男, 山东临沂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物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在这边，它们在那边。”<sup>[1](P.3)</sup>动物被认为是没有感受的机器，对其的杀戮成为人类获取利益或是快感的游戏。在《铁器时代》中，库切罕见地用一段细节描写记录了流水线式杀鸡的场景。在卡伦太太送她的女仆去找她丈夫时，她目睹了如下的情景：“他要做的是猛然出手逮住一只鸡，倒拎着鸡身，把它夹在自己的两膝之间，往鸡爪上箍上一只金属环，然后传给下一个工人，一个小伙子。那人把鸡悬吊起来，鸡在头顶上呱呱乱叫，扑棱着翅膀，吊在啾啾啾的传送带钩子上的鸡就被送进了棚屋。那里有第三个工人，穿着血迹斑斑的防水布工作服，拽住鸡头，抻开鸡脖子，咔嚓一刀把鸡头割下。那把刀很小，就像是他手掌的一部分，他以同样的动作节奏把鸡头扔进一个盛满死鸡头的大桶。”<sup>[2](P.39)</sup>杀鸡者重复了15年这个工作早已变得无动于衷，当杀戮变得轻车熟路，人也就丧失了对生命的尊重。从这一点上看，人类对动物的利用和杀戮与白人对黑人的暴力殖民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动物遭受的苦难与人类的苦难是具有可比性的。在库切越来越频繁地将动物带入作品中时，不难发现大多数的动物依然只是“沉默的他者，它们在人类的手中遭受可见的痛苦。”<sup>[3](P.185)</sup>早在1789年边沁就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发出这样的声音，“可能有一天，其余动物生灵终会获得除非暴君使然就决不可能不给它们的那些权利……一个人不能因为皮肤黑就要遭受任意的折磨而得不到救助。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腿的数量、皮肤绒毛的形式、骶骨终端的形状都不足以作为让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遭受类似厄运的理由。”<sup>[4](P.349)</sup>边沁以他的功利主义原则来为动物权利辩护，而库切则为动物代言，“动物不能为自己说话，为他们说话是我们的义务。”<sup>[5]</sup>呈现动物遭受的痛苦是库切激起人类对动物存在的敏感性必不可少的环节。

然而，正是这种苦难上的可比性才迫使人类发觉动物的主体性存在。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动物不再是残忍人性的体现，而是人类美好品德的提醒，人类对动物主体的关注代表着人类道德感的提升。库切的作品亦不乏人类肯定动物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叙述。在《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送蛮族女孩回到自己的部落，途中一匹马不堪重负即将死去，于是同行的士兵决定将此马杀死分食，“我发誓动物绝对有灵性有感知。一看见刀子，它的眼睛就惊恐地转动起

来。”<sup>[6](P.92)</sup>在《耻》中，那些即将被安乐死的动物，“好像也感到了死亡的耻辱；它们的腿直直地僵着，得把它们拽着、推着，甚至得抱着才能越过门槛。被压在桌子上时，有的拼命左右挣扎，有的则悲鸣哀嚎，谁也不正眼看贝芙手里的针管。”<sup>[7](P.166)</sup>正是这些对动物被杀害前状态的细致书写，才使得人类深刻地洞察人性，反思自己的过错。人类对于动物的无情杀害就像附着在人性上的耻辱一般，然而这样的耻辱在种族隔离的语境下却可以作为检验道德的标尺，如同卡伦太太说言，“我以羞耻感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只要我感到羞愧，我就知道自己并没有堕入耻辱。这就是廉耻心之所用：作为一块试金石，始终搁在那儿的某个标杆。”<sup>[2](P.169)</sup>库切并没有回避人性中恶的部分，他借卡伦告诉读者只有勇于去面对过错和耻辱，才有道德提升的可能，才能真正去关注非人类动物的生存。而这种对动物道德意识的提升也必定能提升人类彼此间的关爱意识，这也正是动物可以作为种族和解桥梁功能的原因。

人类同动物之间的关系早在库切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1974)就已论及，但更侧重于人类对土地的占有。依据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大地包括着土壤、水、植物、动物、甚至人，因此，对土地的占有亦是对动物的伤害。在随后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又重现这种思想，除了侧重人类对土地的寸寸占据，这部被誉为“后基督时代神话”<sup>[8](P.94)</sup>作品的主人公通常还被类比为动物而存在。在这两部作品中动物纯粹作为工具型而存在，而随着创作的日渐成熟，库切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也日渐丰富，如在《铁器时代》中工具型便开始与主体型并存，相较于之前的《等待野蛮人》中初次显露的、难以觉察的主体型动物而言，《铁器时代》中的主体型形象更加的鲜明。动物从工具型向主体型的转变表明了人类对动物态度的积极发展，表明“对动物(存在)的敏感性逐渐成为荣誉的一种标志。”<sup>[9](P.80)</sup>库切对动物主体性的关注，不仅是他对这个种群的关怀，也是他把对人性的批判和完善建立在善待动物理念上的艺术实践。

## 二、文化反思：主体型动物到尊严型动物

通过对动物生存悲惨处境的叙述，读者在作者的感召下对动物投以人文关怀，关注动物的主

体性,给予动物生存的权利。然而,随着动物解放运动的开展,文化反思则更着重于是否需要给予动物尊严。在《铁器时代》中库切借卡伦之口表明了时代循环的观点,人类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理应朝着进步的方向走去。他渴望一个代表着“人心柔顺的时代”<sup>[21](P.48)</sup>的到来,虽意在描述人类社会的进展,但放在对动物形象的又一次转变上也合乎情理。1999年出版的《耻》刻画的是一个政权更迭的崭新南非,没有了战争的硝烟,柔软时代看似已经到来,然而黑白对立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对动物的关注也呈现出新的问题。动物是否具有意识,是否需要被尊严地对待成为库切新的思考,作品《耻》则最大程度地放大了尊严型的动物形象。他将此时期的动物问题与种族中个人的身份重构问题结合,用人类对动物从人文关怀到文化层面的思考、基于尊严的角度来实现对动物种群进一步的关注,同时也实现黑白种族个人的身份重构。

库切常把人物命运的走向与动物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把目光聚焦动物本身,投以人文关怀。动物解放运动倡导的最基本的观点是反对虐待动物。托马斯·阿奎那在《彼得·伦巴德〈箴言四书〉注释》一书中指出“一个人若对动物有怜悯之情,他也会更加对人类有怜悯心。”<sup>[10](P.233)</sup>米兰·昆德拉也认为“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是看他与那些受其支配的东西如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sup>[11](PP.477-478)</sup>库切亦站在同样的立场,把善待动物建立在对人性的批判和完善上,因此《铁器时代》中卡伦太太最终能够真切体认动物的立场。虽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卡伦太太对自己圈养多年的猫并不十分在意,心情不好时,可以随意呵斥,“谁在乎啊?”<sup>[2](P.10)</sup>然而,随着自己遭受癌症困扰、亲历棚户区黑人孩子遭到杀害、自己房屋遭到白人种族狂热分子强占等事件,她发生了巨大转变。她不仅认识到自己身上承接的耻辱,也对动物的生存权利予以真诚地思考。“我总得为它们做点什么,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sup>[21](P.32)</sup>在屠宰场目睹的流水线杀鸡的场景更是将这种体认上升至巅峰。对动物的人文关怀是作为人的基本道德素养,而从更深一层次来说,这种关怀也是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做出反思的基本抵偿。白人迫害黑人,黑人亦屠杀动物,如果人类不能够在这个序列中逐级地给予人文关怀

的话,如果每一级都不能更好的完善自我,那么每一级都有沦为他的可能。

然而,在动物的主体性得到人类关注后,库切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人类文化的功利性。将动物的生存仅依靠在人类的人文关怀上的这种作为一定程度上站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它们从人的立场去考究动物的价值,决定其是否有生存的必要。这种人文关怀层面的依靠还远远达不到库切的要求,他要做的就是从文化层面反思,检视人类的功利文化。狗作为库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意象,也代表着文化的利己性。在《耻》中,狗是南非大地上最寻常的家养动物之一,在原先主人的家里奉献着忠诚,甚至在遭到遗弃之后,还一如既往。然而,动物的忠诚、责任心都是驯化的结果。对他们的忠诚进行称赞实则是对人类自身力量的赞美,在自我欣赏中,人类忘却了对动物的伤害。正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库切钟爱叙述的那只猿猴“红彼得”一样,它身着晚礼服、学说人话、在科学院学者的面前演讲,取悦人类,失去了动物原本的样子。人类长久致力于动物的异化,不仅是对动物主体性的漠视,更是对动物尊严的抹杀。“库切怀疑的不是动物自身,而是构建、分类动物以使之于人类有益的文化手段,”<sup>[12](P.9)</sup>通过对人类理性的非理性内容进行的深思,他检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

库切对动物尊严的呈现几乎都与主人公巨大的身份颠覆同时完成,因此它不仅成为文化反思的基点,也成为动物问题与身份建构问题联接的平台。动物在获得基本的人文关怀之后,能否被人类尊严地对待不仅于动物有直接益处,同时也于人类有反思的效用。动物的权利被给予之路与人类的权利争取之路在这一点上极为相似。在殖民时期黑人视生存的权利为反抗的重点,在获得权利之后,如何有尊严地活着自然成为追求的重心。然而,人类社会的问题又比动物社会的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白人的身份重构问题上,在南非的大地上他们不曾为生存的权利担忧过,但是在沦为边缘化他者时,他们却比黑人更渴望有尊严地生活。然而,这种身份重构中自我与他者的嬗变,仅依靠人类独立完成并非易事,于是作品中大量动物并置的意义便显露出来。《耻》的主人公卢里自从来到黑人聚集地区的农场,他作为白人教授的骄傲和尊严便逐步丧失,农场被洗劫、自己被打伤、露茜被强暴的事件让其知道白人已在南非



彻底失势。面对露茜悲观绝望的态度,“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狗一样,”<sup>[7](P.237)</sup>面对她不顾尊严嫁与黑人以求留在农场的做法,他虽知尊严尽失,却无能为力。然而,他顾及动物尊严的做法实际上却寄托了对身份重构的美好愿望。南非杀戮动物的状况他无法改变,但他选择将动物的尸体一点点捋直、专门送到焚烧厂,面对焚化炉厂的工人用铁锹敲打尸体的做法,他直言“他可不愿意把如此的羞辱强加于这些尸体。”<sup>[7](P.167)</sup>卢里自身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只说这“就是为他自己。为自己理想中的世界。”<sup>[7](P.169)</sup>卢里对动物尸体尊严的捍卫,不仅出于人对动物个体的基本人文关怀,也是对如何完善自我、做好他者的文化反思。“通过对动物虐待的持续感知,库切主人公们的道德意识都提升至新的层面。”<sup>[9](P.79)</sup>不仅人类的道德再次提升,对动物尊严的捍卫亦说明了库切对更好世界的期盼,期待尊严无论在何时、因何事,都能如期而至。

伴随着殖民活动在南非大地上的消解,基本的生存问题已得到解决,无论是动物抑或人类都渴求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中生活。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层,理应不用担忧自然生存的问题。然而,人类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却迫使下一阶层的人或动物为上一层所左右,从而得依靠来自上一层的人文关怀才能得到生存的权利。同时,人类处于道德的高地,理应不用担忧尊严能否被赋予的问题,然而,人类群体中固化的优劣种族概念迫使人类去思考尊严的问题,反思尊严能否被捍卫,能否被给予。库切从人文关怀能给予动物生命到文化反思能给予动物尊严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动物问题与人类身份重构问题上的相似性,表明了完善自我道德素养和及时做出文化反思的重要性。

### 三、生态衡量:尊严型动物到权益型动物

动物一切权利的得失都直接取决于人类对其的态度,进行文化反思后给予动物尊严似乎成为人类最后的一次让步,要让动物与人类平起平坐似乎是个不可能的命题。库切记录了人类从将动物视为工具到将尊严给予动物的转变,改变不易,他肯定了这种良好的趋势,但也流露出了新的疑问: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人类是尽全力尊重和保护环境让其与人类和谐共存,还是出于生态平衡牺牲部分动物的生命?进入新的世纪,人类似

乎也进入了借着各式法律、法规捍卫自己权利的年代。在权益锱铢必较的时候,动物能否争得属于自己的权益还是又再次沦落为新的工具存在是库切的又一个疑问。《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动物的生命》一章又再次提及了动物遭受的困境,对大量肉类的需求使得牲畜工厂每天不停歇地屠杀动物,暴露了人类的残忍,貌似旧的循环在上演。然而,以往的殖民主义因其血淋淋的本质早已遭到唾弃,新的消费主义却正大光明的存在着。库切要做的便是剔除这种合理性,让人类正视文化中消费主义的实质,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实践为人和动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出路。

库切在作品中对于动物问题的思考历经了三个时期,这与历史上动物解放运动的开展基本保持了一致。对动物权利的呼吁和维护日渐得到人类的肯定和重视,但是面对最初的动物解放理论和如今的生态思想,都存在着一个最后利益的权衡标准的问题。毫无疑问,二者均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自然界中的动物和人类的生命同等重要,应尊重动物存在的权利。然而二者的差异性却决定了人与动物利益问题的不可调和性。动物解放理论把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和保护看作是检验人性善恶的标尺,认为只要动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它就拥有获得人文关怀、免遭痛苦的权利。但无疑这也是从人的角度来决定动物的生死境况。生态主义思想立足于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物种优胜劣汰的法则,强调整个种群的集体利益,认为个体的生命价值是从属于其所属种类的价值,它并不考虑某个物种的个体利益。因此,当动物问题被放到生态视野下叙述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动物解放理论支持者的反驳,就连美国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都说,“这在道德上似乎是完全忽视了它们的个性,把每一个个体都视为实现整体系统的目的的手段”,但是他的立场仍是“整体系统能产生更高级的个体。”<sup>[13](P.231)</sup>人类的利益是否高于动物的权益之上、动物与人类该如何实现和谐共处是库切在作品中探讨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在自然环境日渐恶化时共同面对的难题。

库切关注动物的权利,但是他的作品中动物最后通常被置于死亡的境地,他也时常面临着是否要牺牲动物的生命保全人类利益的困惑。在《铁器时代》中,卡伦太太在自己行将就木之前决定将自己的猫施行安乐死,她认为自己应该为动

物做点什么,好像她自己肩负着减轻动物痛苦的义务和使命。在《耻》中,动物福利会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库切困惑的一个证明,“福利会”,顾名思义,是为捍卫动物权利而存在的福祉,然而在南非却成了动物生命被终结的地狱。被送来福利会的动物几乎之前都是看家狗,但是一旦老了、生病了,就被主人弃于此处默许被杀死。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在大多时候更视自己的权益高于动物之上。对于福利会的作为,库切在作品中借卢里之口表达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你所做的,她所做的,都值得尊敬,可对我而言,关注动物福利的人们都有点像某一类的基督教徒。人人都那么兴高采烈,人人都那么心怀善良愿望,同他们相处一会儿,就让人想逃离开,去干抢劫强奸的勾当。”<sup>[7](P.86)</sup>因此,读者可以看到人类在某些时候秉持捍卫动物权利的口号,却并未真正从动物的主体性关注它们的生存。在获得诺奖接受大卫·阿特威尔的访谈中,库切这样说道,“文学生活,或者为我们提供了拷问我们生存方法的其他生活方式——作者的幻想、象征或故事——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好的生活,即在伦理上负责任。”<sup>[14]</sup>库切对伦理道德的捍卫在其作品中极其容易发现,如同越来越多的人类认识到动物的重要性一样,他们将动物“视作具有情感、并在交流中展露这些情感的个体,因而人类对动物有道德义务。”<sup>[15](P.2)</sup>然而,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库切书中的人物几乎都没能将这种道德持续到最后,这不仅是库切对个体觉醒能够改变整个世界对动物态度和作为的迟疑,同时也是对人与动物最终该如何利益最大化地实现和谐共处的困惑。

库切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就是否该以动物为食的问题,他认为不能因动物没有意识而对其杀戮,他的做法也同样能为个体做出改变提供参考。在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他借伊丽莎白之口发问:“他们没有任何意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因此随心所欲地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我们就可以因此随心所欲地屠杀他们吗?为什么?我们所承认的意识在形式上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杀死一个有意识的人是一宗罪行,而杀死一头动物却可以免受处罚?”<sup>[16](P.101)</sup>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库切对传统的从动物是否有意识来确定动物生死的观念的否定,他认为人与动物应该真正实现平等,单从这一点看,库切算作是一个动物解放主义者,秉承着对动

物权益和生命的尊重,坚持素食。然而动物解放理论主张全人类的素食主义,而且相信人类最终势必走向素食。因此,库切又并非是这种理想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困惑更多的表明了他生态主义者的立场,完全素食主义在当前还是难以做到,因为形成上亿年的生态链不可能短期内被打破,食物链的上一环对下一环的捕杀和食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自然系统的不断和谐演进势必意味着种群中的个体要贡献出生命。美国约翰卡罗尔大学的克勒然教授指出,“纯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思辨往往导致政治上、伦理上的麻木,库切的小说却通过对权威和真理的质疑,寻找到了自身话语的位置。”<sup>[17](P.579)</sup>在面对人类能否以动物为食的困境中,库切也做出了妥协,而他的妥协也代表着整个人类所持的态度,适度即合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库切更强调对自己的约束,只有先让规则存于自己的心中并践行,最终才能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存。

#### 四、结语

库切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就关注殖民活动对人类精神和身体的摧残,毫无疑问人类问题是他关注的基点。关注人类问题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动物这个弱者在人类社会的悲惨遭遇,转向对动物问题的关注。然而,动物生存的独特性又让他看到了动物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对动物问题的探究和反思,又有利于人类问题的改善。因此,顺其自然地,人类的问题又成为了他关注的终点。库切的动物观看似与传统中将动物视为工具的做法并无二致,然而却有根本的差别。在深刻检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他将动物视作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工具,但是更将动物视为人类问题解决后的最大获益者。他在乎动物与人类的和谐共存,在乎动物在人类社会如何被有仁爱、有道德地对待,在乎人类社会人与人如何相处。因此,梳理动物形象的逐步转变有助于人类更好的认识动物与人的关系,书写人类对于动物态度的转变也有助于动物更好的生存。可以说,他的动物观里既包括了对动物的关怀,也涵盖了对人类的关爱。在接受动物权利杂志 Satya 的访问时,库切曾说“人类想占据动物的意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命题,但通过同情(遭遇相同而产生的同情)人类有可能真切了解成为另一些人或物是什么感受”。<sup>[18]</sup>这种站在彼此的立场,出于爱和同

情体谅弱者的存在,是作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对仁爱道德的肯定、对自然内在规律的遵循,是库切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也是他动物观的集中体现。

[ 参 考 文 献 ]

- [1] Malamud, Randy. *Poetic Animals and Animal Souls* [M]. New York: MacMillan Pala grave, 2003.
- [2][南非]库切. 铁器时代[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 [3] Oerlemans, Onno. *A Defense of Anthropomorphism: Comparing Coetzee and Gowdy* [J]. *Mosaic* 40. 1, 2007.
- [4][英]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5] Coetzee. J. M. *Animals Can't Speak for Themselves—It's up to us to do it* [DB/OL]. 22 Feb. 2007.  
< <http://www.theage.com.au/news/opinion/animals-cant-speak-for-themselves-its-up-to-us/2007/02/21/1171733841769.html> >
- [6][南非]库切. 等待野蛮人[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 [7][南非]库切. 耻[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8] Marijke, V. V. *Beyond words: Silence in William Golding's Darkness Visible and J. M. Coetzee's Life and Times of Michal K* [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48. 1, 2005.
- [9] Donovan, Josephine. "Miracles of Creation": *Animals in J. M. Coetzee's Work* [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43. 1, 2004.
- [10][澳]辛格·彼得. 动物解放[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 [11][捷]昆德拉·米兰.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12] Baker, Steve. *The Postmodern Animal* [M]. London: Reaktion, 2000.
- [13][美]罗尔斯顿·霍尔姆斯. 哲学走向荒野[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14] Coetzee. J. M.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J. M. Coetzee* [DB/OL]. 8 Dec. 2003.  
< <http://www.dn.se/kultur-noje/an-exclusive-interview-with-j-m-coetzee/> >
- [15] Donovan, Josephine., and Carol J. Adams. *The Feminist Care Tradition in Animal Ethic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6][南非]库切.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 [17] Colleran, Jeanne. *Position Papers: Reading J. M. Coetzee's Fiction and Criticism*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5. 3, 1994.
- [18] Coetzee. J. M. Interview with J. M. Coetzee [J]. By Henrik Engstrom. *Satya* (5), 2004.

(责任编辑 南山)

## 向死而爱

——论《灿烂的星》中死亡与永生的对立统一

方娇艳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灿烂的星》作为约翰·济慈最出众的十四行诗之一,代表了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这首情诗在表达济慈对爱人绝望而深沉的爱情时,将死亡与永生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引入,并将世俗的爱情与人性的自然相互融合,表现出一种深沉而感人的力量,也透露出诗人对世俗爱情的急切渴望与对爱人的深深眷恋。

**[关键词]** 《灿烂的星》; 约翰·济慈; 死亡与永生; 爱情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104-04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85-1821)在其1819年7月25日写给他未婚妻芳妮·布劳恩的书信中,曾写下这样动人的字句:“我散步时沉思着两件最珍贵的东西:你的可爱和我死亡的时刻。哦,要是我能在同一瞬间拥有它们该多好”。<sup>[1](P.271)</sup> 纵观济慈的一生,他短暂的生命确实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父母撒手人寰,弟弟因病亡故,最终他自己也没能逃脱英年早逝的噩运。这种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也不可避免地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来,尤其可见于那些写给芳妮——他的爱人和除诗歌之外的唯一激情所在——的情诗中。事实上,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济慈,以致于即使在他沉浸于爱情的甜蜜中时,他也无时不被一种随时可能失去的恐惧、萦绕在心的疑虑和将爱情永恒定格的急切渴望所折磨,这一点尤其可见于他生前的绝笔之作——《灿烂的星》中。在济慈生平所作中,《灿烂的星》这一十四行诗的诗歌地位和成就虽然不如他闻名于世的四大颂歌——《秋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及《忧郁颂》,但作为济慈最后的也是最出色的莎士比亚式十四行诗,它依然代表了济慈极高的艺术成就,堪称英国十四行诗中的登堂之作。这首诗

赞颂了“心灵所爱的神圣”<sup>[2](P.102)</sup>,而死亡的阴云也恰恰在诗中挥之不去。诗人济慈由于经济和健康的原因,最终无法与爱人芳妮在尘世共结连理,因此,正如 Michio Sugano 所推论的,济慈“出于一种对在圆满的爱中沉溺而亡的渴望”<sup>[3]</sup>而写下这篇哀婉动人的十四行诗,以此作为致爱人芳妮的离别辞。而在这首十四行情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死亡和永生的这一对相互交织的矛盾双方贯穿于诗中,无不透露出诗人对渴望将世俗爱情永恒定格而不可得的内心挣扎。

同许多天才诗人一样,济慈写下《灿烂的星》的灵感来源于旅途中的不期而遇。据济慈的书信记载,济慈于1818年在湖区游玩时,曾对其弟弟汤姆·济慈说道,那里的自然景致“纯洁了一个人的感觉力,使其成为类似北极星那样,永远地睁着眼睛,坚定地注视着那至高无上的威力所创造的奇迹”。<sup>[2](P.252)</sup> 此后的1820年,在去往意大利的途中,即济慈生前的最后一次旅行中,济慈将这一年现的灵光整理书写,遂成就了这一篇伟大而感人的十四行情诗。诚然,将星辰的意象用于表达爱情并非济慈的首创之举,但这首诗歌真正引人入胜之处却在于诗人在表达其绝望而深沉的爱情理

**[收稿日期]** 2014-12-10

**[作者简介]** 方娇艳,女,福建永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想时,将死亡与永生引入,将世俗的爱情与人性的自然相融合,表现出一种深沉而感人的力量,也透露出诗人对世俗爱情的急切渴望与对爱人的深深眷恋。

通读《灿烂的星》可以发现,全诗包含了显而易见的两个层次,即从天上到人间,由自然景观过渡至世俗世界。在前八行诗中,济慈将自然世界人性化,并且追索生命的意义:

灿烂的星!我祈求像你那样坚定——  
但我不愿意高悬夜空,独自  
辉映,并且永恒地睁着眼睛,  
像自然间耐心的、不眠的隐士,  
不断望着海滔,那大地的神父,  
用圣水冲洗人所卜居的岸沿,  
或者注视飘飞的白雪,象面幕,  
灿烂、轻盈,覆盖着洼地和高山——<sup>[4](P.1058)</sup>

诗起四行,通过拟人化地直呼“灿烂的星”(“bright star”),诗人开始描绘一幅夜空灿烂、星辰闪烁的背景画面:夜空中只见明亮的星“辉映”(“splendor”)着,注视着尘世的一切,犹如“自然间耐心的、不眠的隐士”(“patient, sleepless Eremite”)。这灿烂闪耀的星星不眠不休、亘古不变,促发了诗人“像你那样坚定”(“steadfast as thou art”)的向往和渴望。然而,诗人同时也意识到,这灿烂的星星并非毫无缺憾——它虽然灿烂闪耀,却只能“独自辉映”(“lone splendor”);它虽然永恒不朽,却只能“高悬夜空”(“aloft the night”),一种孤独惆怅之情不禁溢于言表。言下之意在于,在诗人的眼中,这灿烂的星由于与世俗尘世远隔万里而显得太过于寂寥,太超脱世俗。接着,诗人又勾勒出一幅尘世中的带有神圣色彩的自然图景来衬托和比拟这灿烂的星辰——冲洗着“人所卜居的岸沿”的“海滔”(“moving waters...round earth's human shores”)、“覆盖着洼地和高山”的“飘飞的白雪”(“new soft fallen...snow” on “the mountains and the moors”)——这些无不呈现出自然本身的平静与和谐,却不无惆怅和寂寥。而诗人所用的“神父”(“priest-like”)、“圣水冲洗”(“ablution”)这些明显带有宗教意味的词汇,使得灿烂的星所带有的孤清、贞洁等明显指向呼之欲出。永恒、圣洁并且超脱尘世的星辰的形象不言而喻。因此,诗人才会意味深长地把此处的星星比作“隐士”,而众所周知,隐士通常“为了获得某种超验体验而脱离社会联系”<sup>[5]</sup>,也因此离群索居

的隐士往往保持着禁欲和简朴的风范,但这恰恰是诗人所不愿接受的:

呵,不,——我只愿坚定不移地  
以头枕在爱人酥软的胸脯上,  
永远感到它舒缓地降落、升起;  
而醒来,心里充满甜蜜的激荡,  
不断,不断听着她细腻地呼吸,  
就这样活着,——或昏迷地死去。

第九行起,诗人笔锋陡转,“不”(“not”)字将全诗的意境和视线转向了世俗人间,准确地说,是诗人所真正热爱与留恋的人间情欲的温暖和爱人的温存。显然,“不”字坦露出诗人不愿像星星一样冷漠地禁欲的情感指向,虽然他仍然渴望如星辰一样坚定不移且永恒不朽。而读者只有在读到最后六行诗时,才能发现诗人在诗歌寄托下所真正渴望拥有的——甜蜜而醉人的凡间情爱。在最后六行诗中,诗人将视线从神圣而冷清的宇宙自然转向现世的温暖情爱。对于诗人来说,现世爱情的温暖恰恰就在于他的爱人(“fair love”)不像星辰一样高悬远隔,而是如此的近在咫尺——他可以安然陶醉地枕在她的“酥软的胸脯”(“ripening breast”)上,时刻感受着“它舒缓地降落、升起”(“its soft swell and fall”),听着“她细腻地呼吸”(“her tender-taken breath”)——这些无不让他“心里充满甜蜜的激荡”(“in a sweet unrest”)。很明显,此处诗人运用了大量细腻大胆的感官知觉的描写,调动了视觉、感觉、触觉、听觉等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呈现出一个真实而温暖的凡间爱人,虽然不免笼罩着情色色彩,但其对于诗意和情感的传达却显得如此真实动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使那永恒不朽却冰冷遥远的星辰黯然失色。相较于诗人头顶上那冰冷遥远且远隔人世的宇宙星辰,他的爱人是他眼里全部的宇宙和世界。到这里,诗人对自然的诵叹的目的才真正揭开——诗人巧妙地以自然界中的事物为媒介和寄托,吐露他对芳妮深沉感人、矢志不渝的爱。有意思的是,在这首情诗中,诗人运用了看似毫无联系的类比,将自然与爱人并置于诗中所构建的丰富的意象世界中。而事实上,一些学者,如 Colvin Sidney 就指出,此处自然世界和女性身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他的爱人的酥胸恰如刚刚落下的白雪一样洁白轻柔,并且起伏如海滔波浪。<sup>[6]</sup>学者 David Ormerod 就此推论,济慈实际上是将整个宇宙想象成一个女性的裸体。<sup>[5]</sup>这种解读虽不免带

有情色色彩,但就诗人在此前所传达的对星辰的禁欲的不满和拒绝而言仍略为可信。正是因为和爱人在一起能够带来这种世俗的极乐,所以诗人才会留恋充满情欲的人间世界,并祈盼像那灿烂的星一样坚定而永恒,以此延长人间欢爱的极致幸福,一晌贪欢。这个愿望对于诗人而言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诗人在诗中多次运用词语重复的手法来表达——全诗可见四次“不断地”(“still”),三次“永远地”(“ever”),而同时,虽然译文中两个同义词合并翻译成“坚定不移”,但原文中“steadfast”紧跟着同义词“unchangeable”的这种语义重复再一次强化了诗人对于永恒的祈盼,或者准确的说,是对诗人任凭时光如何流逝,只愿“就这样活”(“live ever”)在爱人的臂弯中的渴望。

然而愿望终究只是愿望,人终难免一死,济慈也曾在他给芳妮的书信中这样痛苦地哀叹道:“死亡最终必然降临;人终难免一死”。<sup>[1](P.368)</sup>在写下这首十四行诗的当时,济慈仍在与病魔顽强搏斗,然而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死亡之手随时可能将其扼喉。济慈本人也情知自己命不久矣,他与芳妮也将永远无法终成眷属。这种哀婉伤感、绝望痛苦在他另外一首诗歌《每当我害怕》中更加直白地流露出来:

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  
我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一堆书,在文字里,  
象丰富的谷仓,把熟谷子收好;  
每当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见  
传奇故事的巨大的云雾征象,  
而且想,我或许活不到那一天,  
以偶然的神笔描出它的幻相;  
每当我感觉,呵,瞬息的美人!  
我也许永远都不会再看到你,  
不会再陶醉于无忧的爱情  
和它的魅力!——于是,在这广大的  
世界的岸沿,我独自站定、沉思,  
直到爱情、声名,都没入虚无里。

被病魔摧残折磨的济慈深感时间如白驹过隙,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恐怕难以将诗名永恒,同样无法紧握的,还有他恋恋不舍的恋人,而死亡也终将携他离开尘世。这些诗句将诗人祈盼在死亡来临前珍存爱情和生命,以及二者随时可能失去的焦虑和恐惧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来,透露出他面

临死神时的疑虑、恐惧和绝望。然而,在《灿烂的星》中,诗人似乎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而择他路而行——如果对于他来说要逃脱死神的魔爪已不可能,那么他选择在他和爱人的甜蜜爱欲中“昏迷地死去”(“swoon to death”)。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似乎获得了其梦寐以求的新的一种永生,即在爱人的臂弯中死去<sup>[7](P.260)</sup>,以期将他们的爱情永恒定格——也许,在爱情的狂喜的刹那,死亡让诗人感受到了永恒<sup>[8]</sup>。对于诗歌的最后四行,有学者推测,济慈运用了委婉语来暗指“性交的永恒——在性爱高潮的狂喜中永远重复地彼此拥抱”<sup>[5]</sup>,不管这是否真是诗人本身的所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诗人是如何超越人类的短暂生命而获得爱情的永生?对于这一问题,也许可以在最后一行的细味中得到答案。在最后一行中,诗人通过连接词“或”(“or else”)似乎暗示道,对于他而言,“就这样活着”等同于“昏迷地死去”,因为二者都是获得永恒状态的途径。据此,有心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济慈另一首名诗《希腊古瓮颂》中的类似情境,即通过将古瓮上的男女爱人相互追逐的画面被定格下来,二人的青春得以永恒不朽,也因此,其爱情虽然未圆满实现却得以永恒。<sup>[9]</sup>

另外,通过比较本诗的两种版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诗人在对爱情的呼唤中,对于死亡和永生所持有的态度。这两种版本除了极小部分的改动外几乎完全一致,唯一比较明显的改动在最后一句。在1838年9月27日的《普得茅斯和德文波特周报》上刊登的第一种版本中,最后一句是这样的:“Half passionless, and so swoon to death”,而在1848年题为《济慈最后的十四行诗》的Holograph版本(也是目前广为流传并且普遍认可的版本)中则变成:“And so live ever—or else swoon to death”。此处有两处改动尤其引人注目:一是通过将“Half passionless”改成“and so live ever”,“ever”一词与前文形成语义重复,济慈对坚定不移和永生不朽的渴望溢于言表;其次,通过连词的改动,即将“and”改成“or else”,诗人似乎有意突出爱情与死亡之间明显的反差。诗人通过“and so”似乎告诉读者,在情欲的高潮之后,死亡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在爱人间世俗情欲所带来的极致幸福之后,人的死亡是自然并且无可避免的。凡人肉体必然灭亡,那么凡人的感情也难免易变或者随之消亡,因此,诗人对于保持爱情永恒的祈望只是徒劳;而“or else”正如上文所析,至少还表明虽然他

是肉体之身,却还有可能获得永生,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罢了,也就是说,他和爱人的爱情能够在他们的甜蜜爱欲的巅峰体验中得以不朽。这种选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无徒劳和自欺之嫌,但却与诗人文中所表露的强烈的愿望相契合,并且巧妙地解开了诗歌开始所制造的永恒与世俗之间的矛盾。

在《灿烂的星》这一首十四行诗中包含着多种矛盾体:星星永恒不朽却孤寂清冷,超脱于尘世、不食人间烟火,却也因此缺乏人间的温情;尘世的爱情温暖而甜蜜,但却终将有一天消逝;诗人自身面临着随时降临的死亡却仍旧祈盼永生。这些矛盾虽然无法消解,但济慈通过诗歌达成了某种妥协与平衡,甚至是超越。通读全诗可以发现,济慈在诗中呈现出了两种永恒:一种是永恒运转但却孤寂禁欲的宇宙星辰,而另一种则是诗人与爱人在其个人的小宇宙中的永恒定格的世俗结合,任凭时光流逝也不改。诗人作为尘世中生命短暂且拥有欲望的个体,诚实地面对自己作为世俗凡人的局限,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他拒绝了神圣而广袤的宇宙的不朽而选择了次等的人间情欲,将爱人以及与爱人甜蜜的肉欲结合置于神龛,也因此得以将其爱情永恒定格于诗歌所创设的充满张力想象的世界中。恰如他对芳妮所深情许诺的那样:“我可以为我信奉的宗教而殉亡——爱情就是我的宗教——我可以为爱而献身——我可以为你而献身。爱情是我信奉的教义而你是唯一的信条”。<sup>[1](P.334)</sup>死亡本身并不能真正将其威慑,而他假若难免一死,那么他愿意在甜蜜爱情的极乐之中无悔地死去。

与头顶苍穹中星星相比,济慈本人也是一颗明亮但却短暂的流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下的众多诗篇中,《灿烂的星》虽不是最夺目的那一篇,却闪耀着温暖的人性光芒。在这首感人的小诗中,济慈渴望留住甜美的爱情时光和不舍的爱人。

而当他在面临死亡这一严酷现实时,济慈实现了死亡的浪漫想象和爱情理想的书写——“枕在人间情爱这一尘世之床上”<sup>[10]</sup>,同时也通过将其爱情在诗篇中永恒定格,济慈证明了爱情可以比死亡更强大,也可以比星辰更加永恒不灭。

#### [ 参 考 文 献 ]

- [1] John Keats. *Letters of John Keat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2] John Keats. *Keats's Poetry and Prose* [M]. Ed, Cox, Jefferey 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 [3] Michio Sugano. Was 'Keats's Last Sonnet' Really Written on Board the 'Maria Crowther'? [J] *Studies in Romanticism*, 34.3 (Fall, 1995).
- [4] 查良铮. 英诗金库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5] David Ormerod. *Nature's Eremite: Keats and the Liturgy of Passion* [J]. *Keats-Shelley Journal*, 16 (Winter, 1967).
- [6] Colvin Sidney. *Life of John Keats: His Life and Poetry, His Friends Critics and After-fame* [M]. New Delhi: Vishvabharti Publications, 2007:300.
- [7] Anita Ghosh. *Recritiquing John Keats* [M]. Eds, Nagar, Anupam, and Amar Nath Prasad. New Delhi: Sarup & Sons, 2005.
- [8] 张萌,王谦. 追求永恒之旅——济慈《明亮的星》赏析 [J]. *群文天地*, 2012(5).
- [9] Newell F. Ford. *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 in Keats's Poetry* [J]. *Keats-Shelley Journal*, 20 (1971).
- [10] Emily Grosholz. *Clouds, Sensation and the Infinite in the Poetry of John Keats* [J]. *The Hudson Review*, 53.4 (Winter, 2001).

(责任编辑 南山)

# 早期现实主义油画本土化进程及当代性演变\*

朱 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西洋油画作为舶来品在中华大地从落地生根到开枝散叶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油画的发轫期,写实、写意和表现等多种样式并存。在20世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写实主义油画逐渐蔚成气象,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油画。新中国成立后,油画又围绕民族化的主题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当代性转变,体现了中国油画在时代呼唤下的文化选择。本文围绕油画技法的引入与早期本土化探索实践、油画民族化的延续与现实主义创作观的建构、时代大潮下现实主义油画当代性转变等三方面,对油画的本土化进程和当代性演变历程进行论述。

**[关键词]** 现实主义油画; 本土化; 当代性

**[中图分类号]** J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108-05

从初识西洋油画到远渡重洋求学,再到引入国内学校美术教学体制,中国油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油画的发轫期,艺术风格上传统与现代共生,写实与写意并存,诸多流派各展其能,共同推进了早期中国油画的本土化进程。历经战争洗礼和社会的多重变革,围绕“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两种艺术观念的激烈论争,中国油画努力探索适合20世纪特定社会情境的艺术道路。顺应时代激流和民族独立意识的需求,早期写实油画立足生活,自觉走近大众,强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和大众价值观,使得写实主义油画逐渐壮大并占据时代创作主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识形态和宏观文艺导向进一步推动了油画写实主义向中国特色现实主义的本质转变。面对当下时代巨变,中国写实油画正在努力拓展以实现与时俱进的当代性转变。毋庸置疑,时代选择并造就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油画,其历史性的演变历程是中国艺术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正如靳尚谊所言,“现实主义是中国油画的文化选择”。

## 一、油画技法的引入与早期本土化探索实践

油画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如果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给万历皇帝敬献圣像画算起,粗略估计已四百余年。但是,油画正式进入中国课堂教学还只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至今也不过一百余年的历史。油画自传入之初就与“写实”结下了不解之缘,万历年间的圣像画上所绘圣母和耶稣因栩栩如生而使国人大为惊奇。时至清朝,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来华宫廷画师,为迎合帝王趣味也绘制了一些写实油画作品。乾隆时期朝廷还曾专门组织画师向来华传教士学习油画技巧,晚清已有不少中国画家掌握了西方明暗造型法等写实技巧,譬如曾鲸等波臣派的人物画作品就能窥见西洋明暗烘托手法的运用。西洋写实油画在小范围的传播过程中,国人由疑惑好奇到逐渐接受和主动学习,这些早期油画实践具有开拓和试验的意义。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巨变,西方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朝野经历了创痛,“师夷长技以制

\* [基金项目] 201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图像时代油画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拓展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254)。

[收稿日期] 2014-12-10

[作者简介] 朱平,男,江苏如皋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夷”成为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重要命题。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洋务运动”迅速兴起，与此同时也将西方主体文化形态及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介绍和引入到中国。基于这一时代背景，1902年清政府参照日本学制颁布“壬寅学制”，颁行新型学堂的办学章程。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之一部分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下第三节“预备科课程门目表”中规定“艺科”开设“图画”课程，拟聘请“外国教习授”课。”<sup>[1](P.59)</sup>从此，图画课遂在中国学校课堂普及开来。1906年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科开设油画课程，聘日籍教师任教，是为中国学校美术教育之先河。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压倒性的影响，识图和制图成为学习科技的迫切需要。中国学校美术教育引入西方绘画的最初动机是从绘图的实用角度出发，而并非绘画本体语言和媒介的主动引进。中国传统画坛看待油画这一异质画种的基本态度，是将之限定于作为弥补中国绘画缺陷的某种艺术手段。在大部分中国画家看来，西方绘画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和写实性要比油画本体的艺术审美更具吸引力和利用价值。

学校美术教育是中国油画早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它将油画的引进和演化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研习。20世纪初，真正推动中国油画起步和发展的是众多海外留学生和各类专业美术院校，他们对于油画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油画早期本土化进程与他们的努力息息相关。“清末民初之际，同样出现了几位重要的中国留学生画家。其中可以以李铁夫、李毅士、吴法鼎、冯钢百等为主要代表人物。”<sup>[2](P.28)</sup>他们是中国油画界所不能忘却的先驱，正是他们介绍了不同于东方绘画的艺术之媒，引入了西方油画的宝贵火种，这在深受灾难和自强图存的社会情境下是难能可贵的。

李铁夫约1887年进入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在伦敦学画九年。后又入美国纽约美术大学研习油画达十年之久，1930年回国隐居于香港。李铁夫虽技艺精湛但艺术推广不多，对早期中国油画的发展影响有限。李毅士于1907年入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在校五年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学院主义训练，回国后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李毅士以严谨扎实的写实风格而著称，为写实主义油画的推广和本土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06年李叔同进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11年3月学成归国，后应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担任图画手工科西画及音乐教员，教授素描和油画。李叔同是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最先从事油画教学实践的教师，并在国内率先采用石膏模型和人体模特进行写生教学。可以说，李叔同率先迈出了中国油画本土化实践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油画由酝酿发展的“前夜”转入正式起步阶段。

1920年代起，大批有志于西画的青年陆续去日本和法国留学，掀起了中国留洋学习西画的高潮。这一时期，留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艺术的各种流派，回国后投身中国油画的发展事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留学欧洲还是日本，中国留学生研习的焦点都集中于学院派写实主义、印象派主义等具象写实的流派，真正皈依野兽派等纯粹现代主义的画家则不占主流。学者水天中说，“中国留学生是在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学习西方绘画的。最初一批留学生到法国时，西欧画坛已经是野兽派、立体派、“桥社”及“青骑士”们驰骋的天下。但学院派画家在美术学校里仍居主导地位。徐悲鸿投师达仰、高尔蒙门下，学习传统的写实技巧，他的选择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份留学生的心理和志向。他们远涉重洋，是为了学习中国所不具备的艺术。”<sup>[3](P.59)</sup>徐悲鸿留学欧洲八年，对于油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着重关注绘画写实技巧的吸收，其油画作品已经流露出中西融合的气息，已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学院派的古典主义。

“在近代画史上，被称为“画坛三重臣”者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不但精于国画，更是杰出的油画家，又是在美术教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美术教育家。”<sup>[4](P.411)</sup>20世纪上半叶在油画本土化进程中，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三人可谓功绩卓著。民国时期以纯正严谨的写实风格而著称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油画家当推徐悲鸿及颜文樑。颜文樑于1922年创办的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呼吁“提倡画术，互相策励”，在学习西方油画艺术流派上倾向于借鉴印象主义。徐悲鸿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为油画教育和创作实践基地，移植西方学院派写实规范，倡导忠于自然的写实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回国后旗帜鲜明地提倡写实，他最欣赏的是法国画家梅松尼埃、热罗姆、蒲吕东等，却对我们认为的“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和杜米埃等

人并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词,他在油画教学中也没有极力推介和褒扬法国的“现实主义”。究其原因,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只是停留在艺术风格和样式层面,并不包含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与建国后文艺理论界所阐释的“现实主义”有着的本质区别,后者所包含的阶级观念是徐悲鸿所无法预见的。

通常情况下,外来文化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意识的改良,这一点在西方写实油画的引入上也不例外。“凡是留学归来的油画家,尽管他们在西欧受到了古典写实主义,或后期印象派、表现派甚至抽象派的影响,但是,在他们的油画创作中,都融入了中国的民族性和中国画家自己的个性。”<sup>[4](PP.435-436)</sup>虽然“油画民族化”口号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大力弘扬的,但是早期油画家已经开始自发地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正是中国油画家恪守的自主意识和民族性成就了油画多元发展的早期格局。而经过时代精神的洗礼,中国写实主义油画在民族性及社会意识的两相推动下转变为现实主义。

## 二、油画民族化的多样探索与现实主义创作观的建构

民国时期,推动油画本土化发展的主干是大批归国留学生。20世纪20年代起,这些油画家群体以上海、南京、杭州和北京的几大美术院校为平台展开油画艺术的创作与教育实践,引领了中国油画艺术运动的主潮。由于民国时期的美术学校国立、私立并存,艺术氛围相对宽松,艺术家的个性意识可以得到自由发挥。因此,这一时期油画艺术的样式和风格呈现流派纷呈、多元共生的局面。在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整体进程中,这一时期的油画家群体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延续了李铁夫、李叔同等早期油画家的本土化进程,使得油画在学校教学和艺术运动领域继续深化和推进。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油画民族化探索指向及经验积累对后来的油画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启迪。

以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代表的办学机构,由于体制正规,学生众多,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三个院系,奠定了民国油画画坛的基本格局。上述三所美术院系在办学的过程中,遵循各自的办学宗旨,倡导具有一定倾向性的艺术流派。上海美专倡导以梵高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注重自我意识和艺术表现自由,对学生的

创作倾向没有统一的要求。杭州艺专设立之初即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为蓝本,它以调和中西、创造时代艺术为目标,力图成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中坚的美术学府。“南京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开办于1927年,主持该系教学的有画家徐悲鸿、吕斯百等人。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唯一的定学制为四年,毕业生可以取得学士学位的美术系科。中大艺术系既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绘画技能,又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以比较严格、系统的基本训练著称。”<sup>[5](P.60)</sup>与杭州国立艺专和上海美专的油画家们相比较,南京中大艺术系油画群体坚持严整朴实的写实主义而具有鲜明的风格特质。中大艺术系以西洋写生法作为改造本土美术的切入点,在移植和实施法国学院派油画教育体系的同时,主动契合中国文化意蕴实施油画民族化的初步探索,在民国艺坛产生了强大的学术影响力。

从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构成来说,主要有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延安美术学派以及苏联的现实主义等三个来源。毋庸置疑,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倡导的写实主义是中国本土现实主义的最早源流,也是早期写实主义油画的开拓者和培育者。学者苏立文认为:“如同对待外来文明的影响一样,外来的美术风格、样式和技法是否能在另一国度扎下根来,完全取决外来艺术是否能够满足该国的需要。”<sup>[6](P.313)</sup>1937年抗战爆发后,文艺宣传成为艺术界的首要任务,现代派的样式因曲高和寡很难在群众中产生共鸣,而写实画风的艺术作品则更能贴近抗日宣传的需求。徐悲鸿主持的中央大学艺术系践行“艺为人生”的理念,其油画创作与“救亡图存”的社会理想相呼应,凸显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它促进了油画艺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推广和普及,为本土油画由“写实主义”向更具精神内涵“现实主义”的超越作了积极铺垫。

在20世纪中国特定社会情境下,西方油画的引入及其在中国的早期发展,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研习,由模仿、移植到融合、发展,逐渐融入民族血液的本土化历程。经过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社会变革的历练,现实主义逐渐壮大成为中国油画的主流。这些都为新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时代大潮下现实主义油画当代性转变

“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在英文来源都是一

个单词“Realism”，两者的含义并无明确差异。但在中国理论界这两个专业词汇有着不同的内涵，“写实主义”是一种技法层面的偏向于外在风格和样式的描述，而“现实主义”，更多地强调在表现客观事物时关注现实本质和内在精神指向，其艺术手法并非单一的写实如真。我们熟知的欧洲现实主义画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库尔贝、米勒和杜米埃等，他们油画创作来源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社会底层人物，如库尔贝的《打石工》《筛糠妇女》、米勒的《拾穗者》、杜米埃的《三等车厢》等。他们真实地描绘和再现底层民众在现实生活的原始状态，不加美化与修饰，体现了画家对于日常生活中伦理道德和思想上“现实”的关注。

纵观世界美术史，“现实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记录了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同时，现实主义的发展也受到时代因素、社会形态以及艺术个体参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现实主义油画以中央大学艺术系倡导的写实主义为源头，它酝酿于抗日战争爆发的这一特定时期，此时，艺术作品的表现意识让位于教化功能，写实主义在潜移默化中过渡到现实主义，并由此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特色现实主义油画体系，长期引导中国美术的创作主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饱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及对美好新生活的憧憬。现实主义油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占据中国油画创作的主导，这也是主流艺术家们的共同追求。“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后，是中国油画建立统一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的阶段。中国艺术的高度统一之所以成为现实，是由于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体制化进程所促成的。经过政治性整合，艺术创作由个人行为变为从属于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sup>[7](P.116)</sup>邵大箴曾说，“1949年—1965年虽然油画艺术受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干扰，艺术家的创造积极性不时受到限制甚至遭到打击，但油画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艺术家们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作品。”<sup>[8](P.30)</sup>这一时期的油画作品是否都属于“现实主义”范畴还应作具体分析。一方面，许多油画家心态真诚，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歌颂生活，内容积极向上，画面形式完美统一，这些都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时代佳作。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艺术作品的形式与现实内容脱节，艺术水准平庸且脱离个人真实情感，属于“假”现实

主义。总体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绘画还是有了深入的推动和发展，是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丰收季节。“十年文革后出现的“伤痕绘画”及后来的“乡土风格”同样因现实主义写实手法而打动观众，单一的思想内容与现实主义写实绘画的完美结合促成艺术家为人们认识理解特定时期的国家命运及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形象诠释。以中国油画本土化的语言来表现时代主题，展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sup>[9](P.156)</sup>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新的艺术形式涌入国门，日渐固化的现实主义油画面临时代性的巨大考验，写实主义陈旧的表现形式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映衬下而凸显了滞后性。受西方当代艺术“实验性”的辐射与冲击，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油画也急需实现当代性的转变。基于上述原因，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因受到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构成主义等流派的影响，在融通中呈现出更为开放和多元的特征。

进入90年代，现实主义油画的当代性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当代艺术的实验性也逐步消解现实主义的某些特征。一些标榜“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已经带有超现实的荒诞意味，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的既定内涵。受“观念至上”文艺思潮的影响，装置、行为和影像等艺术形式大行其道，传统现实主义油画一统画坛的局面也面临终结。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架上绘画都将面对当代性转变的必然趋势，这与当下艺术实践的实验性与多元化发展进程高度一致。

中国现实主义油画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而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受特定国情和中国传统绘画精神以及画家个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一直延续着油画民族化和时代性的多维探索。现实主义创作取材于世俗生活，使广大观众获得了天然的亲切感，它以丰富多彩的现实风土人情为题材，揭示和引导人们认识和思考社会现实的多种冲突与矛盾，在审视现实客观性的同时引发人们关于审美取向和社会价值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现实主义在当下依然具有持续解读现实的巨大潜能。尚辉在谈及本世纪中国油画发展的趋势时说：“写实性油画在中国获得的发展机遇。既是中国主流美术倡导的艺术大众化和贴近现实生活的价值观的结果，也是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美术的一种传承。对于前者自不必赘言，它是这个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体现。”<sup>[10](P.81)</sup>在信息时代的潮

流下,中国油画的现实主义之路拥有了更为开放的发展空间,现实主义油画的内涵和形式正顺应时代而实现转变和拓展。笔者认为,当今现实主义油画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时代精神、主流意识和意向特征,更多地发展和演变成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它突破了原有单一的思维方式,正在实现原有写实主义手法和既定现实主义内涵的拓展和超越。

#### 四、结语

靳尚谊认为,“现实主义还需要发展,从西方到中国,现实主义曾经在不同时期经历过发展,由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新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到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以至今天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等等,都表明它是一个能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艺术观念。”<sup>[11](P.14)</sup>时至今日,当代艺术形式已经日渐多元,架上绘画、装置、行为和影像等多种艺术样式已经呈现互相影响和渗透的趋势。面对当代艺术纷繁复杂的局面,现实主义油画以何种态度面对和介入,实现自身拓展和当代性转变将面临新的挑战,也是油画界亟待解决的前沿课题。

从本质上说,现实主义油画是一种运用造型规律认识和表现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在关注现实精神的前提下,体现对于客观自然的艺术提炼和思想升华。是故,我们不妨借鉴20世纪西方先锋艺术的“实验性”原则,将其引入到现实主义油画的当代性拓展之中,在实验中参考各种有益于现实主义发展的现代风格及流派。在坚守现实主义基本精神和内涵的前提下,兼收并蓄,内化民族精神的真实性与时代性。同时,从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汲取有益养分,大胆开发创造性思维,实现油画语言和创作方法的外向拓展。毫无疑问,当下现实主义油画仍旧保持了强劲的发展态势,并将与时俱进而永葆活力。

#### [参考文献]

- [1]崔卫.学校制度下中国美术教育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三江师范学堂与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
- [2]李超冲.中国现代油画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
- [3]水天中.油画传入中国及其早期的发展[J].美术研究,1987(1).
- [4]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下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5]水天中.油画传入中国及其早期的发展[J].美术研究,1987(1).
- [6]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 [7]水天中.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油画的发展趋势[J].荣宝斋,2010(4).
- [8]邵大箴.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国油画100年[J].美术,2000(8).
- [9]王鹏.西画东渐及中国油画的现实主义[J].文艺争鸣,2009(7).
- [10]尚辉.写实——仍是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油画的主潮[J].中国油画,2012(1).
- [11]靳尚谊.现实主义与中国油画主流[J].美术,1995(4).

(责任编辑 南山)

# “以中为本”“以今为魂”

——论关山月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的发展观

张曼华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20世纪初,对中国画坛影响最大的社会文化因素是西学的冲击,中国画的改革势在必行。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关山月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画教学,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作出极大的贡献。他提出中国画创作应立时代之意,对“用西洋画改造中国画”的方法提出质疑,坚持以“中”为核心的创作原则,并将这些在创作实践中悟出来的精神贯彻于中国画教学中,培养了大批中国画人才,同时积极有效地推动了岭南画派的发展。

**[关键词]** 关山月; 以中为本; 以今为魂; 中国画创作; 教学

**[中图分类号]** J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113-04

20世纪前期的岭南画坛,以高剑父、陈树人和高奇峰等人创立的岭南画派与赵浩公、李凤公、黄般若等人的国画研究会为两大对峙主流。前者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后者重倡传统,延续国粹。1926年,方人定在其师高剑父授意下发表《新国画与旧国画》一文,主张改革旧国画,国画研究会随即以黄般若为代表写文章辩驳应战,论争焦点集中于:岭南画派攻击国画研究会“全事模仿,埋没性灵”,国画研究会则讥其“剽窃西洋画皮毛”,学习日本画乃逆势而行,且格调不高。论战被称为“方黄之争”,这场以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引发的冲突,标志着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岭南画派和国画研究会自此成为两大堡垒,两大流派因绘画理念、创作主旨及其传派等因素引发的论争一战就是四十多年。

关山月生于1912年,1936年入春睡画院,他对老师高剑父十分敬重,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论争之中。在很多人仍在质疑岭南画派最初提出的“折衷中西”的局限性、作为新旧论战的代表人物方人定观念的变化等是非问题的时候,关山月则对岭南画派的意义及其发展表达了成熟而深刻

的见解。他在《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sup>[1](P. 213)</sup>一文中抓住岭南画派的核心精神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他指出“岭南画派的产生,是顺应当时的革命思潮,对陈陈相因,了无生气的旧中国画坛,起到了一定的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岭南画派就是日本画的翻版”,“岭南画派的特点主要是爱用熟纸、熟绢加上撞水、撞粉的技法”等评价只是看到了画派的表面特点,并没有抓住其本质特征。关山月认为“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艺术法则对促进新国画的发展是行之有效的。岭南画派的“折衷中外”,绝不是中外绘画的生拼硬凑,他强调“‘折衷中外’,以‘中’为本;‘融合古今’,以‘今’为魂”,不但是岭南画派重要的艺术主张和艺术特色,也是其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的中坚代表画家,关山月坚定地认为中国画需要变革,关键是中国画的变革可以抛开传统吗?他指出:“国画要变,但无论怎么变仍然是国画。”<sup>[1](P. 45)</sup>

关山月先生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建立与中国画教学新体系做出贡献,为国家培养的大批美术人

**[收稿日期]** 2014-12-29

**[作者简介]** 张曼华,女,江苏扬州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才。<sup>[2](P.164)</sup>当中国画的教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关山月宣扬守住中国画的根本,是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 一、立时代之意

关山月先生被誉为现代中国画坛新现实主义画家,在其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通过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因而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都极富艺术感染力。

在《我与国画》一文中,关山月强调:“我们的文艺,要表现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要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要注意社会效果,要给人民以美的享受,要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强调艺术家应该有积极的态度,正确的立场,革命的世界观、艺术观,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如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画花鸟还寄意于八哥反目,画山水还立意满纸剩残……先不说古人这样画也是与当日的政治攸关,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时代如此命笔,起码也属于过去就深有所感的‘自擅一家何足道,游离群众哪能行’一类。”“只有艺术不脱离政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伟大的抱负的艺术家,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sup>[1](P.42)</sup>

在《〈关山月纪游画集〉自序》中也曾说:“不动我便没有画。天气变异的刺激更富于诱惑,异域的人物风土的刺激使画稿不致离开人间。”艺术不能脱离生活,但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粗糙的但最基本的东西,它以最生动、最丰富的自然形态存在着,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这是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的道理。而艺术作品却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是生活不等于艺术的所在。在《美国之行》一文中说得更加明确:“绘画一定要跟上时代,不反映生活,同时代的脉搏不合拍,画就没有生命。”<sup>[1](P.55)</sup>

关山月《我走过的艺术道路——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画的变革应该持为发展而继承的观点:“生活源泉是前提!怎样画,首先要有生活,这就要抓住两个问题:源和流。”“我们强调重视和集成传统,不是为继承而继承,而是为发展而继承,因此要批判地继承,不能用以前的东西来替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sup>[1](P.19)</sup>岭南画派常盛不衰的秘诀正在于这样的高瞻远瞩的继承观。既有原则性,亦有灵动性:继承——不是全面复古;借鉴——不能全盘西化。

### 二、对“用西洋画改造中国画”的观点提出质疑

岭南画派历来将“折衷中西”作为中国画革新之大纲,这也是20世纪初西方文化涌入后的大势所趋,然而,解放初期,美术院校在改革中中国画课程几乎被取缔,美术院校不再设中国画系,只有绘画系,而绘画系学的课程很多,有素描、水彩、油画和水墨画等。其中,水墨画课与中国画最接近,但其教学内容只设单线平涂的年画,原来从事中国画教学的老师失去了“用武之地”,只好靠边站。中国画的前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并不是岭南画派倡导中国画革新的初衷。

在《有关中国画基本训练的几个问题》<sup>[1](P.107)</sup>一文中,关山月对以西洋石膏基础练习为一切绘画基本功训练的说法提出质疑:“有人认为中国画教学必须运用西洋画的方法进步才快,主张从学习西洋画入手,甚至还有人主张以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相反,也有人认为从学习西洋画入手是走弯路,甚至还会妨碍中国画教学的进展。为什么这两种看法距离那么远,而经过了许多年的争论还未得到解决呢?”关氏指出问题不在于是否采取西洋画教学经验,而在于西洋基本功训练法是否对国画发展有利?在教学实践中,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才能逐渐证明画石膏圆球并不能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中西绘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不应盲目学习西方教学法,他进而指出中西绘画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们各自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和不同的要求:“一方认为非用明暗不能表达物象的真实;另一方却认为不用明暗也同样可以表现物象的真实。”因而借西润中之法不可流于表面形式,他以梅花为例,中国画与西画写生表现的着眼点迥然不同,中国画的观察和表现注重“掌握梅花的固有特征和它的生长规律,从不变的物象来分析它们的特征,把花、萼、蕊、全开的、半开的和花蕾以及嫩枝和老干的具体对象区分开来,才进一步在忠实物象的基础上要求运用各种表现方法来分别体现出它们的不同特征。”而与西方写生以光、色的明暗关系来表现物象的手法完全不同。“由于双方对所谓真实的概念存在着不同的要求。若不从两个根本不同的造形体系来理解,盲目地采用西法是不会对国画有利的。”

然而,在美术教育的改革中,中国画从材料到基础训练内容都发生了改变:“解放初期,中国画

曾经被称为‘彩墨画’,美术院校的中国画系改称为‘彩墨画系’。当时只强调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课时很少,而人物画西洋素描最多。这意味着,画中国画可以抛弃传统,教中国画和学中国画都可以抛开传统。”<sup>[1](P.45)</sup>在“西洋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理论指导下,学生被强制画苏联契斯卡柯夫模式的素描,只注意从光暗求面,对于提炼为表现结构的线毫不重视,即便落笔屡有误差,还可用橡皮改。如此基本功的训练方法,成为当时国画教学的误区。因此,关山月多次提及“橡皮的功过”,他对橡皮在中国画基础训练中的弊端提出申讨,“橡皮对于中国画无功过可言,但求助它来进行中国画基本训练的人有过。其过在:涣散了中国画强调心脑眼手并用于整体地观察物象的集中注意力,模糊了中国画以线分析物象结构的整体认识,干扰了中国画发挥表现物象的线条威力的系统锻炼。我因而主张中国画的基础训练要用中国的毛笔写传统的白描,以便有志于画中国画的人一开始就认真以线写形,养成画局部必联系全局的整体观念,从而刻苦磨练大胆落笔的功夫而不做依赖橡皮的懒汉懦夫。”<sup>[1](P.86)</sup>

为了克服西方素描练习多用手、少用眼和眼的习惯,他强调以白描作为中国画教学基础训练的必要性,采用传统的方法用毛笔画人物白描,由于不能动辄求救于橡皮,学生就必须首先对对象详加审察,一下笔便牵涉全局,只有通过眼脑手三者同时训练,长期坚持练习,下笔才能又狠又准,不但画出来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记在脑子里的形象也时时复活,既磨练了笔墨,又积累了生活。“因而,我主张用毛笔直接在宣纸上根据人体结构来描绘人体的形和神,而不是随着不同光影的变化以面来体现人物的形而难以捕捉千姿百态的神。”<sup>[1](P.70)</sup>

总之,关山月认为中国画创作可以适当融入西洋画的一些元素,他不注重物象的立体感,认为这不是绘画本质性的东西,中国画创作仍应从传统哲学思想中寻根溯源。他对中国画教学提出以中国画传统的白描为基础,吸收西洋素描中线描一派的优长,建立与中国画系教学全程相适应的中国画素描基础课,以逐步完善地建立中国画系教学的新体系。

### 三、坚持以“中”为核心的创作与教学原则

关山月在创作实践中始终坚持“折衷中西”以

“中”为核心的原则。关山月所有的绘画思想都可以在传统中国画论中追溯其源头,比如前文提到的“立时代之意”,即石涛所云“笔墨当随时代”;对“用西洋画改造中国画”的态度,是通过教学实践来证明对西洋画法学习的生搬硬套只能使中国画走向消亡,必须重新坚定传统基本功训练的立场;关于形象的塑造问题,仍与传统文人画追求的“不求形似”观无二;他强调以书入画,书画同源,诗情画意,法无成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等,都能在传统绘画精神中找到其原型,而正是这些亘古不变的中国画创作规律,维护着中国画的立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深入浅出,灵活运用。

“骨气源书法,风神藉写生。”这是关山月常写的一副对联,强调书法用笔、以书入画的重要性。“中国画特殊的笔墨纸工具,中国人特有的书法的传统所历久形成的线条,是中国画画法的骨脊,由它派生出来的皴擦点染等笔法,积破泼焦等墨法,统为手段,都成血肉,使中国画成为一个神全气足的躯体。”<sup>[1](P.81)</sup>

在基础课教学上强调用毛笔写生,才能发挥中国画写的特色,才能把要写的形象记入脑子里,才能积累生活的多种形象。而书法形式美在中国画中的体现还包括笔迹的干湿浓淡、粗细曲直、疏密聚散等等对立统一的变化,从中追求行笔快慢转折的韵律与节奏感。关山月指出,如果绘画只是“写形”,写不出神韵,即在形式上缺少书法中的这种艺术气韵,是不会吸引读者观众,不会有感染力量的。<sup>[1](P.98)</sup>

树立了正确的传统入门观之后,关山月进而强调传统基本功的训练应严格要求、提出中国画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提出要坚持“四写”,即临摹、写生、速写、默写,是一种较全面的基础锻炼。“中国传统艺术的教学方法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要求在启蒙时必须有个正确的开端,对最基本的训练要采取严格的态度。例如写字首先要讲究执笔的方法,一笔要体现一波三折的功夫,都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勤学苦练,而且必须有个正确和严格的开端,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改旧衣是麻烦事。”<sup>[1](P.110)</sup>只有经过这样严格的传统基本功训练,在用笔时才能达到准确无误,而这个“准”是练出来的,不是橡皮擦出来了。

对于中国画的形象塑造,关山月遵从中国画追求以形写神,似而不似的精神内核。他提出“真

境逼神境,心头到笔头”,背离物象,创造形象的创作观。从大量艰辛的创作实践中,关山月凝练出中国画特有的造型观点,即“胸有成竹”的时候,画家满脑子都是形象的积累才能产生“气韵生动”的中国画作品。“气韵生动”来自其所说“法度随时变,江山教我图”;“自然中有成法,手肘下无定型”;“得意云山行处有,称心烟雨写时来”……这种来自生活、师法自然的成法,就形成中国画落笔随意称心,变化奇妙无穷的生动气韵。

中国画强调形神兼备,以形写神,不求形似,不似而似。关山月反对追求纯粹外形的酷似,更反对西方天马行空抽象变形所谓现代主义风格。他的不求形似的观点亦有源可溯:“中国画的学习过程有这么几个阶段:即第一步是不似,第二步是似,第三步又是不似。”<sup>[1](P.113)</sup>他认为中国画处处讲究对立统一,注重神意、气韵等形外因素,在形神观上,将不似作为绘画创作的最高追求,然而,却不能完全脱离形而存在,关山月否定那些将“形”之根本抽去的主张“中国画的赋形若与自然界的物象对照,不管中国画画家把所追求和显现的神说得怎样神乎其神,曰气曰韵,曰心曰魂,曰质曰采,曰情曰意,但终究不外为了神乎其形,其形总不外处于似与不似之间。如果所赋的形标榜神气十足但离形万丈,或根本把‘象’抽了去,并无形迹可寻,那就很难说是中国画。”<sup>[1](P.81)</sup>他批判那些借中国画追求“不似”的观点而欺世盗名之人:“有些所谓‘先锋’的或现代的新潮派(指的不是勇于进取的先行者),既不讲生活内容,也不讲艺术形式,只用‘自欺欺人’的魔术般的特技手法来卖弄所谓‘笔墨’,这种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欺世盗名的不正之风,如果在中国画教学上也受到宣扬与传播,只能把学生引入歧途而误人子弟。”<sup>[1](P.64)</sup>

他进而提出中国画的创作不是直接描绘对象的,不论画山水、花鸟、人物、动物都可以背离物象而创作:“在实践中,我认识到用毛笔写生是分析对象、研究对象最好的手段,凡每下一笔都牵涉到结构的整体和画幅的构图,是从结构理解分析对象的,这种写生,眼、脑、手并用,高度集中,故而,物象的形体,经一笔一笔贯入脑子里,如生字的认识,逐渐积累下来。”<sup>[1](P.97)</sup>

关山月倡导传统中国画的创作规律,与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的应目会心,得心应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触物为情,摄等注重作者内心世界、

抒发主体情感的观念一致。中国画创作,不是自然主义的客观再现,而是从客观到主观,主客观结合地反映生活。他反复强调中国画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借景抒情,为了发挥笔墨描写对象的情意和作者对事物的感受。

康有为曾云:“以复古为革新”,可以视为艺术演进的方法和策略。诚如郎绍君先生阐释:“‘以复古为革新’本质上不是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旗号、为途径的推进与创造。中国绘画千余年来的演进尤其此特点。”<sup>[4](P.272)</sup>例如我们熟知的元代赵孟頫倡导的“古意”,其实质是通过复古来创新。关山月先生对传统绘画精神的回归,是在20世纪初中国画的改革风潮中试图找到一条可行的,能够真正推动中国画发展的正途,并且反复在创作与教学的实践中验证这些颠扑不破的观点。

画好中国画并非易事,如果以为中国画只是寥寥数笔,只是天赋才华的体现,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画家的优秀作品必定是在长期刻苦的各项基本功的训练的前提下,数易其稿得来“立意不易,达意也难。炫耀一挥而就,难免不是胸有成竹而只笔有定型的自矜。真诚的中国画画家,只有数易其稿的苦衷,而无一挥而就的福气。”<sup>[1](P.88)</sup>

生活实践和时代精神,始终是左右画家立意和达意的最要紧的因素,是法度千变万化的前提条件。“法不一而足,思之三即行。”“更新哪问无常法,化古方期不定型。”“法度随时变,江山教我画。”“自然中有成法,手肘下无定型。”等等,都是关山月自撰的座右铭,也是他在美术教育中坚持贯彻的核心精神。

#### [参考文献]

- [1]关山月.乡心无限[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 [2]刘济荣、关怡.教学相长——美术教育家关山月.关山月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A].“纪念关山月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C].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
- [3]关山月.关山月纪游画集[M].广州: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美术丛书.1948.
- [4]郎绍君.以复古为革新——艺术演进的一种方式.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南山)



# 霍利·霍比的迷人世界

——图画书《嘟嘟和巴豆》艺术性简析

贾如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嘟嘟和巴豆》是一套精美的儿童图画书,画家霍利·霍比以朴素温暖的故事、可爱风趣的形象、明亮斑斓的色彩、温暖细腻的情感和天真稚拙的气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明亮温暖、充满友情与爱的迷人世界。

**[关键词]** 图画书; 故事; 形象; 色彩; 情感

**[中图分类号]** J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1-0117-03

如果说有一种图画书既能让孩子感受到健康快乐的童趣,又能让成人体会到温馨感动,美国女画家霍利·霍比的《嘟嘟和巴豆》正是这样一类书。这套《纽约时报》最畅销的图画书、亚马逊网站五星级童书,以朴素温暖的故事、可爱风趣的形象、明亮斑斓的色彩、温暖细腻的情感和天真稚拙的气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明亮温暖、充满友情与爱的迷人世界。

## 一、朴素温暖的故事

“嘟嘟和巴豆,住在一个名叫喔的咯咯喔咯的地方。”故事这样开始了。嘟嘟和巴豆,是两只个性不同的粉红色小猪:巴豆居家,享受烹饪和园艺的乐趣,是个典型的“宅男”;嘟嘟冲动,酷爱旅行和冒险。就是这样性格迥异两个小伙伴,他们热爱生活、关心彼此、拥有牢固的友谊,他们彼此分享喜悦、分担烦恼,他们一次次的分别,然后彼此挂念,最后相聚,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俏皮、充满爱、友情的故事。

《嘟嘟和巴豆》系列十本图画书中,有分享世界各地旅行冒险见闻的《两个好伙伴》、《真希望你在这里》;有发生了离奇遭遇的《我会回家过圣诞节》、《迷人的奥碧儿》;在故事《迷人的奥碧儿》中,巴豆的表妹奥碧儿掉了一颗乳牙,满怀期待地

等牙齿小仙女来收走,已经不再是幼儿的巴豆似乎对牙齿小仙女是否真的存在抱有怀疑,为了不让表妹失望,他决定自己扮演牙齿小仙女,于是我们看到了用浴帘、浴帽、衣架把自己装扮成“小仙女”的光溜溜的可爱又可笑的巴豆,在被巴豆逗乐的同时,我们也不禁被他的善良所感动。

还有两人一起分享快乐的《世界之巅》和分担坏情绪的《你是我的阳光》;《新朋友》含蓄地表达了每个人都有优点和长处的小道理;《独一无二》教孩子与朋友相处要善良大度。在《送给嘟嘟的礼物》中,巴豆为了送给嘟嘟一份“有史以来最好的礼物”,花了两天时间出门精心挑选(尽管出门购物让他很紧张),并煞费苦心让礼物——鹦鹉邱丽提前一晚藏在工具房,只为第二天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另一本与之内容相似的《快下雪吧》,则演绎了两个好朋友如何花费心思送对方一件特殊的圣诞礼物,故事洋溢着浓浓的温情。整套书充满了欢乐和舒服的感觉。

## 二、可爱风趣的形象

霍利·霍比笔下的两只小猪形象,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为什么他们长得一样?通常,画家为了塑造不同的形象,也便于读者区分,在设计两个主角形象的时候会刻意在造型、色彩上进行区

**[收稿日期]** 2014-12-25

**[作者简介]** 贾如丽,女,安徽滁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别呈现,如一个胖一个瘦,一个高一个矮,抑或是画成不同的肤色。但嘟嘟和巴豆显然不是,嘟嘟通常穿黄色上衣和土黄色大短裤,巴豆是一身黑白条纹衫和蓝色背带裤——除此之外,两只小猪的模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更别说他们有时还换衣服,甚至常常光着身子!因此在当当网上一些家长抱怨说两只小猪一模一样,大人都分辨不出来。



霍利·霍比为什么要这样画呢?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创作经验的画家,绝非是她一时疏忽,更不是处理方式的欠缺,探究这套图画书的绘画风格,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本书的绘画风格显然不是卡通风格,这或许会让一些习惯了欣赏卡通漫画的家长和孩子感到稍许不适应:猪的形象夸张得还不够!卡通形象的最大特点就是大胆的夸张、变形以及拟人化,突出形象的个性特点,力图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深刻的视觉记忆。而《嘟嘟和巴豆》的绘画风格是略带漫画式加自然写实的风格。除了穿着衣服和直立行走,小猪们保留了猪的基本外形特征,但他们的表情、动作无不是拟人化的、散发出亲切、可爱的幽默感——这不由让人联想到英国古典图画书作家比阿特丽克斯·波特图画书中那些穿着衣服的小动物们和彼得兔——不过嘟嘟和巴豆的表情和动作刻画显然比彼得兔更为丰富细腻和夸张有趣,体现了典型的美国式漫画特征:夸张肢体和表情的动作,强调动感。画家更多地是通过这些细节刻画来表现两只小猪的不同性格,而刻意忽略他们外貌特征的区别,画家或许是想表达:这样两只亲如兄弟的好伙伴,就该长得一样嘛!本套书的最后一个故事《快下雪吧》,里面有

个细节其实就暗藏着霍利·霍比的意图:圣诞节那天奥碧儿收到了嘟嘟和巴豆送给她的礼物:两只小猪玩具娃娃,但分不清楚“它们谁是谁”,“一个可能是嘟嘟,另一个可能是巴豆”,为什么它们这么像呢?奥碧儿说“它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性格不一样。”

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认为,给孩子看的画首要就要有趣,中国连环画大家贺友直先生认为画画就要会使点俏皮,两只小猪刚出场时,宅男嘟嘟的性格只用一张他做爆米花的图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看他一手握着高压锅、一手掐着腰,头高高扬起,再看他眯着眼,嘴角上扬的表情,一脸的满足和享受——这是一只多么热爱生活的居家小猪!

还有诸多有趣的细节刻画:冬天巴豆在啾啾的池塘滑冰,像个专业的滑冰运动员般地旋转、舞蹈,姿势既专业又优雅,可到了春天,他脱光衣服跳进烂泥塘里,打滚、撒欢,压根就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小猪呀!不禁让人哈哈大笑。这不也正是孩子的天性吗?所以很容易引起孩子的共鸣。孩子们一定很羡慕巴豆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玩泥巴,也都曾经梦想自己能够在雨天任性地踩一次水塘而不被妈妈责骂吧?在《我会回家过圣诞节》中,当巴豆得知嘟嘟要从国外旅行回来,激动地在家里打扫卫生来迎接嘟嘟,画家用了五个连续的小画面:读信、打扫、烹饪、摆花、刷牙,打扫那张,撅着屁股对着画面的巴豆居然把灰尘都扫进了地毯下面!他不仅大搞房间卫生,个人卫生也不马虎,瞧他龇着小白牙洗刷刷的模样真逗人!在《迷人的奥碧儿》里,霍利·霍比是这样透过细节刻画角色性格的:嘟嘟、巴豆和达芙妮去池塘游泳,嘟嘟光着身子,只在手里拿着一个小帆船模型,而巴豆拿着浴巾、潜水鞋,带着鸭舌帽,手里还拿了一个小瓶子,仔细看——防晒霜!没有多余的文字说明,这些可爱幽默的小细节表现了两只小猪全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当然,这些都需要读者用心观察和体会。

### 三、明亮斑斓的色彩

水彩画具有独特的轻盈透亮和明快的特点,是不少图画书画家钟爱的创作媒介,《嘟嘟和巴豆》是一个充满阳光、温情、欢乐的故事,用轻松的线条与明快的水彩来表现,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霍利·霍比运用了极其娴熟精湛的水彩技法,为

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精美的画面：温馨的小木屋，树林里斑驳的树影、春天的明媚阳光、冬季的皑皑白雪、圣诞夜温暖的炉火……画面充满了诗意、优雅、美好，体现了画家对生活多年的细致观察和深厚积累，对生活的深深热爱。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审美的愉悦，这样美丽的图画书真是不可多见。



儿童读物插图具有美育功能，高质量的优秀的绘画既能让孩子兴致浓厚地走进故事中的美妙世界，进行快乐地体验和历险，又可以通过画面的色彩、形状、光影、空间感受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敏锐他们对美的触觉，学会欣赏美，得到审美享受。儿童在审美心理结构中，顺应能力、可塑性强，他们易感、易接受各种艺术形式和思想情感、易被规范整合，所以他们接受的作品品质和品位就极其重要了，孩童时代所接触的作品对他们一生都会有深远的影响。长期浸润在精美的儿童读物插画中的孩子，无疑对美的触觉更加敏锐，能得到更多的审美享受，形成对美与丑的判断能力。书中美丽的自然景观对于今天生活在都市中的孩子来说，也都是难得一见的：春天里闪闪发光的树叶，秋天缤纷的黄叶，古老的小镇、高山湖泊、热带丛林……绚烂却不张扬，美轮美奂，令人沉醉。

色彩是烘托气氛、表达情绪的主要因素，霍利·霍比特别擅长运用冷暖色调和对比营造气氛。《两个好伙伴》中，大雪纷飞的夜晚，笼罩着一片深蓝色调，小木屋的两扇窗户透出暖黄的灯光，通过冷暖颜色的对比表现两个好伙伴久别重逢的

欢乐。接下来的一张，两只小猪已经美美地躺在各自床上厚厚的被窝里了，整个画面笼罩在明亮温暖的光影之中，多么温暖、愉快的夜晚！《你是我的阳光》里大量运用了灰蓝色调来烘托嘟嘟的低落情绪，而当他重新找回快乐心情之后，画面立即呈现出明快的色彩。

#### 四、含蓄丰富的情感

《嘟嘟和巴豆》是一本没有说教的书，它用看似平淡无奇的情节和语言展示儿童的天性和认知方式，以及对生活、对情感世界的体悟，充满了健康有爱的人文关怀。即使是那个有点自傲、爱出风头的达芙妮、那个爱抄袭别人想法的芭布丝，也都是一幅孩子气的模样，而且故事总以幽默的结局化解小小的不愉快。每个故事都简单朴素，没有故意迎合孩子的夸张做作和吸引眼球的一波三折，丰富的情感表达，细腻而含蓄。

当好朋友没由来地情绪低落，你该为他做些什么呢？嘟嘟一连好几天闷闷不乐，巴豆除了默默陪伴，还做了很多努力：给他做了一个冰镇浆果大冷盘，带他一起穿越急流，请来几个小伙伴陪嘟嘟一起玩耍……虽然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然而终于当一场暴风雨后，笑容重新回到脸上的嘟嘟在心里默默地想：“好朋友是绝对必要的！”看似情节平淡，却是经过层层铺垫达到最后的点睛之笔，含蓄地表达了朋友之间的真诚关心和默默付出，这种关心无需过多言语，也不求回报，而被关心的一方也懂得感恩，懂得珍惜。这小小的故事里其实蕴含着大大的道理，这也正是儿童阅读中最珍贵的人文关怀精神。

艺术创作源于情，是情感的表达，图画书的创作要融入对儿童的关爱之情。它需要画家反复琢磨主题、琢磨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启动回忆，启动情感，在感动的情境中带着童心去创作。在儿童的故事中感动，这对成年人来说确实是很困难，因为画家未必都始终胸怀童年的美好情愫。而霍利·霍比的《嘟嘟和巴豆》故事既幽默又不故弄玄虚，形象既天真又不做作，色彩既鲜艳又不甜腻，正是这种含蓄而又丰富的情感打动着每一个读者。

（责任编辑 南山）

# 2014 年社会科学总目录

(作者姓名后的数字是刊期和起始页码)

## 【本刊特稿】

从货币经济学走向货币政治学

——评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货币章”的解读

袁久红(1.1)

社会治理演化的历史考察

严强(3.1)

论组织模式变革中的组织规则

张康之(4.1)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毛泽东的历史遗产

刘林元(6.1)

大卫·哈维: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

胡大平(7.1)

##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及革命诗学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研读 刘丽(7.8)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陈磊(7.12)

资本主义的持存与新帝国主义

——评哈维的《新帝国主义》 徐兴华(7.16)

## 【素质教育论坛】

“要我学”→“我要学”

班华(1.7)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成因的叙事研究

罗琳(1.11)

“问题学生”与校园“教育冷暴力”现象探析

谢方圆 孙承毅(1.15)

当今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研究

王郢 杨灿灿(7.20)

1912—1922 年普通中小学校图画课程改革述评

郑宪恒 胥笋笋(7.23)

新媒体对青少年阅读行为的影响与对策

王咏梅(7.30)

多元价值背景下大学生信仰教育探略

黄海(10.1)

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调查研究

——以扬州市为例 金奇(10.5)

学生社团: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新载体

王玲(10.9)

江苏大学生手机阅读调查:现状、问题及对策

——对南京七所高校的统计分析 吴翔 陈晓敏 胡琨琨(10.12)

## 【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义务教育均衡问题的理性沉思 郑友训 尧新瑜(3.10)

“放大眼光”的地方教育行政

——夏承枫地方教育行政思想述略 郑友训 尧新瑜(3.15)

## 【“生活力与生活教育”研究】

培养生活力是“生活教育”的根本宗旨 高谦民(1.51)

生活力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当代新发展 王铁军(1.55)

教师生活力及其提升 秦德林(1.60)

陶行知生活力专题研究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顾伟(6.9)

论“生活力”的教育思辨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追溯和重审 邱磊(6.16)

陶行知“爱满天下”教育情怀的原因探析

许庆如 丁锦宏(6.21)

## 【教师教育研究】

教师自我提升培训调查分析

李林 李娟 熊莉莉 舒康云(1.64)

试论教师教育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铸成 宗序亚(1.69)

芬兰科学教师培养模式探析

——以赫尔辛基大学为例 亓英斯 柏毅(6.53)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背景下的学前教育教育

——以江苏省五年制高等幼儿师范学校为例 杭梅(6.56)

21 世纪以来美国教师教育研究的引文分析

——基于 2000~2011 年 JTE 的可视化分析 杨天平 欧玉芳(9.1)

刘百川教育思想探析 凌宗伟(9.7)

## 【学前教育研究】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拟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田燕(1.72)

大班幼儿在园环境公德行为的干预训练

王小娜 丁芳 曹令敏(1.77)

幼儿主题探究活动中的闽南本土文化传承路径探析

沈雯(6.60)

美国 0—3 岁早期教育实践综述及启示 余春瑛(6.63)

幼儿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探析 王玲玲(9.31)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幼儿园教育

——基于对 466 对新生代农民工夫妇对学前教育认识及态度的调查 张硕(9.35)

## 【德育·心育】

人格特质在社交网络中的表现 陈友庆 胡婷婷(3.23)

中学课堂教学交往情况调查研究 南腊梅(3.28)

大学生诚信缺失现状、原因和对策 朱卫国 梅贞(3.34)

大学生理性爱国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戴韶华 段文忠(12.5)

90 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发展性评价与矫正 李贵平(12.11)

“新媒体一代”闲暇生活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丁炫凯(12.15)

初中生羞怯、焦虑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关系

张露 丁芳 曹令敏(12.19)

学习习得性无助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李玲玉(12.26)

概念组合的具身观:具身概念组合理论述评 张师辉(12.30)

## 【德育·家庭教育】

关于家庭教育立法有关问题的思考 刘守旗(4.8)

自媒体中鄙俗词汇引出的道德认识问题分析  
——基于南京某院校 192 份样本数据  
巩欢 花亚纯(4.13)

军人和大学学生的集体主义及爱国主义倾向调查  
刘秀杰 陈友庆 潘萧羽(4.17)

### 【教育经济学】

江苏省区域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分析 李星云(3.38)  
义务教育财政政策在县级基础教育部门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  
——以安徽省 H 县为例 李冰仙 刘玲(3.43)

### 【教师教育研究】

高校教师教育专业交互式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陆丽云 赵媛(3.47)  
隐性知识共享视域下教师发展平台的构建 周洋(3.50)  
发达国家初等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及启示 宋雅(3.54)  
论教师社会交流语言“三忌” 王家伦 陈琼(4.22)  
发达地区学前教育师资发展现状与研究  
——基于浙江省绍兴市的调查分析 孙燕(4.25)

### 【课程与教学】

语文走向与主流话语的百年演进 李震(1.107)  
1962 年中学历史基础知识问题讨论意见述评 李长印(1.120)  
应试教育与课程改革辨析 陈尚达(3.58)  
高校德育显性课程透视 邱丽华(3.64)  
归真,政治课教学泛政治化批判 赵春宇(3.69)  
案例教学:法学本科教学的生命 邵维国 张竹云(4.80)  
浅析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构 段冰(4.84)  
浅《贸易经济学》课程教学创新探讨 唐红涛(4.88)  
电子商务实验教学的策略优化研究 杨以文(4.91)  
探索高等师范院校历史学本科专业《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建设的途径 梁励(6.67)  
“以学定教”的教学意蕴阐释及其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特征  
马维林(6.71)

### 【高教研究】

应用型高校专业导师制的实践与思考 黄玉安 杭祖圣(4.31)  
困境与突破:高校实践育人路径探析  
鲁焯 吴鹏 管其雨(4.35)  
通识教育视阈下的高职公共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职业核心能力维度探究 吴炜炜(4.39)  
提升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机制探索 王曦(9.14)  
学科精英的群体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钱洁(9.20)  
和谐学科生态系统的演替机制及构建策略选择  
王平 赵志强(9.24)  
“微媒体”视域下高校舆情建设路径探究 陶赋雯(9.28)

### 【课程教材教法研究】

“临床教育学”视域下语文教学论课程的优化研究  
金荷华(10.86)  
试论课程实施中的权力与控制 王佃(10.92)

基于三种理论指导下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构建的探析  
——以南京市 S 中学为例 王悦(10.96)

### 【政史哲经法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基本途径分析  
崔志胜(1.18)

共生与互渗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  
自觉生成机制研究 汪堂峰 汪丽红(1.24)

都铎时期英国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探析 黄光耀(1.29)

历史学视阈下道教政治思想研究的范式及其价值与意义探析  
陈胜(1.36)

论清末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与异化 刘霆(1.39)

《尚书》中所见“道”字考辨 徐团 张笑川(1.44)

初盛唐政治家与庄子 鲍鹏山(3.7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论曾国藩之原因探析

梅乐(3.7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妇女家庭地位的嬗变  
郭婷婷 刘金源(3.80)

论古埃及拉美西斯时代的皇家墓地工匠  
——以麦地那工匠村为例 徐昊(3.84)

江苏省制造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 王健 李致平(3.88)

浅谈新媒体时代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华星(3.93)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动力研究述评 陈宗章(4.44)

浅谈新媒体时代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华星(4.49)

民国时期江宁县存废争论探析(1927—1934)  
朱彦同 齐春风(4.52)

文化动力与实践反思

——略论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的内涵、使命以及发展路径  
尚文隆(4.58)

人才特区建设现状评析 王培君(4.62)

知识产权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协同机制研究  
赵志强(4.65)

产业政策·文化底蕴·园区集聚  
——2008—2012 年江苏城市动画宏观文化资本因子分析  
张建亮(4.69)

论美国过失责任中的合理人标准 范峥(4.74)

论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举证规则

——兼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不足与完善  
张素凤(6.24)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向度 汤丽芳(6.29)

波里比阿史学探究 李红霞(6.34)

明清时期洞庭秦氏家族研究

——以《洞庭秦氏宗谱》为中心 秦婷(6.38)

浅析东晋龙亢桓氏江左的地域选择 丁振伟(6.43)

浅论以色列在“消耗战”中的国防战略调整 张莹(6.49)

辛苦营生的近代江南村妇

——以民国时期的苏州轿妇为例	张帆(7.33)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动机分析	
——以边沁的功利学说为研究视角	张欢欢(7.38)
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纳西语为例	李莉(7.42)
南阳汉画像石墓出土铺首衔环分析	顾伟(7.46)
浅析我国政府在网络招聘中应承担的职能	肖可(7.49)
析论 1956 - 1965 年徐州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抗救措施	郭世玉 蔡雪珍(7.54)
内化经济:当下经济新范式之研究	成乔明(7.58)
适应性团队:转型背景下中小企业团队构建新思路	张志行(7.65)
船舶抵押权中“抵押权人同意”制度研究	封海波(7.69)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战略举措	李安林(9.41)
论民间道德力量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影响	王霞(9.45)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王静波(9.50)
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为例	张圆(9.54)
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初探	
——以五卅运动前后英美烟公司产品为例薛意歌	李一翔(9.64)
浅探张易之、张昌宗对武周晚期政治的影响	马舟(9.64)
GKN 丹阳公司采购流程优化对策分析	吴蓓蕾(9.67)
南通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建设中人才高地构筑策略研究	谢度(9.71)
金融行业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保障机制研究	张杰 张成翠 刘晶(9.78)
毛泽东和平解放战略在西藏的实现	董传奇(10.18)
延安时期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及当代启示	徐岑琛 鞠健(10.27)
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建设	王恒亮(10.30)
奥巴马政府伊朗政策中的以色列因素	季慧(10.34)
李煦奏折硃批研究	
——读《李煦奏折》	俞润生(10.39)
化解与包容:论“三武”法难时的佛门应对	郭少丹 朱艳艳(10.43)
试论我国高校毕业生供给、需求、匹配政策的调适	孙倩(10.48)
高校资产管理与内控机制建设探析	张其飞(10.52)
1949 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之研究	董鹏 黄志红(12.46)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初探	潘国红(12.52)
近 30 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综述	王倩雯 彭校(12.58)
基于 FDI 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分析	
——来自江苏苏州的实证	吉丹俊(12.63)

## 【文学研究】

论托马斯·曼的《特里斯坦》和赵玫的《寻找伊索尔德》	姚公涛(1.84)
浅析《无名的裘德》中女性气质的边缘化	曹磊(1.88)
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	
——以钱锺书《围城》《人·兽·鬼》为例	龚郑勇(1.91)
从“学者作家化”到“教授写小说”	
——对当前一种文学现象的解读	黄书泉(3.96)
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	
——以钱锺书《围城》《人·兽·鬼》为例	龚郑勇(3.104)
论和而不同原则下的非中心意识与本土意识	
——兼论跨文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研究	薛瑞东(4.94)
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的暴风雨意象研究	吴蔚(4.98)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欲望书写	袁家丽(4.102)
安吉拉·卡特短篇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研究	郑爽(4.106)
中国传统文学的换形变体	
——论“诗化小说”的兴起与传承	贺仲明(6.76)
被忽略的一年	
——谈《狂人日记》的即时反响兼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	张钰(6.81)
一部优秀的“亚自传”	
——评毕飞宇新作《我们小时候·苏北少年堂吉珂德》	宋雯(6.84)
疏离、死亡、叙述	
——解读《聚会》中的创伤	洪芸 石云龙(6.88)
试论托尼·莫里森《家》的文化书写	李亚利(6.92)
郭璞作为诗人的命运	[日]林田慎之助著 曹旭译(7.73)
巧于互补 失之抵牾	
——鲁迅小说与杂文比较	林荣松(7.81)
淮安望社形成及其成员与浙江籍流寓文人交游议考	郎晓斌 陈亮亮(7.85)
逆写帝国	
——康拉德与《诺斯托罗莫》	何文玉(7.89)
元稹诗文辨伪汇集	吴伟斌(8.82)
民歌与民俗关系研究论纲	杨思贤(9.88)
谈爱伦·坡短篇小说《幽会》中的陌生化效果	徐薇(9.94)
一座自由孤独的花园	
——论《他们眼望上苍》中寻找“他者”的珍妮郭雨微	(9.97)
论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表征	马卫华(9.100)
“新文体”:中国散文现代化的临界点	姚苏平 钮庭友(9.105)
思的深邃与诗的澄明	
——评蒋成德的《思与诗——郁达夫研究》	萧洪恩(10.56)
论 1940 年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	
——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为例	黄玲(10.63)
《仇池笔记》不同版本形成始末及异同辨析	李艳 丛晓静(10.70)

20 世纪以来《牡丹亭》主题研究综述 王雪松 蒋小平(10.75)

担当联结者的新女性

——解析《霍华德庄园》中的玛格丽特

高敬 石云龙(10.79)

寻找黑人女性的精神家园

——佐拉·尼尔赫·赫斯顿和艾丽丝·沃克的宗教思想探析

蒋曙(10.83)

叶燮的诗学观：“物我相合而为诗”

祁志祥(12.69)

宋代奏议集序跋之书写特色及心理期待

梅华(12.74)

晚明周履靖“和陶诗”论略

邓富华(12.79)

《安禄山事迹》的叙事艺术

——兼与正史比较 凌帆 王立增(12.84)

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应“知识、情商、能力”兼顾

——以“明代诗文”教学为例 徐燕(12.95)

《纯真年代》中华顿对男性神话的解构 孙晓明 姜礼福(12.100)

移置、流放、错位：“间质空间”视域下的《祖先游戏》

鲁晓川 胡戈(12.104)

E. B. 怀特的幻想世界

——以《夏洛的网》为例 陆新(12.108)

### 【英语教学研究】

从格式塔意向重构探究散文翻译的审美再现

——以《自深深处》的汉译为例 李栋颀 石云龙(3.108)

论大学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中的隐性文化阻碍

周艳艳(3.112)

从格式塔意向重构探究散文翻译的审美再现

——以《自深深处》的汉译为例 李栋颀 石云龙(4.110)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以《老人与海》的汉译为例 李健(4.114)

论大学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中的隐性文化阻碍

周艳艳(4.118)

典型理论对分句中 than 词性界定的启示

刘连营(4.121)

汉学论著翻译问题论析

——以伊沛霞《剑桥插图中国史》为例 张芳(7.93)

大学英语阅读策略培训的教学设计 蒯莉萍 冯哲(7.98)

当代网络流行语英译研究综述 李梓 江波(7.102)

公示语翻译的时代特征及翻译策略 杨慧群(7.105)

影响三语写作成绩的学习者可控因素研究

刘玲玉 孔德明(10.100)

自我效能感对英语学习者的影响 沈文燕 胡俊杰(10.107)

语篇分析在大学英语阅读课中的应用 刘娟(10.110)

《西游记》第 59 回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王烨 刘宗敏(12.114)

“去英语化”时代高校英语教师出路探析 王春梅(12.120)

### 【艺术研究】

理论纷争与经典的变迁：从先锋到后先锋 周韵(1.95)

作为“历史流传物”的艺术经典：阐释及其有效性 翁再红(1.99)

艺术史书写与经典建构

——以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例 李健(1.103)

通过革命而进步的民国书法 曹院生(3.115)

石涛“不似之似”说对齐白石绘画形神观的影响 潘富群(3.124)

拉魂腔“三大剧种”音乐渊源及形成探微 薛雷(6.96)

从梅村二胡艺术看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朱磊(6.101)

爵士乐衬词唱法(Scat Singing)和传统民歌衬词唱腔艺术简析

孙黄澍(6.105)

浅析《冬之旅》与《诗人之恋》创作特色 王健(6.109)

试论大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培养 陈澄(6.113)

江苏地域文化资源视野下的“傅抱石”研究、保护与合理利用

黄戈(7.107)

中西绘画融合时期的笔法特征

朱平(7.112)

《韩熙载夜宴图》主人公考略

何韵潇(7.116)

论艺术二重性及当代美学的可能性

殷曼婷(9.110)

艺术解体抑或艺术转型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及其反思

郭丽萍 章桢(9.114)

陌生化之旅

——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布莱希特 杨向荣 陈丽(9.119)

朗诵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性 张洪侠(10.113)

江苏同宗民歌应用于高校音乐教学初探

王音 方露娜 王春燕(10.116)

文化创意产业园形象设计问题探析 赵岳峻 陈曦(10.119)

装置艺术在广告设计中的影响 张蔓青(10.122)

### 【编辑学研究】

参考文献著录若干问题探讨 曹小春(6.115)

用一生做好一个选题

——编辑的责任、价值和学养 金薇薇(6.118)

### 【教育思想研究】

胡瑗教育思想的当下继承与应用

——以江苏省泰州中学为例 张树俊(12.1)

### 【核心价值观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论析 李东晓(12.36)

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印亚军 徐惠忠(12.42)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eform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WANG Chun – jie WEI Zho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is a crucial part in the layout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hich has a close association with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Deng was in exile to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late 1960s, he reflected on the ultra – left ideological trend that was prevalent for many years and the deficiencies existent in the system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and then realized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political system. After Deng's visit to Japan, Singapore and America in the late 1970s, he recognized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foreign countries and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rgency of reform.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political reform, Deng was extremely cautious about it. Nowadays, with the economic reform obtaining great achievements and the citizens' rising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aunching the political reform centered on restricting pow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ity, democracy,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policy – making not only has a better foundation, also appears more urgent.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political reform; political system; origin; evolution

## Research on the Measure of Suppor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With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at the Core

GUAN BING CHEN Guo – wei

(*Basic Education College,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ng, Guangdo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Anti – Japanese War is a special period to China.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economic resources, Kuomintang (KMT) born overseas turned their eyes again to the abroad. They not only carried out the reforms on the institution,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policy. To strengthen and cultivat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taken in education was to vigorously support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in support of these schools took the following steps, namely, setting up Chinese schools at home and abroad, training more qualified teachers, improv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providing funds, etc. Though making some achievements, there existed certain limita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one of which was that transplanting the party education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field exerted some negative effects.

**Key words:** Anti – 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support

##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Infringemen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Disabled in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Zhumadian

YE Ya – jie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30070, China;*  
*Soc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disabled belong to the weak social group most in need of help. Especially in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hey lead a more difficult life and need more care and help from the society. However, in today's information age,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some criminals swindle money out of the disabled and infringe on their security by making use of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city of Zhumadian, a relatively less developed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disabled,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such education methods as "audio network" and "slogans" to publicize law education and guide the disabled to take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being infringed.

**Key words:** the disable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evention of infringement;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Academic Project Development

Tomas De Piero; ZHOU Yu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New York, 14672, the US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conducted on May 1, 2013,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academic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es a new opportunity brought b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o traditional humanities and their academic project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1990's, when visual culture and digital humanities emer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was the first institution to set up the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project.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university has taken institutional efforts to develop digital human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cademic projects relies on faculty's professional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yet it may also bring new prospects for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isual culture, digital humanities

## Loc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he Early Realist Oil Painting

Zhu Ping

(*School of Fine Art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Western oil paintings, as imported goods, have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of history from their first arrival in China to today's prosperity. In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oil paintings, there exist multiple styles such as realism, freehand brushwork, expressionism and so on.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last century, realist oil painting gradually developed to posses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nese oil paintings centered on the theme of nationalization and made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in sync with times, which reflected the cultural choice of the era. This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 the introduction of oil painting techniques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progress, the extension of the nationalization theme and construction of realist creation ideas, and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under the tide of times, discusses the localization and evolution of oil paintings.

**Key words:** realist oil painting; localization; contemporary evolution